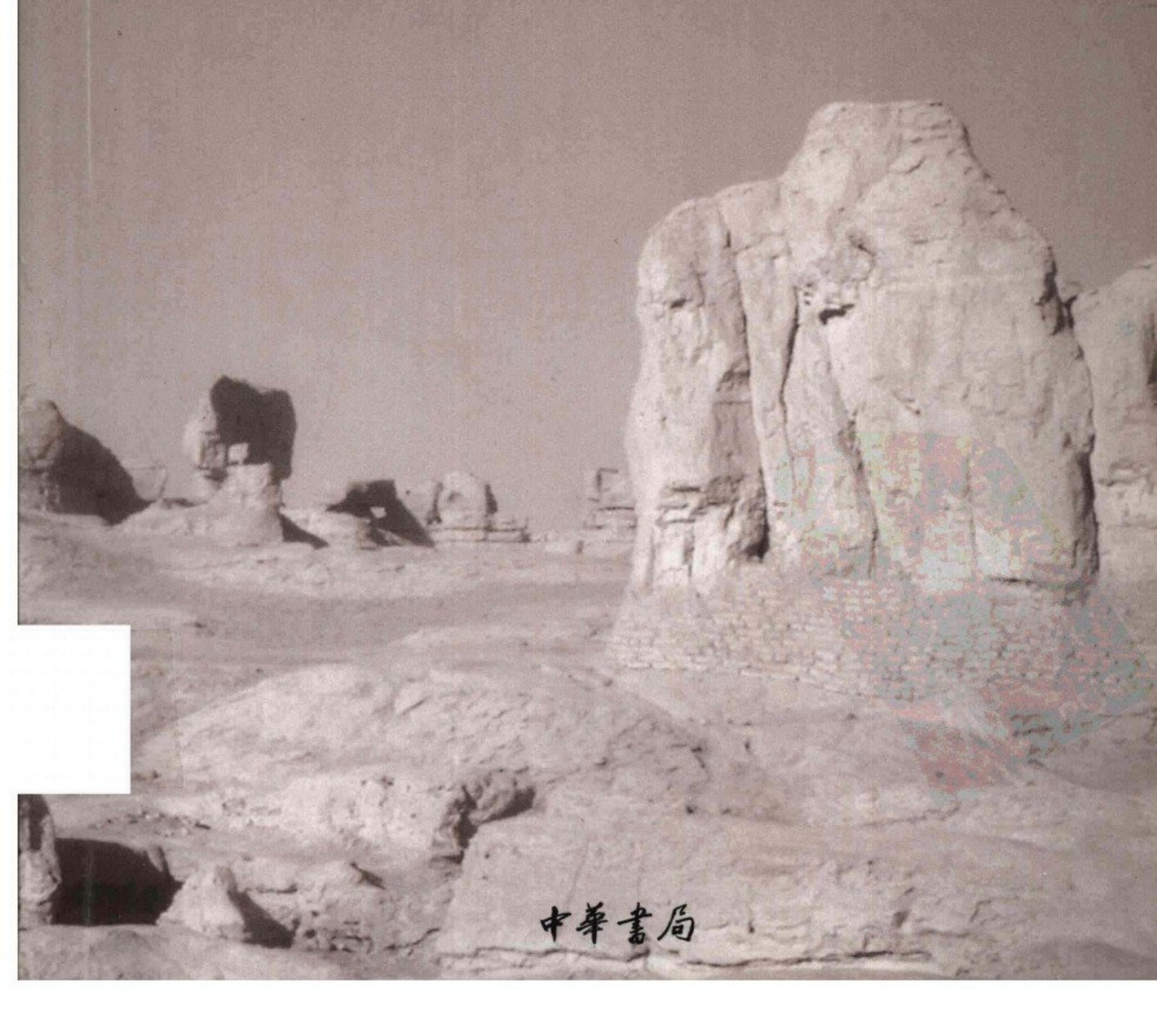
欧亚学刊

第五辑

EURASIAN STUDIES

余太山 李锦绣 主编



中華書局



责任编辑　马　燕
封面摄影　胡友鸣
封面设计　刘　莹

ISBN 7-101-04575-8
9 787101 045758 >
定价：38.00元

欧　亚　学　刊

Eurasian　Studies

第　五　辑

余太山　李锦绣　主编

中　华　书　局

2005・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亚学刊.第5辑/余太山,李锦绣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
ISBN 7-101-04575-8

Ⅰ.欧… Ⅱ.①余…②李… Ⅲ.①欧洲-历史-研究-文集
②亚洲-历史-研究-文集 Ⅳ.K1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06911号

欧　亚　学　刊
Eurasian Studies
第五辑
余太山　李锦绣　主编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19印张・356千字
2005年6月第1版　200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定价:38.00元

ISBN 7-101-04575-8/K・1979

目　录

CONTENTS

匈奴的崛起

余　太　山

一

最早为匈奴立传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据《史记》的记载，匈奴至迟在战国时期已经登上历史舞台。

据《史记·秦本纪》，秦惠文王后元七年（前318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这是《史记》中有关匈奴最早的记事。

《史记·秦本纪》所见五国攻秦事，又见于《史记·六国年表》和《史记·张仪列传》。后者作“其后五国攻秦……义渠君乃起兵袭秦，大败秦人李伯之下”。索隐：“表秦惠文王后元七年（前318年），楚、魏、齐、韩、赵五国共攻秦，是其事也。”[1]或据以为《史记·秦本纪》所谓“匈奴”其实是义渠[2]。

今案：此说有所未安。据《史记·张仪列传》，义渠君曾朝魏，犀首因“闻张仪复相秦，害之”，谓义渠君曰：“中国无事，秦得烧掇焚杅君之国；有事，秦将轻使重币事君之国。”后五国伐秦，秦王听陈轸之言赂义渠君文绣千纯、妇女百人。义渠君忆及犀首之言，遂起兵袭秦。可见义渠袭秦，必在五国“帅匈奴共攻秦”之后，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此后，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将李牧“常居代、雁门，备匈奴。……匈奴每入，烽火谨，辄入收保，不敢战。如是数岁，亦不亡失。……匈奴数岁无所得。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入，详北不胜，以数千人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陈，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3]。其事当在前3世纪中叶。

说者以为李牧所破也不是真正的“匈奴”。盖李牧守代、雁门之际，紧邻二郡塞下者，自西而东为林胡、襜褴和东胡，匈奴不可能越界侵犯。

今案:此说亦有未安。传文并列匈奴、襜褴、东胡、林胡,知传文区别匈奴于襜褴等。传文所见“单于”,显然指匈奴首领。没有证据表明襜褴等有此号。至于匈奴能否越界,取决于匈奴与林胡等族势力之消长,不能执一而论。

二

除《史记》外,《说苑·君道一》记燕昭王问于郭隗,有“齐人取蓟八城,匈奴驱驰楼烦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庙,恐危社稷”之语。昭王师郭隗,《资治通鉴》系于周赧王二年(前312年)。这也是匈奴在战国时期已登上历史舞台的证据。

楼烦,据《战国策·燕一》载苏秦说燕文侯之言:燕“北有林胡、楼烦”,则楼烦在燕之北。匈奴能“驰驱楼烦之下”,成为燕昭王“恐危社稷”的原因之一,说明匈奴越界来犯不无可能。

又,赵国之西亦有楼烦,《战国策·赵二》载赵武灵王之言:“今吾国……东有燕、东胡之境,西有楼烦、秦、韩之边,而无骑射之备。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其参胡、楼烦、秦、韩之边。”可以为证。

又据《史记·赵世家》,“惠文王二年(前297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西河”之范围不妨认为和西汉西河郡大致相仿,而据《汉书·地理志下》记载,雁门郡有县,名“楼烦”。师古注引应劭曰:“故楼烦胡地。”楼烦县(传赵武灵王所置[4]),一般认为在今山西宁武附近,紧邻西河郡东境。战国时期这一带亦为楼烦人居地亦未可知。燕北之楼烦与赵西之楼烦当为同种,但未必属于同一个政权。

林胡,据《战国策·燕一》所载亦在燕北,但应在楼烦之西。盖据《史记·赵世家》,二十年(前306年),赵武灵王曾“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5]。榆中,据“索隐”,在“胜州北河北岸也”,则其地在今内蒙古准噶尔旗东北。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见襜褴[6],“集解”引如淳曰:“在代北。”或在楼烦之东。

襜褴既在代北,则楼烦确切地说应在燕之西北。

至于东胡,《史记·匈奴列传》称:“燕北有东胡”。又载燕为防御东胡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五郡,可知东胡应在今老哈、西喇木伦二河流域[7]。

又据《史记·赵世家》,赵“东有燕、东胡之境。”可见东胡势力范围有时西向延伸至赵国北方,故为李牧所破。

匈奴崛起之前,据《史记·匈奴列传》,东胡“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不妨认为匈奴和东胡以大兴安岭为界[8]。

《史记·赵世家》载,赵惠文王“二十六年(前273年)取东胡欧代地”。“欧代”应即《史记·匈奴列传》所见“瓯脱”。惠文王所取何地,无从确指。而“索隐”注“欧代地”曰:“东胡叛赵,驱略代地人众以叛,故取之也。”

由此可见,战国时期的匈奴活动于襜襤、楼烦、林胡之北,其东即东胡,亦即长城以北、大兴安岭以西的蒙古高原。

另外,匈奴在战国时已屡有南侵之举。规模最大的一次,如《史记·廉颇蔺相如传》所记,竟有十五万骑。虽然史籍记载不详,但燕、赵、秦诸国苦于其侵犯的情况,不难想见。

正因为如此,《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二年(前214年),燕人卢生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三

“匈奴”与“胡”是同名异译[9]。“‘胡’本匈奴专名,去‘Na’着‘Hu’,故音译曰‘胡’”[10]。《汉书·匈奴传上》载匈奴单于遣使遗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更可证“胡”为匈奴自称。

前引文献(特别是《战国策》)的记载表明早在战国时,已有东胡、林胡和“三胡”等称呼,这也可以看作匈奴在战国时已经登上历史舞台的证据。质言之,这些名称的出现很可能都是在“匈奴”这一专名出现之后,是在“匈奴”一名的基础上形成的[11]。也就是说,林胡等称“胡”不是后来被匈奴并吞的结果。

既然没有证据表明林胡等与匈奴同种,则林胡等被称为“胡”,主要原因只能是其生活方式或文化形态与匈奴相类。这方面的证据有《战国策·赵二》所载赵武灵王之言:

> 今吾国……东有燕、东胡之境,西有楼烦、秦、韩之边,而无骑射之备。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其参胡、楼烦、秦、韩之边。

武灵王“变服骑射”所备既包括“参胡”,说明三者亦为骑射之国。

应该指出,虽然楼烦也在武灵王所备之列,但至少燕北之楼烦不被冠以“胡”称。前引《战国策·齐五》之文“胡人袭燕楼烦数县”云云,可证该处楼烦不被视作胡。而所谓“燕楼烦数县”,说明当时楼烦役属于燕,其人当半农半牧,且有城池。

赵李牧所破诸胡中不见楼烦之名,则表明楼烦不在犯赵诸胡之列。这可以和武灵王“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参看。

另外,《战国策·赵二》“变服骑射”以下数句,《史记·赵世家》作“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索隐”:“林胡、楼烦、东胡,是三胡也。”但似乎《战国策·赵二》更近实

际,亦即楼烦不在"参胡"之内。"参胡"也许应指林胡、襜褴、东胡,即李牧所破者。

司马迁虽然将战国乃至更早时期存在的北方诸族视作匈奴的前身,说"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史记·太史公自序》),将各族的所作所为全部归诸匈奴。但《史记》还是将匈奴和被匈奴征服的部族加以区分,选择了"匈奴"一名作为战国以来便游牧于蒙古高原,在冒顿即单于位后一统漠北的这一特定部族的专名。

《史记》既然继承战国以来的传统,将活动于燕、赵等国以北的诸族称为林胡等,"胡"这一"匈奴"的异译,有时便难免被用作北方诸族的泛称。《史记·匈奴列传》载:

> 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

其中,秦筑长城所拒之"胡",多半指匈奴。赵武灵王所谓"胡服",无疑指骑马诸族之服装,故武灵王效法的对象自然也包括匈奴在内;林胡、楼烦既破,赵国筑城置郡的目的主要是防备匈奴。燕将为质之"胡",或为东胡;东胡虽"却千余里",燕国无疑仍有"拒"之必要,但匈奴既曾"驰驱楼烦之下",筑城置郡所拒之"胡"显然也包括匈奴在内。

这就是说,"胡"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泛称,但"当是之时"即战国末期,秦、赵、燕三国北疆面临的主要威胁已不再是林胡等,而是匈奴。因此史迁才以"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一句结束前文。此句《资治通鉴·秦纪一》秦始皇帝三年(前 244 年)作:"天下冠带之国七,而三国边于戎狄"。改"匈奴"为"戎狄",虽然不能说错,但有失史迁原意。

正因为赵、秦等均"边于匈奴",才有《史记·匈奴列传》接着叙述的情况:"其后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云云。"

《战国策·燕三》载,樊将军亡秦之燕,太傅鞠武谏太子曰:"愿太子急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案:此事《资治通鉴》系于始皇帝十九年(前 228 年)。这可以视为战国末燕国"边于匈奴"之佐证。

四

《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崛起之经过曰:

> 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

“当是之时”，按之上下文，应为始皇帝三十二至三十三年（前215—214年）秦将蒙恬北击匈奴，收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以南地区）之后。

东胡被秦开击退而“却千余里”，年代不详。但传文称：“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既然“秦舞阳乃开之孙，计其年或在昭王（311—279年）时”[12]，则东胡至秦初已由衰转盛，且趁蒙恬收河南地、头曼单于败北之际，西向扩张其势力范围，压迫匈奴。

至于月氏，据《史记·大宛列传》，其势力范围东起今祁连山以北，西抵今天山、阿尔泰山东麓[13]。但极盛时其势力可能伸展至黄河以西[14]。据《史记·匈奴列传》，冒顿曾为质于月氏。由此可见“当是之时”匈奴和月氏关系于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所谓“头曼不胜秦，北徙”，按照上下文，似乎不应仅仅理解为被蒙恬打败，失去河南地。盖始皇命蒙恬北伐去蒙恬之死（前210年）不过五年，故若按“十余年”上推，头曼“北徙”当在前220年之前。因此，很可能此前秦人已有伐匈奴之举，而头曼“北徙”乃指匈奴放弃所占燕、赵长城之北原林胡、楼烦、襜褴之地。

要之，秦代匈奴东面受到来自东胡、西面受到来自月氏的压迫，南面则受制于秦。这种形势一直继续到秦末，中原陷于混乱，头曼单于才得以“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

冒顿继头曼即单于位后，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

> 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可知冒顿首先打击的是东胡。东胡破灭的结果，据同传，匈奴“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在今吉林、辽东地区）、朝鲜”。

破灭东胡后，冒顿掉转矛头，进攻西面的月氏。所谓“西击走月氏”，应是遏阻月氏东进的势头。其结果，据同传，其“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

消除来自东西双方的威胁后，匈奴便大举南下。首当其冲的是“河南地”。所谓“楼烦白羊河南王”，应该是居住在河南地的楼烦人[15]。被冒顿并吞之前，很可能已服属于秦。

传文没有提及被匈奴吞并的部族中有林胡、襜褴，似乎表明这些部族，包括燕北的楼烦均已不复存在。这似乎也可以说明战国末期，秦、赵、燕三国已经直接与匈奴为邻。

冒顿南进的结果，据同传：“单于之庭直代、云中。”也就是说此时单于庭已迁至漠北安

侯水(鄂尔浑河)。盖据《魏略·西戎传》,匈奴单于庭在"安习水";而"安习"系"安侯"之讹[16]。一说此前匈奴单于之庭一度可能在漠南阴山之北的头曼城,盖据《汉书·地理志八下》,五原郡"稒阳: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17]。今案:头曼城所在未必匈奴单于庭所在,也许只是头曼一度驻跸处。即使"东胡强而月氏盛"之际,匈奴亦未必局促于漠南阴山。

嗣后,《史记·匈奴列传》又载"后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犂之国。于是匈奴贵人大臣皆服,以冒顿单于为贤"。

浑庾,可能是北迁的鬼方或猃狁[18];屈射,与塞种诸部之一 Gasiani 或月氏同源[19];丁零,可能是赤狄之一支[20];鬲昆,即 3 世纪的坚昆和 7 世纪的黠戛斯(Kirghiz)[21];薪犂,似即《史记·李斯列传》所见纤离[22],亦即见诸后世突厥暾欲谷铭文中的 Sïr 和 7 世纪中叶称雄漠北的薛部族[23]。

其中,浑庾、屈射、薪犂三者的具体位置不详。鬲昆,一般认为在叶尼塞河上游,而丁零在贝加尔湖以西及以南色楞格河流域。

此后,《史记·匈奴列传》载,西汉文帝前元四年(前 176 年)冒顿单于遗汉书:

> 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24]。

乌孙故地在今敦煌以西、天山以东,可能在伊吾附近[25]。呼揭在今阿尔泰山南麓[26];"二十六国"应为"三十六国"之误,即所谓西域三十六国[27]。上述诸国在此之前皆役属于月氏无疑,既为匈奴所定,月氏在其上述故土已无容身之处,不得不西迁伊犂河、楚河流域。

《史记·匈奴列传》以下一段可以视作史迁关于匈奴崛起的总结:

> 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

作为"尽服从北夷"的结果,匈奴的领土东起辽东、西抵准噶尔盆地以西,南起长城,北至贝加尔湖。还应该补充的是,由于冒顿单于一再大败月氏,其势力伸向西域,西域南北道诸国尽皆役属之[28]。

注　释

〔1〕攻秦之五国,《史记·六国年表》作魏、韩、赵、楚、燕。

〔2〕参看曹永年《战国历史上的匈奴》,《光明日报》1963 年 4 月 10 日,《史学》双周刊第 259 号。

〔3〕《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亦称李牧居边"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韩、魏。当是之时,赵几霸"。

〔4〕见《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四(中华书局,1983年,p.395)等。
〔5〕此前,据同传,赵武灵王称其先王曾"败林人于荏,而功未遂"。"正义"以为"林人"亦即林胡。
〔6〕襜褴,《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又作"澹林"。
〔7〕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白鸟库吉全集·塞外民族史研究(上)》(卷四),东京,岩波书店(1970),pp.63-320,esp.69-71。
〔8〕白鸟库吉注7所引文,esp.69-70。
〔9〕王国维《鬼方昆夷玁狁考》,《观堂集林》卷一三,中华书局,1984年,pp.583-606。
〔10〕陈寅恪《五胡问题及其它》,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陈寅恪文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pp.194-195。
〔11〕例如:"东胡"一名,《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服虔曰:"在匈奴东,故曰东胡。"
〔12〕宋吕祖谦撰《大事记解题》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pp.53-56。
〔14〕余太山《古族新考》,中华书局,2003年,pp.29-52。
〔15〕《史记·匈奴列传》载武帝时卫青北伐匈奴,"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胡之楼烦白羊王"应为业已服属于匈奴之"楼烦白羊王"(《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作"白羊楼烦王"),《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则作"匈奴白羊楼烦王"。"白羊楼烦王"或"楼烦白羊王"指同一实体。标点本作"楼烦、白羊河南王",似乎欠妥。关于"楼烦白羊河南王",参看熊存瑞《先秦匈奴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1期,pp.110-113。
〔16〕说见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pp.24-25。
〔17〕说见马长寿注16所引书,p.23。
〔18〕注14所引余太山《古族新考》,pp.77-110。
〔19〕关于Gasiani或月氏之迁徙,参看注14所引书(出处同)。
〔20〕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pp.1-11。
〔21〕陈庆隆《坚昆、黠戛斯与布鲁特考》,《大陆杂志》51-5(1975年),pp.205-215。
〔22〕《史记·李斯列传》提到"纤离之马",知"纤离"亦游牧之国。说见马长寿注16所引书,p.24(注1)。
〔23〕参看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pp.180-184。
〔24〕白鸟库吉《烏孫に就いての考》,載《白鸟库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东京,岩波书店(1970),pp.1-55,指出:据《汉书·匈奴传》,文帝三年时,左贤王曾侵河南地,故击月氏应在三至四年间。
〔25〕注13所引余太山书,,pp.131-133。
〔26〕说见护雅夫《いわゆる"北丁令"、"西丁零"について》,载《瀧川博士还历纪念论文集·东洋史篇》,長野中泽印刷,1957年,pp.57-71。
〔27〕松田寿男《古代天山の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70年,p.37。
〔28〕参看余太山注13所引书,pp.272-274。

馨孽(Khingila)与那色波王(nspk MLK')考

马　小　鹤

俄罗斯联邦东方学研究所所长李特文斯基在《中亚文明史》第三卷第六章"哌哒帝国"中说："哌哒国家曾铸造货币，我们知道许多钱币系列。已经出版了出色的分类和类型研究的著作，但是还没有充分地把这些钱币作为一种史料来使用。"他所引用的哌哒钱币研究主要是戈布尔1967年出版的四卷本着作(Litvinsky,1996,页146;Göbl,1967)。本文主要结合文献资料，特别是汉文史料，分析两种主要的哌哒钱币：馨孽(Khingila)和那色波王(nspk MLK')的牛头冠钱币，探讨哌哒史上的若干重要问题。

第一节　馨孽(Khingila)考

在最近出版的《人类历史》第3卷中，宗德曼在第24章第6节中写道："金吉拉(Kingila)建立了哌哒王国，他的名字后来成了他的继承者们，甚至他们的继承者们——喀布尔的突厥沙希统治者们的王朝名称或共用的名字。金吉拉也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以此显示他不仅仅是贵霜诸王的继承者。大约6世纪初，哌哒侵入西北印度，取代了那里的寄多罗人。大约514年，哌哒霸主头罗曼与金吉拉系君主分裂，建立了他自己独立的印度哌哒王国。"(Sundermann,1994)

2001年1月5日《印度时报》报导，巴基斯坦历史学家丹尼分析了在北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新发现的梵文碑铭，碑铭记载了印度沙希统治者吠迦(Veka)建立一座湿婆神庙的事。丹尼认为，在阿富汗发现过金吉拉(Khingila或Khinkhila)的钱币，大食人叶耳孤比曾提及他，他可能是吠迦之前的国王(The Times of India,01-05-2001)。叶尔孤比提及的金吉拉是778年的喀布尔沙希，宗德曼说的金吉拉却是头罗曼以前、公元5世纪的哌哒王，时间相差3个世纪。钱币上的Khingila到底是哪一个呢？这引起了我们重新审视馨孽(Khingila)问题的兴趣，并由此涉及哌哒史的分期问题。

早在上个世纪末，钱币学家坎宁安就刊布了一枚Khingila钱币，并认为Khingila可以勘

同于迦罗那《诸王流派》中的 Khingkhila，至今不少学者仍然接受这一观点。1956 年在阿富汗加德兹发现了一尊大理石象头神雕像，雕像底座上有两行梵文铭文，记载了众王之王 Khimgala 建造这尊神像的事。学者们遂展开了钱币、《诸王流派》和碑铭上的 Khingila 是否可以勘同的讨论。1964 年，佩特奇发表一篇短文，提出碑铭和钱币上的 Khingila 与两《唐书》罽宾传中记载的此国先祖馨孽为同名异译，并指出阿拉伯史料中讲到过 778779 年的喀布尔沙也叫 hngl(* Hingil)。1966 年戈布尔出版了四卷本伊朗裔匈人（主要是哌哒人）钱币集成，刊布了他所掌握的 Khingila 钱币，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系统的钱币资料。

对于钱币、《诸王流派》、梵文铭文、汉文史料和阿拉伯文记载上的馨孽（Khingila）能否勘同，学者们意见纷纭。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认为钱币、梵文铭文、汉文记载中的馨孽可以勘同，时代大致在 5 世纪中叶，即头罗曼以前的哌哒王。这种意见以戈布尔、哈尔马塔、费耐生、宗德曼为主要代表。另一种意见认为，钱币、《诸王流派》、梵文铭文上的 Khingila 可以勘同，时代大致在 6 世纪上半叶，即摩醯逻矩罗之后的哌哒王。这种意见以比斯瓦斯、丹尼为主要代表。

本文在以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先尽量客观介绍钱币、碑铭和《唐书》罽宾传等文献资料，比较诸家不同意见，结合对当时整个形势的观察，考证哌哒历史上的这位重要人物馨孽（Khingila），估量他在其国家转折关头所起的作用，重写哌哒史上的一章。

一、钱币、碑铭和文献中所见的 Khingila（馨孽）

1. Deva Sahi Khingila 银币

坎宁安于 1894 年首次刊布了一枚 Khingila 银币，这枚银币以后又被许多学者研究过，戈布尔 1967 年著作中编号为 Em. 81[1]。根据历来的研究，这枚德拉克麦仿波斯萨珊王朝银币，直径 1.05 英吋，形制如下：

正面：仿萨珊王半身像，脸向右，无髯，上髭末端微微上翘，鼻子大而多肉；王冠是一种帽形冠，前部有新月饰，后有带饰，为两条飘逸的带子；（戈布尔王冠类型编号 K18）耳饰是一个小耳环下悬挂着两串小珠，每串三颗；冠后带饰的左面是一种标记⅄，通常被称为哌哒族徽（戈布尔戳记编号 S1）；半身像的右边是日轮（戈布尔戳记编号 S41）。

反面：模糊不清，戈布尔辨识为拜火祭坛，左右各有一祭师（戈布尔火坛编号 Typus 2，火坛的火焰上方没有苏鲁支的半身像）。

钱铭：正面：（婆罗谜文）：DEVA Ṣ ĀHI KHI ṄGILA。反面：无字。

出土地点：不明。

戈布尔在 1967 年又刊布了 3 枚同类银币，第 4 枚出土于喀布尔地区。

坎宁安将他刊布的那枚钱币上的 Khingila 勘同于迦罗那《诸王流派》中的 Khingkhila，认为他是摩醯逻矩罗之后统治克什米尔的匈奴人继承者之一，这一观点有长远影响，至今比斯瓦斯、丹尼等不少学者仍然接受这一勘同。

2. 迦罗那《诸王流派》关于 Khinkhila 的故事

迦罗那《诸王流派》是 12 世纪写作的克什米尔诸王的朝代编年史，第一卷第 289 至 324 节讲述了某个摩醯逻矩罗的故事，然后讲述了他的几个继承者的故事。第 346 节讲述了戈卡纳（Gokarna）的故事，接着第 347 至 349 节讲述了 Khinkhila 的故事[2]：

347. 他的儿子那伦德罗阿迭多（Narendrāditya），又名 Khinkhila，奉献了〔湿婆〕神龛布特湿婆拉（Bhūteśvara），并为供养婆罗门而建立了一笔永久的基金。

348. 他的上师名叫乌格拉（Ugra），受神恩宠，气质华贵，建立了湿婆神龛乌格瑞沙（Ugreśa）和一个"母亲神坛"。

349. 在地上统治了三十六年又一百天之后，这位虔诚的国王因功德深远而获升无邪世界。

3. 喀布尔象头神像上的梵文 Khimgāla 铭文

1956 年，印度政府派遣一个考古代表团前往阿富汗，代表团在喀布尔得知，数年前人们在喀布尔以南约 70 公里的加德兹发现了一尊大理石象头神雕像，这尊神像被移到喀布尔，受到当地印度教居民的崇拜。在雕像底座上有两行梵文铭文，已经专家释读[3]，翻译如下：

吉祥如意！于第八（samvat）年，逝瑟吒月（Jyeshṭha-māsa）白分第十三日，〔月〕宫在亢宿（Viśakha），狮子宫当空之吉祥时光，这尊摩诃毗那夜迦（Mahāvināyaka）大〔像〕由至尊（paramabhatteraka）、众王之大王（Mahārājadhirāja）室利·沙希·金吉拉·乌仗那王（śrī-sāhi-Khiṁgālaudyāna-sāhi-pādaih）所建。

摩诃毗那夜迦即象头神。对于 udyāna-sāhi-pādaih 的释读，学者们之间尚有不同意见。如果释读正确，其意为"乌仗那王"。乌仗那在今印度河上游及斯瓦特地区。

喀布尔地区在 630 年以前已经流行对象头神的崇拜，这种崇拜由来已久，这可以在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迦毕试国（喀布尔以北 62 公里的贝格拉姆）的记载中得到证实（Ji, 1985，页 156—157）：

城西南有比罗娑洛（PĪlusāra）山，唐言象坚也。山神作象形，故曰象坚也。

昔如来（Tathāgata）在世，象坚神奉请世尊（Bhagavat）及千二百大阿罗汉（Arhat）。山颠有大磐石，如来即之，受神供养。其后无忧王（Aśoka，？—前 232 年）即磐石上起窣堵波（Stūpa），高百余尺，今人谓之象坚窣堵波也。亦云中有如来舍利，可一升余。

4. 两《唐书》西域传罽宾国条中的馨孽

佩特奇1964年提出,上述碑铭和钱币上的Khingila与两《唐书》罽宾传中记载的此国先祖馨孽同名(Petech, 1964)。《新唐书》卷二二一上曰:

罽宾(Kāpiśī),隋漕国也,居葱岭南,距京师万二千里而赢,南距舍卫(Cravasti)三千里。王居修鲜城,常役属大月氏。地暑湿,人乘象,俗治浮屠法。武德二年(619),遣使贡宝带、金锁、水精醆、颇黎状若酸枣。贞观(627—649)中献名马。……十六年(642),献褥特鼠,喙尖尾赤,能食蛇,螫者嗅且尿,疮即愈。国人共传王始祖曰馨孽(Xingil),至曷撷支传十二世。显庆三年(658),以其地为修鲜都督府。龙朔(705—706)初,拜其王修鲜等十一州诸军事、修鲜都督。开元七年(719),遣使献天文及秘方奇药。天子册其王为葛逻达支特勤(Qarrïaci tegin)。后乌散特勒洒(Horsānteginšahi)年老,请以子拂菻罽娑(Frōm Kesar)嗣。听之。天宝四载(745),册其子勃匐准为袭罽宾及乌苌(Udyāna)国王。乾元(758—759)初,使者朝贡。

《旧唐书》的记载与此基本相同,文长不录。两《唐书》之罽宾,即玄奘《大唐西域记》之迦毕试,其地在今阿富汗境内之贝格拉姆,位于喀布尔以北62公里。

5. 叶尔孤比记载的hngl(* Hingil)

佩特奇还指出,马迦特已经在《伊兰考》中提请学者们注意,叶尔孤比的《世界史摘要》记载,麦海迪(al-Mahdi,公元775—785)曾向各国国王派遣使者,要求他们臣服,许多国王臣服了,其中包括喀布尔沙希金吉尔(hngl,可发音为Hinğal或Hinğil)和其他一些国王[4]。

6. 有钱铭依据的Khingila钱币

戈布尔在其哌哒钱币集大成之作中,把70余版钱币列为馨孽钱币,年代为公元430—490年,长达60年。我们认为,馨孽无疑是哌哒史上非常重要的君主,统治年代比较长,发行钱币比较多。但是,是否统治这么长时间,发行这么多版钱币,还有商榷余地。我们只介绍有钱铭依据的钱币,作为本文研究的基础。凡是与上述Em. 81类似之处,不再重复(Göbl,1967,Em. 44, 54,57,61,66〔卷1,页61,66,68,71—72,75〕;Humbach,1966—1967,卷1,页56—57)。

Em. 44:正面:头像右面有哌哒族徽(S1)。反面:火坛和两名祭司,仿萨珊国王沙普尔二世(309—379)钱币。钱铭:正面:7点钟的位置上为婆罗谜文钱铭KHIGI - LA,即KHIMGI-LA,1点钟的位置上为巴克特利亚文钱铭ΑΛΧΟΝΟ = αλχονο。出土地点:第3枚出土于阿富汗(可能为喀布尔)。

Em. 54:铜币。正面:半身像向右;王冠是一种帽形冠,前部有新月饰,后有带饰,为两条带子。(K17a)反面:花瓶。(S6)钱铭:反面:婆罗谜文KHI - NGI即Khingila。

Em. 57:正面:半身像向右;头像左面有菱形中间带一个点的戳记(S5)。反面:火坛及二

祭司(Typus 1,火焰上方有苏鲁支半身像)。钱铭:正面:2 点钟的位置上婆罗谜文 KHIGI 即 Khingila。出土地点:第 13 枚出土于呾叉始罗,第 14 枚出土于哈达。

Em. 61:正面:半身像向右,王冠比 Em. 81 的简化一些(K16);右面有哌哒族徽(S1)。反面:火坛(Typus 1)。钱铭:正面:巴克特利亚文,9 点钟的位置上为 ΧΙΓΓΙΛΟ,1 点钟的位置上为 ΟΧΟΝΟ[5]。出土地点:第五枚出土于贝尔格拉姆。

Em. 66:正面:半身像向右,右面有哌哒族徽(SI)和日轮戳记(S5)。反面:火坛和二祭司(Typus 1)。钱铭:正面:11 点钟位置上婆罗谜文 KHIGI 即 Khingila,1 点钟位置上巴克特利亚文 ΑΛΧΟΝΟΝΟ = αλχονονο。出土地点:可能为呾叉始罗。

二、史料考证

以上共介绍了五种史料:坎宁安和戈布尔刊布的钱币、《诸王流派》、喀布尔象头神像上的梵文铭文、新《唐书》罽宾传和《世界史摘要》。这五种哌哒族徽(S1)和日轮戳记(S5)。反面:火坛和二祭司(Typus 1)。钱铭:正面:11 点钟位置上料上的 Khingila(及其各种译写)是否能够勘同,学者们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我们将逐项进行考订。

1.《世界史摘要》

拉赫曼在 1979 年出版的《最后的两个沙希王朝》一书中写道:佩特奇近来建议,将坎宁安描绘的钱币上的 Khingila 与叶尔孤比记载的 Khinjil 勘同。坎宁安早就把这种钱币归于继承臭名昭著的摩醯逻矩罗的克什米尔王 Khinkhila。但是,Khinjil 的年代(约公元 778)和 Khinkhila(约公元 580)不符,二者必有一误(Rahman,1979,页 183)。

拉赫曼将 Khingila 钱币置于乌散特勤洒钱币之后(Rahman,1979,页 181—184)。根据《旧唐书》罽宾传和《册府元龟》卷九六四,乌散特勤洒的年代和继位者均相当确定,开元二十六年(或二十七年,即公元 737 或 738 年)他以年老,请以子拂林罽娑嗣。根据拉赫曼的意见,《诸王流派》中的 Khinkhila 的年代为公元 580 前后,那么钱币上的 Khingila 就不能与《诸王流派》中的同名者勘同,只能与叶尔孤比记载的 Khinjil(约 778 年)勘同。但是这种勘同与戈布尔对 Khingila 钱币的断代(430—490)不符。拉赫曼虽然在其参考书目中列入了戈布尔 1967 年出版的哌哒钱币集大成之作,但是却没有对戈布尔关于 Khingila 钱币的断代提出反驳。

戈布尔对其掌握的全部哌哒钱币进行了综合分析,将 Khingila 钱币定为哌哒中期钱币。他的断代过于长了一些,但是这种钱币不会早于 430 年、也不会晚于 490 年,当无多大问题。因此钱币上的 Khingila 不能与叶尔孤比记载的 Hingil 勘同。

拉赫曼在其 1979 年的著作中没有参考哈尔马塔 1969 年发表的重要论文"后巴克特利

亚铭文"。哈尔马塔在这篇论文中认为,关于 Xingil 的资料延续三个世纪。这种情况说明,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区分几个 Xingil。较晚的资料说明,就像佩特奇假设的那样,后期的 Xingil 可能是喀布尔沙希的称衔。但是,同样合理的是,我们也可以假设这是一个王朝名称,这种假设可能性更大,因为出现在喀布尔梵文铭文和钱币上的 Khimgala、Khingila、Xingilo 无疑是个人的名字。因此,虽然 778/779 年提及的喀布尔沙希 Xingil 无疑属于突厥沙希王朝,但是 7—8 世纪的喀布尔沙希们可能把他们的起源追溯到哌哒第一个伟大的统治者 Xingil 的王朝(Harmatta,1969,页 396—397)。

我们认为哈尔马塔的意见更具说服力。叶尔孤比《世界史摘要》中记载的 778 年的 Hingil 此人并不能与其他资料中记载的同名者勘同。这个名称晚至 8 世纪尚见于记载,只是说明 7-8 世纪喀布尔突厥沙希可能犹自视为哌哒王馨孽的继承者,显示了馨孽在中亚史上名声之显赫。

我们把阿拉伯文史料《世界史摘要》中记载的 Hingil 首先排除之后,接着考察梵文克什米尔编年史《诸王流派》。

2.《诸王流派》

自从坎宁安把钱币上的 Khingila 与《诸王流派》中的同名克什米尔国王勘同,置于摩醯逻矩罗之后,这一观点始终甚为流行。塔库在 1967 年出版的《匈奴在印度》一书中,既未分析 1956 年发现的喀布尔梵文铭文,也未利用佩特奇 1964 年论文关于馨孽的分析,继续沿用坎宁安 19 世纪的观点(Thakur,1967,页 197、217、288—289)。比斯瓦斯在 1973 年出版的《印度匈奴政治史》中,详尽分析了喀布尔梵文铭文,认为克什米尔国王 Khinkhila 大约 597—633 年间在位,是玄奘的同时代人,当时克什米尔与迦毕试置于同一个国王统治之下,他也是乌仗那的领主(Biswars,1973,页 112,130—137,144)。丹尼在《中亚文明史》第 3 卷第 7 章第 1 节中,基本接受了比斯瓦斯的观点(HCCA,卷 3,页 169—171,176)。

问题在于,这些学者依据的主要史料为《诸王流派》。尽管整体来说,成书于 12 世纪的《诸王流派》几乎是古代印度史料中唯一比较可信的史书,关于当时及前世纪的记载是正确的,可是有关更早的各个时期记录是不可靠的。《诸王流派》的英译者斯坦因指出,Khingila 钱币当为公元 5 或 6 世纪之物,而根据迦罗那的年代表来计算,Khinkhila 的年代为公元前 250—214 年。如果把两者勘同,则《诸王流派》年代方面的误差不少于六百年。根据碑铭、钱币和汉文史料,哌哒王摩醯逻矩罗在公元 6 世纪上半叶统治西旁遮普及其邻近地区,包括克什米尔。而根据迦罗那的年表来计算,摩醯逻矩罗统治的年代为公元前 704—634 年。如果把两者勘同,则《诸王流派》年代方面的误差整整一千二百年。根据迦罗那的年代表计算,头罗曼的年代为公元 1 世纪之末。而在克什米尔发行钱币的头罗曼,至少晚了六个世

纪。迦罗那记载的头罗曼的事迹与其他史料关于头罗曼的记载也多不符。根据其他史料,头罗曼为摩醯逻矩罗之父,而迦罗那将头罗曼置于摩醯逻矩罗之后六百年[6]。《诸王流派》把头罗曼、摩醯逻矩罗、Khinkhila Narendrāditya 等名字列入克什米尔王统,正如同书把阿育王(Aśoka)、胡韦色迦(Huviska,《诸王流派》写作 Huska)、迦尼色伽(Kaniska)的名字列入克什米尔王统一样,只能说明罄蘗在中亚历史上是与上述诸王同样著名的人物,在民间传说中流传甚广,而由迦罗那记载了下来。但是《诸王流派》在上述诸人的绝对年代、事迹和人物的相对关系方面,却不能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记述。斯坦因指出,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的实际年代为公元前3世纪,而《诸王流派》的年代为公元前1182年,相差一千年。贵霜王迦尼色伽的实际年代尚有不同意见,但不出公元前后1世纪,《诸王流派》的年代为公元前1182年以前,相差至少一千一百年。《诸王流派》把胡韦色迦和迦尼色伽列为同时代的统治者(Stein,1900—1,卷1,导言,页64;译文,页30—31)。实际上胡韦色迦是迦尼色伽之后的贵霜王。因此,我们不能根据此书确定罄蘗是摩醯逻矩罗之后的吠哒王。

在排除了根据《诸王流派》确定罄蘗活动年代的可能性之后,我们进而论证钱币、汉文史料和喀布尔梵文铭文上的罄蘗的勘同问题。

3. 钱币

丹尼在《中亚文明史》第7章第1节最后说:匈人钱币从仿制萨珊样式开始,后来显示出贵霜样式,然后出现婆罗谜文钱铭和一些戳记,逐渐地方化。他还在注释中说,关于匈人钱币的分类、断代以及钱币、钱铭、戳记等的分析,参见非常重要的戈布尔1967年出版的4卷本著作(HCCA,卷3,页176,注41)。我们认为,丹尼关于吠哒钱币演变的基本轮廓的叙述与戈布尔的分析并无多大出入,但是戈布尔对罄蘗钱币的断代符合这个轮廓,丹尼的断代却不符合。

有钱铭为依据的罄蘗钱币全部是仿制萨珊样式的,Em.61 只有巴克特利亚文钱铭,Em.44 和 66 则既有巴克特利亚文,也有婆罗谜文钱铭,其余则只有婆罗谜文钱铭,这说明罄蘗钱币不是只有巴克特利亚文钱铭的吠哒前期钱币,而为中期钱币。同时,有钱铭为依据的罄蘗钱币中没有头罗曼、摩醯逻矩罗的骑马者型银币、吉祥天女型铜币、扇尾孔雀型铜币、瘤牛型铜币,也没有公牛或公牛旗标等戳记。这说明罄蘗钱币不是吠哒后期钱币。根据大多数钱币学家认可的基本轮廓,罄蘗钱币应当发行在头罗曼之前,而不是摩醯逻矩罗之后,即在5世纪中叶,而非6世纪初叶。

4. 两《唐书》罽宾传

《旧唐书》罽宾传说:"显庆三年(658),访其国俗,云王始祖罄蘗,至今曷撷支,父子传位已十二代。"每一代算多长时间,学者之间有些不同意见。马迦特把每代估算为18年,因此

王朝的起始年代为 442 年(Marquart,1901,页 284 以下)。哈尔马塔则把每代估算为 16 年,起始年代为 466 年。不过哈尔马塔把馨孽的年代定为 466 年,主要是根据普里斯库斯关于 466 年波斯还在与寄多罗匈人作战的记载,认为哌哒不可能早于此年占据喀布尔。从汉文记载的十二代来说,并不能确切断代,只能大致说在 5 世纪中叶。因此汉文史料中的馨孽可以与钱币上的 Khingila 勘同。

5. 喀布尔梵文铭文

学者们对喀布尔梵文铭文本身的释读并无多大分歧,但是关于其断代却有很大出入。桑山正进认为,喀布尔梵文铭文上的 Khimgāla 可能是两《唐书》记载的罽宾国王勃匐准(745 年继位)或其以后的罽宾国王(Kuwayama,1999,页 66—74)。图齐认为,从字体来看,当为 5 世纪末、6 世纪初之物,Khimgala 可以与钱币和《诸王流派》中的同名者勘同,其年代仍有争议,根据《诸王流派》,他是摩醯逻矩罗的继承者,根据其他权威观点(L. de La Vallée Poussin, *Dynasties et Hisoire de l' Inde depuis Kaniska*, p. 14; E. J. Rapson, *Indian coins*, p. 29),他可能在头罗曼之前(Tucci,1958,页 327—328,注 29)。西尔卡尔认为,此铭文字体的年代当为六、七世纪。很难说铭文中的 Khingāla 能否与钱币和克什米尔编年史上的同名者勘同(Sircar,1963,页 44,46)。佩特奇接受西尔卡尔关于年代的意见(Petech,1964,页 287)。达瓦利卡尔认为,铭文上的 Khingala 可以与钱币上的同名者勘同,从而假设其年代为 5 世纪下半叶,或至迟为 6 世纪上半叶,这一点与雕像的风格特点是一致的(Dhavalikar,1971)。

哈尔马塔在 1969 年的论文中认为,梵文铭文上的 Khimgala 可以与钱币、汉文史料中的馨孽勘同,从他拥有众王之王这样的最高尊号来看,他肯定是一个大国的君主,因此铭文显然出自哌哒时代,而非 7 世纪。馨孽停止使用后贵霜纪元,在铭文上署第 8 年,应该是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可以称之为馨孽纪元。哈尔马塔推算馨孽纪元起始年代为 466 年的依据主要有三条(Harmatta,1969,页 394—398)。一是普里斯库斯记载,466 年波斯还在与寄多罗匈人作战,因此馨孽不可能占据罽宾。这个论据尚有商榷余地。余太山认为,普里斯库斯记载的寄多罗匈人就是哌哒(Yu,1986,页 80—82)。哈尔马塔的第二个论据是,根据汉文史料,456 年统治粟特的哌哒王仍然是忽倪,馨孽当在 456 年至 465 年间继位。哈尔马塔未注明根据何种汉文史料,但是有关的汉文史料极为有限,当即《魏书·粟特传》。夏德确实认为,匈奴的粟特国王遣使北魏在文成帝初(太安初即 455—457 年)。但是,榎一雄等日本学者和余太山均详细论证了《魏书·西域传》主要依据董琬、高明 437 年西使归来的报告(Yu,1986,页 44—65)。我们只能说 437 年粟特的哌哒国王仍为忽倪,馨孽继位当在此后,456 年遣使的哌哒王很可能就是馨孽本人。哈尔马塔的第三个论据,是头罗曼的一种钱币上有 52 年的纪年。但是如何解释这个纪年,学者们之间也有分歧。帕塔克(K. B. Pathak)认为,哌

哒纪元起始于448年,很可能是与哌哒征服巴克特利亚联系在一起的。坎宁安则认为,应该从哌哒把萨珊最后逐出河中算起,即456或457年为起始。

哈尔马塔综合各种资料,认为曾有过一个馨孽王朝,第一个国王是钱币上的Deva šāhi Khingila,即汉文记载的馨孽,梵文碑铭上的šāhi Khimgala,他非常可能从460—466年开始其统治。他根据戈布尔编号43的钱币,认为可能有一位馨孽二世,大约562年在位(Harmatta,1969,页399—401,431)。费耐生基本同意哈尔马塔的这些意见,认为哈尔马塔首次系统地尝试不仅利用钱币资料,而且综合利用所有资料,重建东方统治者的年代顺序,而这与戈布尔只靠钱币资料建立的年代顺序比较接近(Frye,1984,页355—356)。

我们同意戈布尔、哈尔马塔、费耐生、宗德曼诸位的意见,把钱币、汉文史料和喀布尔梵文碑铭上的馨孽视为同一个人物。由于史料不足,已有史料又往往互相矛盾,学者们的解释又各不相同,目前还很难确定馨孽纪元的起始年代。但是,根据比较可靠的史料,大致作出哌哒史的分期,还是值得尝试的。而馨孽正是在哌哒从小国发展成大国的转折关头发挥关键作用的君主。

三、馨孽在哌哒史上的地位

哌哒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大约从4世纪中叶到5世纪中叶,《魏书》粟特传和小月氏传称其为匈奴,西史称为匈尼特,哌哒之名未显,控制的范围限于粟特及其周边地区。第二个时期,哌哒开始名震四方,向中国遣使,与萨珊波斯鏖战,越过兴都库什山,以喀布尔河流域为基地,威胁印度。这个时期的关键人物即为馨孽,他在哌哒史上的地位可比之于贵霜史上之丘就却。第三个时期,以头罗曼和摩醯逻矩罗为代表,征服印度北部。

1. 犹为小国

《魏书·西域传》记载:"哌哒国,高车之别种。其原出于塞北。自金山而南,至文成帝时已八九十年矣。"(Yu,1986,页12) 北魏文成帝于452—515年在位,故哌哒自塞北度金山即阿尔泰山南迁的时间当自452—515年。上溯80至90年,约为4世纪中叶。

《魏书·粟特传》说:"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一世若以三十年计,由437年(董琬西使)上溯三世(约90年),可得匈奴灭粟特约在347年。白鸟库吉、曼陈-赫尔芬(Maenchen-Helfen)、哈尔马塔、余太山等认为,这里的匈奴即为哌哒。榎一雄则认为,这里的匈奴是匈尼特(Yu,1986,页46,52—53,59—60;Harmatta,1969,页393)。我们认为,这里的匈奴可以与匈尼特、哌哒勘同。前期哌哒钱币上常有巴克特利亚文钱铭

ΑΛΧΟΝΟΝΟΡΑΥΟ = αλχονονο ταυο,《魏书·粟特传》记载的"温那沙"即其译音。沙(Ραυο)意为"王",温那(αλχονο)应为哌哒王族的姓氏。拜占庭历史学家阿弥阿努斯·马耳塞利努斯记载的 Chionitae(匈尼特)的词根是 Chion-,也是 αλχον 的异译。匈尼特于356—359 年与萨珊波斯王沙普尔二世(309—329)作战,后来双方签订了和约,匈尼特帮助萨珊与罗马作战,夺取军事重地阿米达要塞。

米切纳指出,哌哒最早的钱币是用沙普尔二世的钱范制作的,只是用巴克特利亚文 αλχονο(即 Chionitae)取代钵罗婆文的沙普尔的名字 bg shpwr。有的钱币上有哌哒族徽。这种钱币可能是哌哒于 355 年控制了巴尔赫之后不久发行的。此后不久,哌哒就开始发行用自己的钱范制作的仿沙普尔二世钱币(Mitchner,1975,页 162;Göbl,1967,Em. 33,36,39)。哌哒是否早在 355 年就控制了巴尔赫,尚可商榷。但是,最初的哌哒钱币仿制沙普尔二世的钱币,证明哌哒是在 4 世纪中叶与沙普尔二世交战、媾和、结盟的过程中,获得了仿制其钱币的能力。因此,哌哒开始铸币的年代,不是像戈布尔假设的 400 年前后,而应该提前半个世纪,开始于 4 世纪中叶。后来馨孽的钱币与此一脉相承,也有相同的王族姓氏和族徽。

但是,馨孽以前的钱币却为数不多,戈布尔收集的只有 7 版。这种情况和历史记载是吻合的。从 4 世纪中叶到 5 世纪中叶,中外史料甚至未曾提及哌哒之名。这个部族可谓四面受敌:北有强大的游牧国家柔然(芮芮、蠕蠕),南有勇武的寄多罗,西有波斯。《梁书·滑国传》载:"元魏之居桑干也,滑犹为小国,属芮芮。"这应即拓跋氏都平城之时(398—494 年)。哌哒约于 4 世纪中叶占据粟特,5 世纪中叶逐走寄多罗。因此,从哌哒本身的历史看,它役属柔然只可能在南迁粟特、逐走寄多罗以前,大致在 5 世纪初柔然兴起到 5 世纪中叶。《魏书·大月氏传》记载:"大月氏国,……北与蠕蠕接,数为所侵,遂西徙都薄罗城,去弗敌沙二千一百里。其王寄多罗勇武,遂兴师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陀罗以北五国皆役属之。"寄多罗数为蠕蠕所侵的年代,也在 5 世纪初至中叶。但是寄多罗却并未因此而衰落,反而越过兴都库什山,南侵北印度。自 4 世纪中叶沙普尔二世与匈尼特结盟进攻拜占庭以后,直到馨孽以前,也未见哌哒威胁波斯的记载。可见在柔然、寄多罗、波斯三个强敌环伺之下,哌哒局促于粟特及其周边地区,只能算一个小国。5 世纪中叶,中亚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2. 号为大国

5 世纪中叶,中亚形势相当错综复杂,一些具体历史事件的年代虽然不易确定,但是根据可以确定年代的事件,还是可以复原其基本面貌的。第一个可以确定年代的事件是北魏太安二年(456)哌哒遣使朝贡(《魏书·太宗纪》)。这是哌哒首次朝魏。在此之前,柔然控制着西域,哌哒役属柔然,当然没有可能直接与北魏交往。柔然 429 年受到魏军的沉重打击之后,走上了衰落的道路(Duan,1988,页 216)。《北史·蠕蠕传》记载,真君十年(449),北

魏再次北伐柔然,柔然可汗"吐贺真益惧,弃辎重逾穹隆岭远遁。……略阳王羯儿尽收其人户、畜产百余万。自是吐贺真遂单弱远窜,边疆息警矣。"柔然显然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从整个中亚形势看,这次遣使显然说明嚈哒不再役属于柔然,解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这次遣使的嚈哒王很可能就是馨孽。

1964年12月间,河北文物工作队在定县城内华塔故址塔基内发掘出一个北魏时期的舍利石函,内藏金银器、波斯银币等。其中有一枚萨珊波斯王耶斯提泽德二世(Yezdigird II,438—457年)银币,正面联珠圆框以外下边有一行压印的巴克特利亚文铭文,林梅村释读为alxano šaō(Xia,1966;Lin,1993)。这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温那沙"钱币。林梅村正确地指出:"中亚地区发现的嚈哒钱大部分是采集品,而我国发现的这枚有明确的埋藏时间,这对研究嚈哒钱的年代无疑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因为储藏这批遗物的石函上有铭文说明,太和五年(481),帝后(孝文帝和文明皇后冯氏)造此五级佛图,所以可以确定这枚嚈哒钱是481年埋入石函中作为施舍物的。夏鼐提出:"在这之前,嚈哒国曾于太安二年(456)十一月遣使到北魏'朝献'。这枚银币是前段所提到的那几次波斯使节将它混在波斯银币中带来的呢?还是原先由嚈哒国使臣带来,后来在皇室的储藏库中混在一起呢?"波斯钱币被打印上嚈哒族徽或钱铭,多半标志这些钱币是波斯给嚈哒的进贡之物,无疑是波斯屈辱的象征,因此这枚钱币不大可能是波斯使臣带到中国来的。如果我们相信这枚钱币是嚈哒使臣送给北魏的礼品,那么它就不仅对研究嚈哒钱的年代,而且对研究整个嚈哒早期历史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它表明嚈哒在456年朝魏以前,已经是波斯强大的东邻,因此耶斯提泽德457年去世后,其子卑路斯为了与兄弟争位,投靠嚈哒寻求奥援。

第二个可以确定年代的重大事件即457年萨珊波斯王子卑路斯逃往嚈哒,请求嚈哒王出兵帮助他夺取王位。根据泰伯里的记载,嚈哒王在卑路斯答应割让呾剌健(al Tālaqān)的条件下,派兵支持卑路斯夺位。469年卑路斯与嚈哒王库希那瓦(Akhshunwā)闹翻了,出兵进攻,兵败被俘。恒宁认为,Akhshunwā可能是一个称衔,出自粟特文'xš'wnd'r,意为"掌权者"。哈尔马塔认为,此王即汉文史料、钱币和喀布尔梵文铭文中的馨孽(Tabarī,卷5,页107—114;Harma-tta,1969,页395)。卑路斯答应支付大量赔款,才得以获释。以后卑路斯发动了第二次对嚈哒的战争,又惨遭失败,再次答应支付大量赔款。由于国库无力立即支付,只得留下王子卡瓦德(居和多)作为人质,卑路斯才得以被释放。484年,卑路斯发动对嚈哒的第三次战争,根据泰伯里的记载,嚈哒王库希那瓦引诱卑路斯落入设置好的陷阱,将其全部歼灭。卑路斯当场阵亡,王室宝藏皆为嚈哒所得(Tabarī,卷5,页114—121)。打上嚈哒戳记的卑路斯钱币证实卑路斯确实向嚈哒支付过赔款(Göbl,1967,Em. 283;Mitchiner,1975,页163—164)。嚈哒仿制的卑路斯钱币出土数量相当巨大(Hébert,1991),很可能因

为获得了卑路斯支付的巨额赔款,才有能力生产这么多钱币。

第三个可以确定年代的重大事件是458年匈人入侵印度笈多王朝的领土。由于印度碑铭材料只是泛称匈奴(Hūnas),既可以理解为寄多罗人,也可以理解为嚈哒。余太山陈述了他认为此处的匈奴即为嚈哒人的理由(Yu,1986,页85—87)。如果这次入侵确实是嚈哒所为,那么领导入侵的很可能就是馨孽。

第四个可以大致确定年代的重大事件是460年前后嚈哒征服乾陀罗。据宋云等《行纪》,正光元年(520年)宋云一行经过乾陀罗时,该国为嚈哒所灭,遂立敕懃为王,治国以来,已经二世。一世一般以三十年计,则嚈哒征服乾陀罗当在460年前后。

如果我们把馨孽与泰伯里记载的库希那瓦勘同,那么馨孽当为波斯王卑路斯的同时代人,活动年代大致为456—484年。有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具体年代尚不易确定,但是可以推测相对年代。

第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是嚈哒逐走寄多罗。《魏书·小月氏传》说:"小月氏国,都富楼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罗子也。寄多罗为匈奴所逐,西徙后令其子守此城,因号小月氏焉。……其俗以金银钱为货。"一般认为《魏书·大月氏传》主要依据太延年间(437)董琬、高明的报告,《小月氏传》所依据的资料的年代要晚一些。榎一雄和余太山都认为,这里的匈奴是指嚈哒(Yu,1986,页66—75)。根据董、高报告写的《魏书·粟特传》把嚈哒称为匈奴,而456年嚈哒首次朝魏以后,汉文史料一般采用"嚈哒"这个新名称,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小月氏传》记载的寄多罗为匈奴所逐发生在456年以前。

戈布尔1967年著作中编号84的一版钱币正面是国王立像,头饰上有飘带。巴克特利亚文钱铭 ΒΟΓΟ ΚΙΟΟΟΟ ΟΟΖΟΡΚΟ ΚΟΡΟΝΟ ΡΟΥΟ = βαγο * κιδαροοαζορκο κορονοΡουο 意为"神佑寄多罗大贵霜沙"。反面是湿婆神像及其坐骑圣牛难提(Göbl,1967,编号84;Humbach,1966—1967,卷1,页57,52;Mitchiner,1978,卷2,编号1413〔页223〕)。这版钱币显然是仿制一种寄多罗金币(Göbl,1967,卷3,图版4,编号XIII;Humbach,196—1967,卷1,页52)。戈布尔1967年编号85的钱币正面是贵霜风格的国王立像,比较粗糙,头大身体小,反面是湿婆和圣牛难提,显然是仿制编号84的钱币(Göbl,1967,编号85;Humbach,1966—1967,卷1,页57—58;Mitchiner,1978,卷2,编号1414—1419〔页223〕)。

嚈哒直接利用寄多罗钱币样式的做法与他们利用萨珊波斯沙普尔二世和卑路斯钱币的做法如出一辙。他们初次铸造仿寄多罗钱币时,如法炮制,甚至保留了钱铭 * κιδαρο(寄多罗)。这两版钱币可谓嚈哒逐走寄多罗的考古证据。

泰伯里记载卑路斯在457年将吐剌健割让给嚈哒。泰伯里又记载,卑路斯出兵进攻那个夺取了吐火罗(Tukhāristān)的被称为嚈哒的民族(Tabarī,卷5,页110)。吐剌健位于吐火

罗的最西端,西接波斯国界,大约在今阿富汗西部木尔加布河流域。泰伯里的记载也证实,在457年以前,哌哒已经据有吐火罗。寄多罗应当已经被逐出这一地区。

如果我们的推论不误,则馨孽霸业的第一步,就是于5世纪40年代末,乘北方柔然衰落,没有后顾之忧时,逐走南面吐火罗的寄多罗。这为下一步越过兴都库什山,占据迦毕试、乾陀罗做好了准备。

第二个重大历史事件,是哌哒南征迦毕试。两《唐书》罽宾传记载,罽宾王族以馨孽为始祖,足以说明馨孽在迦毕试地区影响的长远。镌有梵文铭文的象头神出土于喀布尔以南70公里的加德兹说明了馨孽曾经在这一地区活动。馨孽钱币已知的出土地点主要在喀布尔河流域及其附近: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北62公里的贝格拉姆、喀布尔、贾拉拉巴德以南8公里的哈达、今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西北约20英里的呾叉始罗。馨孽征服罽宾地区当在他派兵出征乾陀罗之前,即5世纪50年代。

第三个历史事件是哌哒征服乌仗那。《魏书·西域传》哌哒国条以下,为朱居、波知、乌苌(即乌仗那)、乾陀等七国。余太山指出,这七条记载应全部看作哌哒传的附录。波知、乌苌二国虽无明文,但之所以列入,无疑因为二国当时亦在哌哒势力范围之内。传文称乌苌国"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驴数头运食,山下无人控制,自知往来也"。而《酉阳杂俎》续集卷八记载:"西域厌达国有寺户,以数头驴运粮上山,无人驱逐,自能往返,寅发午至,不差晷刻。"船木氏据以推测乌苌亦在哌哒势力范围之内(Yu,1986,页241—243,注24)。《宋云行纪》记载乌场国(即乌仗那)"土气和暖,地方数千里:民物殷阜,匹临淄之神州;原田膴膴,等咸阳之上土"。这说明这一地区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根据喀布尔梵文铭文中馨孽又称乌仗那王来看,征服这一地区当为馨孽南征的主要业绩之一。

通过对钱币、碑铭、文献,特别是汉文史料的分析,我们大致拟构了馨孽建树哌哒霸业的轮廓。下面我们讨论继馨孽钱币之后的另一种重要的钱币:牛头冠钱币。

第二节 那色波王(nspk MLK')钱币考

哌哒网页上是这样描绘那色波王(nspk MLK')钱币的:请看一下有钱铭nspk(或释读作napki或nezak)的钱币,显然,6、7世纪在地球上没有一个地方铸造过这样精致的半身像钱币。在许多钱币上看起来半身像就像是2或3世纪健陀罗雕塑的翻版(见下面戈布尔匈人钱币编号225)。对比之下,甚至这个时代的萨珊钱币看来就像只有两维的卡通。铸造这些钱币的人不是骑在马鞍上的嗜血的游牧民族。相反,他们必定来自一个重要的政治和艺术中心(http://www.grifterrec.com/coins/huns/huns.html)。

嚈哒网页的作者没有告诉我们，这些铸造钱币者到底来自哪个重要的政治和艺术中心，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些钱币与嚈哒有何关系，为什么要把这些钱币置于嚈哒钱币之列。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

一、研究概况

大部分学者认为那色波王钱币是嚈哒钱币，但是对于断代就莫衷一是了。德摩根和大多数早期学者认为，它们是生活在4或5世纪的一位嚈哒王发行的（de Morgan，1923）。但是哥舒曼认为，它们是嚈哒强国灭亡以后，7世纪的一个嚈哒裔国家发行的（Girshman，1948，页51—54，图版V，5—9）。戈布尔比较全面地收集了嚈哒钱币，关于那色波王钱币的断代，他接受了上述两种观点的某些部分，认为这种钱币在加兹尼的发行从460年延续到600年，在喀布尔谷地，从515持续到700年。至于仿制这种类型的钱币则一直延续到745年（Göbl，1967，卷2，页50，322）。米切纳在1975年发表的“谁是Napki Malik”中则认为，这类钱币是嚈哒鼎盛时期几个相继的统治者铸造的，其年代不早于475年，不晚于560年，大多数是在喀布尔谷地铸造的，但有相当数量是在北巴基斯坦和巴克特利亚铸造的（Mitchiner，1975a）。

哈尔马塔在1969发表的“后巴克特利亚文碑铭”和费耐生在1974年发表的“Napki Malka和贵霜—萨珊人”中都认为，这种钱币的钱铭应该读作nyčky MLK'，就是阿拉伯史料中记载的Nēzak，也即汉文史料记载的捺塞（Harmatta，1969，页406—409，Frye，1974，页115—118）。但是，伊辛1977年发表了"Tarkhan Nīzak或Tarkhan Tirek?"，认为阿拉伯史料中记载的Nīzak实际上是Tirek的讹误（Esin，1977，页233以下）。这使哈尔马塔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他和李特文斯基在《中亚文明史》第3卷第16章“西突厥统治下的吐火罗和犍陀罗（650—750）”中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nyčky实为西突厥部落“阿悉结泥孰俟斤”一名中“泥孰”的译音（Harmatta & Litvinsky，1996，页374—375）。

桑山正进则在1993年的论文“6—8世纪迦毕试—喀布尔—扎布尔的货币发行者”和1998年的论文“不是嚈哒而是迦毕试的馨孽：Napki钱币的发行者”中提出，Napki钱币的发行者不是嚈哒人，而是迦毕试和扎布尔的当地王朝（Kuwayama，1993；1998）。

那色波王系钱币可以分为好几个类型，本文限于篇幅，只讨论其中的牛头冠钱币。我们认为，牛头冠钱币的起始年代为500年前后，延续到630年以后。发行的主要地域为喀布尔—迦毕试和加兹尼。这种钱币是在相当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粟特人的商业精神、嚈哒强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力量和萨珊波斯的财富及造币技艺相结合的产物。通过对牛头冠钱币的研究，可以发现一个以往不为学者们所注意的史实：即粟特人在嚈哒强国中的作用；同时，还

可以进一步加深对哌哒与萨珊波斯关系的认识,加深对哌哒统治方式的认识。

二、牛头冠钱币概况

我们先比较详细地描述戈布尔1967年编号198牛头冠钱币的式样。这种银币基本上是仿制萨珊波斯的。正面:国王的半身像,脸向右,国王无须。头上戴的冠冕是一个牛头,有双翼,戈布尔1967年王冠编号K38。反面:火坛,左右各有一名祭司,火坛的火焰上方没有苏鲁支的半身像,戈布尔1967年图像编号Typus 2。两名祭司头的上方各有一个6—8道光芒的日轮。钱铭:正面:钵罗婆文nspk MLK'。第199—205版钱铭均与此相同(Göbl,1967,Em. 198;Harmatta,1969,页406—409)。

下面我们根据戈布尔和桑山正进的研究介绍牛头冠钱币的概况。

桑山正进1993年、1998年	戈布尔1967年		
	编号	正面	反面
I. A. 牛头冠,前有月牙	198	K38	Typus 2,日轮
	199	K38;戳记S100	Typus 2
II. A 牛头冠,前有月牙	200	K38;钱铭同198	同上
	201	K38;戳记S101	同上
	202	K38	同上
	203	K38	火坛两边是戳记S61
II. A. ?	204		S61
III. A. 牛头冠,前有月牙,月牙两端各有小点,中有圆形物	205	K43	Typus 2 日轮
II. B 牛头冠,前有月牙	217	K38;钵罗婆文钱铭:nspk' MLD-š	同上
	218	同上	同上
	219	同上	火坛
	220	同上	半身像
	221	同上	Typus 2
I. B. 牛头冠,前有月牙	222	K38;钱铭同217版	同上
	223	K38	
	224	K38	

VI. 牛头冠，前有一个类似倒写的 C 的符号。正面单圈花边外有弧 + 星记号，仿胡司洛一世钱币。反面火坛左右有弧与星，仿奥尔米兹德四世(579—590)、白赫兰六世(590—591)	262	K39；钵罗婆文钱铭：dlc	类似胡司洛一世第 5 年
	263	K39a；钵罗婆文钱铭：dlc	同上
	264	类似卡瓦德，半身像左月牙，右星	类似卡瓦德，左月右星
V. C. 牛头冠，双月牙，E. 265 晚于胡司洛一世第 5 年(535)；E. 266 晚于库萨和第 11 年(601)，因反面祭司的 U 形胡子只出现于这版钱币上	265	K40；S61c；钵罗婆文钱铭 nspk MLK'	类似胡司洛一世第 5 年
	266	K41；S61c；钵罗婆文钱铭 nspk MLK	类似胡司洛二世第 11 年
IV. C. 牛头冠，双月牙，国王半身像的左右有星/月结合的戳记，不早于 615—627，因这种戳记只出现在库萨和的第 26、27、36、37 年的钱币上	267	K42	岩羊；S61
	268	K42	S61
	269	K42	S61
	270	K42	湿婆和瘤牛
	271	K42	S61

三、《隋书·西域传》漕国条

关于那色波王钱币的断代众说纷纭，但是其中的牛头冠钱币却有一个比较确定的年代可资参考。哌哒网页上这样介绍那色波王钱币：桑山正进原来发表在《南亚考古 1993 年：欧洲南亚考古学家协会第 12 届国际会议记录》上，后来发表在 1996 年春东方钱币学会通讯(第 148 号)上的一篇文章相当有说服力地说明，这些“牛头”冠钱币根本不是哌哒人的，而是属于 6 世纪后期、7 世纪初期以迦毕试为首都的“漕”国的(戈布尔称“Tso”)。隋唐时代的汉文史料提及那里有个王国，其国王戴金牛头冠。但是，这些钱币应该仍然是与哌哒有联系的，因为半身像被置于”翅膀”上等等(http://www. grifterrec. com/coins/huns/huns2. html)。

其实在桑山正进之前，坎宁安早在 1894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已经把那色波王钱币归于罽宾(即 Kophene = Arakhosia)国王。他根据雷摩塞特的译文，知道汉人说这个国家的国王戴“牛头冠”。坎宁安这篇论文所附图版 10 第 2、3 号钱币上的国王王冠上就有牛头，看来符合这种描写；但是第 2 号钱币有同样的钱铭，却只有三支三叉戟的王冠。坎宁安认为，这些钱币显然属于 7 世纪中叶(Cunningham，1894，页 267)。

桑山正进提及，雷摩塞特 1829 年把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三六以下中央亚细亚诸国

的记事翻译成法文,使欧洲东方学家知道了隋代漕国国王戴牛头冠的事实(Remusat,1829,卷I,页211)。桑山正进接受列维的考订,认为唐代罽宾即迦毕试。桑山正进的贡献在于辩明《隋书·西域传》是根据韦节撰《西蕃记》等可靠资料编撰而成,可信程度比较高。今本《隋书》说漕国"国王戴金鱼头冠",恐怕是讹误。《通典》卷一九二边防典八和《北史》卷九七西域传撰写的时候,一定都以当时看到的《隋书》为根据,都作"牛头冠",应该是正确的。(Kuwayama,1993;1998)。

现摘引《北史》西域传漕国条,以资研究:

> 漕国,在葱岭之北,汉时罽宾国也。其王姓昭武,字顺达,康国王之宗族也。都城方四里。胜兵万余人。……国王戴金牛头冠,坐金马座。……大业(605-617)中,遣使献方物。

桑山正进认为,这里说的"其王姓昭武,字顺达,康国王之宗族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可能只是因为"漕"字与昭武九姓的"曹国"的"曹"字读音相同,字形相近,只多了三点水,从而搞混了。

我们认为,《隋书》所据资料比较翔实,相当可信。因此关于漕国王姓昭武的说法,不宜轻易否定。迦毕试的王族与粟特有渊源关系,在500年前后开始制造牛头冠钱币。哌哒灭亡以后,这支昭武族继续统治迦毕试和制造牛头冠钱币,一直持续到大业年间,即7世纪初。

关于昭武族的来龙去脉,我们已经另文详述,这里限于篇幅,只能叙其大要。

四、迦毕试昭武族

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汉文史料中关于昭武的主要记载。《隋书·西域传》说:"康国者(今萨马尔罕),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支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昭武诸国主要是粟特地区的康国、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安国、小安国、那色波国,还包括乌那曷国、穆国和漕国。《唐书》也有类似的记载。

我们根据前辈学者们的研究,拟构昭武得名的由来如下:公元前2世纪以前,月氏的故乡是在中国甘肃西部。但是他们的部落酋长被称为 * yabγu、* yavug 或 * zawu(γ)。公元前176年,匈奴在甘肃西部击败了月氏,月氏西迁,其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公元前177汉设张掖、敦煌二郡,张掖所领昭武县的名称,可能是译土语 * zawu(γ)而立名(参阅Cen,1958,页133—134)。

月氏西迁于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分其国为五翕侯。后百余岁,贵霜翕侯丘就却(约公元30—70年)攻灭四翕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翕侯"就是

丘就却钱币上的佉卢文钱铭 yavug 和希腊文钱铭 ζαοου 的音译，意为部落酋长（参阅 Humbach,1966,卷 1,页 24）。从丘就却的儿子阎膏珍开始，就不再使用这一称号。但是臣属于贵霜的粟特君主则在自己的钱币上使用这一称号，粟特文写作 YaVUG（Mitchiner,1973,页 44,以及第 57—59 号钱币〔页 47〕,图版 VI,注 225）。这个称号演变成了粟特王家之姓，汉文译作“昭武”。

公元 350 年前后，号称“匈奴”的哌哒入侵粟特，杀其王而有其国（《魏书·西域传》粟特国条）。从此昭武族就置于其统治之下。昭武族的一支随哌哒南征，越葱岭（兴都库什山），进入迦毕试（喀布尔—贝格拉姆），逐渐强大。

迦毕试的王族为昭武姓，即与粟特有渊源关系，玄奘的记载也提供了一条重要旁证。《大唐西域记》几种古本的卷一迦毕试国条说：“货用金钱、银钱及小铜钱，规矩模样，异于诸国。王，窣利种也，有智略，性勇烈，威慑邻境，统十余国。”窣利就是粟特的异译（Ji,1985,页 136—137）。玄奘 630 年前后经过此国所看到的这位粟特裔的迦毕试王，应该就是牛头冠钱币的发行者。

粟特人是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民族，善于经商，还扮演着传播多元文化和多种宗教的角色。据《旧唐书·康国传》记载，“生子必以石蜜内口中，明胶置掌内，欲其成长，口常甘言，掌持钱如胶之粘物。俗习胡书，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往不到”。相当简要地概括了粟特人的特点。关于粟特人沿丝绸之路向东的活动，经过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已经比较清楚（参阅 Rong,2001,页 19—179,222—237,258—274,285—325,413—446,以及有关注释）。粟特人是城邦居民，文化比较高，他们的移民聚落遍及丝绸之路沿线，其语言成了国际通用语，又善于理财，受到突厥人的重视，被授予理财和办理邦交的显职。在漠北地区，粟特人形成了一个依附于突厥汗庭的”胡部”。7 世纪初，被汗庭宠信的史蜀胡悉，“不告（突厥可汗）始毕，率其部落，尽驱六畜，星驰争进”，到马邑互市。这一事件为我们提供了粟特商胡在突厥境内聚族而居、在经商方面拥有很大自主权的具体例证。调露元年（679），唐朝在河套地区的灵州南界置六个州，安置粟特胡人，号称“六胡州”。万岁登封元年（696），因契丹攻陷营州（今辽宁朝阳市），则天武后大发六胡州等地精兵，悉赴营州。以后逐渐在那里形成了粟特人聚落，成为安禄山起兵称帝的核心力量之一。

我们对于粟特人沿着丝绸之路向西、向南的活动以及移民聚落，还没有系统的研究。比照粟特人在东方的活动，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我们可以推测九姓胡在迦毕试地区形成移民聚落，在哌哒联合体中形成一个独立王国，主导牛头冠钱币的制造，在哌哒灭亡以后继续保持地方性的独立政权。

根据米切纳的研究,粟特人早在公元前200—130年就开始制币。钱币仿制希腊巴克特利亚王国攸提腾一世(前210—6年)的钱币,正面是攸提腾一世的头像,脸向右,反面是赫拉克勒斯坐像。公元前130—公元80年的粟特钱币,正反面的纹样仍然是攸提腾一世钱币的变体,但是有钱铭YaVUG(昭武)。公元80年以后,粟特出现了几种新的币制。其中之一,正面是有须头像,脸向右,反面是琐罗亚斯德教火坛(Mitchiner,1973,页26—29,44—47,图版IV—VII)。

最值得注意的是那黑沙不(Nakhsheb)钱币。钱币正面是无须长发头像,脸向左,有粟特文钱铭;反面左面是一个持剑的人,勇斗右面站立着一头猛扑过来的狮子。这种钱币已经发现了500多枚,大部分是在卡希卡河(Kashka-darja)流域的埃尔库尔干(Erkurgan)及其周围地区发现的,证明俄国学者卡巴诺夫(Kabanov)对这种钱币的制造中心的判断是正确的(Brykina,1999,页201—202,图版119:26—27)。在《隋书·西域传》史国条中,说到史国"西去那色波国二百里",《新唐书》则说:史"西百五十里距那色波,……那色波亦曰小史,盖为史所役属"。那色波乃Nasaf之对音。Nasaf一词是阿拉伯人对当地地名Nakhshab的转写(Xu,2000,页124)。

《新唐书》记载史国:"国有城五百。隋大业中,其君狄遮始通中国,号最强盛。筑乞史城,地方数千里。"可见这个国家一度是粟特的中心。

戈布尔将牛头冠钱币上的钵罗婆文钱铭释读为nspk MLK',意为"那色波(Naxšāb)王"(Göbl,1967,卷2,页8;Humbach,1966,卷1,页59)。这正好证实,《隋书》关于漕国(迦毕试)王姓昭武、玄奘关于迦毕试王为窣利种的记载确有所据。钱币资料可以进一步说明,随哌哒南迁迦毕试的九姓胡,乃是那色波王族,因此他们在牛头冠钱币上使用nspk MLK'(那色波王)这个称衔。

具有悠久制币历史又擅长经商的昭武姓那色波王族当在牛头冠钱币的制造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仅仅只有粟特人的重商精神,还不足以产生如此精致的牛头冠钱币。从我们目前掌握的哌哒入侵粟特以前的粟特钱币来看,还没有达到过如此精美的水平。我们必须进而分析牛头冠钱币上的哌哒因素。

五、哌哒因素:从牛头冠到牛旗

以往学者都承认牛头冠钱币为哌哒钱币,不同意见只是断代。但是,最近哈尔马塔在《中亚文明史》第3卷中提出了突厥泥孰部说,桑山正进提出了当地王朝说,这就要求我们更仔细地重新分析牛头冠钱币与其他哌哒钱币的关系,论证它是否确实属于哌哒钱币系统。

戈布尔非常详细地研究了伊朗裔匈人钱币上的各种戳记和符号,把它们分为一百六十

多种类型，进而把它们归为若干系列，为研究这些钱币的内在关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牛头冠钱币 Em. 201 正面半身像的左面有一个戳记，戈布尔编号 S101，非常类似戳记 S2。而 S2 见于嚈哒温那沙钱币 Em. 33 和 34。

牛头冠钱币 Em. 203 反面火坛左右各有一个戳记，戈布尔编号 S61。Em. 204 反面有一个很大的 S61 戳记。Em. 265—266 正面连珠框外 3、6 和 9 点钟的位置上各有一个 S61 戳记。Em. 267 反面是一头卧着的岩羊，上方有 S61 戳记。Em. 268 的反面右下方、Em. 269 和 271 的反面左下方和右下方都有戳记 S61。这种戳记被桑山正进称为酒杯形戳记。实际上，S61 与 S101、S2 一样，都是嚈哒族徽 S1 的变体（Göbl，1967，卷 4，图版 17）。

牛头冠钱币 Em. 198 反面火坛左右两个祭司的头上各有一个 6 至 8 道光芒的日轮。Em. 205、217 反面纹样与此类似。日轮是嚈哒钱币上常见的符号。戈布尔把十多种符号归入日轮类（Göbl，1967，卷 4，图版 18）。比如，Em. 66 是温那沙馨孽钱币，正面国王半身像的右面就有一个 8 道光芒的日轮。下面讲到的铜币 Em. 177—179 反面均有日轮符号。

牛头冠钱币最突出的特征无疑就是牛头。据戈布尔描述，Em. 270 反面是湿婆和瘤牛。牛头冠可能与湿婆的坐骑圣牛有关。牛在嚈哒钱币上并不罕见。

Em. 152 是铜币，正面国王半身像，脸向右；反面是瘤牛，向左。正面有婆罗谜文钱铭：ŚRĪ MIHIRAKULA，确证这是嚈哒王摩醯罗矩罗的钱币；反面有婆罗谜钱铭 JAYATU VṚṢĀ，意为"祝牛常胜"。铜币 Em. 153 与此类似。

铜币 Em. 158 正面是国王半身像，脸向右，右面有嚈哒族徽（S1）。反面是一头瘤牛，头向右。铜币 Em. 159 类似，反面是一头牛，头向左。铜币 Em. 160 正面是国王半身像，脸向左，左面有三叉戟状的符号（S91），反面是一头瘤牛，头向左，左面有祭坛状符号（S92）。铜币 Em. 161 正面是国王头像，脸向左，左面有嚈哒族徽（S1），反面是一头瘤牛，头向右。戈布尔把这些钱币视为摩醯逻矩罗钱币。

铜币 Em. 177 正面是湿婆，瘤牛头向左。反面左边有日轮符号（S47）。铜币 Em. 178 与此类似。铜币 Em. 179 正面是湿婆，牛头向左。反面左边有日轮符号（S46）。铜币 180—187 正面都与之类似。铜币 Em. 188、189 正面有一头瘤牛，头向左。戈布尔把这些钱币划归温那沙（αλχον）钱币。

更为引人瞩目的是摩醯罗矩罗的"牛旗"钱币。Em. 134 是银德拉克姆，正面是国王半身像，脸向右，在脸的右下方有一面牛旗，牛头向左（S54）。10 点钟的位置上有婆罗谜文钱铭 JAYATU VṚṢADHVAJA，意为"祝牛旗战无不胜"。Em. 135 也是银德拉克姆，正面也是国王半身像，脸向右，脸的右方是一面牛旗，牛头向左（S49）。9 点钟的位置上有婆罗谜文钱铭

JAYATU MIHIRAKULA,意为“祝摩醯罗矩罗战无不胜”。Em. 136 与此类似。

哌哒钱币上大量与牛有关的纹样与符号,很可能与贵霜钱币上大量的牛的纹样有渊源关系。第一个贵霜王丘就却就铸造了大量瘤牛钱币,钱币正面是一头瘤牛,头向右。以前在钱币上称“救世主”而不知其名的国王,现在根据新发现的巴克特利亚文碑铭,一般被认为就是丘就却之子阎膏珍。他也铸造了大量钱币,正面是国王立像,反面是湿婆和瘤牛。贵霜王瓦苏提婆(约 195—230)铸造了精美的金币,正面是国王立像,反面是湿婆,湿婆的身后是他的坐骑瘤牛,头向左。他也铸造了大量样式类似的铜币。在瓦苏(Vasu)和楚(Chhu)时代的贵霜王国(约 260—300)继续铸造反面为湿婆和瘤牛图样的铜币。直到贵霜王国的最后岁月(300—360)仍然铸造过反面是湿婆和瘤牛图样的铜币(Mitchiner,1978,2882—2896,3006—3059,3385—3500,3559—3566,3605—3612〔页 393—4,405—409,447—455,464,470〕)。我们有理由假设,哌哒的湿婆—瘤牛型钱币是受到贵霜同类钱币影响的产物。可见昭武族自称出自大月氏,有的汉文史料称哌哒为大月氏之种类,并非全是空中楼阁,昭武族和哌哒都曾有意把自己的起源追溯到大月氏(贵霜),以增强自己的声威。

从基本型制来看,牛头冠钱币与其他大部分哌哒钱币一样,是仿制波斯萨珊钱币的,即正面是国王的半身像,反面是火坛,左右各有一个祭司。但是反面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纹样,比如岩羊、湿婆和圣牛等,或者仅有一种戳记。

哌哒人不识文字,并无制币的历史经验。粟特昭武九姓则有很长的制币历史,在帮助哌哒制造仿萨珊波斯钱币方面,当发挥过重要作用。所谓“布哈拉胡达特(Bukhar Khuddat)”钱币就是一个证据。这是一种德拉克姆,正面是国王半身像,脸向右,反面是火坛,左右各有一个祭司,火焰上方有苏鲁支半身像。这种钱币是仿制萨珊波斯国王白赫兰五世(420—438 年)的钱币(作为原型的白赫兰五世钱币见 Mitchiner,1978,961—963〔页 166〕)。这种粟特钱币正面有粟特文钱铭,恒宁释读为 Pwɣ'r γwβ k'y,意为"布哈拉王—君主"(Frye,1949,页 26—29)。同时,哌哒仿制的白赫兰五世钱币也在布哈拉流通(Brykina,1999,页 194,图版 118,图 4)。哌哒仿制的白赫兰五世钱币很可能就是粟特人帮助他们组织制造的。

我们论证了牛头冠钱币是粟特人的重商精神和哌哒人的军事、政治力量结合的产物,但是仍然不够完整。不仅粟特人在哌哒人到来之前的钱币不甚精美,即使哌哒人控制粟特地区以后,无论哌哒人自己制造的钱币,还是哌哒统治下粟特本土制造的钱币,其精致的程度都不及牛头冠钱币。因此我们必须考虑第三个重要因素:萨珊波斯的因素。严格说来,是萨珊波斯在特定历史时期,与哌哒之间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建立了特殊的进贡关系,从而哌哒才得以制造出可以与萨珊波斯前期钱币比美的牛头冠银币。

六、萨珊波斯因素:从居和多到库萨和

桑山正进划分为第IV型的牛头冠钱币即戈布尔编号Em. 267—270,正面国王半身像的左右各有一个新月抱星的图像。这种情况,只出现在库萨和(Khusrow II,590,591—627年)第26、27、36和37年的钱币上(库萨和钱币参见Mitchi-ner,1978,1107—1223〔页181—192〕)。因此,这种钱币应该不早于公元615—627年。这个推断与《隋书》中关于昭武族漕国王于大业年间(605—617)进贡以及《大唐西域记》关于窣利种迦毕试国王的记载是基本符合的。晚至630年迦毕试尚在制造牛头冠钱币。

桑山正进划分为V型的牛头冠钱币即戈布尔编号Em. 265—266。Em. 265反面是火坛,左右各有一祭司,与胡司洛一世(Khusrow I,531—579年)第五年的钱币类似,因此其断代不早于535年。Em. 266反面也是火坛,左右各有一祭司,留着U形胡子,这类似于库萨和第十一年的钱币,因此不早于601年。

问题的关键在于牛头冠钱币断代的上限。桑山正进划分为VI型的钱币即戈布尔编号Em. 262—264。这3版钱币的特点是正面连珠圆圈之外,下、左、右各有一个新月抱星。这种样式只见于居和多(Kawad I,488—497,499—531)和奥尔米兹德四世(579—590)的钱币。居和多复辟(499)后,在连珠圈外缘空白处常添上四个新月抱星,分置于上、下、左、右,如果上面已为越出连珠圈外的王冠所占,则仅有三个。这是为了防止使用者剪边的一种措施(Xia,1974,页484)。桑山正进因为预先认定牛头冠钱币非嚈哒钱币,而居和多与嚈哒关系特别密切,所以排除VI型钱币仿制居和多钱币的可能性。其实,从钱币资料出发,我们只能肯定,VI型钱币不早于居和多复辟(499)。这应该是牛头冠钱币断代的上限。

嚈哒制币的开始和几次变化都与萨珊波斯有密切关系。嚈哒制币的开始,与沙普尔二世有关。4世纪中叶波斯王沙普尔二世(309—379)曾前往东部对付蛮族入侵,后与匈尼特结盟,在359年进攻拜占庭军事要塞阿米德的波斯军队中,就有匈尼特部队。匈尼特人应即后来的嚈哒。而嚈哒最初的钱币就是用沙普尔二世的钱模,对钱铭稍加改变而制作的。以后嚈哒的钱币多为仿制沙普尔二世的钱币。嚈哒钱币的第一次重大变化,与卑路斯(459—484)有关。5世纪下半叶,波斯王卑路斯两次被嚈哒打败,被迫交付大量赔款,最后一次兵败被杀,王室库藏皆为嚈哒所得。当时嚈哒主要在大量的卑路斯钱币上打上嚈哒戳记。嚈哒钱币的第二次重大变化与居和多有关。居和多与嚈哒建立了特殊关系,进贡长达30年,才使嚈哒有可能制造精美的牛头冠钱币。

居和多为卑路斯之子,根据叶尔孤比和其他作者的记载,居和多曾有两年时间是嚈哒王库希那瓦的人质。他很可能是在嚈哒人的帮助下于488年夺得王位的(Tabari,卷5,页126,注324;Frye,1984,页322)。居和多为了加强王权、对抗大贵族的势力,曾支持马兹达克运

动。496 年大贵族发动宫廷政变,推翻居和多。居和多逃往哌哒,哌哒王将自己与卑路斯之女所生的女儿嫁给居和多为妻。在哌哒军队的支援下,居和多大约在 498 年底、499 年初重新夺取了王位。但是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必须继续向哌哒支付贡赋,一直延续了 30 年,直到胡司洛一世继位(531)才结束。他为了向哌哒支付贡赋,甚至向罗马皇帝阿纳斯泰希厄斯(491—518)借钱,遭到拒绝,引发了波斯与罗马之间的战争。约 502 年,居和多进攻阿米达,在他的军队中就有哌哒人。503 年 8 月,一支罗马军队歼灭了 800 人的哌哒人前锋部队,但是不知道波斯大军就在后面,因此遭到居和多的突然袭击而全军覆没(Tabari,卷 5,页 136,注 348;Procopius,I,vi,10—19 - viii,22〔卷 1,页 46—69〕)。哌哒人参加居和多的军队对罗马人作战,与一个半世纪以前匈尼特人参加沙普尔二世的军队进攻拜占庭人的要塞阿米达相当类似。

居和多是与哌哒关系最为密切的波斯王。他可能从其父亲卑路斯向哌哒复仇而兵败被杀的结局中吸取了教训,未曾再倾全国之力向哌哒复仇。相反,他一直向哌哒进贡,利用哌哒的武力威慑国内的大贵族以保持自己的王位。戈布尔编号 Em. 285 是哌哒仿居和多钱币,戈布尔将其断代为 488 年。但是没有大量打上哌哒戳记的居和多钱币传世。居和多向哌哒进贡 30 年之久的波斯钱币以何种形式传世呢?它们很可能被改铸成了牛头冠钱币而流传于世。大量卑路斯钱币被打上哌哒戳记,显然是波斯帝国屈辱的象征。居和多可能为了避免自己进贡的大量钱币被打上哌哒戳记而蒙受羞辱,遂向哌哒提供波斯的能工巧匠和制币技术,帮助哌哒制造新币——牛头冠钱币。因此这种钱币上的钱铭是钵罗婆文。

研究波斯古钱的学者,将沙普尔二世的钱币划为萨珊朝铸币的第二期的开始。沙普尔二世在位达 69 年之久,铸币既多,自不易维持王朝初叶时的铸币那样花纹精致优美,所以他中期以后的银币,花纹的风格便退化到很粗陋的地步,没有达到初期那样高度的艺术水平。胡司洛一世的钱币也因为大量生产的缘故,铸造得不大工致,花纹更为退化,很是粗陋,研究波斯古钱的,将他的铸币归入萨珊朝第三期或晚期中去(Xia,1957,页 471,475)。居和多的钱币与此情况类似。牛头冠钱币能恢复和接近萨珊朝初叶的工艺水平,也可能因为这种钱币流通毕竟不如居和多、胡司洛一世和库萨和的银币那样广泛,所以比较容易维持花纹的精致优美。哥舒曼在《伊朗艺术》中分析波斯艺术对东方的影响时认为,所谓"那色波王"钱币(5—6 世纪)展现了与梵衍那和卡克拉克(Kakrak)壁画之间显著的图像学上的类似(Girshman,1962,页 317)。这可以旁证牛头冠钱币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当地现象,而是与波斯文化的向东传播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七、泥孰说与当地说质疑

哈尔马塔的泥孰说和桑山正进的当地说，从局部细节看，都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从宏观来看，则仍不如传统的嚈哒说令人信服。

如果我们接受牛头冠钱币上的钵罗婆文钱铭释读为 nyčky，仅从对音来说，泥孰说可以自圆其说。但是，从宏观来看，突厥钱币在数量方面远不能与嚈哒钱币相比。戈布尔收集的嚈哒系钱币，不计那色波王钱币，也多达 200 多版。米切纳在 1978 年出版的《东方钱币及其价值》第二卷中，把第 1543—1546 号钱币定为西突厥汗国叶护钱币，一共只有 4 版，且都比较粗糙（Mitchiner，1978，1543—1546〔页 239〕）。第 1546 号钱币基本类似牛头冠钱币。国王脸的右面有戳记，反面有钵罗婆文钱铭，米切纳释读为 MaRA YaP（GU） TA（RDU），解释为"君主叶护达头"，将这种钱币定为：喀布尔谷地，达头：约 570—601。如果我们相信米切纳的判断，那么这版钱币当为达头可汗一度短暂控制喀布尔谷地时，模仿牛头冠钱币所制造的。

牛头冠钱币的主要特点为王冠上的牛头，这与嚈哒钱币的联系已在上文作过分析。哈尔马塔认为，西突厥汗国王族标志中出现牛头可能追溯到达头可汗 599 年成为整个突厥帝国的唯一统治者之后所采用的步迦（buqa，牛）这个称衔（Harmatta & Litvinsky ，1996，页 370）。实际上，汉文"步迦"很可能只是突厥可汗常见称衔 Bilga（毗伽，意为"智慧"）的异译（Chavannes，1935，页 177；Xue，1992，页 784）。哈尔马塔把一种牛头冠钱币定为吐火罗突厥叶护沙钵罗（Ishbara）在位第 13 年在赫拉特所发行。其实这种钱币即戈布尔 1976 年著作中编号 265 的钱币，为那色波王钱币之一，其钱铭的释读尚有争议。（Harmatta & Litvinsky ，1996，页 371；Göbl，1967，Em. 265；Humbach，1966，卷 1，页 65）。因此，吐火罗突厥叶护钱币上有牛头冠的假设，证据不足。哈尔马塔认为，迦毕试—犍陀罗那色波王钱币上的王冠从牛头变为三叉戟（或三个月牙），说明这个王国恢复了嚈哒传统，摆脱了吐火罗突厥叶护的控制而赢得了独立（Harmatta & Litvinsky，1996，页 376）。我们认为，三叉戟确实为嚈哒钱币上的重要标记之一。但是，何以迦毕试要在嚈哒灭亡多年后回归其传统？这个问题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我们认为，牛头、牛旗、牛本来就是嚈哒钱币上的重要标记，不是突厥的标记，迦毕试那色波王钱币源自嚈哒系钱币，牛头冠与三叉戟冠都是嚈哒系的传承，与突厥泥孰部落无涉。只有当钱币上出现狼冠时，才标志着突厥人篡夺了迦毕试政权。关于三叉戟冠与狼冠钱币，我们将另外撰文，在此不赘。总之，突厥人以马上得天下，以马上治天下，没有制币传统，从来没有显示高度的制币技巧，很难想像他们能突然制造出精美的牛头冠钱币。

桑山正进的当地王朝说也有很大合理性。如果我们把嚈哒理解为"天无二日，国无二君"的统一帝国，那么就必然得出结论，迦毕试（喀布尔）是一个独立王国。但是，为何当时中外史书都一致记载嚈哒为中亚第一强国，而从钱币资料看，迦毕试居然能够发行大量钱

币,并在钱币上称王道寡?涉及嚈哒史的类似矛盾还有几个:粟特在4世纪中叶已被嚈哒征服,而粟特在435—479年间还独立朝贡了九次;直到5世纪70年代末,包括犍陀罗在内的兴都库什山以南地区还没有为嚈哒所并吞,嚈哒人怎么可能在5世纪50年代中就入侵笈多印度?"吐火罗国"的出现,是在嚈哒占领吐火罗斯坦之后,岂不令人费解?余太山在分析这些矛盾时指出,关键是搞清楚嚈哒控制和统治中亚地区的方式。他认为,在嚈哒统治下或势力范围内的小国,依然有自己的国君,有自己的领土,有外交的权利,有信仰的自由,只是必须向嚈哒统治者进贡,把它们的特产和通商所得源源不断地送到嚈哒的中心地区(Yu,1986,页131)。费耐生在《古代伊朗史》中也认为,嚈哒是一些王国的联合体,但并非像萨珊或贵霜那样的帝国(Frye,1984,页347)。余太山和费耐生的看法为我们解释嚈哒系钱币的复杂情况提供了基本架构。

钱币资料与嚈哒政治结构的复杂情况是比较吻合的:其核心部分是嚈哒王直接统领下的游牧部族,拥有强大的骑兵,能够长途奔袭,具有很大的威慑力,可以控制一个非常广阔的地域。因此,《宋云行纪》说其"受诸国贡献,南至牒罗,北尽敕勒,东被于阗,西及波斯,四十余国,皆来朝贺"。这个核心部分制造的钱币,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直接在波斯钱币上打上戳记,或者对钱铭稍作修改,其他方面与波斯钱币几乎没有区别。这完全符合嚈哒人"不识文字、礼教俱阙"的情况。第二种类型的钱币,是仿制萨珊钱币,正面国王的半身像反映了嚈哒王的真实形象,没有萨珊波斯国王那么复杂的王冠,也没有波斯国王那样的长髯。

在嚈哒控制的广大地域内,原来的一些国家保持着很大的独立性。比如,布哈拉的忸密国和卡希卡河流域的那色波国。他们各自制造自己的钱币。

在嚈哒控制的广阔势力范围内,还形成了一些新的王国。宋云所描写的犍陀罗王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这位王见了宋云等北魏使者,坐受诏书,不屑于跪拜。宋云责备他:"嚈哒、乌场王并拜受诏书,大王何独不拜?"可见在对待北魏使者的态度上,他比嚈哒王还要傲慢。宋云所见的王,可能就是摩醯罗矩罗(Yu,1986,页93)。不管这一勘同能否最后证实,头罗曼、摩醯罗矩罗父子一系在印度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当为不争的事实。他们除了继续制造仿萨珊钱币之外,还制造贵霜式国王立像——吉祥天女型、骑马者型等新币。米切纳在其《东方钱币及其价值》第三卷中,把传统归诸嚈哒人的钱币一分为二,将嚈哒王各种程度的仿萨珊波斯钱币置于第十章萨珊波斯钱币之后,而将头罗曼、摩醯罗矩罗及相关统治者的钱币置于第十六章贵霜及其邻国和继承者的钱币中,这样做当然割裂了嚈哒钱币,但是准确地反映了嚈哒钱币至少分属两大系统的特点。

迦毕试也是一个具有很强独立性的王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桑山正进认为牛头冠钱币是迦毕试当地王朝的钱币,可谓言之成理。但是,当地说无法全面地解释,为何在当时众多

的当地王朝中,五花八门的钱币里头,独有迦毕试制造了如此精美的牛头冠银币。我们只有全面考虑粟特人在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活动,厌哒人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厌哒与萨珊王居和多的特殊关系,萨珊波斯的长期进贡和高度制币技艺等多种因素,才能对牛头冠钱币的产生和延续得出比较合理的解释。

正因为厌哒并非萨珊波斯那样的统一帝国,562—567年它在突厥和波斯的打击下覆亡,只是意味着厌哒王称雄中亚的军事霸权不复存在了。随之而来的是,厌哒王系的仿萨珊钱币也停止制造了。但是,厌哒势力范围内的独立王国并未因此丧失其独立性,相反,它们可能利用厌哒覆亡而出现的政治"真空",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独立性。我们看到,所谓头罗曼钱币在克什米尔还制造了很长时间。在迦毕试,牛头冠钱币的制造并未随着厌哒的覆亡而停止,而且这个系列的钱币还花样翻新,出现了三叉戟冠、蛇冠、狼冠等各种类型。我们将另外撰文分析这些钱币对厌哒钱币传统的继承和创新。

结　语

厌哒原出于塞北,4世纪中叶,自金山即阿尔泰山而南,杀粟特王而有其国。从5世纪初叶到中叶,厌哒犹为小国,属芮芮(柔然)。南有勇武的寄多罗,西有强大的波斯帝国,发展的余地甚小。

449年柔然遭到北魏沉重打击,被夺走人户、畜产百余万。自是柔然可汗吐贺真遂单弱远窜,边疆息警。厌哒王馨孽利用这个时机,摆脱柔然的役属,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全力南征吐火罗,逐走了寄多罗。456年,厌哒首次向北魏朝贡。随着柔然的衰落和寄多罗的被逐,厌哒一跃成为波斯最强大的东邻。457年,波斯王耶兹德格德二世去世,王子奥尔米兹德继位,另一个王子卑路斯为了夺取王位,逃往厌哒,请求其出兵帮助。在卑路斯答应割让呾剌健的条件下,厌哒派兵助卑路斯夺得王位。可见此时厌哒已经强大到足以操纵波斯王位的废立。馨孽钱币的基本型制是模仿萨珊银币的,使用巴克特利亚文钱铭的钱币主要用于吐火罗。

与此同时,馨孽出兵越过兴都库什山,征服罽宾(迦毕试)和乌仗那,威胁印度笈多王朝,约460年派兵征服乾陀罗。469年卑路斯进攻厌哒,兵败被俘,支付大量赔款方获得释放。475年,卑路斯又一次发动对厌哒的战争,也以失败而告终。484年,卑路斯第三次进攻厌哒,本人阵亡,王室宝藏尽入厌哒之手。从此厌哒号为大国,横跨兴都库什山南北。有的馨孽钱币兼用巴克特利亚文和婆罗谜文,显然反映了他的统治范围既包括通用巴克特利亚文的吐火罗斯坦,也包括通用婆罗谜文的兴都库什山以南地区。有的钱币纯用婆罗谜文,则

显然是以乌仗那、乾陀罗等地为主要流通地域的。在加德兹立象头神像,使用梵文铭文,显示了他容纳印度教信仰,怀柔南亚人民的意图。

馨孽在哌哒史上的地位,实可比之于丘就却在贵霜史上之地位。《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记载:

> 初,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都密,凡五部翎侯。后百余岁,贵霜翎侯丘就却攻灭四翕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侵安息(帕提亚〔Parthia〕),取高附地(喀布尔〔Kabul〕),又灭濮达(布色羯罗伐底〔Pushkalavati〕)、罽宾(克什米尔〔Kashmir〕),悉有其国。丘就却年八十余死,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印度〔India〕),置将一人,监领之。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7]

馨孽扩张的步骤几乎与丘就却如出一辙。他在罽宾(迦毕试)地区的影响尤其巨大,以至于十二代以后,到显庆三年(658)唐朝使者访其国俗时,罽宾的王族犹以馨孽为始祖。他的名字可能成了罽宾地区王朝的名称或一种尊号。晚至778年,还有一位喀布尔沙希自称馨孽(Hingil)。12世纪写成的克什米尔编年史《诸王流派》关于古史的年代、事迹与世系均不可靠,但是把馨孽(Khinkhila)的名字与阿育王、迦尼色伽、胡韦色迦、头罗曼、摩醯逻矩罗等著名君主并列,却足以说明他在中亚、南亚名声流传的久远。

昭武九姓胡的那色波王族可能早在4世纪中叶就依附哌哒,后来随着馨孽南征,越兴都库什山,统治漕国(迦毕试),形成哌哒联合体中的独立王国之一。萨珊波斯王卑路斯(459—484)曾三次与哌哒开战,均遭失败,支付大量赔款,最后一次兵败被杀,王室府库尽为哌哒所得。现在已经发现大量打上哌哒戳记的卑路斯钱币,正是这段历史的物证。卑路斯之子居和多(488—497,499—531年在位)与哌哒关系特别密切,他曾有两年时间在哌哒人那里当人质,于488年在哌哒人的帮助下夺得王位,在496年宫廷政变中失去王位后逃往哌哒,直到499年在哌哒军队的援助下复辟,从此有30年之久向哌哒进贡。但是迄今尚未发现大量打上哌哒戳记的居和多钱币。居和多可能是为了避免大量进贡的钱币被打上哌哒戳记,留下耻辱的象征,遂自愿向哌哒提供认识钵罗婆文的铸币工匠,帮助哌哒制造了使用钵罗婆文钱铭的牛头冠钱币。这种钱币最早几版的特点是正面连珠圆圈之外,下、左、右各有一个新月抱星。这种样式与居和多复辟以后所铸钱币才开始有的特色相同。后来牛头冠钱币制造业的实权可能落到了善于经商理财的粟特人手中。因此大量牛头冠钱币上的钵罗婆文钱铭为nspk MLK',意为"那色波王",当为迦毕试昭武族的称衔。银币的质量十分精良,不亚于萨珊波斯早期银币。由于很长时期内迦毕试本地工匠继续仿制牛头冠钱币,但是已经不认识钵罗婆文,所以钱铭逐渐退化为装饰。

哌哒并无统一的币制，在其役属范围内，忸密（布哈拉）和那色波本地都有自己的钱币，征服北印度的头罗曼及其子摩醯逻矩罗也制造了自己的钱币。漕国（迦毕试）铸造自己的牛头冠钱币并不出人意料之外。562—567 年间哌哒为突厥与萨珊波斯所灭后，漕国（迦毕试）的牛头冠钱币并未停止制造。漕国于大业（605—617）中向隋遣使贡方物，隋对于此国有了比较可靠的了解，记载其王姓昭武，为康国（今萨马尔罕）王之宗族。国王戴金牛头冠。这与牛头冠钱币上国王的形象吻合。玄奘于 630 年前后经过迦毕试，也亲眼见过这个国家的金钱、银钱及小铜钱，规矩模样，异于诸国。王为窣利种。漕国（迦毕试）王族为昭武、为窣利的记载，与牛头冠钱币上的钵罗婆文钱铭 nspk MLK'（那色波王）正可以互相印证。

略语表

ActaAnt. Hung. = *Acta Antiqu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Budapest.

Biswas, 1973 = A. Biswas,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Hūṇs in India*, Dehli, 1973.

Brykina, 1999 = *Г. А. Брыкина* (ed.), *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в раннем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9.

（部分英译见 http://kroraina. topcities. com/ca/index. html）

Cen,1958 = 岑仲勉《证明东突厥处罗侯汗死于西征波斯及昭武即叶护之异文》,《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 年,页 130—138。

Chavannes, 1935 = 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商务印书馆,民国 24 年。

Cunningham, 1894 = Sir A. Cunningham, "Coins of the Later Indo-Scythians. Ephthalites, or White Huns", *Numismatics Chronicle*, 1894, pp. 243—293.

De Morgan, 1923 = J. De Morgan, *Manuel de numismatique orientale*, *Paris*, 1923.

Dhavalikar, 1971 = M. N. Dhavalikar, "A note on two Ganesa Statues from Afghanistan", *EW*, XXI (1971), pp. 331—336.

Duan, 1988 = 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

Enoki, 1955c = K. Enoki, "The Origin of the White Huns or Hephthalites". *EW*, N. S. 6, no. 3.

EI = *Epigraphia Indica*

Esin, 1977 = E. Esin, "Tarkhan Nīzak or Tarkhan Tirek?" *JAOS*, Vol. 97 (1977), pp. 323—31.

EW = *East and West*, Roma

Frye, 1949 = R. N. Frye, *Notes on the early coinage of Transoxiana*, *Numismatic notes and mon-*

ographs, 113 (1949)

Frye, 1974 = R. N. Frye, "Napki Malka and the Kushano-Sasanians", in *Near Eastern Numismatics, Iconography, Epigraphy and History: Studies in Honor of George C. Miles*, ed. by D. K. Kouymjian, Beirut, 1974, pp. 115—122.

Frye, 1984 = R. Frye, *The History of Ancient Iran*, Mü nchen, 1984.

Girshman, 1948 = R. Ghirshman, *Les Chionites-Hephthalites*, Le Caire, 1948.

Girshman, 1962 = R. Ghirshman, *Persian Art: the Parthian and Sassanian Dynasties, 249 B. C. - A. D. 651*, New York, 1962.

GÖ bl, 1967 = R. GÖ bl,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iranischen Hunnen in Baktrien und Indien*, vols. 1—4. Wiesbaden, 1967.

Harmatta, 1969 = J. Harmatta, "Late Bactrian Inscriptions", *Acta Ant. Hung.*, Vol. 17, pp. 297—432.

Harmatta & Litvinsky, 1996 = J. Harmatta and B. A. Litvinsky, "Tokharistan and Gandhara under Western Türk rule (650—750)", in *HCCA*, vol. 3, pp. 367—401.

HCCA, v. 3 =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 3, ed. by B. A. Litvinsky, Zhang Guang-da, R. Shabani Samghabadi, UNESCO, 1996.

Hébert, 1991 = R. J. Hébert, "Preliminary notes on the Alxono hoard", in *Numismatic Studies*, v. 1, ed. by D. Handa, New Delhi, 1991, pp. 103—110.

HH, v. 3 = *History of Humanit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Paris: Unesco, 1994—

Humbach, 1966—1967 = H. Humbach, *Baktrische Sprachdenkm äler*, I - II, Wiesbaden, 1966—1967.

Huns. Chron. = *Numismatic Chronicle*, London.

JAOS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New Haven, Conn.

Ji, 1985 = 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 年。

Kuwayama, 1978 = Kuwayama, "The Turki Sahis and Relevant Brahmanical Sculptures in Afghanistan", *EW*, 26/3—4, pp. 375—407.

Kuwayama, 1993 = 桑山正进《6—8 世纪 KapişĪ-Kabul-Zabul の货币と发行者》,《东方学报》,京都 65,页 430—381。

Kuwayama, 1998 = S. Kuwayama, "Not Hephthalite but Kapisian Khingal: identity of the Napki coins", in *Ex Moneta: Essays on Numismatics,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in honor of Dr. David W. MacDowall*, v. 2, ed. by A. K. Jha and S. Garg, New Delhi, 1998, pp. 331—

249.

Kuwayama, 1999 = S. Kuwayama, "Historical Notes on Kāpiśī and Kabul in the Sixth-Eighth Centuries", *ZINBUN*, 1999 No. 34 (1), pp. 25—77.

Lin, 1993 = 林梅村《北魏太和五年舍利石函所出呎哒钱币考》,原载《中国钱币》,1993 年第 4 期,收入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 年,第 131—141 页。

Marquart, 1901 = J. Marquart, *Ērānšahr, nach der Geographie des Ps. Moses Xorena* 口 *i*, Berlin, 1901.

Litvinsky, B. A., 1996 = Litvinsky, B. A., "The Hephthalite Empire", in HCCA, v. 3, pp. 135—162.

Mitchiner, 1973 = M. Mitchiner, *The Early Coinage of Central Asia*, London, 1973.

Mitchiner, 1975 = M. Mitchiner, "Some late Kushano-Sassanian and early Hephthalite silver coins", in *East and West*, 25:1—2 (1975), pp. 157—165.

Mitchiner, 1975a = M. Mitchiner, "Who were Napki Malik?", in *East and West*, v. 25, nos. 1—2 (1975), pp. 167—174.

Mitchiner, 1978 = M. Mitchiner, *Oriental Coins and Their Values: The Ancient and Classical World*, 600 *B. C.-A. D.* 650, London, 1978.

Petech, 1964 = L. Petech, "Note su Kāpisi e Zabul", *RSO*, 39 (1964), PP. 287—294.

Procopius = *Procopiu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 B. Dewing*, London, 1914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Rahman, 1979 = A. Rehman, *The Last Two Dynasties of the šahis. An Analysis of their History, Archaeology, Coinage and Palaeography*, Islamabad, 1979.

Remusat, 1829 = A. Remusat, Sur quelque peuples du Tibet et de la Boukharie, tire de L'ouvrage de Ma-touan-lin, et traduit du chinois. *Nouveaux Melanges Asiatiques*, Tome I, Paris, 1829, 186—257.

Rong, 2001 =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 年。

RSO =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Rome)

Sircar, 1963 = D. C. Sircar, "Three Early Medieval Inscriptions", *EI*, 1963, pp. 44—47, & pl. I.

Stein, 1900—1 = A. Stein, *Kalhana's Rajatarangini. English translation*, *Reprint*, 1979, Delhi.

Sundermann, 1994 = W. Sundermann, "The Rise of the Hephthalite Empire", in HH, v. 3, p.

474.

Tabarī, v.5 = *The History of Al-Tabarī*, v.5, tr. by C. E. Bosworth, SUNY Press, 1999.

Thakur, 1967 = U. Khakur, *The Hūṇs in India*, Varanasi, 1967.

Times of India, The, 01—05—2001 = "Inscription throws new light on Hindu rule in Afghanistan", http://www.hvk.org/articles/0101/40.html

Tucci, 1958 = G. Tucci, "Preliminary reports on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in Swat", *EW*, *IX*, no.4, 1958.

Xia, 1957 = 夏鼐《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原载《考古学报》1957 年第 2 期,收入《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年,页 470—480。

Xia,1966 = 夏鼐《河北定县塔基舍利函中波斯萨珊银币》,载《考古》1966 年第 5 期第 267—270 页。

Xia, 1974 = 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原载《考古学报》1974 年第 1 期,收入《新疆考古三十年》,页 480—495。

Xu, 2000 = 许序雅《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 年。

Xue, 1992 = 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

Yu, 1986 = 余太山《嚈哒史研究》,齐鲁书社,1986 年。

Zhang, 1978 =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8 年。

注 释

〔1〕Cunningham, 1894, pp. 262, 265, pl. vii, 11; Thakur, 1967, pp. 197, 217, 288—289; Göbl, 1967, Em. 81 (v.1, p. 83), v. 3, Tafel 25, 81:1; Humbach, 1966—1967, v.1, NumH 81 (p. 57); Harmatta, 1969, p. 395; Biswar, 1973, p. 132, 199, 215 (no. 62), pl. IV. Fig. 41; Rahman, 1979, pp. 183—4; HCCA, vol.3, p. 176.

〔2〕Stein, 1900—1, I. 347—9 (p. 52).

〔3〕Tucci, 1958, fig. 40, & p. 276; Sircar, 1963; Biswar, 1973, pp. 131—138; Kuwayama, 1978, pp. 377—378, figs. 4, 5; Kuwayama, 1999, pp. 66—74.

〔4〕*Ta'rīh al-Ya'qūbī*, ed. Houtsma, Leiden, 1883, II, p. 479; J. Marquart, *Eranšahr nach der Geographie des Ps. Moses Xorenac'i*, Berlino, 1901, pp. 248 e 291; Petech, 1964, p. 288; Kuwayama, 1998, p. 340.

〔5〕戈布尔认为,也可能为 XIΠIΛO。洪巴赫在 1966—1967 年的著作的第 1 卷第 57 页上,释读为 XIΓΓIΛO OXONO = χιγγιλο αλχονο,但在第 2 卷第 3 页注 1 中放弃了。这里采用哈尔马塔的释读(Harmatta,1969,页 396,430)。

〔6〕Stein, 1900—1, v.1, introduction, p. 65, 83.

〔7〕地名之比定,见徐文堪、芮传明译《中亚文明史》第二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年,页 188。布色羯罗伐底是干陀罗的印度河以西的部分。Zhang,1978,第四册,第 32 页以为,濮达即拔克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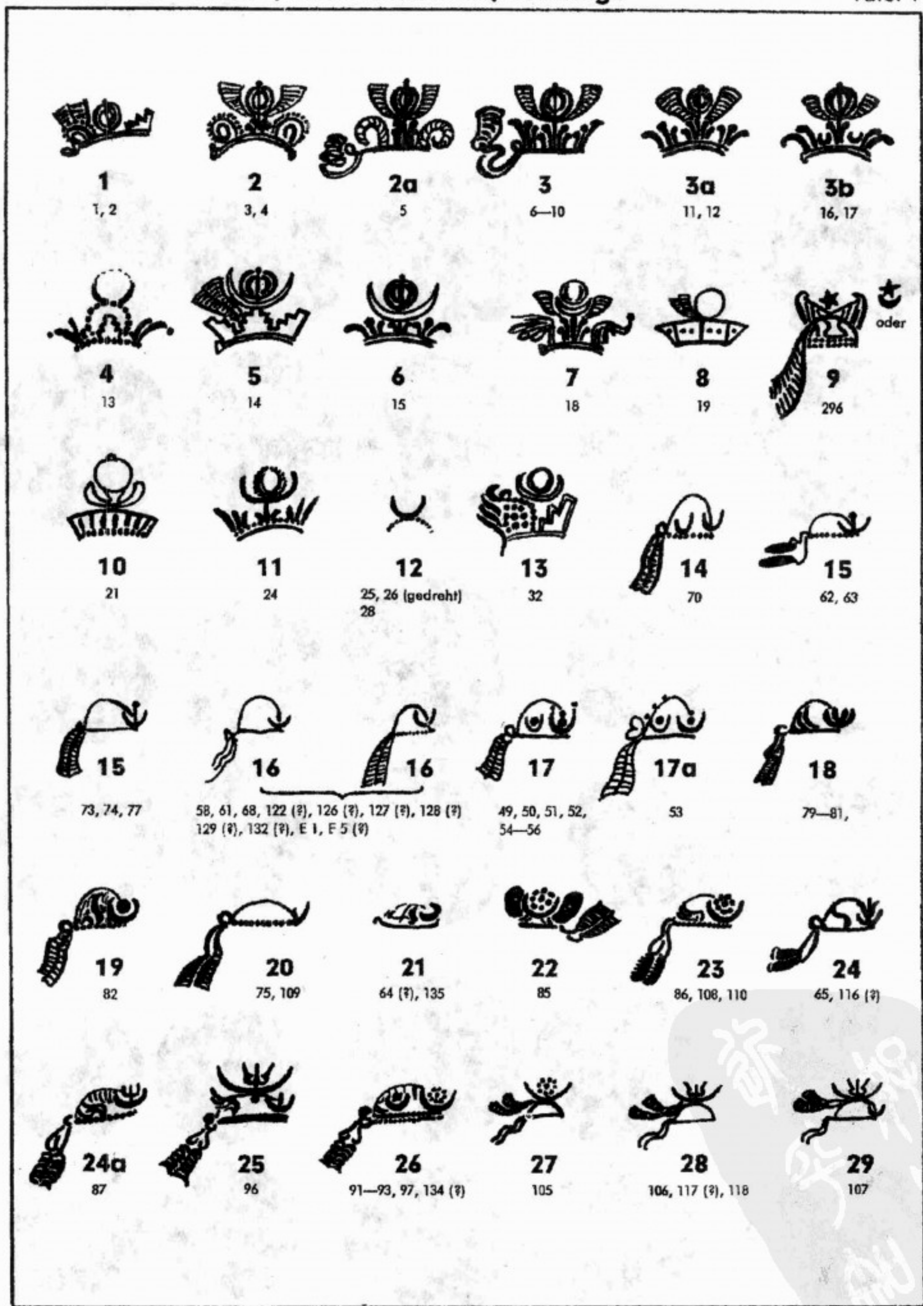
利亚（Bactria，Bactra）之译音，今代之巴里黑（Balkh）也。余太山认为，濮达即 Bactria 的对译。见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第 35 页；第 49 页注 51；第 169 页。

Tafel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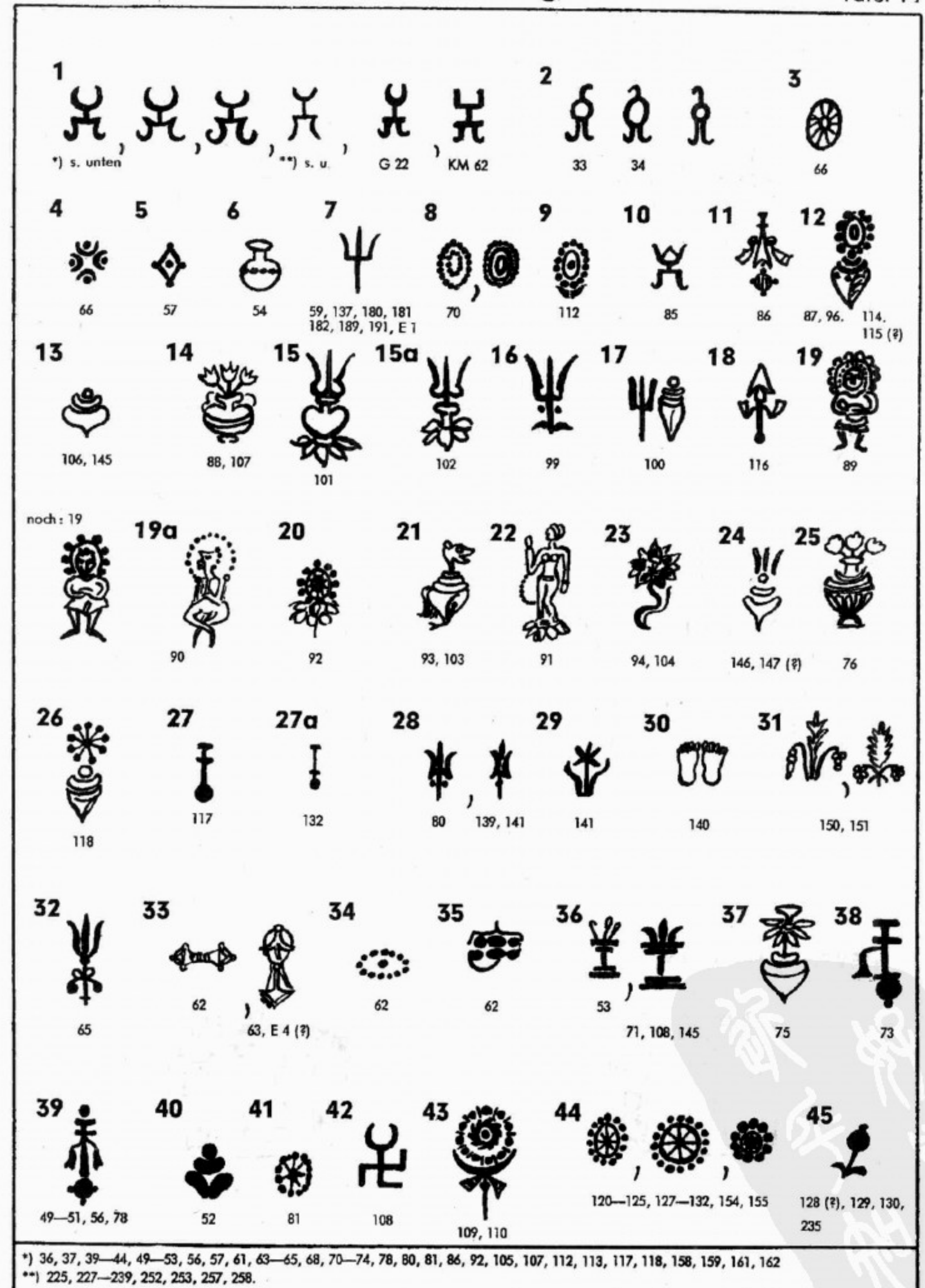
GÖBL III

KRONEN: numerische (arbeitstechnische) Ordnung. Tafel 1



GÖBL I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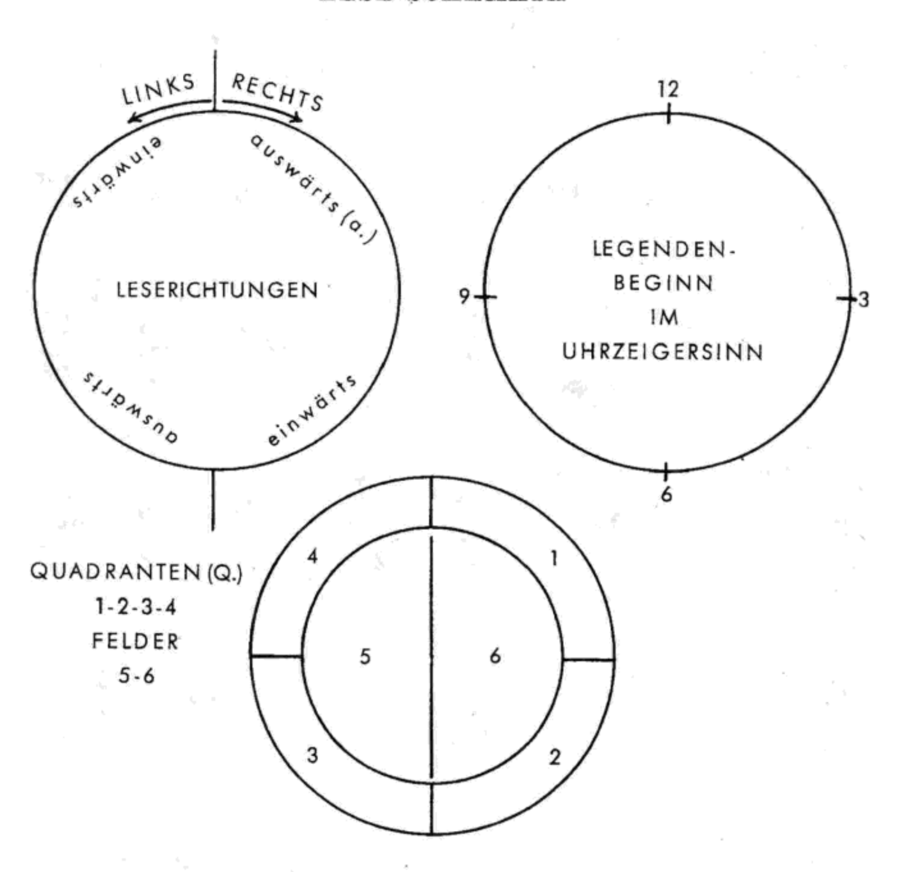
TAMGAS und SYMBOLE: numerische Ordnung. Tafel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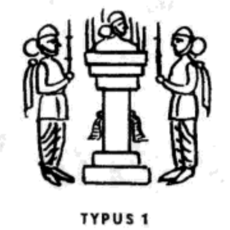
GÖBL IV

IX

LESE-SCHEMATA



REVERS-HAUPTTYPEN



TYPUS 1



TYPUS 2

LEGENDENFAKSIMILIA: numerische Ordnung nach Emissionen usw. Tafel 28

80/4

80/5

81/1

82/1

/2

83/1

/2

84/1 völlig verderbt nach der Grundform:

85/1 Riss

/2

/3

/4

/5

/6

86/1

/2

/3

/5

87/1

88/1

89/1

/2 Münzrand

91/1

/2

92/1

/3

93/1

GÖBL I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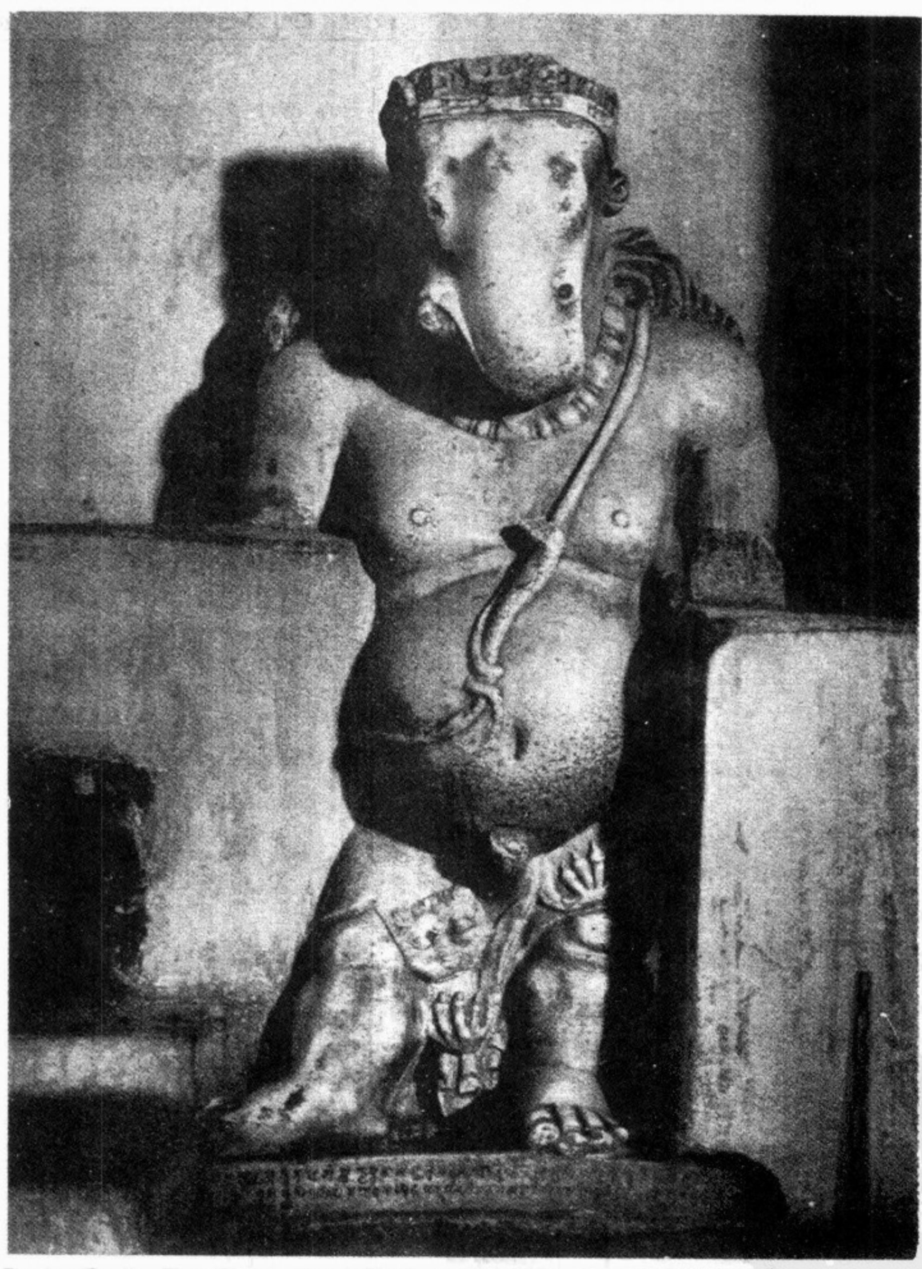


Fig. 1 - Gaṇeśa. From Gardez. *Dargah Pir Rattan Nath, Kabul* (Courtesy,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New Delhi).

Tafel 16



GÖBL III

LEGENDENFAKSIMILIA: numerische Ordnung nach Emissionen usw. Tafel 25

40 Links:

41/1

/2

/3

/4

42/1

/2

43/1

/2 ausgebrochen

/3

/4 ausgebrochen

/5

/6

/7

/8

/9

/10

44/1

/2

/3 Loch

/4

45/3

46

49/1

/2

/3

GÖBL IV

“派提达那”非“屏息”辨

张 小 贵

1923年,陈垣先生发表《火祆教入中国考》以来[1],中国火祆教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由于种种原因,有关火祆教礼俗的研究,尚有深入的余地[2]。已故孙培良教授曾撰《祆教杂记》一文,将祆教祭司祀火时所专用的“派提达那”比对为汉籍所记之“屏息”,于中国祆教礼俗研究颇具启发意义[3]。近年来,随着国际琐罗亚斯德教研究的进展,以及中国考古的新发现,特别是1999年山西太原虞弘墓、2000年陕西西安安伽墓以及2003年西安史君墓的发掘,使我们有可能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对“派提达那”与“屏息”之关系做进一步探讨。

一 祆教礼仪中的“派提达那”

祆教礼仪专用口罩,见诸该教经典《阿维斯陀经》(Avesta);在该经的《辟邪经》(Vendīdad)中,这种口罩叫作“派提达那”(Paitidâna)。Paitidâna,为阿维斯陀语,帕拉维语作padām,帕尔西人古吉拉特语则作padān,新波斯语作panām[4],“派提达那”的形制,“包括两条白布,从鼻边下垂,至少至嘴下两寸,用两条带系于头后”。《辟邪经》第十四章,先知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即琐罗亚斯德)询问上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对那些重击水獭者应做何惩罚,阿胡拉·马兹达回答说:

> 他要向诸神虔诚地进献一些宗教器具,供祭司使用,以示向水獭灵魂赎罪。这些器具包括马鞭(The Astra)、奶盆、派提达那(Paitidâna)、捕蛇器(Khrafstraghna)、鞭子(Sraoshô-karana)等等。[5]

可见“派提达那”为祭司所专用的宗教器具,献予祭司,以表示犯过者赎罪。该经第十八章,在提到祭司不称职的种种表现时,阿胡拉·马兹达说:

> 哦,神圣的查拉图斯特拉!有这样一个人,他戴着“派提达那”,但是他没有严格遵守教法。当他宣称自己是一名侍火祭司(Âthravan)时,他在撒谎,不要称他为祭司。哦,神圣的查拉图斯特拉!阿胡拉·马兹达如是说。[6]

此章主要是说祭司虽然戴着"派提达那",但如不谨遵教法,亦不称职。可反证戴"派提达那"是祭司的一个重要标志。之所以要戴"派提达那",是和该教有关洁净的义理密不可分的。琐罗亚斯德教认为人身所排出的诸物都是不净的,人的呼吸会带来污染;因此当祭司当值,甚至平信徒祈祷时,必须戴"派提达那",以免自己的气息触及圣火[7]。

古希腊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斯特拉波(Strabo,公元前64/63—公元23年),记录了波斯境内的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该地琐罗亚斯德教派十分活跃)火庙崇拜的情景:

> 他们有火庙,其四周显然有围墙;中间有祭坛,坛上有大量的火烬。麻葛们(即琐罗亚斯德教祭司)保持着火永燃不灭。他们每天都到里边祈祷约一个小时……在火前,他们披戴头巾,头巾垂至面颊,遮住嘴唇。[8]

这是有关该教祭司祀火时戴口罩的最早文字记录。即便在阿拉伯征服之后,波斯本土仍然保存着火庙祭祀;13世纪的穆斯林作家,提到当时的祆教祭司祀火时仍要遮盖口鼻:

> 在萨吉斯坦(Sagistan)的一座叫卡尔库叶(Karkuye)的古城,有两栋大圆屋建筑,据说是早在英雄鲁斯塔姆(Rustam)时代就有了。在这两座建筑之上,有两个角,弯曲相向,宛似两个牛角……建筑之下,有一火屋……该屋中之火永不熄灭,其有专人轮流照管。照料火的祭司,鼻口均有遮盖。他们用银钳夹小块柽柳木,投入火里。当火焰缩小时,便把木块一一投入。麻葛们视该屋为一所最大的火庙。[9]

古代伊朗和中亚的国王或其他显贵,其侍者经常戴这种口罩。有关这种口罩的考古资料也很多。赫茨菲尔德(E. E. Herzfeld)在《古代东方的伊朗》一书中述及伊朗西北部发现的两座米底时代的古墓(约公元前600—550年),其中一座大墓门上的浮雕像,雕刻为两人立于火坛旁,均戴口罩。口罩有两式:一种与帽相连,露眼和鼻;一种不与帽相连,只盖着嘴,用两条带子系于头顶[10]。传世萨珊银器中有萨珊王身旁侍者戴口罩之像,例如德黑兰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在卡兹文发现的银盘,就有这种图像[11]。

除了波斯本土外,这类图像在中亚也不少。1962年,苏联马松(Masson)教授在马里地区发现的双耳彩绘陶罐,一面为骑士射猎之图,另一面为骑士夫妇宴饮之图,旁有侍者戴口罩[12]。普加琴科娃(G. A. Pugachenkova)论述的莫拉—库尔干(Molla-Kurgan)所出藏骨瓮(ossuary)图像也有戴口罩的祭司。该件文物上部为金字塔式顶,高73厘米,矩形面上,有三拱,中间拱下有火坛。火坛上部呈三级檐,上有七火舌。祭司在两侧,一站一跪。他们手持火钳和燃料,脸戴口罩[13]。

以上从文献与文物两方面考察了琐罗亚斯德教祭司戴口罩的情况,其中口罩主要用于祀火仪式。从学者们对现代琐罗亚斯德教徒的田野调查中,我们可见,除了祀火仪式以外,口罩还广泛用于其他祆教礼仪中。

1963—1964 年,英国伦敦大学著名伊朗学家玛丽·博伊斯(Mary Boyce)教授,在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村落进行田野调查,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记录。根据她的记录,沙里发巴特村的祭司胡达特(D. Khodadad)在为教徒举行大净礼“九夜之净”(barašnom-e nō-šwa)时,就戴着口罩,口罩连着帽子,使他看起来像现代的外科医生[14]。另一次需要戴口罩的仪式是新年早晨,胡达特举行维斯帕拉特仪式(Visperad)。这一仪式是专为庆祝琐罗亚斯德教七大节日而举行的[15]。

1972 年,瑞典隆德大学的哈特曼(Sven S. Hartman)教授,在印度拍摄了有关印度琐罗亚斯德教徒(即帕尔西人,Parsi)仪式的珍贵照片,刊布在《帕尔西教——琐罗亚斯德的宗教》一书中[16]。其中,帕尔西人在举行大净礼“九夜之净”时,负责仪式的祭司也要戴口罩,可与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九夜之净”礼相印证[17]。众所周知,公元 7 到 9 世纪,阿拉伯人征服并统治波斯,迫使异教徒改宗伊斯兰教,部分虔诚的教徒逃亡到印度西海岸,发展成现代的帕尔西民族[18]。帕尔西人与伊朗教徒仪式的一致性,可以证明戴口罩风俗应在阿拉伯征服即 7 世纪中叶之前就已存在,且历经千年而不变。

从哈特曼教授刊布的照片中,我们看见祭司在室内举行的诸多仪式时要戴口罩,如“饮豪麻汁”(The Drinking of the Haoma)仪式。祭司先要举行准备豪麻汁的仪式,然后主礼祭司走入圣地,其右手持盛着净水的水盆,先清洁左手,同时唱诵 Khshnaothra 祷文,再清洁右手。然后走近火盆,朝东面火而立。继而念诵一系列祀火祷文。最后,他念诵三遍《阿森·伏服》(Ashem Vohu),用手中水盆中的净水清洗放置火盆的石台,按照南、西、北、东的方向,依次全面清洗。直到饮豪麻汁时,祭司才摘掉口罩,分三次饮用,每次间歇都要念诵《阿森·伏服》[19]。不过举行室外仪式,如水节(Ābūn Jashan)、成年礼、日常早祷、婚礼等其他仪式时,祭司则很少戴口罩。[20]

二　中国考古的证据

20 世纪初叶,河南省彰德府(安阳)近郊古墓出土的一组石棺床雕刻,墓石八块,形成一组,分藏美国华盛顿弗里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波士顿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Cologne)。其中藏于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的左右门阙二件,门阙的侧面各有一祭司状人物,免冠,着联珠纹大翻领胡袍,有腰带。两人手执香炉之类的祭器,戴口罩,挂在颌下,未及口鼻。这两个祭司身旁均有祭盆、祭酒胡瓶及拜火火坛各一,火坛中圣火熊熊。20 世纪 50 年代纽约大学的斯卡格里亚(Gustina Scaglia)氏就撰文,不同意早期喜龙仁(Sirén)称这

几块墓石是"曹操床",而判断其为北齐文物,认为石刻上的人物是来自粟特地区,而"这件纪念性文物,十之八九是为一位驻在邺都的人物制作的,他很可能是一位萨宝"[21]。以后俄罗斯学者马尔沙克(B. Marshak)先生《阿伏拉西阿勃(萨马尔汗)"使节大厅"绘画的图像程序》[22]一文,法国学者葛乐耐(F. Grenet)主编的《前伊斯兰中亚崇拜与宗教文物》[23]一书封面,都曾提及安阳棺床石雕双阙中的祆教祭司图像。我国学者孙培良先生很早就注意到斯卡格里亚氏的研究成果,在前揭文章中征引了安阳棺床石雕双阙中戴口罩的祆教祭司图像;但限于当时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资料不是很多,并未申论。近年姜伯勤先生据甘肃天水发现的隋唐屏风石棺床画像石实物,对散居各地的安阳棺床石雕进行了拼接和全面考察,对图像所反映的祆教意义所论尤为深入[24]。

日本 Miho 美术馆藏山西出土石棺,年代在北朝后期。该石棺床后壁第三块石板 J 上,保存了一幅珍贵的粟特丧葬图。美国学者勒娜(Jadith Lerner)在《六世纪中国的中亚人——琐罗亚斯德教丧葬仪式》一文中,阐述了图像的内容:

> 画面分上下两部分。上部的中央站立着一位身穿长袍的祭司,脸的下面,戴着一种白色的口罩(padām),前面有一火坛,坛前站着护持圣火的祭司,当是举行"户外奉献仪式"(āfrīnagān)。火坛旁边,有一个托盘,上面有面包或水果;火坛的另一边有一瓶子,盛着供仪式用的液体。祭司后面有四人,二跪二立,均手持小刀嫠面。祭司等人物的左边有七人,前面是两个女子,一人手持几个小包袱,后面五个男子叉手站立,悲伤地注视着前方。火坛和女子前面是一围栏,里面有三头骆驼,只有后退显露出来。下部有二女三男。二男在前,一男二女在后,身后有三匹马,人和马向着树的方向前进。上下两部分的中间,有一条小狗,站在祭司旁边,面朝火坛。[25]

1999 年 7 月,山西考古工作者在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发掘出完整的虞弘墓石棺,并有墓志,记有确切的入葬年代(隋开皇十二年,592 年)和墓主人身份(检校萨保府)。虞弘墓石棺下面的床座上,也有浮雕火坛,两边是半鸟半人形的祭司。《发掘简报》的描写如下:

> 该画面雕绘于椁座前壁下排正中。画面中部,是一个灯台形火坛,中心柱较细,底座和火盆较粗,火坛上部呈三层仰莲形,上有熊熊火焰。在其左右两边,有两个人首鹰身的人相对而立,上半身为人身,均戴一冠,黑色长发呈波形披在头后,深目高鼻,浓眉大眼,须髯浓密,头后有两条红白二色的飘带,向后翻飞。身着红色圆领半臂衫,半臂袖口处有花边,肩披一轻柔的火焰形长帔,经过肩臂,飘卷于身后。腰系一软带,软带在腹前打结,然后垂地,带端也为火焰形状。下半身为鹰身,有鹰翅,鹰尾、鹰腿爪。两人均是上身倾向火坛,手戴手套,一手捂嘴,一手伸出,抬着火坛一侧。这种形式在世界各地拜火教图像和波斯银币图案中常见,夏鼐先生在研究中国发现的波斯银币图像时即指

出"银币上的祭坛底座有二级,中心柱较细,有打三角结的条带在柱的两侧,带的末端向下飘扬。坛的上部三层,逐层外伸扩大,最上层有横置联珠一列或二列。再上为上升的火焰"。认为这是典型的祆教礼仪的象征。[26]

其中半鸟半人形祭司,并没有戴口罩;但是我们认为,其一手捂嘴,实际上具有与戴口罩一样的意义。

2000 年 5—7 月份,陕西省考古所在西安市北郊发掘了北周安伽墓,墓志题"大周大都督同州萨保安君墓志铭",卒年为北周大象元年(579)五月,确切说明墓主人是来自中亚粟特地区的安国人。在安伽墓墓门的门额上,刻画着三只骆驼支撑的火坛,两旁是半鸟半人形的祭司:

门额呈半圆形,高 0.66、宽 1.28 米,正面装饰有减地浅浮雕贴金彩绘图案。图案内容为祆教祭祀场面,可分四组,并以纵中心线为轴对称分布。中部为火坛,三头骆驼(一头面前,两头分别面向东或西)踏一硕大的覆莲基座,驼背负一较小的莲瓣须弥座,座上承大圆盘,盘内置薪燃火,火焰升腾幻化出莲花图案。火焰左右各有一乐神,上身袒裸、腰系裹体红色长裙、跣足,肩披飘动飞扬的条帛,四周祥云缭绕。左侧乐神弹奏曲颈琵琶,项圈和手镯贴附金箔;右侧乐神舞弄箜篌。骆驼座两侧各有一人身鹰足祭司,上半身为人身,卷发、深目、高鼻、络腮胡须,似戴口罩,上身赤裸,下身为鹰身,双翼伸展上翘,尖尾鹰爪,双手握神杖伸向火坛两侧的供案。供案为三兽足,案面两端呈鱼尾状,案上放置瓶、叵罗、盘、罐等器物,瓶内插祭祀用吉祥花叶,叵罗可能用来盛酒;瓶贴金,其他器物施白彩,花叶贴金或饰绿彩,案涂黑彩。[27]

韩伟先生对这一人身鹰足神进行了考证:

门额正中拜火坛左右的神祇呈人手鹰爪之状。身着大袍,头发卷曲,络腮大胡,公牛躯干,男根裸露,鼓舞双翅,羽尾上翘,双腿分立,足爪犀利,是祆教的幻想形象。从其戴口罩、执法杖的特征分析,其职能当为专司祭祀的神祇。这类图像亦曾在太原隋代虞弘墓的石椁基座上发现,只是时代比安伽墓要晚。在苏尔赫—考塔尔火坛遗址之火坛一侧,有所谓两个"对鸟"的图像,上半截已毁,下半截与安伽墓之人首鹰足图像极相似,若头部原系人首,"对鸟"的称谓尚可商榷。这类人首鹰爪躯体若牛的专司祭祀的神祇,看来在中亚早有流传。[28]

有关安伽墓的祆教意义,马尔沙克教授的解释最为透彻:

墓门门楣上画着一对鸟人形状的祆教祭司,以及中间喷火的火坛。火坛放置在由三匹骆驼托起的宝座上。这种火坛以前从未见过。画家很有可能来自中亚,在粟特地区,祆神的宝座通常都是用一匹或两匹骆驼托着的。我自己认为是胜利之神,在粟特即

Washaghn(《阿维斯陀经》的 Verethraghna,是骆驼的化身)。在粟特艺术中,骆驼托举的宝座上的神常常负责守护主要的火坛。在伊朗,最高等级的火坛称为"Wahram 火",这个名称源于 Wahrām 神(Verethraghna 的帕拉维语形式)。安伽墓门楣上承托火坛的骆驼似乎更像是 Washaghn。[29]

由于安伽墓的出土,学者们现在可以确定上文提到的安阳石棺床、Miho 美术馆的石屏风、太原虞弘墓石椁以及益都和天水发现的石棺床[30]都是属于同一组的粟特系统的图像。荣新江先生指出:"从北朝到隋唐,在以粟特人为主体的胡人聚落未分散之前,聚落内部的宗教主要应当是祆教,而聚落的首领萨保,固然总管聚落内部各种事务,但他本人的宗教信仰,显然也应当和聚落内部的大多数胡人一样,是祆教而非佛教。"[31]

2003 年 6 月 12 日—10 月 28 日,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在今西安市未央区大明宫乡井上村东,西距汉长安城遗址 5.7 公里处清理了北周史君墓。其中出土有浮雕彩绘贴金作装饰的石椁。石椁东壁浮雕画面分成三个部分,从北到南编号为 E1、E2、E3。其中 E1 图画面下部"为起伏的山峦,山上用石绿点染树木,山坡上有两犬,犬颈下挂铃。山下有一个雕栏的拱形桥,桥头有一对望柱。桥左侧站立两位祭司,戴口罩,穿圆领窄袖长袍,足登高鞠靴,腰束带,腰的左侧均悬挂有物,双手持火棍。桥上方和望柱上分别刻有两团火焰……"。杨军凯先生将其与 Miho 丧葬仪式画面作比,讨论了此图的祆教内涵[32]。如果杨先生的考证得实,则中国考古发现又见"派提达那"之实例。

中国境内所发现的这些祆教图像资料,从祭司祀火一点来看,他们还是顽强地坚持着本教的原始信仰的。只是他们的祭祀活动发生在本聚落内部,外人很少看见。吾人固知,琐罗亚斯德教视教外人为不净人,在其举行净礼时,不许教外人在近旁观。如当今研究琐罗亚斯德教最著名的学者玛丽·博伊斯教授,在伊朗亚兹德(Yazd)市的琐罗亚斯德教徒住地考察时,尽管她与教徒们至为亲善,但毕竟还不是教中人,因此在他们举行净礼时,也只能远观,不能近看[33]。所幸,这批珍贵的粟特图像作品,为我们保留了有关祆教祭仪的珍贵内容[34]。

三 文献所见的"屏息"

"屏息"之名见于明末方以智《通雅》的记载。该书卷三六"屏息奉献以掩鼻者"条提到这种口罩:

遯园曰:太常供奉祭品如羹醢之类。其奉献人口鼻用物作长袋系颈后,俗名"抵须",非也。志名曰"屏息"。太庙以黄罗,他祀以红纻绢为之。家君戊寅代署南太常

篆，智随殿上，窃瞻典礼，不见有奉献带屏息者。故事之废，岂一端哉。[35]

从方以智的记述中，我们可知“屏息”乃用于太常供奉，其形制为“用物作长袋系颈后”，太庙以黄罗，他祀则以红纻绢。太常礼使用“屏息”，可从明代《太常续考》中得到印证[36]。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安徽桐城人，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其父方孔炤，字潜夫，桐城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37]。文中提到的戊寅年，当为明崇祯十一年（1638）[38]。《马可波罗行纪》记忽必烈汗饮宴时亦提到这种“屏息”，可与上文相印证：

> 并应知者，献饮食于大汗之人，有大臣数人，皆用金绢巾蒙其口鼻，俾其气息不触大汗饮食之物。大汗饮时，众乐皆作，乐器无数。大汗持盏时，诸臣及列席诸人皆跪，大汗每次饮时，各人执礼皆如上述。[39]

《行纪》的注者沙海昂注云：

> 此种卫生方法，出于游牧部落之蒙古人，似不应知之，殆因袭汉人之制。1421 年沙哈鲁使臣志明代之事有云：“两宦者侍立，口覆厚纸，覆及耳下。……每次进馔于帝前，乐人皆奏乐（颇节本 281 页引 Quatremère 译文）。[40]

沙海昂以为那是蒙古人因袭汉人之制，并未提出根据。孙培良先生指出：“唐宋诸史礼仪等志既不见有关‘屏息’的记载，而伊朗乃至中亚却有以帛覆口鼻侍宴之风，且有实物可证，则未尝不可设想蒙古人是在西侵过程中从中亚或伊朗学得这种‘卫生方法’。至于明朝是否在灭元之后因袭蒙古人的制度，或另有来源，尚难确定。”[41]然而仔细考察“屏息”的形制与用途，其与火祆教中的“派提达那”是不同的：“屏息”或为黄罗，或为红纻绢，而祆教尚白，“派提达那”为白色；“屏息”主要用于宫廷的太常祭祀之礼，而“派提达那”则用于祆教祀火和净礼等重要宗教场合，两者显然不可简单等同。

检明代以前诸史礼仪等志，不见有关“屏息”的记载。上节所论中国考古发现，主要是唐以前隋与北朝时期文物，从中可见戴口罩的风俗当存在于胡人聚落内部的祆教祭祀中。而且，从唐代有关祆祠祭祀的史料中，我们也否定了这种风俗在教外人士中的流行。宋敏求《长安志》卷十布政坊下记：

> 布政坊，胡祆祠。注：祠内有萨宝府官，主祠祆神，亦以胡祝充其职。[42]

《通典》卷四十《职官典》所记：

> 视流内
>
> 视正五品：萨宝
>
> 视从七品：萨宝府祆正。注：祆，呼烟反。祆者，西域国天神，佛经所谓摩醯首罗也。武德四年，置祆祠及官，常有群胡奉事，取火咒诅。[43]

这里明确提及唐初所置祆祠，取火咒诅的是群胡而非汉人，与上揭北朝图像资料所反映的胡

人祭祀场景是一脉相承的。但是这些在祠中主持祭祀的祆教祭司,亦即祆祝,是否谨尊教法而戴口罩,则不得而知;而且,即便他们戴口罩祀火,也属胡人聚落内部的宗教事务,外人很难得知其详,更遑论这种风俗会被时人习得。史籍记载的其他祆祠的情况当与之相似,兹不赘述[44]。《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制·祠部》记"两京及碛西诸州火祆,岁再祀,而禁民祈祭"[45]。说明火祆祭祀一度被官方允许存在,只是禁民祈祭而已。此处之民当指中土百姓,而非祀祆胡人。

宋代的文献记载还有关于火庙祭祀的微弱信息,只不过其祆教特征已经非常不明显了。宋代董逌《广川画跋》卷四《书常彦辅祆神像》云:

> 元佑八年(1093)七月,常君彦辅就开宝寺之文殊院,遇寒热疾,大惧不良。及夜,祷于祆神祠。明日,良愈。乃祀于庭,又图像归事之。属某书,且使教知神之休也。祆祠,世所以奉梵相也。其相希异,即经所谓摩醯首罗。有大神威,普救一切苦,能摄伏四方,以卫佛法。当隋之初,其法始至中夏,立祠颁政坊。常有番人奉事,聚火祝诅,奇幻变怪。至有出腹决肠,吞火蹈刃,故下俚佣人,就以诅誓,取为信重。唐祠令有萨宝府官主司,又有梵祝以赞于礼事,其制甚重,在当时为显祠。今君以祷获应,既应则祠,既祠则又使文传,其礼至矣。与得悉唐国顺大麗宾同号祆神者,则有别也。[46]

常彦辅在佛寺中得了寒热疾病,到晚上祈祷于祆神祠,第二天就痊愈,于是在自己庭院里祭祀祆神,并把祆祠中的神像画下来,带回家供奉。在这里,虽然作者着意表明祆神比佛、菩萨要灵,但是此处的祆神只是更为灵验的神灵而已,这种偶像崇拜的特征,与正统祆教是互相矛盾的[47]。

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记载:

> 东京城北有祆庙(呼烟切)。祆神本出西域,盖胡神也。与大秦穆护同入中国,俗以火神祠之。京师人畏其威灵,甚重之。其庙祝姓史,名世爽,自云家世为祝累代矣。藏先世补受之牒凡三:有曰怀恩者,其牒,唐咸通三年(862)宣武节度使令狐给,令狐者,丞相绹也;有曰温者,周显德三年(956)端明殿学士、权知开封府王所给,王乃朴也;有曰贵者,其牒亦周显德五年(958)枢密使、权知开封府王所给,亦朴也。自唐以来,祆神已祀于汴矣,而其祝乃能世继其职,逾二百年,斯亦异矣。
>
> 今池州郭西英济王祠,乃祀梁昭明太子也。其祝周氏,亦自唐开成年(836—840)掌祠事至今,其子孙今分为八家,悉为祝也。
>
> 噫,世禄之家,能箕裘其业,奕世而相继者,盖也甚鲜,曾二祝之不若也。镇江府朱方门之东城上,乃有祆神祠,不知何人立也。[48]

庙祝史氏世继为祝,与琐罗亚斯德教祭司注重父子相承的传统是相吻合的[49]。然而,这段

记载除了追述唐代建祠的渊源，可表明其曾是祆祠外，我们丝毫看不出其具有祆教的特征。正如林悟殊先生指出：“《墨庄漫录》所云史姓庙祝世爽，先祖为胡人祆僧无疑，但‘家世为祝累代’，已属地道的‘土生胡’。就其血统，多半为胡人；但从其文化背景，则应目为汉人。除了该史姓庙祝外，在宋代的其他祆祠、祆庙中，或许也有胡姓神职人员，但吾人断不可据此而言其祠庙乃为胡人所有。”[50]《宋史》卷一百二《礼志》载：

> 建隆元年(960)，太祖平泽、潞，仍祭祆庙、泰山、城隍，征扬州、河东，并用此礼。
>
> 初，学士院不设配位，及是问礼官，言：“祭必有配，报如常祀。当设配坐。”又诸神祠、天齐、五龙用中祠，祆祠、城隍用羊一，八笾，八豆。旧制，不祈四海。帝曰：“百谷之长，润泽及物，安可阙礼？”特命祭之。[51]

《宋会要辑稿》第十八册《礼》十八《祈雨》：

> 国朝凡水旱灾异，有祈报之礼。祈用酒脯醢，报如常祀……京城……五龙堂、城隍庙、祆祠……以上并敕建遣官……大中祥符二年(1009)二月诏：如闻近岁命官祈雨……又诸神祠，天齐、五龙用中祠例，祆祠、城隍用羊，八笾，八豆，既设牲牢礼料，其御厨食、翰林酒、纸钱、驼马等，更不复用。[52]

宋代的祆庙、祆祠已与中国的泰山、城隍等传统祠庙一起被纳入官方轨道，按官方规定的标准享受祭祀，祆神已进入中国的万神殿了。因此即使这些祆庙中有胡姓神职人员，他们也不可能按照传统的方法，戴着“派提达那”，为信众举行仪式了。

到了元代，祆神更直接作为文学上的用典，与祆教已经无所关联了。明彭大翼撰著《山堂肆考》第三十九卷《宫集·帝属·公主》条记载：

> 幸祆庙
>
> 蜀志：昔蜀帝生公主，诏乳母陈氏乳养。陈氏携幼子与公主居禁中，约十余年。后以宫禁，逐而出者六载。其子以思公主疾亟。陈氏入宫，有忧色。公主询其故，阴以实对公主。遂托幸祆庙为名，期与子会。公主入庙，子睡沉。公主遂解幼时所弄玉环，附之子怀而去。子醒见之，怨气成火而庙焚。按祆庙，胡神庙也。[53]

关于元曲中的祆庙资料，日本学者多所征引，此不赘述[54]。陈垣先生对此类资料与火祆教之关系，持谨慎态度：

> 明万历间臧晋叔编元曲选，卷首载陶九成论曲，仙吕宫中有祆神急一出，注曰，与双调不同；双调中亦有祆神急一出，亦注曰，与仙吕不同。元曲中既时演祆神，则祆神至元时，不独未曾消灭，且更形诸歌咏，播之管弦，想其意义已与中国旧俗之火神相混，非复如原日西来之火祆教矣。元曲选卷首又有李直夫所撰火烧祆庙一出，与上述祆神急两出，均未入选，不能得其词，莫由定其为中国火神，抑西来祆教，为可惜耳。朝野新声太

平乐府卷六有仙吕祆神急一曲，朱庭玉撰，玩其词意，与祆教无关，盖数典忘其祖矣！[55]

林悟殊先生根据这些作品中屡屡把爱情故事与祆庙相联系，认为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考虑，“祆”很可能是一种用典，他进而指出：

元代俗文学作品中，广泛以祆为典，虽不能说明元代社会有火祆教之流行，但却暗示了我们：中国在元代之前，必定有过祆神崇拜颇为流行的时期，否则，就不会给后代留下如此深刻难忘的印象，以至成为典故，为元人所熟悉并广为采用。所以，我们不妨把元代俗文学中的“祆典”，视为往昔祆神崇拜留下的烙印。至于元代或尔后的明清，是否亦有这种崇拜的残余，就现有史料看，尚不明显，有待进一步的发掘考证。[56]

林文主要着眼于从元代俗文学作品中寻找元代之前祆神崇拜的残余。其实，从上引元代文献所见的祆庙祭祀中，我们已完全找不到祆教祭祀的痕迹，火烧祆庙之火与唐时“群胡奉事，聚火祝诅”的情形已完全不同了。这时祆庙里已经没有火祆教的专职祭司，当然不会有祭司们祀火专用的“派提达那”了。

上文我们从祆教祭祀的角度，认为正统祆教祭祀的具体情节不可能为时人习得，论者谓“屏息”受祆教影响并不具备事实基础。而且，以巾复面并非祆教独有的传统，我国自古有之。

1913—1915年，匈牙利裔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Aurel Stein，1862—1943）进行第三次中亚考察，曾到吐鲁番发掘阿斯塔那墓（Astana），发现有“复面”（face-cover）[57]。1959年10月至11月，新疆博物馆东疆文物工作组在吐鲁番阿斯塔那的墓葬进行发掘，从六个墓葬里获得一批4至7世纪的资料，其中死者脸部有“复面”（面罩）：

303I女尸复面残长28、宽24厘米（连边），以素绢为面，内夹丝锦，紫锦银边，边宽4厘米。上缀穿珠三颗，两颗骨质，约当眼部，一颗玛瑙质，约当鼻尖。302墓男尸复面已失，从残存迹象看，上压眉、下护嘴、两边齐腮，四角有带子以束系，眼部开洞。[58]

新疆博物馆又于1960年在阿斯塔那墓区发掘清理，两次共清理墓葬四十座，出土复面三十二件。新疆博物馆和武伯纶先生都将其定为文献记载的面衣，并旁征博引，对面衣在古代中国的流行情况进行了系统研究[59]。王澍先生根据新疆博物馆现藏的几件较好标本，认为“复面”并非“上压眉、下护嘴、两边齐腮，四角有带子以束系，眼部开洞”的复布式制品，而是一种帽套式的面衣。并对其面料、制作方法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最后指出“从实物看来，口部或眼部，都没有发现任何开洞的痕迹”[60]。关于面衣口部是否开洞，文献的记载是模糊的。《仪礼·士丧礼》记载：

布衣、环幅不凿。〔正义〕郑氏康成曰：“环幅，广袤等也。不凿者，士之子亲含，反其巾而已；大夫以上，宾为之含，当口凿之，嫌有恶。”贾疏：《杂记》“凿巾以饭，公羊贾为

之也"。注云,记士失礼所由始。盖士亲饭必发其巾;大夫以上臣为宾,宾含饭嫌有恶,故凿之,士则不凿也。[61]

这里,凿与不凿(即在不在口部开洞),主要是视社会身份不同而规定的,大夫以上可以凿洞。而士,"亲饭必发其巾",不应当凿口的。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关于复面制法的记述:

崔生初隔纸隙见亡兄以帛抹唇如损状,仆使共讶之,一婢泣曰:"几郎就木之时,面衣忘开口,其时匆匆就剪,误伤下唇,然旁人无见者。不知幽冥中二十余年,犹负此苦。"[62]

事虽无稽,但此处明确记载面衣在口部开洞,应是确凿无疑的。无论如何,面衣至少有口部开洞与不开洞两种,这与祆教祭司戴"派提达那"以防气息污染圣火的功能是迥异的。

值得注意的是面衣除用于死者复面之外,还可用于生人日常御寒[63]。《晋书·惠帝纪》记载永兴元年十一月乙未:"行次新安,寒甚,帝堕马伤足,尚书高光进面衣,帝嘉之。"[64]著名的玄奘法师西去印度求法,路过高昌时,高昌王麹文泰为其打点盘缠,制备行装,其中包括必备的御寒之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袜等各数事。"[65]面衣可用于死者复面和活人御寒,无论从其形制或功能来看,都与"派提达那"绝不相类。但二者俱以巾复面。由此可以推想,蒙古族久居漠北风沙之地而独自发明了以巾复面的"卫生方法",并进而演变为宫廷侍宴和祭祀中的"屏息以献",与火祆教的"派提达那"则无甚关联了。

另外,喇嘛庙打鬼仪式(即跳布扎)也有戴面巾之习俗。清人徐松曾目睹了绥定喇嘛庙的打鬼仪式,并引徐兰芬若《塞上集唐六歌》之《打鬼歌序》:"几上陈胡朗叭令(原注:以醍醐拌面作人兽形,为鬼食),二甲士左右立,以帛束口,恐人气触之,鬼不食也……复有一僧曰乃冲,戎装执戟,吐火吞刀,云神附于身。观者皆膜拜,奉界单(原注:绸巾)于神,以问休咎。"[66]既然喇嘛庙打鬼仪式可以"以帛束口",那么,"屏息以献"乃源于本民族的自我发明,也就不足为异了。在资料匮乏的情况下,实不宜把这种风俗与火祆教的"派提达那"简单等同。

总之,"派提达那"是火祆教祭司的专用之物,既遵教法,亦为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所证明。中国考古发现中的"口罩",主要见于胡人聚落的祆教祭祀中,可与之比对。虽然唐代文献记载群胡"聚火咒诅"的祆祠祭祀中或有祭司戴口罩之可能,但由于祆教祭祀的隐秘性,时人不易得知其具体细节,因此祭司带口罩的特征无法形诸时人笔墨,更无从论及其对汉地风俗产生什么影响了。到了宋元之际,祆神崇拜已纳入中国万神殿,正统祆教祭祀的具体情节当然更不可能进入中国史家的视野。中国自古已有以巾复面的传统,主要用于丧葬和御寒,喇嘛教的打鬼仪式也"以帛束口"。可推知元明时期,"屏息以献"用于宫廷侍宴和祭祀,或许是蒙古族久居漠北风沙之地而独自发明的一种"卫生方法",后逐渐走向宫廷,成

为王朝祭祀的一部分。至于其与火祆教是否有所关联,只能存疑,以待史料的发现了。

"派提达那"与"屏息",一为专用的宗教器具,一为彰显身份地位的"卫生用品",分别具有宗教与世俗的不同含义,实在不应该简单混淆。

注 释

〔1〕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完成于1922年4月,发表于《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1923年1月),发表后,1923年1月、1934年10月作者进行过两次校订。本文采用1934年10月校订本,据《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80年,页303—328。

〔2〕有关中国的火祆教研究状况请参阅林悟殊《20世纪中国琐罗亚斯德教研究述评》,载余太山主编《欧亚学刊》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页243—265;《陈垣先生与中国火祆教研究》,载龚书铎主编《励耘学术承习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170—179;《三夷教·火祆教》,载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页577—585。Rong Xinjiang, 'Research on Zoroastrianism in China 1923—2000', *China Archaeology and Art Digest*: *Zoroastrianism in China*, Vol. 4 No. 1, Hong Kong, 2000, pp. 7 – 13;荣新江:《西亚宗教的传播·祆教》,载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页273—277。

〔3〕孙培良《祆教杂记》,载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理事会编《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首届年会学术论文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35—45。蔡鸿生《论突厥事火》,《中亚学刊》第一辑,中华书局,1983年,页145—149;《隋书康国传探微》,《文史》第26辑,中华书局,1986年,页103—108;《唐代九姓胡礼俗丛考》,《文史》第35辑,中华书局,1992年,页109—125;《唐代"黄坑"辨》,余太山主编《欧亚学刊》第三辑,中华书局,2002年,页246—247;《唐代九姓胡崇"七"礼俗及其源流考辨》,《文史》第60辑,中华书局,2002年,页105—111。

〔4〕J. K. Choksy, *Purity and Pollution in Zoroastrianism*: *Triumph over Evil*,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9, p. 162.

〔5〕J. Darmesteter (transl.), *The Zend-Avesta*, Part I, *The Vendīdād*, in F. Max Müller ed.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SBE*), Vol. IV,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5, pp. 168—169.

〔6〕*SBE*, Vol. IV, p. 189.

〔7〕*SBE*, Vol. IV, p. 168 n. 7.

〔8〕Mary Boyce ed. & transl., *Textual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Zoroastrianism*,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63.

〔9〕Mary Boyce ed. & transl., *Textual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Zoroastrianism*, pp. 63—64.

〔10〕Ernest E. Herzfeld, *Iran in Ancient East*, London 1941, pp. 204—205, Figs. 313, 314. 引自孙培良《祆教杂记》,页42。

〔11〕Gustina Scaglia, 'Central Asians on a Northern Ch'i Gate Shrine', *Artibus Asiae*, Vol. XXI, 1958, Fig. 7.

〔12〕Grégoire Frumkin, *Archaeology in Soviet Central Asia*, Leiden 1970, pp. 147—149, Fig. 38. 见弗鲁姆金著《苏联中亚考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1981年,页66,136。

〔13〕G. A. Pugachenkova, 'The Form and Style of Sogdian Ossuaries',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 8 (The Archaeology and Art of Central Asia. Studies from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1996, pp. 235 – 236.

〔14〕Mary Boyce, *A Persian Stronghold of Zoroastrianis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Lanham · New York · London, 1989, p. 127.

〔15〕Mary Boyce, *A Persian Stronghold of Zoroastrianism*, p. 231.

〔16〕Sven S. Hartman, *Parsism: The Religion of Zoroaster*, Leiden: E. J. Brill, 1980.

〔17〕Sven S. Hartman, *Parsism: The Religion of Zoroaster*, pp. 26—27, Plate XXVIII – XXX. 有关帕尔西人举行“九夜之净”的具体情况，则可参阅 J. J. Modi, *The Religious Ceremonies and Customs of the Parsees*, 2nd ed., Bombay, 1937, pp. 126—127.

〔18〕林悟殊《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 年，页 11—22。

〔19〕Sven S. Hartman, *Parsism: The Religion of Zoroaster*, pp27— 29; J. J. Modi, *The Religious Ceremonies and Customs of the Parsees*, p. 300 f. and 293 f..

〔20〕分别见 Sven S. Hartman, *Parsism: The Religion of Zoroaster*, Plate XXXIX、XXVII、XL.

〔21〕Gustina Scaglia, ‘Central Asians on a Northern Ch'i Gate Shrine’.

〔22〕B. Marshak, ‘Le programme iconographique des peintures de la《Salle des ambassadeurs》à Afrasiab (Samarkand)’, *Arts Asiatiques*, 49, Paris, 1994, p. 13.

〔23〕F. Grenet, *Cultes et monuments religieux dans L'Asie centrale préislamique*, Paris, 1987, 封面。

〔24〕姜伯勤《安阳北齐石棺床画像石的图像考察与入华粟特人的祆教美术——兼论北齐画风的巨变及其与粟特画派的关联》，《艺术史研究》第 1 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 年，页 151—186；并见氏著《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4 年，页 33—62。

〔25〕J. A. Lerner, ‘Central Asians in Sixth-Century China: A Zoroastrian Funerary Rite’, *Iranica Antiqua*, XXX, 1995, p. 180, Pl. I.

〔2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文物》，2001 年第 1 期，页 43—44，图三一、三六。

〔2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西安北周安伽墓》，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报告，第 21 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年，页 16。

〔28〕韩伟《北周安伽墓围屏石榻之相关问题浅见》，《文物》，2001 年第 1 期，页 91。

〔29〕B. I. Marshak, ‘La thèmatique sogdienne dans l'art de la Chine de la seconde moitié du Vie siècle’,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 Belles-Lettres, 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nnee* 2001 *janvier-mars*, Paris, 2001, pp. 244—245.

〔30〕见夏名采《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文物》1985 年第 10 期，页 49—54。天水市博物馆《天水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考古》1992 年第 1 期，页 46—54。

〔31〕荣新江《北朝隋唐胡人聚落的宗教信仰与祆祠的社会功能》，载荣新江主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年，页 396。

〔32〕杨军凯《北周史君墓石椁东壁浮雕图像初探》，《艺术史研究》第 5 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 年，页 189—198；《西安北周史君墓石椁图像初探》，提交“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学术研讨会”论文，2004 年 4 月 23 日—25 日，中国北京。

〔33〕Mary Boyce, *A Persian Stronghold of Zoroastrianism*, p. 119, 128.

〔34〕有关汉唐之际入华粟特祆教美术的研究，可参阅荣新江《粟特祆教美术东传过程中的转化——从粟特到中国》，提交“汉唐之间——文化的互动与交融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 年，收入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年，页 51—72；荣新江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 年，页 301—325。

〔35〕〔明〕方以智《通雅》卷三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一六三，杂家类，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857 册，页 701。遯园即明顾起元（1565—1628），方以智关于屏息的描述乃引自顾起元《客座赘语》，谭棣华、陈稼禾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页 86—87。

〔36〕〔明〕《太常续考》卷二、卷三、卷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三五七，职官类，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599 册，页 1—330。

〔37〕《明史》卷二六〇，中华书局点校本，页 6744—6745。

[38]任道斌编著《方以智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 年,页 84。
[39]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年,页 217。党宝海先生在新注冯译《马可波罗行纪》时,并未对此段文字进行解释,见 A. J. H. Charignon 注,冯承钧译,党宝海新注《马可波罗行纪》,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页 329—333。
[40]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页 220。
[41]孙培良《祆教杂记》,页 43。
[42]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页 316。
[43]《通典》卷四十《职官典》,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 年,页 1102—1103。
[44]关于祆祠的分布,可参阅林悟殊《火祆教在唐代中国社会地位之考察》,载蔡鸿生主编《戴裔煊教授九十诞辰纪念文集:澳门史与中西交通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年,页 172—175。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收入氏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页 157—160。
[45]《新唐书》卷四十六,中华书局校点本,页 1195。
[46][宋]董逌撰《广川画跋》卷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一一九,艺术类,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813 册,页 476—477。
[47]Mary Boyce, 'Iconoclasm among the Zoroastrians', *St. dies for Morton Smith at sixty*, J. Neusner, Leiden, Vol. IV, 1975, pp. 104 - 105.
[48][宋]张邦基著,孔凡礼点校《墨庄漫录》(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卷四,中华书局,2002 年,页 110—111。
[49]Mary 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9, p. 153.
[50]林悟殊《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与中国古代的祆神崇拜》,载余太山主编《欧亚学刊》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99 年,页 212。
[51]《宋史》卷一百二,中华书局点校本,页 2497、2501。
[52][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十八册《礼》十八,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 年,第一册,页 733—748。
[53][明]彭大翼撰《山堂肆考》卷三十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二八〇,类书类,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974 册,页 673。
[54]石田干之助《神田学士の〈祆教杂考〉を读みて》,刊《史学杂志》第 39 卷第 6 号,1928 年,见页 558—559。
[55]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页 327—328。
[56]林悟殊:《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与中国古代的祆神崇拜》,页 204。
[57]Aurel Stein, *Innermost Asia*, Vol II, New Delhi-India: Cosmo Publications, 1981, p. 677.
[58]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博物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60 年第 6 期,页 15。
[59]武伯纶《唐代的复面和胡部新声》,《文物》,1961 年第 6 期,页 42—44。
[60]王澍《复面、眼罩及其他》,《文物》,1962 年第 7、8 期,页 83—84。
[61]《仪礼注疏》卷三十五,(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 年,页 1130。
[62][唐]段成式著,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续集卷一,中华书局,1981 年,页 205。
[63]向达《西域见闻琐记》,《文物》,1962 年第 7、8 期,页 34。
[64]《晋书》卷四,中华书局点校本,页 103—104。
[65][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华书局,2000 年,页 21。
[66][清]徐松《西域水道记》卷四,[清]清河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四帙,杭州古籍书店,1985 年影印本,第 6 册,页 877。

民众信仰与国家建构：关于黑秃阿喇的七大庙*

李 勤 璞

引 言

明万历四十三年乙卯(1615)[1]，奴儿哈赤(Nurhaci, 1559—1626，老乙可赤、弩尔哈奇、努尔哈赤，清朝太祖皇帝)在黑秃阿喇[2]东阜建立所谓"七大庙"[3]，至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建成，清朝实录曾予以专条记载。而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是他上尊号"abka geren gurun be ujikini seme sindaha (amba) genggiyen han"[4]的年份[5]。那么，七大庙是怎么回事？对于其后清帝国(Daičing Ulus, 1636—1911)的建立(1636)有怎样的关联？至今尚无人讨论[6]。一般而言，民间寺庙为信仰者设立，官奉寺庙则有的是为满足百姓信仰，有的是国家体制、礼仪建筑，出于政治文化的考虑；有些寺庙则可能满足了这两方面的需要[7]。有鉴于此，本稿专考七大庙：它的建立经纬，它的内容与功用，它在满清兴起史上的意义。同时也以七大庙崇祀对象为基点，切实探求一六〇〇年前后辽东及其四周各色人民的信仰情况，以期了解大清帝国兴起时节的地域信仰环境。

从另一立场看，当时驻锡蒙古科尔沁(Qorčin Aimaγ)、大有名声的乌斯藏喇嘛斡禄打儿罕囊素(Örlüg Darqan Nang-so Bla-ma，？ -1621)，跟奴儿哈赤素有过往，在七大庙建造期间，曾二度受邀，南来此地，应该是其中佛教寺庙的开光和度僧者，是他完成了清朝藏传佛教的开山事业[8]。众所周知，西藏与蒙古人的佛教(所谓喇嘛教)在清帝国政治与意识形态统制上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以致有学者称清朝是"儒教与(藏传)佛教之二重帝国"[9]。可知为理解"中华世界帝国"[10]或"东亚中国世界"及其中清朝的性质，以及理解清末以来西藏及内外扎萨克(dotoγadu ǰasaγ，γadaγadu ǰasaγ；内外蒙古)某些重大变故的历史根源，亦应探

---

* 纪念金毓黻(1887—1962)

究清人入关前创建寺庙、藉重宗教这类汉学者难能措意的历史事件。

一　七大庙的建立记载和供奉尊像

关于“七大庙”的重要记载如下。《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卯年（万历四十三年，1615）四月条：

○ duin (ilan) biyade ilan erin i fucihi sa. abkai (iowang) ioi hūwangi mio uhereme nadan
四　三　月于　三　世　的　佛　等　天的　玉王　玉　皇的　庙　共计　七

amba mio arame deribuhe;
大　庙　建造　使开始

（四月：开始建筑三世诸佛，天上的玉皇寺庙等，共计七大庙。）[11]

《满文老档》乙卯年四月条：

○ duin biyade, ilan erin i fucihi sa, abkai ioi hūwang miyoo, uhereme nadan amba miyoo
四　月在　三　时间的　佛　们　天的　玉　皇　庙　总共　七　大的　庙

arame deribuhe; [12]
建立　开始了，创始了

（在〔乙卯年（1615）的〕四月，开始创建三世诸佛、天玉皇的庙，总共七座大庙。）

Daicing gurun i taidzu horonggo enduringge hūwangdi yargiyan kooli（满洲文《大清国的太祖武皇帝的实录》，四卷写本）jai debtelin（卷第二）：

duin biyade, hecen i šun dekdere ergi, ala de, fucihi sy, ioi hūwang ni miyoo, juwan
四　月在　城　的太阳　将升起　方向　山冈　在　佛　寺　玉　皇　的　庙　十

ilmun-han i miyoo, uheri nadan amba miyoo arame deribufi ilaci aniya šanggaha; [13]
阎王　的　庙　总共　七座　大的　庙　建造　已开始　第三　年　完成了

（四月，在城的日升方向山冈上，开始建造佛寺、玉皇庙、十阎王殿，总共七座大庙；第三年完成了。）

《清太祖武皇帝努儿哈奇实录》（即《大清武皇帝实录》），同年同月项记[14]：

四月，于城东阜上建佛寺、玉皇庙、十王殿，共七大庙，三年乃成。

三体《*Manju i yargiyan kooli*/满洲实录/*Manǰu yin ünen maγad qaoli*》同年同月项记[15]：

满洲文　duin biya de hecen i šun dekdere ergi, ala de, fucihi sy, ioi hūwang di miyoo, juwan
四　月　在　城　的太阳　将升起　方向　山冈　在　佛　寺　玉　皇　的　庙　十

ilmun-han i miyoo, uheri nadan amba miyoo arame deribufi ilaci aniya šanggaha;
阎王　的　庙　总共　七座　大的　庙　建造　已开始　第三　年　完成了

(在四月,于城的日昇方向山冈上,开始建造佛寺、玉皇庙、十阎王殿,总共七座大庙;第三年完成了。)

汉　文　四月,于〔黑秃阿喇〕城东阜上,建佛寺、玉皇庙、十王殿,共七大庙;三年乃成。

蒙古文　ǰun u terigün sara dur, qotan u naran urγuqu edekde deki tabsang deger-e, γurban čaγ
夏天的　初　月　在　城　的　太阳　将起　方面　在　(土)台　上面　三　时

un burqad un süm-e kiged, qormosta tngri yin süm-e ba, arban erkelig qaγan u süm-e
的　佛们　的　寺　和　上帝,梵天　天　的　庙　和　十个　有权威的　可汗　的　寺

bügüde yi barisuγai kemen setüǰü, γutaγar on daγusuluγ-a;
总共　把　使建造　云云著手　第三　年　使完成了

(在孟夏之月,于城的日升方向土台上,着手建造三世佛的寺、天帝的寺、十位有权威的王的寺;第三年完成了。)

乾隆朝钦定《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同年同月项记[16]:

夏四月丁丑朔。〇始建佛寺及玉皇诸庙於城东之阜,凡七大庙,三年乃成。

蒙古文《太祖高皇帝实录》同年同月所记相同[17]:

〇ǰın u terigün sar-a yin šin-e yin nigen-e, ulaγaγčin üger;
夏天 的　头　月　的　新　的　一在　丁　丑

〇qotan u naran urγuqu edekde deki tabsang deger-e burqan un süm-e kiged,
城　的　日　将起　方向　于　土台　上面　佛　的　寺　和

qormusta tngri yin süm-e terigüten doloγan yeke süm-e üiledün sedüǰü, γutaγar on
天帝　天　的　寺　等等　七　大　寺　做的　著手　第三　年

daγusuluγ-a;
使完成了

(在夏天的头一个月的初一日,丁丑。在城的日升方向的土台上,着手建立佛寺、天帝寺等等七座大寺,第三年完成了。)

以上几条,《老满文原档》乃当日记事,《满文老档》是其重编,叙述者在工程开始时写下这一条;其余为后世编写,故用追述语气,且书竣工年时。《武皇帝实录》、三体《满洲实录》都比《老满文原档》《满文老档》多出“十王殿”,又指明建庙方位,显得在后两者以外另有取材;《满洲实录》尚且三体对照,最便于理解。现摘要列表如次:

文献\项目		三世佛寺	佛寺	玉皇庙	十王殿	在城东阜	第三年竣工
《老满文原档》册一		■		■			
满洲文汉文《武皇帝实录》			■	■	■	■	■
满洲文《满文老档》		■		■			
三体《满洲实录》	满汉文本		■	■	■	■	■
	蒙古文本	■		■	■	■	■
汉文蒙古文《高皇帝实录》			■	■		■	■

如上所列，七大庙中已知者有三：三世佛寺、玉皇庙[18]、十王殿；"佛寺"就是别本的"三世佛寺"。原档称玉皇为 abkai ioi hūwang，亦即天（abka）的神格化，后修的蒙古文《满洲实录》译写成 qormusta tngri，犹传达此意。

三世佛，指过去、现在、将来三劫的当世佛[19]，"三世佛"是对佛陀在时间上的扩大解释，在佛教初期就有了[20]。三世佛寺就是它的大殿供奉三世佛以为主尊。玉皇庙，就该词字面意思言，它是以玉皇大帝为主尊的庙。玉皇是宋朝以来最受供养的道教大神[21]。

十王殿应该是供奉地狱十王（十位阎王）的寺庙。十王信仰在朝鲜[22]、日本、中国汉文化地区[23]一直盛行。其依据是《十王经》，有敦煌本、传世本。在朝鲜则有明代汉文、谚文刻本，乃至合璧插图本[24]。这是跟地藏菩萨信仰及净土信仰直接连系的佛书[25]。按字面看十王殿是以十王为主尊的殿，但在十王图上，居于中心的往往是地藏菩萨，所以他是主尊，冥界教主，围绕着地藏菩萨刻画十王审判情形[26]。黑秃阿喇的"十王殿"或者是这样的。地藏殿在汉语系佛教寺庙最普及，多数寺庙都设，因为信徒死后灵牌或骨灰存放寺庙时往往与此殿有关。也有独立的地藏寺。

以上论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迄四十五年（1615—1617）之际黑秃阿喇七大庙，但史料有限，不能具体。兹附述后世一些情况，俾资参证。康熙朝《盛京通志》（1684）卷二十，祠祀志·兴京[27]：

显祐宫

即玉皇庙。在城之东北，国初建，崇德十七年置道士，顺治六年赐道士布疋，十五年赐名显祐官、立碑，康熙二十一年（1682）赐供器十六事。

地藏寺

在玉皇庙东。天聪六年八旗拨僧八十名居之。康熙二十一年驾临幸。

整整一百年之后，乾隆朝《钦定盛京通志》（1784）有更多的记载。该书卷九十七，祠

祀·兴京[28]:

显祐宫

在城东北二里。正殿三楹,后殿三楹,配殿六楹,大门三楹。国初建,崇德十七年置道士,顺治六年赐道士布疋,十五年赐名“显祐宫”、立碑,康熙二十一年赐供器十六事,定例元旦日贡献。庙内道士岁给衣布。乾隆十二年御书“碧落保珍”匾额,恭悬正殿内,三官殿,乾隆十二年有御书“太微元范”匾额。又乾隆八年、十九年、四十三年、四十八年俱有御制谒显祐宫诗,恭载《天章》门[29]。

地藏寺

在显祐宫东。地藏殿五楹,大佛殿五楹,配庑各三楹,又左右殿各五楹,韦驮殿三楹,大门三楹,耳房三楹,钟鼓楼各一。国初建,天聪六年敕八旗拨僧居之,岁给衣帽。康熙二十一年盛驾巡幸,有碑记。内大佛殿,乾隆十二年有御书“妙证三摩”匾额;地藏殿,乾隆十二年有御书“人天法炬”匾额,俱恭悬殿中。

因知玉皇庙后来易名显祐宫,毗邻的地藏寺就是十王殿;十王殿乃民间称呼,天聪六年住僧八十名,规模很大[30]。世祖章皇帝曾在原地建立满蒙汉三体《御制兴京显佑宫碑文》,兹录汉文全文如下:[31]

自古帝王统御天下,必以仁义为本,尤懋恭肃而崇祀明神,盖期国祚熙昌,俾兆民罔不康宁之故。钦惟神莫大于××,而事莫隆于××,虔恪之志,益当加倍寻常。惟兹兴京所建显佑宫,始于缔造之初,昭事上帝之所,其关甚重。运祚灵长,神实启之;臣民瞻仰,神实迪之。是以国家膺图御箓,固我太祖武皇帝、太宗文皇帝开骏业而肇鸿基,本仁德而施政教所致。然荷兹天眷者,岂非诚敬万灵、怀柔河岳之故欤。是以天无所不在,事天之心即无时不谨。稽王业所自始,地擅神皋;遡祖德所潜通,歆居上帝。朕夙夜寅恭,冀登上理,睠念受命发祥之地,益深钦天率祖之思,已命所司缮整维新,春秋禋祀,载表功德,树丰碑以传不朽。于戏!艰难不昧,常怀对越之诚;丹雘丕彰,永保冈陵之固。后之子孙臣庶,其无忘朕敬事之意焉。顺汉十三年(1658)七月十七日立。

申述显祐宫在清朝建立史上的作用,温习祖宗创业时敬天戒惧之情,有深沉的历史感。

今将七大庙情况概括如下:

时代	寺庙名称			
一六一五年创建	三世佛寺	玉皇庙	十王殿	（其他四座庙亡失其名）
后代	（无存）	显祐宫	地藏寺	
备考	一九四九年之后人为破坏不复存在[32]			

二 七大庙已知神佛的信仰者：东北亚与蒙古高原共通的信仰世界

现在再回到入关以前的时代。当时供奉在黑秃阿喇地方的这些神佛（enduri fucihi），其信仰者会是哪些人呢？不用说，当日关内汉人（Nikan，Kitad，乞塔）、辽东的汉人、朝鲜人（Solho，Solangγas，Solungγa，琐珑革），都接受佛（包括三世佛）、地狱十王、玉皇大帝诸种信仰；所以需要搞清的是蒙古人（Mongγol）、金人（ǰürčin，ǰürčid，女真）的情况。先说蒙古。

十六世纪蒙古藏传佛教复兴时，一些重要寺院大殿的主尊是三世佛。例如《阿勒坦汗传》第310及382节，记一五八〇年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建成的"大召"（Yeke J̌uu；Erdeni yin Süm-e/弘慈寺）[33]；又《蒙古源流》记一五八七年达赖喇嘛"来到卜失兔·扯臣吉囊的〔住地〕外，指出了〔修建〕三世〔佛〕寺的地点"，三世佛庙宇，蒙古文作 γurban čaγ-un süm-e，满洲文译本作 ilan forgoni juktehe，"三世寺"[34]，等等。一六三八年盛京敕建的莲华净土实胜寺，大殿主尊也是三世佛。

关于玉帝，蒙古人在明代往往把他们的汗或者满洲汗称作"玉皇大帝"，可见是最尊崇的。例如《蒙古源流》记，一五七八年俺答汗（1508—1582）会见达赖喇嘛时，阿儿秃斯（鄂尔多斯，Ordos）的卜失兔·扯臣吉囊发表了一通重要演说，谓菩萨的化身（转世）阔端合罕[35]，及转轮圣王忽必烈薛禅合罕二人，从前"遵奉自在天帝之命"，而称俺答汗是"大力天帝合罕"；别处称呼满洲天聪合罕是"东方的天帝"[36]。所有"自在天帝"、"天帝"之语，满洲文译本均作 hormusta[37]，系音写蒙古原文的 qormusta[38]，意"上帝"、"玉皇大帝"。蒙古末代可汗林丹汗的一串冗长的尊号中，最末两个是[39]：

delekei dekin ü qormusta，altan kürdün i erčiγülügsenmonun qaγan
天下，世界 在 的 玉帝，上帝 黄金 车轮 把 使转动者 经法 的 可汗

（天下的玉皇大帝，转动金轮者法王）

关于地藏十王信仰，王崇古万历元年（1573）的奏疏中记：

咨行甘肃巡抚，及遣官通常锐同虏使恰打儿罕（Kiy-a Darqan）等前往甘肃庄浪等

处。去后续准(甘肃)巡抚都御使廖咨,送番官指挥马你卜剌原系哈密土官,随带韃靼番字孔夫子讲《书经》,《元留经》,《文殊菩萨经》,《北斗七星经》,释迦牟泥佛《元留经》,《十王韃靼经》,共六卷,与同常锐并夷使于本年四月二十八日前来。[40]

十王韃靼经,是韃靼文十王经,即蒙古文《十王经》[41]。《万历武功录》卷十四,西三边,《切尽黄台吉列传》:隆庆六年壬申(1572)闰二月朔日,

切尽(Sečen Qong Tayiǰi,? —1587)徙马啼寺,礼佛毕,即使夷使,乡(嚮)抚臣索车渠数珠、莲花子数珠,及《西番十王经》。(中略)已,乃为书谢抚臣(延宁抚臣郜光先)曰:"如今活身都是谎,死在阴司是实佛。日夜跧而望车渠数珠及十王经拜诵,以修再生。唯太师(勤璞案即王崇古)蚤赐。"抚臣廖逢节以为切尽好佛,政当顺其性,以遏彼好杀之惨,不知切尽非忠心诚好佛者也。于是遣画匠余和尚,赍《护法坛场经》、《密济坛场经》、《普觉坛场经》三部、数珠十盘与切尽。切尽率诸部并东乡(嚮)叩头,将经顶礼曰:"此持入西方公案矣。"

同书卷八《俺答列传下》又记:隆庆六年六月,神宗皇帝继位,

先是,俺答请金番经数部,及剌麻番僧一人,事隶祠祭司。于是咨僧录,得金字经三部;行顺天府,复造及墨字经,大率十部。遣其剌麻僧星吉藏卜(Seng-ge Bzang-po)、坚参札巴(Rgyal-tshan Grags-pa)、及其徒领占班麻(Rin-chen Pad-ma)、星吉坚剉(Seng-ge Rgya-mtsho)往,以坚参札巴曾使西番(Bod),兼通经故也。[王]崇古幸俺答晚喜佛,意欲番僧阐扬慈教,启发善心,乃取抚赏金,造禅衣褊衫,市税金,治米面茶果菜蔬,及红黄纸札、贡器具,而以汉(Kitad)僧八人,陈列法器,令番僧至虏(Mongγol)中诵经,于是通事人金奉、珊瑚[43]与俱。既至虏营,二僧出地藏十王神像,及《心经》《华严》《金刚》《观音》等诸经。以为此梵王初传妙音,与傍门邪法不同,佛家为傍门者七十有二,而传法降魔,皆非正法。因陈说清净贞空明心见性,令戒杀去暴,全天地好生之德,免十阎罗地狱之苦。崇古又恐番僧多习咒法,有如二僧不知,徒为虏王所嫚易,乃令传告虏王,汉法禁习傍门,徒知奉西方大乘教法,已乃择日治道场,谢三宝圆满功德如令。俺答既闻僧至,即引众出迎四十余里,膜拜迎入穹庐,与胡中番(Bod-pa)僧哈望喷儿剌(Ngag-dbang Vphrin-las)[44],夷(Mongγol)僧公木儿把实(baγši)[45]、大都把实(Dayidu baγši)、黄金把实(Qongǰin baγši)、恰打儿罕(汉)(Kiy-a Darqan)[46],参伍无异,俺答即率其子若孙,及部众万余,日夕丫手[47]而礼佛(下略)。[48]

西番十王经,比较来看,就是西藏文《十王经》。但西藏文以及蒙古文佛藏中没有十王经,它只能是支那撰述的一种或一类书,而在甘青一带或者北京编译为藏文者。两位汉人喇嘛尚

且带去地狱十王的像，又谓免除十阎罗王地狱之苦，所以明显地，《十王经》是支那撰述的"地狱十王经"翻译成西藏文以及蒙古文者[49]。这样看来，在藏传佛教传播之前或同时，汉传佛教在蒙古已行传播了。所谓蒙古佛教，具综合的特点，不仅仅是西藏佛教[50]。

另外，十王信仰乃以佛教所谓"中阴身"为根据，后者谓人死后进入中有（梵文 antarābhava，又译中阴、中蕴，藏文译作 bar-do srid-pa，> bar-do）的生命状态。中有，像"人"那样，也是众生的生命形式。它寿命至多是七天，在七个七日（肆拾玖日）内一定转生投胎，或往生净界。民间把中有叫灵魂、魂儿。在汉语系佛教的民间信仰中，死者生前本人或死后子嗣（七个七日，乃至三年）供奉地藏及十王，可减轻死者在阴间的判罪，或得往生净土。这种信仰演成风俗，专名叫做"七七""七七忌日"。这是十王经主要内容[51]。这个信仰，包括百日忌，记载上看，北魏胡人中间就流行了。例如外戚胡国珍（438—518）歿，"诏自始薨至七七日，皆为设千僧斋，令七人出家；百日设万人斋，二十七人出家"[52]；孙灵晖"从绰死后，每至七日至百日，灵晖恒为请僧设斋行道"[53]。日后才结合中国习俗敷衍出一年、三年的供养节目[54]。

根据记载，蒙古人早就信七七投生。萧大亨记蒙古事情的、万历二十二年（1594）自己作序的著作《夷俗记》，其《葬埋》节云："俗无三年之丧[55]，唯于七日内，自妻、子至所部诸夷，皆去姑姑帽，七日外复如故也。今奉贡惟谨，信佛甚专，诸俗虽仍其旧，独葬埋杀伤之惨，颇改易焉。盖西方之僧，彼号曰'喇嘛'（bla-ma）者，教以火葬之法，凡死者，尽以火焚之，拾其余烬为细末，和以泥，塑为小像（tsha-tsha），像外以金或银裹之，置之庙中。近年大兴庙宇，召喇嘛诵经四十九日；虽部落中诸夷，亦召喇嘛诵经至七日而止，尽以死者所爱良马衣甲为喇嘛谢。"[56]《阿勒坦汗传》写俺答汗万历十年（1582）死后，在七七日以内，请"四类僧众"唪诵"广大经典"，"不断祭祀、赞叹、叩拜、祈祷、祝福"，举部（ulus）人民持续诵经[57]。可见是信七七转生。

至于蒙古人"祭七"之俗，是否承自辽金旧俗甚或南边的汉人社会，尚待考而后定。因为除长城以内，吐蕃远在唐朝就由金城公主（Gyim-shing Kong-jo，Gyim-shang Ong-jo，? - 740）引入七日之祭，藏语谓之 Bdun-tshigs，"七节"。后来蒙古人精神生活上跟吐蕃非常密切，也有可能从喇嘛那儿学到七七信仰。*Rba Bzhed* 记吐蕃祭七之俗的缘起说：

sngor blon-po shi tshadla zan skalmad-pa snged rgya-nagchos dar-bas mi shi-bala
从前 大官 死了 时 在食物福缘 没有以 我 中国 佛法 兴起因为 人 死了 在

bdun tshigs yod bod chos ma dar-bas blon-po snying-re-rje zer nas mi shi ma
七 节期 有 吐蕃 佛法 没有 兴起因为 大官 可怜 说了 于是 人 死了 没有

thag-du lha mi stong la vtshal-ma bstsal te bod kyi tshe zhes-bya-ba gshin dgevi srol
断在 天 人 一千 于 食物 给予 而吐 土蕃 的 时 名为 死者 好的 风习

btsugs zhes byung-ngo ll[58]
树立 所谓 出现了

(从前,大官死了,没有受人供奉食物的福缘。[金城公主]说:"在我们中国因为有佛法兴起,人死了,有七期。在吐蕃因为没有兴起佛法,大官死了就十分可怜悯了。"于是,人死了还没有托生期间,向天、人多次以食物供给。这个就名为"吐蕃的节日",建立了对死者来说是好的风俗)

以上我们说明了当时及其以前,生活在建州女真周边的人信仰方面有关情形。建州女真居于这些人之间,是晚开化者,自然可能承受、熏染北方民族和南方明人、朝鲜人的风习,对所建立的寺庙也会崇信。下面具体分析。

关于女真的天、阎王信仰,兹有《满文老档》的直接记载。其天命六年三月十六日条:

○ juwan ninggun de, ***abka*** dafi urušehe bade emke juwe endebure doro, abka wakalafi
十 六 在 天 救助 赞许 处在 一 二 过错的 规律 天 责备

bucehe ba waka, yabahai sini jalinde bi inu abka de baimbi, si inu genehe ba i ***ilmun han***
死亡 地方 不是 Yabahai 你的 为了 我 呢 天 对 请求 你 呢 去的 地方的 阎王

de habšafi, han amji minde banjinju, akūci sini ahūta hošoi beise ya emu niyalma de
对 控告了 汗 伯父 在我 使投生 不然 你的 哥哥们 和硕 贝勒们 哪个一 人 于

banjinju, hošoi beise ci fusihūn, gūsai ejen ci wesihun, ya emu niyalma de banjinju,
投生 和硕 贝勒们 从 以下 旗的 主子 从 以上 哪个一 人 对 投生

yabahai, buha, sunjacin, bayan, yamburi, sirtai, langge, dumbu, dahambulu, wangge
Yabahai Buha Sunjacin Bayan Yamburi Sirtai Langge Dumbu Dahambulu Wangge

suweni uyun niyalmai gebu be bithe arafi abka de baimbi, abka, muse be gosime ujimbi, dain i
你们的 九 人的 名字 把 书 写了 天 对 请求 天 我们 把 仁爱地 抚养 战争的

doro de emke juwe endebure doro, abka emgeri urušefi gosiha be dahame, suwembe inu
道理 在 一 二 错误的 规律 天 业经 讚许 仁爱 把 既然那样 把你们 呢

sain bade banjibumbi dere seme abka de jalbarime baiha;[59]
好的 地方在 使投生的 方向 云云 天 对 祈祷 央求了

(十六日。"因老天(abka)眷助讚许,纵有一二过失也是常事,並不是受天责备而死。Yabahai,为了你,我向天(abka)祈求,你也向你去之处的阎罗王申诉,使你投生到汗伯父我家,不然投生到你哥哥们和硕贝勒哪一家,投生到和硕贝勒以下、固山额真以上哪一家。Yabahai, Buha, Sunjacin, Bayan, Yamburi, Sirtai, Langge, Dumbu, Dahambulu, Wangge,如今写了你们九个人的名字,向天祈求。天仁爱抚育我们,在征战之事纵有一二过失,也属常事。既然天赞许仁爱,一定使你们往好

地方(sain ba)投生”。〔汗〕这样对天祈求了。)

英明汗似乎是以为有不止一位阎王爷。

关于金人的信仰七七,亦可举一例证。三体《满洲实录》卷六,天命五年(1620)九月条[60]:

满洲文 uyun biya de, han i deo cing baturu beile akū oho, (中略) tere deo de nadan
九 月 在 汗 的 弟弟 青 巴图鲁贝勒 没有 了 这 弟弟 于 七

waliyara de, han i beye genefi...
将祭祀 于 汗 的 身体 去了

(在九月,汗的弟弟青巴图鲁贝勒去世了,对这位弟弟祭七的时候,汗亲自前去。)

汉 文 九月,皇弟青巴图鲁薨,(中略)葬之七日,帝亲往奠之。

蒙古文 namur un ečös sara dur, taisu gegen qaγan u dekür(= deküü) inü, čing baratur noyan
秋天 的 末尾 月份 在 太阳 光明 可汗 的 弟弟 呢 青 巴图鲁 諾颜

čilegergeǰü önggereüge (中略), tere dekü deken (dekin) takil talbiqui dur, qaγan
患病 死去 这 弟弟 对 祭礼 设 当 可汗

ögede buluγad...
亲临 祭掃

(季秋之月,太祖英明汗的弟弟青巴图鲁诺颜患病去世,对这位弟弟设祭礼时,汗亲临祭奠。)

蒙古文本没有提到“七日而祭”,但满汉文本都有。所谓 nadan waliyambi,对照汉文本,乃是入葬以后第一个七日的祭礼。七七信仰久为女真奉守,在满洲文上也有表现。满洲文 *nadan* 这个字,意思是数字“柒”,另有一个意思是“上大坟”:人殁后七日、七七日上坟烧纸[61]。

拜天敬天是历来女真人的风俗。如《武皇帝实录》记:天命二年(1617)七大庙建成,三年戊午(1618)“四月十三壬寅,巳时,帝将步骑二万征大明。临行,书七大恨告天(中略)。祝毕,拜天,焚表(中略)。谕讫,遂与诸王臣暨领兵诸将等,鸣鼓乐,谒玉帝庙而行”[62]。值此历史性举动,女真汗次序告天、祭天、谒玉帝庙(指堂子,看下文)。显示天、天帝在女真信仰及国政上的重要位置。另外明代女真蒙古化程度已经很深,其宗教信仰可从当时蒙古的情形上测知[63]。

稍后事例亦可纳入视野。太宗天聪汗四年(1630)夏,在辽阳,七月斡禄打儿罕囊素喇嘛舍利塔庙竣工;九月上浣,皇帝所命重建的玉皇庙也竣工(上年四月肇建),跟敕建喇嘛塔庙在辽阳城同一方向,且相距不远。《太宗实录》天聪三年(1629)二月(丁亥朔)记皇太极在

甲辰日自盛京"南巡,阅视边境城垣颓坏者",

己酉。车驾次辽阳。遍阅寺庙。见玉皇庙殿宇圮坏,命重葺之。仍谕察出原毁之人,令其修复庙内屋舍。[64]

相应的蒙古文本《太宗实录》(斜线/表分行处):

širaγčin takiy-a edür, / qaγan, liyoo yang dur kürčü ireged, süm-e keid i čöm /

己 酉 日 可汗 辽 阳 于 到 来 庙 寺 把 都

bürin-etoγorin ergiǰü üǰebei basa qormusta tngri yin/süm-eyi üǰeǰüdekiǰü üiled, ger inü

全部 这一带 视察 观看 又 玉帝 天 的 庙 把 观看 重新 修整 房舍 呢

maγu bolǰoqoi, iǰaγurun/ ger i ebdegsen kümün i ilγan eriǰü süm-e yin ger küriy-e

坏的 成为了 原来的 的 房舍 把 捣毁的 人 把 分辨 寻找 庙 的 房舍 院落

yi /saiturǰasaγul kemebe.[65]

把 好好地 使修缮 这样说

(己酉日,可汗来到辽阳,把这一带寺庙挨箇全都看了一遍。又观看玉皇庙(qormusta tngri-yin süm-e),命令重新修整。房屋已坏,把原来的拆毁房屋的人找出来,并让其把寺庙房舍院落好好修缮。这样说了。)

《太宗实录》天聪五年二月(乙巳朔)又记:壬戌十八日

先是太祖时建玉皇庙于辽阳城南校场,香火不绝。后为贝勒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属下庄屯人拆毁,造棺椁市卖。上闻之怒。追讯毁者,偿值重建。至是落成。上以庙貌重新,给办香火牲祭银百两。[66]

相应的蒙古文本《太宗实录》(斜线/表分行处):

liyoo yang dur, / degedü tayidzu yin čaγ tur qormusta yin süm-e yi qotan u emün-e

辽 阳 在 上,祖先 太祖 的 时候 在 玉帝 的 庙 把 城 的 南

eteged, / qarbaγalun γaǰar tur egüdč ü, küǰi šitaγan bülüge, qoin-a/ tere süm-e yin

方面 把箭 的 场地 在 创立 香 燃烧 矣 后 那个 寺庙 的

ger i aǰige noyan, dorγon noyan, todo/ noyan u qariy-a du toγsu yin kümün ebdeged

房舍 把 阿济格 诺颜 多尔衮 诺颜 多铎 诺颜 的 属下 在 拖克索 的 人 毁坏而后

absakiǰü/ qudalduǰuqui; tegün i / qaγan sonosuγad, kilingleǰü ebdegsen kümün i ilγan

棺材 制造 售卖了 那个 把 可汗 听说而后 愤怒 破坏的 人 把 找出

γarγaǰu yaγaran töläǰü / baridqun kemen dekiǰü bariγulbai, / qaγan süm-e yi dekiǰü

出来 急忙 赔偿 建造 云云 重新 建造了 可汗 庙 把 重新

šinečilen baiγuluγsan u yosoγar ǰaγun lang/ mönggön ögčü, egüber küǰi šitaγ-a, qonin

更新 建立 的 按道理 一百 两 银子 给予 用这个 香 使烧 绵羊

γaqai beledčü takiγdun kemen/ögbei;[67]
猪 备办着 祭供 云云 给了

(在辽阳,先太祖的时候,在城南校场建立玉皇庙(qormusta yin süm-e)、烧香。后来阿济格诺颜、多尔衮诺颜、多铎诺颜属下拖克索的人把那个寺庙的房舍拆毁做成棺材卖了。可汗听说以后非常愤怒,叫把毁坏之人查出来,令其赔偿重建。这样重建完成。因为寺庙重建已毕,可汗给银子一百两,用以烧香、备办猪羊祭祀。)

又立汉文碑文,说"先皇"(英明汗)、"新皇"(天聪汗)对被毁坏的原来庙宇忧惧不安,皇帝贝勒以下各出银两资材人手重建。碑文述大殿五楹,供奉圣像是玉帝,另建殿三楹,供伏魔大帝塑像。说玉帝"至尊无对,位都诸天之表",管祸福报应,供奉的话能护国庇民,"繇是国无不福,民无不庇,炎炎大宝可计日臻矣"云云[68]。显示非常崇敬玉皇大帝,以及知道敬奉的意义。

经以上考究,知奴儿哈赤称汗之时,建州女真及其周边人民对上述三大庙所奉神佛俱怀信仰;也就是说各族人民固然互有偏见摩擦,受不同政治势力驱使,但宗教信仰却颇一致[69]。

至于七大庙中未知的四座,应该会有关帝庙[70]。而且女真濡染蒙古文化与生活方式,浑然不觉,估计蒙古藏传佛教在建州的位置会比我们知晓的要更重要和普遍,不过除了七大庙和囊素喇嘛两次访问,惜无资料可证[71]。

三 七大庙和奴儿哈赤的固伦(Gurun)

在§2我们看到,七大庙的建立在实录被单立一条记录着,是重要的一件事[72]。建立的意义或动机何在?现由几个方面观察。

首先从创建时机上看。奴儿哈赤立国(*gurun*)甚早[73],而称 *Genggiyen Han* 则是在一六一六年,七大庙工程似与后一事有关。根据汉文《清太祖武皇帝弩儿哈奇实录》卷一、卷二[74],奴儿哈赤大明嘉靖三十八年己未(1559)出生。当时情势,是周遭各部落纷乱无绪,互相残杀。万历十一年(1583,二十五岁)为报杀祖父之仇,起兵攻尼康外郎,至万历十四年(1586)仇得报。这期间征服许多临近女真部落,扩大地盘和势力。奴儿哈赤想必也感觉到这一进展,乃在翌年丁亥(万历十五年,1587),"于首里(*šoli*)口(*anggaci*)[75]虎拦哈达(*hūlan hada*)下、东南河二道,一名夹哈(*giyaha*),一名首里(*šoli*),夹河中一平山,筑城三

层,启建楼台"[76]。"启建楼台"满洲文本作 *yamun leose tai araha*[77],意思是"建立起衙门楼台",康熙重修汉文本作"建宫室,起楼台"[78],即兴建具有政权象征意味的建筑物,以配合其势力的扩张,这就是后来所称的旧老城(*Fe Ala*,佛阿拉)。接着,"六月二十四日,定国政,凡作乱、窃盗、欺诈,悉行严禁"[79]。初次建成一个地方势力的样子。

《实录》说这时环满洲而居者,皆被削平,国势日盛;复与大明通好,遣人朝贡,民殷国富云云。正因其势力渐大,周边九部感到压力,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纠合进兵,欲灭奴儿哈赤,结果奴儿哈赤打败了他们(九月),从此势力更大:军事方面,万历二十一年以前太祖的征服是内向的、限于满洲五部,此后扩大到东方的扈伦部、东海兀吉部,这是对远方女真的征服。作为政治联合手段使用的通婚,万历二十一年之前仅对哈达部行一次,此后对叶赫、东海、乌拉诸部有六次。经济方面,先前主要与明朝贸易(朝贡和互市),以明珠、人参、皮革等自然出品与明交换日常用品,对明当然十分依赖。此后,万历二十六年(1598)开矿山,冶炼,致力于自立。交往方面,九国之战已经接触到蒙古,一五九四年战败的蒙古前来通好,从此往来不断。文化上,万历二十七年依蒙古字造满洲文字,希望替代女真正统九年(1444)以前已在使用的蒙古文。万历二十九年(1601)确立兵制。万历三十一年(1603)移于黑秃阿喇,筑城居住。万历三十三年(1605)在城外筑大郭。

黑秃阿喇时代以降,更获得持续进展。万历三十四年(1606)蒙古喀尔喀(*Qalq-a*)五部来人晋谒,尊奴儿哈赤为崐都仑汗(*Kündülen Qaγan*),在当时蒙古满洲,这是"可敬的汗"的意思,系敬称。万历四十三年(1615)于城东高阜上开始建七大庙。同一年建立八旗(*gūsa*)制,立理国政大臣,制定理事程式。这一年大臣们会议称号之事。次年(1616)正月朔日大臣合议上尊号,称 *Genggiyen Han*。万历四十六年(1618)始列举七大恨,作为征伐大明主国的凭藉。在出发征讨之次日,向臣下表白,谓其兴兵,"非欲图大位,而永享之。但因大明[80]累致我忿恨,容忍不过"。"大位"即皇帝之位,满文本相应处作 *qan i soorin*,亦是"皇位,皇帝的位子"。可见金人领会到了出师征明的历史性意义:跟大明争"天下"。

在上述金国兴起的过程中,国家礼制方面怎样呢?旧老城时代(Fe Ala, 1587—1603)或算是奴儿哈赤创业真正起点,在城外东南设有一个祭天的场所,申忠一记作"天祭祠堂"[81]。众所周知,祭天拜堂子是女真家家都行的信仰,旧老城的这个祭天之所不一定算是代表国家(*gurun*)体统的彝礼设施,而是本部(*aimaγ*)的宗教设施[82]。而在这三十余年(1587—1617)间,七大庙工程最大,且值其行用专门汗号的前夕,一直战事频仍,应非寻常。且《武录》一六一五年的文字,频记奴儿哈赤对贝勒、臣下的为臣之道的告诫,显然是为更张其"国体"在作思想宣导。

其次从功用上看。创建七大庙之前,凡领兵出征、归来及新正等时候,奴儿哈赤都率贝

勒大臣们拜堂子以礼天;在七大庙建立以后仍如旧:凡大事拜堂子祭天。没有奴儿哈赤往驾七大庙祭祀的纪录。唯前引文献中的"玉帝庙"需要讨论一下。汉文《武皇帝实录》记天命三年(1618)书七大恨反明这件大事:

> 四月十三壬寅,巳时。帝将步骑二万征大明,临行,书七大恨告天曰(列举七大恨,略)。祝毕,拜天焚表。帝又谓诸王曰(略)。谕讫,遂与诸王暨领兵诸将等,鸣鼓乐,谒玉帝庙而行。[83]

当日满洲文档案未提"谒玉帝庙"情节[84]。但这同一个地方,满洲文《武录》作 *tangse*;《满洲实录》满汉蒙文相应地分别记作:*tangse*/玉帝庙/*tngri*[85],即堂子/玉帝庙/天(天帝);《高皇帝实录》同处也作"堂子"[86]。所以玉帝庙并不是七大庙内的玉皇庙,而是堂子[87]。可见七大庙建立之后没有用来举行重大仪式,只作为一个公共礼仪设施。

第三,这些庙宇供奉对象有佛有道,教理冲突,却由统治者一时齐建,在民众信仰上也不是一件自然的事。

综合以上各点,则七大庙的创建是为适应新的汗号"恩养众国英明汗"与政体而配备的国家坛庙、仪礼建筑,是从部落到部落国家的转折标志[88]。属于古典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89]的祀[90]。

七大庙的性质,亦值得讨论。我们把满洲政权前后几个政治中心的坛庙作一个比较表在下边[91]。

满洲政权前后时期"都城"坛庙

诸时期	坛庙	在宫殿·都城的方位
Fe Ala (老城) 1587—1603	堂子	城内西侧、厅中
	祭天祠	城外东南山头,山头高四〇五米
Hetu Ala (兴京) 1603—1619	堂子	
	祭天所	东南五里许[92]
	七大庙	东阜二里
Mukden (盛京) 1625—1644	堂子	内治门(小东门)外。内治门是东面的城门,在抚近门北
	太庙	抚近门(大东门)外。抚近门是东面的城门,在内治门南
	天坛	德盛门(大南门)外五里。南门有二,这是东边的
	地坛	内治门外三里

诸时期	坛庙	在宫殿·都城的方位
清朝北京(neislel qota)1644—1911	堂子[93]	长安左门(即东门)外
	太庙	宫殿之左(东)
	天坛	正阳门外左侧(南偏东)
	社稷坛	宫殿之右(西)
明朝[94]北京(录供比较)	太庙	宫殿之左(东)
	天坛	正阳门外左侧(南偏东)
	社稷坛	宫殿之右(西)

比较地看,七大庙在东,相当于太庙的位置。并且庙建至"七"(nadan)座,这个数字又跟"天子七庙"(太庙)的古制吻合。《礼记正义》卷十二,《王制》篇本文说:[95]

> 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

孔颖达的《疏》称:"王制者,以其记先王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96],则上引《礼记》文字是讲祭祀的庙制。它讲的庙,是祭祀祖宗的"宗庙"。奴儿哈赤可能正是受了"天子庙制"故典的启发。因为按照中华的历史经验,立国先要创建坛(天坛)庙(太庙)。彼时祭天之所已经有了,正缺宗庙[97]。

但七大庙供奉的,已知者全是神、佛的像,没有自家祖宗,与宗庙完全相异。这或许是俚俗化、民间化的理解;也或许是当事者明白,七大庙的建设,并非功成名就的总结,而是争天下的开始,期望天佑神助、百姓来归,是热切地制造、树立"大位"的体统而作的权变[98];也可能只是以东为上位,庙立东方以示尊敬而已。所以它看来跟太庙概念极有关系,但还只能说是万神殿。

在本节,对于奴儿哈赤建立七座大庙的意图,我们反复援引"中华的历史经验"以为解说,而不是引用譬如罗马帝国的历史经验[99],这是因为:奴儿哈赤固为"夷狄",但是中华世界的夷狄[100],其历史意识[101](例如"后金"、"金"这个国号表示的对金朝的延续性),即他关于立国、建元、称汗诸事的思想与行动,都在依循中华帝国历史经验,即符合或践行"中华世界帝国"的原理[102]。因为在彼时彼地,中华世界秩序并非"中华的",尤其不止是 Daiming Gurun(明朝)和 Nikan(明人,汉人,Kitad)的,而是"天",abka,是"普世价值"。

四 总 结

任何好的或坏的政权都得运用成套的象征与意识形态(新造的或现成的),以制造其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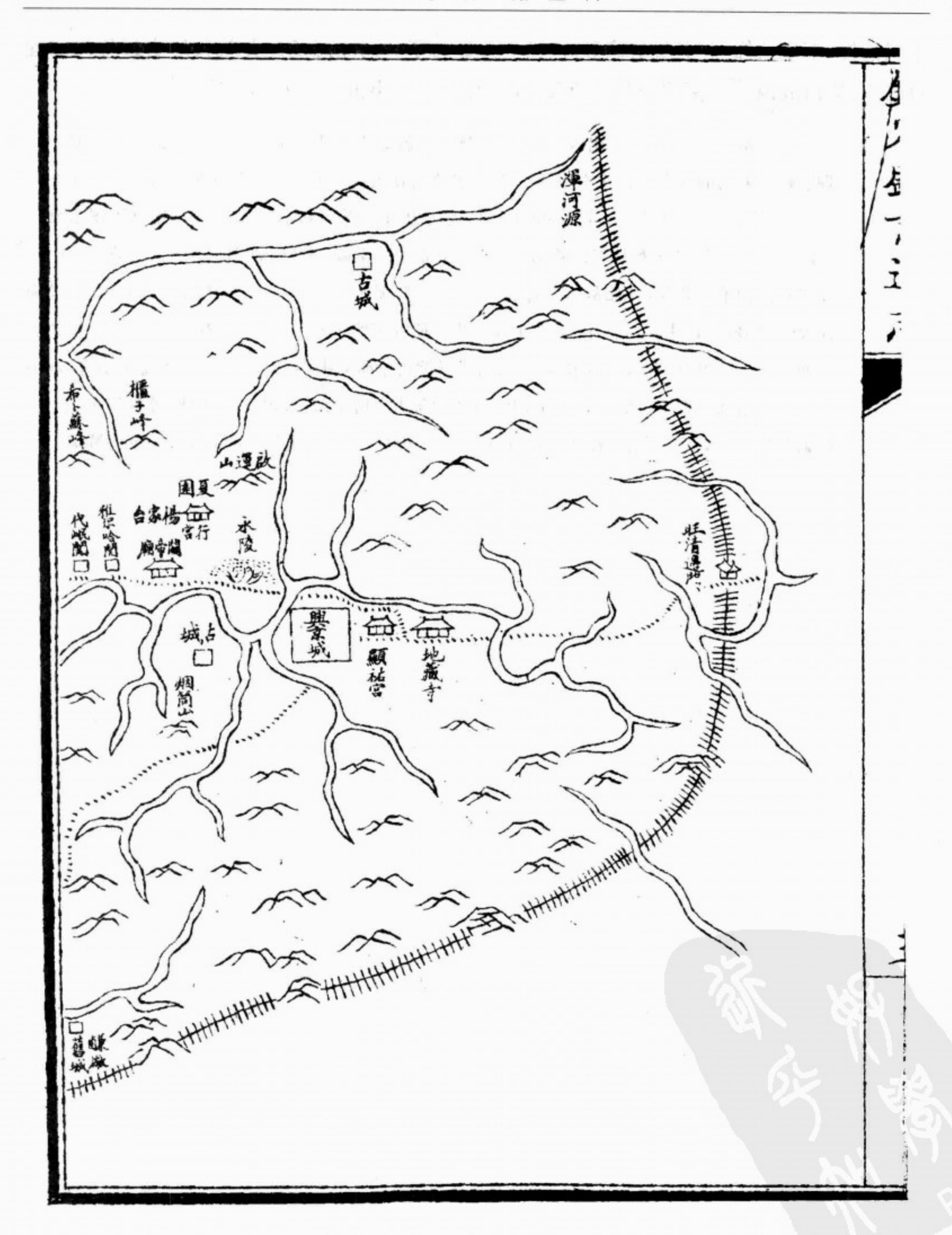
当性，边鄙“土酋”奴儿哈赤也一样。本稿征引各种语文的资料，由民众信仰与国家祀典的立场阐明奴儿哈赤在万历四十三至四十五年(1615—1617)之间、于“都城”黑秃阿喇兴建七座大庙的事，得知这是这个女真政权第一次正式且大规模地建设宗教设施，其中三个寺庙的供奉主尊尚得以考见；接着考究本地及周遭各色人民的信仰状况，七大庙已知三庙供奉的神佛均与他们的信仰恰合；最后作历时的分析，显示七大庙是金人配合新国家的塑造而创立的，是国家祭祀设施，为的是树立其政权的正当性，进行社会统合，增加对周边人民的号召力使其归心，在辽东切分出一个单独空间，好立脚跟大明天朝争“天下”。由此一瞥这个政权最初的意向。

至于七大庙这种构想，是基于“中华世界帝国”政治文化的通则：《春秋》左氏传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祀，这也是同时天下共主“大明”及从前辽、金、元三朝所遵循的。数字上的七，可能是参考“天子七庙”的成说，但内容上就已知的部分来看，不建成宗庙，而是具有众神殿这样综合的、民俗化的性质，以迎合天下人心。或许是因为未晓得“天命”之所归，不敢遽然建立太庙[103]。至于这塑造政权合法性的构想，其直接的思想资源，可能不在先秦故典，而是家喻户晓的口传故事《三国志演义》[104]，或者奴儿哈赤朝贡北京时的观察，特别是他们对于辽(Dailiyoo)、金(“Julgei Aisin Gurun”)、元(Dai Yuwan Ulus)这三个由北方部族所立国家的强烈的历史记忆[105]，以及对于“天朝”大明(当时金人目之为“南朝”)的强烈的竞争志向。这样一来，从东北亚—东亚的地域场景看，奴儿哈赤辽海“夷狄”政权在向明朝主导的中华世界秩序挑战的过程中，价值观念正在向着“中华体制”、“中华世界秩序”，以激越的方式进化、自我角色化与中心化。值此过程，明朝覆亡了，“中华世界秩序”的原理则得以充实和强化。总之七大庙的建立是金人适应着政治进展，依循中华世界秩序原理，第一次在祀典上创立“国家体统”，以利于精神上对抗明朝，因之在清朝建立史上是第一个政治意图鲜明的国家祭祀设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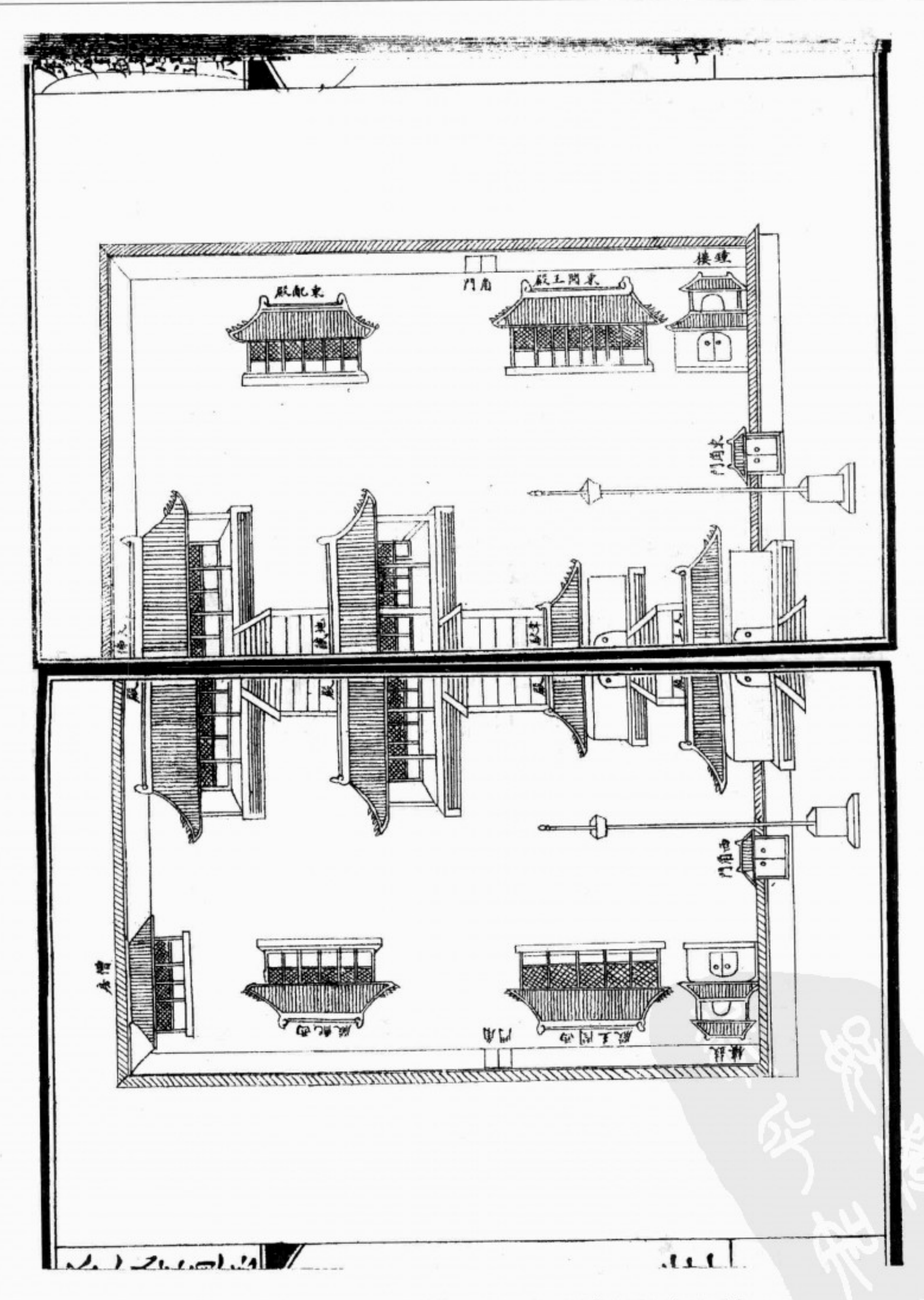
从对七大庙已知三座庙所供神佛信仰者的考察看到，围绕辽东地面，一六〇〇年前后约六七十年间，汉与非汉各民族或者部落及其政治体，固然有来自文化的地域的偏见和利害抵触，以致互相杀伐，隶属不同的生态环境和语文、社会构造，但精神生活一些重要方面已一体化，即在东北亚及内陆亚洲区域间存在一个共同的“信仰世界”：长城、九边、山海关、兴安岭、鸭绿江固非文化的界限。这提示满洲清朝兴起时节文化与思想环境问题。这方面外国学者及其影响下的汉文作者，向来强调满洲政权在中国乃至亚洲史上的特殊性，蒙古、满洲与明人、朝鲜之间的文化差异，有的意在证明“满蒙”文化上不同于“中华”、领土上不属“中国”，世间早已积累许多文字[106]。姑且不论先秦以降特别是辽金元三朝造成“中国”与塞外文化价值的交互作用，但就本稿轻微展现的短暂时刻那些文化情感的“共同性”的方面，像

十王信仰、玉皇信仰、关老爷信仰等等,已十分显著了。而注意及此并就其历史过程深加理解,庶几检讨成说[107],阐明当时东亚及内陆亚洲"华—夷世界"的全局[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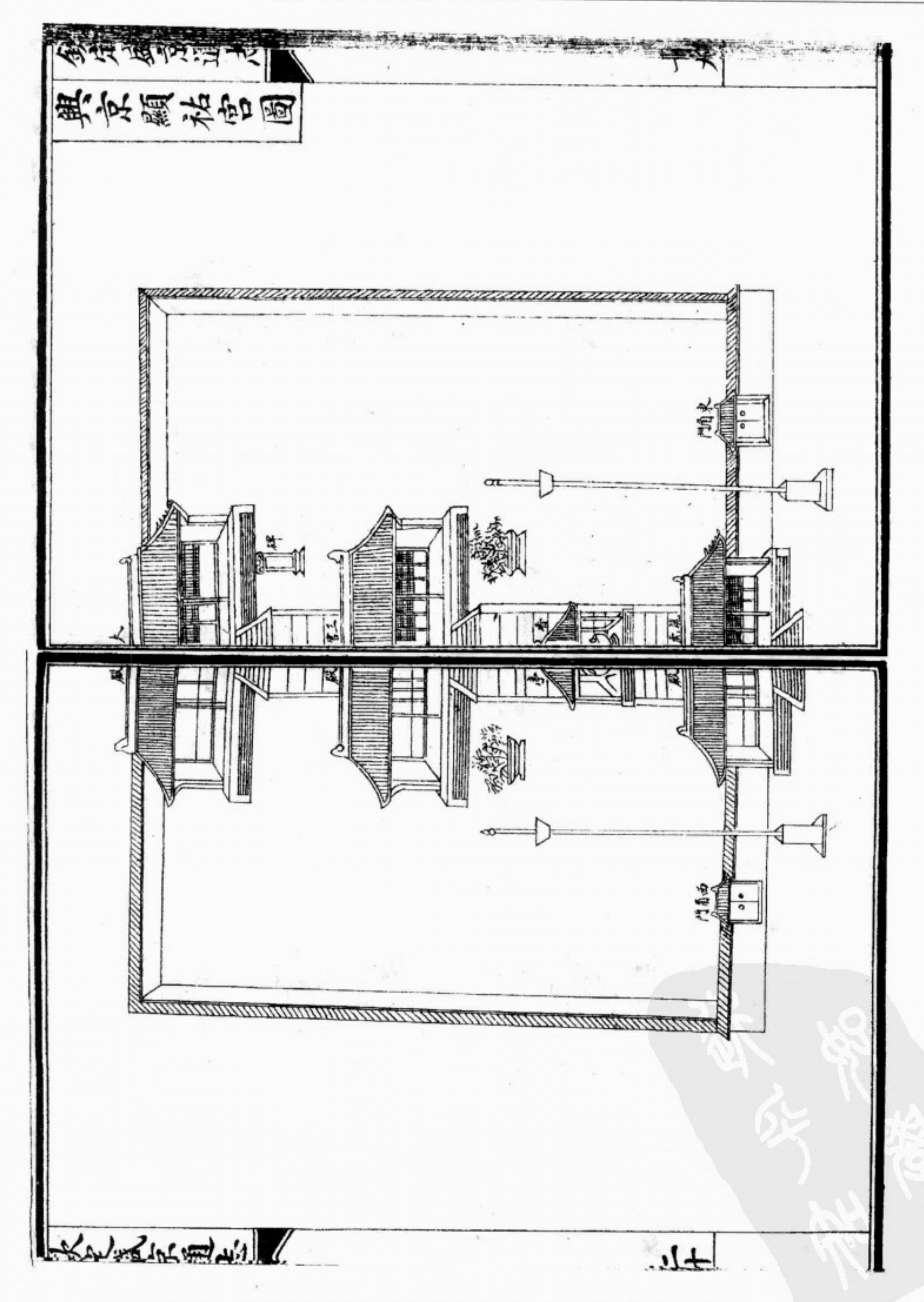
附记:援朝先生(辽宁民族出版社蒙古文编辑室)就蒙古文清实录玉皇庙记事的拉丁字转写及理解赐予殷切的教诲。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当任所长杜正胜先生,1999年6月末)和张存武、张启雄先生(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学铫先生及其秘书陶翠玉女史(蒙藏委员会,2000年6月末),陈明华(台北市立师范学院,2000—2001)、姚义田、戴立强(仝、辽宁省博物馆)、佟悦(沈阳故宫博物院)、黄进兴、陈弱水、刘淑芬(仝、史语所)、黄丽生(台湾海洋大学,2000年以来)、王俊中(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班,已故)、上田贵子(大阪外国语大学博士课程,2001)、齐木德道尔吉(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2004)、谢善智(察布查尔,2004年8月)、哈斯巴根(N. Qasbaγan-a,内蒙古大学蒙古史博士课程,2004年9月)等等许多先生先后惠赐或惠借论著或资料,在此一并敬谨志谢。(2004年11月1日,Mukden-Kökeqota-Mukden)



图一 《兴京图》局部〔《钦定盛京通志》(1784)卷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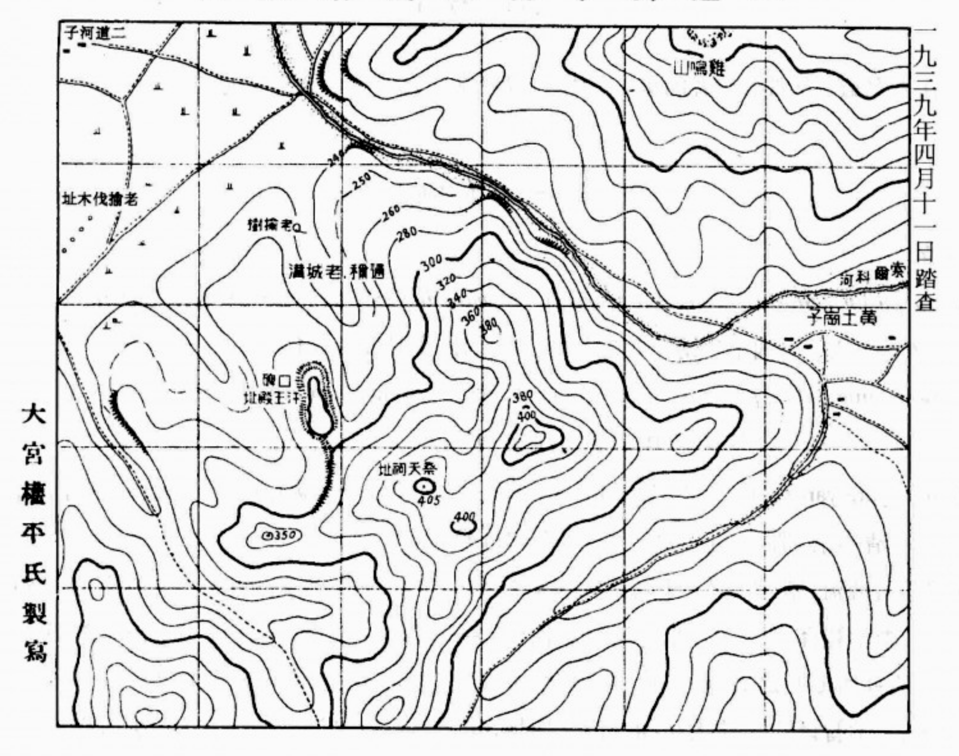


图二　兴京地藏寺图〔《钦定盛京通志》(1784)卷首〕



图三　《兴京显祐宫图》〔《钦定盛京通志》(1784)卷首〕

二道河子舊老城踏查圖



图四　佛阿拉城祭天祠堂所在位置图

〔采自《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



引用书目

汉字作者名或(未列出作者的场合)书名,以汉文正体字笔画多少为序。

一、传统文献

满洲文

Daicing gurun i taidzu horonggo enduringge hūwangdi yargiyan kooli(大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四卷写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本稿使用其胶片复印本。

Lo guwan jung, *Ilan gurun-i bithe*, Urumci: Sinjiyang niyalma irgen cubanše, 1985ci aniya 2 biyade.(二十四卷本《三国志通俗演义》)

《Manju i yargiyan kooli/满洲实录/Manǰu yin ünen maɣad qaoli》满洲—汉—蒙古三体合璧,载《清实录》册一,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6。

《钦定蒙古源流》满洲文本(手写影印),载江实译注《蒙古源流》,东京:弘文堂书房,1940。

广 禄、李学智译注,《清太祖老满文原档(第一册荒字老满文档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八)册一,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

广 禄、李学智译注,《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第二册昃字老满文档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八)册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1。

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原文拉丁字转写)I-III(太祖),东京:东洋文库,1955—1958。

蒙古文

Daičing Ulus un Maɣad Qaoli, nigedüger emkidgel, Taidzu degedü quwangdi yin maɣad qaoli, Qailar: Öbör mongɣol un soyol un keblel ün qoriy-a, 1990 on u 3 sar-a du.

Daičing Ulus un Maɣad Qaoli, qoyaduɣar emkidgel, Taidzong gegegen uqaɣ-a du quwangdi yin maɣad qaoli(nige), Qailar: Öbör mongrol un soyol un keblel ün qoriy-a, 1989 on u 12 sar-a du.

Čoyiǰi tulaɣan qaričaɣulǰu tailburilaba, Dharm-a ǰokiyaba, *Altan Kürdün Mingɣan Gegesütü*, Kökeqota: Öbör mongɣol un arad un keblel ün qoriy-a, 1987 on u 11 sar-a du.

Čoyiǰi tulaɣan qaričaɣulǰu tailburilaba, Lobsangdanǰin ǰokiyaba, *Altan Tobči*, Kökeqota: Öbör mongɣol un arad un keblel ün qoriy-a, 1983 on u 12 sar-a du.

Dudang, Ülǰeitü nar orčiɣulba, *Altan ulus un teüke*, Begeǰing: Ündüsüten ü keblel ün qoriy-a, 1988 on u 3 sar-a du.(《金史》本纪译文)

Saɤang Sečen, *Erdeni yin Tobči*, Kökeqota:Öbör mongɤol un arad un keblel ün qoriy-a, 1980 on u 1 sar-a du.

珠荣嘎译注,《阿勒坦汗传》(附录蒙古原文 *Erdeni tunumal neretü sudur orosiba* 和校勘),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

西藏文

Brag-dgon-pa Dkon-mchog bstan-pa rab-rgyas, *Mdo-smad chos-vbyung*, Zi-ling: Kan-suvu mi-rigs dpe-skrun khang, 1982 lovi zla 3 par.

Rba Bzhed(《拔协》),转引自 Dpav-bo Gtsug-lag Phreng-ba, *Chos-byung Mkhas-pavi Dgav-ston*(贤者喜宴,1564 年成书), Pe-cin: Mi-rigs dpe-skrun khang, 1986 lovi zla 6 par.

Sba Gsal-snang,*Sba Bzhed*, Pe-cin: Mi-rigs dpe-skrun khang, 1980 lovi zla 6 par.

佟锦华、黄布凡译注,《拔协》附西藏原文(*Sba Bzhed*),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

汉　文

《三国志通俗演义》弘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太宗实录》乾隆朝钦定本,台湾华文书局影印伪满国务院本。

《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载《清实录》册一,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6。

《春秋左传》,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7。

《后金檄明万历皇帝文》,载潘喆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清太祖武皇帝努儿哈奇实录》,北平:北平故宫博物院排印本,1932。

《盛京通志》三十二卷本,康熙二十三年(1684)修,奉天:康熙五十年(1711)补刻。辽宁省图书馆善本书 30186 号。

《钦定大清一统志》,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钦定盛京通志》一百三十卷本,北京:武英殿,乾隆四十九年(1784)刊本。

《礼记正义》,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7。

王晶辰主编《辽宁碑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

王崇古"为恭进虏王谢恩表文请颁佛像番经併陛效劳官僧职级昭国恩变夷俗以坚贡盟事"疏,片段见载井上治《<少保鑑川王公督府奏议>に见えるアルタンと佛教》,《东洋

学报》80.1(1998)。

沈周冕《兴京县志》,奉天:太古山房,1925。

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李能和《朝鲜巫俗考》,收入任东权、李元植、娄子匡合编《韩国汉籍民俗丛书》2,台北:韩国民俗学会、中国民俗学会影印,1971。

洪亮吉《晓读书斋初录》,载氏著《晓读书斋杂录》,授经堂:光绪三年(1877)重刊。

徐恒晋校释,李民寏著《栅中日录校释　建州闻见录校释》,沈阳: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

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杨起鹏《重建玉皇庙碑记》,载曹汛《 <重建玉皇庙碑记> 曹振彦题名考述》,《红楼梦研究集刊》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郑之珍《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明刊本(有万历壬午(十年,1582)作者序),载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辑《古本戏曲丛刊初集》,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54。

萧大亨《夷俗记》万历二十二年刻本,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11,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无出版年月。

藏　川述《佛说地藏菩萨发心因缘十王经》、《佛说预修十王生七经》,载(日本)藏经书院编《〔大日本〕续藏经》第七四九册,上海:涵芬楼影印,1924。

魏　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87。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北京:中华书局影印万历年间刊本,1962。

罗振玉编辑《天聪朝臣工奏议》,收入《史料丛刊初编》,东方学会,1924。

二、近人论著

Bulaɤ nairaɤulba

1998 *Mongɤol Burqan u Šašin u Uran J̌okiyal un Sudulul*, Qailar: Öbör mongrol un soyol un keblel ün qoriy-a. (蒙古文)

Ü. Manduqu emkidgen tailburilaba

1995 *Mongɣol i ioi toli bičig*, Begeǰing: Ündüsüten ü keblel ün qoriy-a. (蒙古文)

インド・チベット研究会

1993 《チベット密教の研究》,京都:永田文昌堂。

小南一郎

2002 《'十王经'の形成と隋唐の民众信仰》,《东方学报》京都第七十四册。

三田村泰助

1972 《满文太祖老档の编纂》(1950),载氏著《清朝前史の研究》,京都:东洋史研究

会。

1972 《满文清太祖实录のテキスト》(1957)。

川崎信定译

1993 《(原典译)チベットの死者の书》,东京:筑摩书房。

王三庆

2003 《敦煌文献中斋愿文的内容分析研究》,载项楚、郑阿财主编《新世纪敦煌学论集》,成都:巴蜀书社。

王以铸译,吉田兼好撰

1988 《徒然草》,载周作人、王以铸译《日本古代随笔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民信

1995 《姚从吾先生研究史学的心路历程》,《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27。

王锺翰主编

1994 《中国民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井上治

1998 《〈少保鑑川王公督府奏议〉に见えるアルタンと佛教》,《东洋学报》80.1。

2002 《ホトクタイ＝セチェン＝ホンタイジの研究》,东京:风间书房。

永托里

2001 《想起广禄先生》,《锡伯文化》35,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永梅兰

2004 《锡伯族婚姻与殡葬习俗》,《全国锡伯族文化研讨会论文彙编》,察布查尔:全国锡伯族文化研讨会筹备组。

水野卓

2003 《春秋时代における统治权の变容——“器”の意味を中心として》,《东方学》106。

包国庆译,永井匠著

2004 《隆庆和议与右翼蒙古的汉人》,《蒙古学信息》2。

户田茂喜

1938 《赫图阿拉城构成の素描》,楳溪会编《山下先生还历记念东洋史论文集》,东京:六盟馆。

札奇斯钦

1980 《库伦城小史》,载氏著《蒙古史论丛》,台北:学海出版社。

1980 《谈蒙文史料"金轮千辐"》,载氏著《蒙古史论丛》。

石守谦

1985 《有关地狱十王图与其东传日本的几个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6.3。

石桥崇雄

1994 《清初皇帝权の形成过程——特に"丙子四年四月〈秘录〉登ハン大位档"にみえる太宗ホン・タイジの皇帝即位记事を中心として——》,《东洋史研究》53.1。

平野聪

1997 《チベット佛教共同体と"中华"——清朝期多民族统合の一侧面——》,《国家学会杂志》110.3・4。

矢野仁一

1933 《满洲支那领土说の批判と满洲国の建国》(财团法人启明会第五十回讲演集),东京:启明会。

白鸟库吉译,バンザロフ原著

1942 《黑教或ひは蒙古人に於けるシャマン教》,《北亚细亚学报》第一辑,东京:北亚细亚文化研究所。

羽田亨

1937 《满和词典》,京都:京都帝国大学满蒙调查会。

朱越利等译,福井康顺监修

1990 《道教》第一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伊东忠太

1936 《满洲の佛寺建筑》(初刊于《东洋协会调查部学术报告》第一册,东京:东洋协会,1909 年 7 月),见载伊东忠太建筑文献编纂会编纂,伊东忠太著,《东洋建筑の研究》上册,东京:龙吟社。

池内宏编

1975 《明代满蒙史料 李朝实录抄》,台北:文海出版社。

近藤治

2000 《アブルファズルの皇帝观について》(On the Abu'l-Eazl's Conception of Kingship),《东洋史研究》59.2。

邢义田

1998 《从比较观点谈谈秦汉与罗马帝国的"皇帝"》,载同氏《古罗马的荣光 I——罗马史资料选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

李光涛

1948 《清太宗与三国演义》,《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2。

李勤璞

1998 《白喇嘛与清朝藏传佛教的建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0。

2000a 《明末辽东边务喇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1.3。

2000b 《圣经寺壁画初考》,《美苑》(鲁迅美术学院学报)4。

2002—2003《斡禄打儿罕囊素:清朝藏传佛教开山考》,《蒙古学信息》88—91。

李凤民

1985 《清入关前都城述略》,载《沈阳故宫博物馆文集 1983—1985》,沈阳:沈阳故宫博物馆。

李德启

1936 《满文老档之文字及史料》,《(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十一周年纪念)文献论丛》,北平: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

佟 悦

1985 《清盛京太庙述略》,《沈阳故宫博物馆文集 1983—1985》,沈阳:沈阳故宫博物馆。

佟锦华

1992 《论〈巴协〉》,载氏著《藏族文学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余骏升、扎英梅主编

2001 《新疆锡伯族人物录》,乌鲁木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政协、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政协合编。

若松宽

1994 《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松本荣一

1932 《被帽地藏菩萨像の分布》,《东方学报》东京第三册。

松村润

2001 《清太祖实录の研究》,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Production Center。

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

1989 《安多政教史》,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

和田清

1955 《清の太祖の顾问龚正陆》(1952),载其著《东亚史研究(满洲篇)》,东京:东洋文库。

金元龙等编

1996a 《高丽佛画》(韩国 uy 美(7)),Se-oul:中央日报社。(朝鲜文)

1996b 《朝鲜佛画》(韩国 uy 美(16)),Se-oul:中央日报社。(朝鲜文)

金光平、金启孮

1980 《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

金冈秀友

1978 《地藏·阎魔の一体说——思想史的系谱——》,载江上波夫教授古稀记念事业会,《江上波夫教授古稀记念论集 民族·文化篇》,东京:山川出版社。

河内良弘

1994 《李满住と大金》,《松村润先生古稀记念清代史论丛》,东京:汲古书院。

胡其德

1997 《蒙古族腾格里观念的演变》(蒙藏专题研究丛书 81),台北:蒙藏委员会。

神田信夫

1990 《爱新觉罗考》,《东方学》80。

姚从吾

1976 《国史扩大绵延的一个看法》(1957),载氏《东北史论丛》,台北:正中书局。

乌 兰

2000 《“蒙古源流”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郭冠连

1999 《当代中国大陆蒙古学研究概论》(蒙藏专题研究丛书 94),台北:蒙藏委员会。

建国大学研究院

1939 《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建国大学研究院历史报告第一》,新京:(伪)建国大学。

庄明兴

1999 《中国中古的地藏信仰》(台湾大学文史丛刊 110),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

庄吉发

1979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叙录》,载氏著《清代史料论述(一)》,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2 《从故宫旧档看清实录的窜改》,载氏著《清史拾遗》,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1992 《朝鲜人心目中的努尔哈齐》,载氏著《清史拾遗》。

耿 昇译,戴密微著

1983 《从敦煌写本看汉族佛教传入吐蕃的历史》(1979),载王尧主编《国外藏学研究选译》,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

许倬云

2002 《中国古代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的变动》(1996),载氏著《许倬云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黄进兴

1997 《作为儒教的宗教:一个比较宗教的初步探讨》,《亚洲研究》23。

1999 《"圣贤"与"圣徒":儒教从祀制与基督教封圣制的比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1.3。

黄彰健

1967 《奴儿哈赤所建国号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7 下册。收入氏著《明清史研究论稿》,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

1967 《论张儒绅赍夷文至明年月并论奴儿哈赤的七大恨及满文老档讳称建州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7 下册。收入氏著《明清史研究论稿》。

1967 《满洲国国号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7 下册。收入氏著《明清史研究论稿》。

1967 《清太祖天命建元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7 下册。收入氏著《明清史研究论稿》。

1967 《论清太祖于称汗后称帝,清太宗即位时亦称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7 下册。收入氏著《明清史研究论稿》。

黄丽生

1993 《〈尚书〉历史意识之研究》上篇,《人文数理学报》2。

张羽新

1988 《清政府与喇嘛教》,西藏人民出版社。

张怡荪主编

2000 《藏汉大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

张振阳

2002 《清代初期的祭天典礼及其支配正当性的建立》(摘要),"第三届人类学相关系所研究生论文发表会",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主办,

2002 年 5 月 24—25 日，台北市金华街 110 号，清华月涵堂会议厅。网址 http://trex. hss. nthu. edu. tw/ ~ anth/records_old. htm#001。(2004 年 6 月 14 日查阅)

张启雄

1992 《"中华世界帝国"与近代中日纷争——中华世界秩序原理之一——》，《近百年中日关系论文集》，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

张誉熏

2002 《台湾民间道教头七仪式》，《生死学通讯》6(2002 年 1 月)，见网页：http://www. nhu. edu. tw/ ~ lifedeath/literature/newsletter_2/letter_2_6. htm。

陈明华

1997 《东传韩国地狱十王图之研究》，《台北市立师范学院学报》28。

1999 《韩国佛教美术》，台北：艺术家出版社。

陈捷先

1978 《满文清实录研究(满文档案丛考　第一集)》，台北：大化书局。

1990 《明清史》，台北：三民书局。

1992 《清入关前满族的宗教信仰》，《台大历史学报》17。

陶晋生

1986 《金代政权合法地位的建立》，许倬云等著《中国历史论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黑田源次

1943 《满洲史观(满洲史の时代的区分)》，新京：满洲民族学会。

敦冰河

2001 《清初国家意識の形成と転換——アイシン国から大清国へ——》，《东洋学报》83.1。

渡边照宏

1958 《日本の佛教》，东京：岩波书店。

塚本善隆

1931 《引路菩萨信仰に就いて》，《东方学报》京都第一册。

齐木德道尔吉

2003 《满文蒙古文和汉文〈清太祖实录〉之间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35.1。

乔　吉

1994 《内蒙古寺庙》，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蒲文成主编

1996 《甘青藏传佛教寺院》,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杨成能译,稻叶君山著

1940 《满洲发达史》,奉天:萃文斋书店。

杨 宽

1993 《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杨联陞

1998 《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1968),载氏著《国史探微》,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稻叶岩吉

1914 《清朝全史》上卷,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

刘小萌

2001 《满洲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刘学铫

2000 《介评征服王朝、渗透王朝、骑马征服王朝诸说之不当》,《中国边政》147。

潘世宪译,道尔吉·班札罗夫著

1965 《黑教或称蒙古人的萨满教》,载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历史系蒙古史研究室编印《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17辑。

锋晖(孔果洛·穆腾慕)

2004 《追忆广禄先生》手稿。

斋藤道子

1991 《春秋时代における统治权と宗庙》,伊藤清司先生退官记念论文集编集委员会编《中国历史と民俗》,东京:第一书房。

2002 《祖先と时——宗庙·祭器に込められた春秋时代の时间观念——》,《东海大学纪要文学部》77。

萧启庆

1983 《姚从吾教授对辽金史研究的贡献》(1982),氏著《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鸳渊一

1965 《〈满文满洲实录〉に见える满洲族の天と地への崇拜——abka·na·baの语を通じて——》,《东方学》31。

1967 《〈满文老档太祖纪〉に見える满洲族の天地に対する思想に就いて——特にabka・na・baの三语を对象として——》,《东方学》33。

1968 《<满文老档太宗纪>に見える满洲族の天地の崇拜に就いて——特にabka・na・baの语を通じて——》,《东方学》35。

1973 《满文老档による研究の一齣 = 续篇——特に"满洲民族の思惟风习の一斑"》,《东方学》45。

鸳渊一编,内藤虎次郎著

1935 《增补满洲写真帖》,京都:小林写真制版所出版部。

瞿荆洲

1987 《黄梅杂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泷川政次郎

1941 《清朝文官の服制》,伪满《国立中央博物馆时报》11。

苏秉琦

1997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

注 释

〔1〕蒙古林丹可汗(Legs-ldan Qutuɣtu Qaɣan, 1592—1634)即位的第七年,朝鲜光海君(1575—1641。1608—1623年在位)七年,日本元和元年。

〔2〕Hetu Ala,后来音写为赫图阿拉,满洲语,意思是"横冈"。沈阳(Šin Yang Qota)和Hetu Ala(Köndelen Tabsang un Qota)以天聪八年(1634)四月初一日上谕,改名"天眷盛京"和"天眷兴京":Tngri yin Ürösiyegesen Mükden, Tngri yin Ürösiyegesen Yenden。见 *Daičing Ulus-un Maɣad Qaoli*, qoyaduɣar emkidgel, Taidzong gegegen uqaɣ-a-du quwangdi-yin maɣad qaoli (nige) (Qailar: Öbör mongɣol un soyol un keblel ün qoriy-a, 1989 on u 12 sar-a du), Arban Naimaduɣar debter, niɣur 523。即盛京(Mukden/Mügden)和兴京(Yenden)。兴京疆域大体上变成现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天眷"是金朝熙宗皇帝年号,1138—1140年间行用;顺治间完成的《金史》钦定蒙古文译本将这个词译成"tiyan ǰiuwan, tngri yin ürösiyel",见 Dudang, Üljeitü nar orčiγulba, *Altan ulus un teüke* (Begeǰing: Ündüsüten ü keblel ün qoriy-a, 1988 on u 3 sar-a du), niγur 97。

〔3〕满洲文"nadan amba miyoo",蒙古文"doloɣan yeke süm-e",意即七座大的庙。看下文。

〔4〕广禄(1900—1973.1.4)、李学智(1919—2003)译注《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八)册一(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3月),页63;册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1年9月)页29;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太祖)(东京:东洋文库,1955年8月31日),页67,所谓"天命元年"正月朔日条。这个尊号译言"天授抚育众 gurun 的(大)英明汗",《武皇帝实录》《满洲实录》译为"列国沾恩英明皇帝",《高皇帝实录》译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其实 gurun(清代音译固伦)同蒙古语 ulus 一样,都还有人民、部落、部族等意思;三体《满洲实录》此处,相应于 gurun 的蒙古字为 irgen,意即"民";对应于 han 的蒙古字是 qaγan 而不是 quwangdi(皇帝)。

关于广、李两位前辈的个人资料，目前后者有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图书馆的介绍，在网上能看到："李学智教授纪念图书室"http://www.ethnos.nccu.edu.tw/LiLib.htm。关于广禄先生，大陆有三篇介绍文章，即：1)《广禄》，载余骏升、扎英梅主编《新疆锡伯族人物录》(乌鲁木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政协、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政协合编，2001 年 6 月 10 日)，页 45—46；2)永托里，《想起广禄先生》，《锡伯文化》35(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年 10 月)，页 151—154；3)锋晖先生(孔果洛·穆腾慕，广禄先生后裔)手稿《追忆广禄先生》(廿一页，最末两页是复印照片。2004 年 8 月)。

〔5〕关于奴儿哈赤政权的国号、建元、汗号的建立与变迁的经纬，黄彰健先生一九六七年刊布的研究详细周到。即其著《奴儿哈赤所建国号考》,《论张儒绅赍夷文至明年月并论奴儿哈赤的七大恨及满文老档讳称建州国》,《满洲国国号考》,《清太祖天命建元考》,《论清太祖于称汗后称帝，清太宗即位时亦称帝》，依次刊载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七本下册(1967 年 6 月)，页 421—503。后收入同氏论文集《明清史研究论稿》(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 年 9 月)卷四。大陆及日本学者忽略他的研究，而延续种种误说。参看李德启《满文老档之文字及史料》,《(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十一周年纪念)文献论丛》(北平：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1936 年 10 月 10 日)，论述二页 19—26。不过本稿清朝纪年仍暂沿《清实录》。

〔6〕刘小萌《满洲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 年 10 月)乃专论满洲从部落到国家发展的专著，其正文及附录大事年表中，完全没有提及七大庙这件事。敦冰河也是如此，见其著《清初国家意识の形成と转换——アイシン国から大清国へ——》,《东洋学报》83.1(2001 年 6 月)，页 27—52。如下论文或许跟本主题有关，但未知详情：张振阳(政大民族所)《清代初期的祭天典礼及其支配正当性的建立》(摘要)，"第三届人类学相关系所研究生论文发表会"，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主办，2002 年 5 月 24—25 日，台北市金华街 110 号，清华月涵堂会议厅。目前(2004 年 6 月 14 日)仅可在网上看到摘要，网址是：http://trex.hss.nthu.edu.tw/~anth/records_old.htm#001。石桥崇雄以下论文待查阅：1.《清初祭天仪礼考——特に"丙子年四月《秘录》登ハン大位档"における太宗ホン＝タイジの皇帝即位记录にみえる祭天记事を中心として——》，载石桥秀雄编《清代中国の诸问题》(山川出版社，1999)；2.《清朝の支配权と典礼——特に清初前期におけるハン权・皇帝权と即位仪礼・祭天典礼の问题を中心として——》，载水林彪、金子修一、渡边节夫编《王权のコスモロジー》(比较历史学大系一。弘文堂，1998)。

〔7〕黄进兴《作为儒教的宗教：一个比较宗教的初步探讨》,《亚洲研究》23(1997 年 7 月)，页 184—223；《"圣贤"与"圣徒"：儒教从祀制与基督教封圣制的比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1.3(2000 年 9 月)，页 509—561 参考。

〔8〕李勤璞《斡禄打儿罕囊素：清朝藏传佛教开山考》,《蒙古学信息》88(呼和浩特，2002 年 9 月 15 日)，页 17—29；89(2002 年 12 月 25 日)，页 12—24；90(2003 年 3 月 15 日)，页 36—43；91(2003 年 6 月 15 日)，页 17—21 及 29；《白喇嘛与清朝藏传佛教的建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0(台北，1998 年 12 月)，页 65—100。

〔9〕平野聪《チベット佛教共同体と"中华"——清朝期多民族统合の一侧面——》,《国家学会杂志》110.3・4(1997 年 4 月)，页 106—168。或从清帝国统制全局来观察，谓之"中华王朝としての清朝と民族王朝としての清朝"(本间宽之)。泷川政次郎由朝珠推想，谓喇嘛教是清朝的国教，见其著《清朝文官の服制》，伪满《国立中央博物馆时报》11(1941 年 5 月)，页 8。

〔10〕张启雄《"中华世界帝国"与近代中日纷争——中华世界秩序原理之一——》,《近百年中日关系论文集》(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92 年 6 月)，页 13—43。他还有多篇论著研究这个课题。

〔11〕广禄、李学智译注《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册一，页 38。

〔12〕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太祖),页 43。

〔13〕*Daicing gurun i taidzu horonggo enduringge hūwangdi yargiyan kooli*, jai debtelin。无页码。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本稿使用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的胶片复印本,齐木德道尔吉老师俞允使用。

〔14〕《清太祖武皇帝努儿哈奇实录》(北平:北平故宫博物院排印本,1932 年 1 月)卷二,叶 7b。关于《大清武皇帝实录》满汉文本间的关系及史料学方面,参看三田村泰助(1909—1988)《满文清太祖实录のテキスト》(1957),载氏著《清朝前史の研究》(东洋史研究丛刊之十四)(京都:东洋史研究会,1972 年 4 月 30 日),页 347—362;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满文档案丛考 第一集)》(台北:大化书局,1978 年 7 月 1 日),页 5—54;154—157;庄吉发《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叙录》,载氏著《清代史料论述(一)》(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 年 10 月),页 211—216;《从故宫旧档看清实录的窜改》,载氏著《清史拾遗》(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2 年 3 月),页 99—104;松村润《清太祖实录の研究》(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Production Center, 2001),页 3—12;齐木德道尔吉《满文蒙古文和汉文 <清太祖实录> 之间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35. 1(2003 年 1 月 15 日),页 15—16。

〔15〕满汉蒙古三体《满洲实录》,载《清实录》册一(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6 年 11 月),页 172。关于满洲文本《满洲实录》史料特征及价值,参考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满文档案丛考》第一集)》,页 62—100。

〔16〕《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载《清实录》册一,页 58b。

〔17〕*Daičing Ulus un Maɣad Qaoli*, nigedüger emkidgel, *Taidzu degedü quwangdi yin maɣad qaoli* (Qailar: Öbör mongɣol un soyol un keblel ün qoriy-a, 1990 on-u 3 sar-a du), dörbedüger debter, niɣur 86a.

〔18〕有人说这玉皇庙"实为堂子"。王锺翰主编《中国民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 12 月),页 783。不知有何凭依。

〔19〕藏语 dus-gsum sangs-rgyas,蒙古语 ɣurban čaɣ un burqad, ɣurban čaɣ un burqan,满洲语 ilan erin i fucihi sa,均翻"三世佛"。

〔20〕インド・チベット研究会《チベット密教の研究》(京都:永田文昌堂,1993 年 11 月 20 日),页 129。

〔21〕朱越利等译,福井康顺监修《道教》第一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页 49—50。

〔22〕李能和(1869—1943)《朝鲜巫俗考》第十五章"巫祝之辞及仪式"第六节"十王",载任东权、李元植、娄子匡合编《韩国汉籍民俗丛书》2(台北:韩国民俗学会、中国民俗学会影印,1971 年秋),页 41a—b;陈明华《东传韩国地狱十王图之研究》,《台北市立师范学院学报》28(1997 年 6 月 30 日),页 375—398。图像方面,参看金元龙等编《高丽佛画》(韩国 uy 美(7))(Se-oul:中央日报社,1996 nyen 8 wuei 23 il),图 42—44;《朝鲜佛画》(韩国 uy 美(16))(Se-oul:中央日报社,1996 nyen 8 wuei 23 il),图 121—138;陈明华《韩国佛教美术》(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99 年 12 月),页 171—181。

〔23〕石守谦《有关地狱十王图与其东传日本的几个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6. 3(1985 年 9 月),页 565—618。

〔24〕塚本善隆《引路菩萨信仰に就いて》,《东方学报》京都第一册(1931 年 3 月),页 130—182;松本荣一《被帽地藏菩萨像の分布》,《东方学报》东京第三册(1932 年 12 月),页 141—170。

〔25〕藏川述《佛说地藏菩萨发心因缘十王经》、《佛说预修十王生七经》,载(日本)藏经书院编《〔大日本〕续藏经》(上海:涵芬楼影印,1924 年)第七四九册,页 381a—384b;385a—387a。庄明兴《中国中古的地藏信仰》(台湾大学文史丛刊 110)(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9 年 6 月),页 137—154。小南一郎《「十王经」の形成と隋唐の民众信仰》,《东方学报》京都第七十四册(2002 年 3 月),页 183—256。庄明兴的书(承陈弱水先生惠赐)就中国讫北宋初期之前地藏菩萨信仰有恰

切说明,附图对读者亦大有助益。

〔26〕庄明兴《中国中古的地藏信仰》,页137—154。朝鲜半岛的情况看陈明华《东传韩国地狱十王图之研究》,页383—387。关于地藏与阎魔关系,一篇有趣的研究值得参考:金冈秀友《地藏·阎魔の一体说——思想史的系谱—》,载江上波夫教授古稀记念事业会,《江上波夫教授古稀记念论集 民族·文化篇》(东京:山川出版社,1978年11月10日),页121—140。

〔27〕董秉忠等《盛京通志》(康熙二十三年〔1684〕修,康熙五十年〔1711〕补刻)卷二十,页1。辽宁省图书馆善本书30186号。

〔28〕阿桂《钦定盛京通志》一三〇卷本(北京:武英殿,1784年刊本)卷九十七,页1。

〔29〕诗见载阿桂《钦定盛京通志》卷十二、页8《谒显佑宫》,卷十三、页24《显佑宫叠旧作韵》,卷十四、页29《谒显佑宫》,卷十六、页16《谒显佑宫》。

〔30〕宫、寺在一九四九年以后被彻底毁坏。近代的情形,看沈周冕《兴京县志》(奉天:太古山房印刷,1925年)卷十一《古迹·庙宇》;卷九《宗教·佛教》。一九〇五年已经破败了,看伊东忠太(1867—1954)《满洲の佛寺建筑》(初刊于《东洋协会调查部学术报告》第一册,东京:东洋协会,1909年7月),见载伊东忠太建筑文献编纂会编纂,伊东忠太著《东洋建筑の研究》上(东京:龙吟社,1936年11月27日),页371—372。

〔31〕王晶辰主编《辽宁碑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页244。参看阿桂《钦定盛京通志》卷三圣制门,页7—8。张羽新《清政府与喇嘛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收录显祐宫碑文(页224—225。其录文太祖作"武皇帝",则似乎是拓本),以乾隆《盛京通志》校之,错漏字逾十处;且不示其依据。其题名,误作"兴京显祐寺碑文",后面做了一篇长"注"(页225—226),在此纠正其错误似乎适宜:1.这是"宫"而不是"寺",是昭事"上帝"、"昊天"的所在,因而不是喇嘛庙、汉族佛寺,更不供奉"三世诸佛"。2.顺治年间是维修而不是建造,碑文已明言。3.谓"后金时期的和尚、喇嘛是住在一起的,供奉'三世诸佛'的庙宇,是汉族佛寺与喇嘛教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寺庙形式"云云(再看《清政府与喇嘛教》,页7),未摆出任何证据;4.这是道教的宫观碑文,收在所谓"喇嘛教碑录"里甚属不伦。至于谓"顺治的这篇碑文,追述了努尔哈赤时期崇奉佛教的情况,是研究努尔哈赤时期喇嘛教问题的重要资料",真匪夷所思。

〔32〕了解奴儿哈赤兴起时节旧迹,方志以外可看鸳渊一编,内藤虎次郎(1866—1934)著《增补满洲写真帖》(京都:小林写真制版所出版部,1935年6月5日)许多照片,系明治卅八、卅九、四一年(1905,1906,1908)间拍摄。另有二十世纪前半叶日本人的各种踏查记录。

〔33〕珠荣嘎译注《阿勒坦汗传》附录蒙古原文 *Erdeni tunumal neretü sudur orosiba*(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310;382。

〔34〕Saɣang Sečen, *Erdeni yin Tobči*(Kökeqota:Öbör mongɣol un arad un keblel ün qoriy-a, 1980 on u 1 sar-a du), niɣur 473;乌兰《"蒙古源流"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1月),页695(原文),435(译文),参照页687(原文),430(译文)。满洲文本,江实译注《蒙古源流》(东京:弘文堂书房,1940年),满洲文原文,卷七,页39。

〔35〕珠荣嘎译注《阿勒坦汗传》附录蒙古原文,§§270,272;Saɣang Sečen, *Erdeni yin Tobči*, niɣur 442; 443。乌兰,《"蒙古源流"研究》,页684—685(原文),429(译文)。

〔36〕Saɣang Sečen, *Erdeni yin Tobči*, niɣur 548。乌兰《"蒙古源流"研究》,页723(原文),473(译文)。

〔37〕江实译注《蒙古源流》满洲原文卷七,页10—11;卷八,页42。

〔38〕对于蒙古人的 tngri, qormusta 信仰,参看如下的研究:潘世宪(1910—1990)译,〔俄〕道尔吉·班札罗夫(1822—1855)著《黑教或称蒙古人的萨满教》,《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十七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历史系蒙古史研究室,1965年3月),页4—8;另有白鸟库吉日译本《黑教或ひは蒙古人に於けるシャマン教》,《北亚细亚学报》(东京:北亚细亚文化研究所)第一辑(1942年10月),页8—18。胡其德,《蒙古族腾格里观念的演变》(蒙藏专题研究丛书81)(台北:蒙藏委员

会,1997年9月)。

〔39〕Čoyiǰi tulɣan qaričaɣulǰu tailburilaba, Lobsangdanǰin(<西藏文>blo-bzang bstan-vdzin)ǰokiyaba, *Altan Tobči* (Kökeqota:Öbör mongɣol un arad un keblel ün qoriy-a, 1983 on u 12 sar-a du), niɣur 648。参看 čoyiǰi tulɣan qaričaɣulǰu tailburilaba, Dharm-a ǰokiyaba, *Altan Kürdün Mingɣan Gegesütü* (Kökeqota:Öbör mongɣol un arad un keblelün qoriy-a, 1987 on u 11 sar-a du), niɣur 149. 另看 Bulaɣ nairaɣulba, *Mongɣol Burqan u Šašin u Uran J̌okiyal un Sudulul* (Qailar: Öbör mongɣol un soyol un keblel ün qoriy-a, 1998 on u 7 sar-a du), niɣur 23。关于 *Altan Kürdün Mingɣan Gegesütü* 这本书,有札奇斯钦的研究《谈蒙文史料"金轮千辐"》,载氏著《蒙古史论丛》(台北:学海出版社,1980年9月),页1277—1291。

〔40〕王崇古"为恭进虏王谢恩表文请颁佛像番经併陞效劳官僧职级昭国恩变夷俗以坚贡盟事"疏,片段见载井上治《"少保鑑川王公督府奏议"に見えるアルタンと佛教》,《东洋学报》80.1(1998年6月),页016—017。注意《十王畏兀经》篇幅为一卷。关于马你卜剌,井上治有小考证,见氏著《ホトクタイ=セチェン=ホンタイジの研究》(东京:风间书房,2002年3月15日),页333—336。

〔41〕井上治《<少保鑑川王公督府奏议>に見えるアルタンと佛教》,页014,016—017参照。

〔42〕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北京:中华书局影印万历年间刊本,1962年6月)卷十四,页34a—b(总页1233a—b)。马蹄寺(mā-this-zi)在今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马蹄区,藏语名 dgav-ldan dam-chos gling,见 Brag-dgon-pa Dkon-mchog bstan-pa rab-rgyas, *Mdo-smad chos-vbyung* (1865) (Zi-ling: Kansuvu mi-rigs dpe-skrun khang, 1982 lovi zla 3 par), shog grangs 147-149;汉译本: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安多政教史》(西宁: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4月),页143—144。蒲文成主编《甘青藏传佛教寺院》(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页565;井上治《ホトクタイ=セチェン=ホンタイジの研究》,页434参照。

瞿九思(1546—1617)《武功录》在一六一二年写定,自作序言,并呈上。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4月)卷二八八(文苑)有传(页7390—7391);其后裔瞿荆洲记其人其书,载氏著《黄梅杂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8月),页1—22;138—147。又附录《武功录》九思自序(刻本影印,在页148—153),及一九八二年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武功录》时邓嗣禹叙论(页154—165)。

〔43〕金奉、珊瑚是两位明朝通事。看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页761b,767b,769b,781a(作"金凤"),《黄台吉列传》、页791b(以上金奉);和《俺答列传下》、页753b,769b,781a(以上珊瑚)。

〔44〕井上氏以为此人可能是 Ašing lam-a/A seng bla ma/vdzo ge A seng bla ma 云。见其著《〈少保鑑川王公督府奏议〉に見えるアルタンと佛教》,页05—06。

〔45〕此人大致是 Sgo-mang Nang-so 喇嘛。看若松宽《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5月),页264。

〔46〕"窨"是"汉"的误写,看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页761b,766b,778a。

〔47〕丫手即叉手。明刊本郑之珍《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三卷,有万历壬午(十年,1582)作者序,今收入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辑《古本戏曲丛刊初集》(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54),其中夜叉作"夜丫"的例子有多个,如:"末净夜丫","夜丫尊我作班头,拘管牢中饿鬼囚","自家夜丫班头是也","(内叫云)夜丫接官!","这夜丫急忙忙逼我骨肉分张,痛杀杀使我肝肠裂碎",见其上卷叶25b, 56b, 58b。

〔48〕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叶39a—40a(页765a—766a)。

〔49〕井上氏对于"十王畏兀经"的所指不能定。氏著《"少保鑑川王公督府奏议"に見えるアルタンと佛教》,页023,注26。当时有三种文字的佛经,即"番经""汉经""畏兀经",见瞿九思《万历武功

录》卷八,页 766a。在《ホトクタイ = セチェン = ホンタイジの研究》中(页 342—344),井上治对"西番十王经"的所指,提出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指的《藏汉大辞典》页 552 上的词条"rgyal-po mdo bcu";另一种可能是指的西藏撰作的中阴救度经 *bar-do thos-grol*,及其蒙古文译本:*sonusuγad yekede toniluγči*〔*tonilγaγči*〕 *neretü yeke kölgen sudur*(有 16 到 17 世纪白桦树皮写本残篇十三叶在外蒙古出土)。若依本稿此处的资料和分析,这两种"可能"均属不可能。另外井上治在文义理解上似乎有差误: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年 5 月)"rgyal-po mdo bcu"词条汉译作"十大王经",系指十部经典,它们被视作"众经之王","rgyal-po" = "王"为形容之辞;汉文"十王经"则意指关于十位阎王的经书。再者 *bar-do thos-grol* 中没有十位阎王,请看川崎信定译《(原典译)チベットの死者の书》(东京:筑摩书房,1993 年 11 月 10 日)。

〔50〕比较郭冠连的看法,见氏著《当代中国大陆蒙古学研究概论》(蒙藏专题研究丛书 94)(台北:蒙藏委员会,1999 年 6 月),页 174—175。

〔51〕庄明兴,《中国中古的地藏信仰》,页 138—141 参照。

〔52〕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卷八,页 1834—1835。

〔53〕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 10 月)卷八十一,页 2718。洪亮吉,《晓读书斋杂录》(授经堂,光绪丁丑重刊)之《晓读书斋初录》卷下,页 16a 参照。

〔54〕王三庆《敦煌文献中斋愿文的内容分析研究》,载项楚、郑阿财主编《新世纪敦煌学论集》(成都:巴蜀书社,2003 年 3 月),页 615—616。

〔55〕三年之丧是汉文化的传统习俗。

〔56〕萧大亨,《夷俗记》万历二十二年刻本,载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11(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无出版年月),页 627。文中"西方",对应蒙古语的同义词 örön-e, baraγun,甚或 baraγun ǰuu("西招"),即指西藏或拉萨。明清时节蒙古人心目中的圣地。

〔57〕珠荣嘎译注《阿勒坦汗传》,§ §282 - 283。

〔58〕*Rba Bzhed*,转引自 Dpav-bo Gtsug-lag Phreng-ba, *Chos byung Mkhas-pavi Dgav-ston*(1564)(Pe-cin: Mi-rigs dpe-skrun khang, 1986 lovi zla 6 par), shog grangs 296—297。参看 Sba Gsal-snang, *Sba Bzhed* (Pe-cin: Mi-rigs dpe-skrun khang, 1980 lovi zla 6 par), shog grangs 4;又佟锦华、黄布凡译注《拔协》(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 年 10 月),页 87(原文),4(汉译文)。关于这本书,参看戴密微著,耿昇译《从敦煌写本看汉族佛教传入吐蕃的历史》(1979),载王尧主编《国外藏学研究选译》(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3 年 3 月),页 9;佟锦华《论〈巴协〉》,载氏著《藏族文学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 年 6 月),页 64—85。在日本,七七祭日也是早已流行的。渡边照宏《日本の佛教》(东京:岩波书店,1958 年 3 月 5 日),页 108—110。参看吉田兼好(1283—1350)撰,王以铸译《徒然草》第三〇段,载周作人、王以铸译《日本古代随笔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年 9 月),页 358。台湾的情形参考:张誉熏《台湾民间道教头七仪式》,《生死学通讯》6(2002 年 1 月),见网页:http://www.nhu.edu.tw/~lifedeath/literature/newsletter_2/letter_2_6.htm。伊犁锡伯族的情况,看永梅兰《锡伯族婚姻与殡葬习俗》,《全国锡伯族文化研讨会论文彙编》(察布查尔:全国锡伯族文化研讨会筹备组,2004 年 8 月),页 129—131。

〔59〕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太祖),页 286—287。

〔60〕满洲汉蒙古三体《满洲实录》,页 300a。

〔61〕羽田亨《满和辞典》(京都:京都帝国大学满蒙调查会,1937 年 12 月 20 日),页 322。

〔62〕《清太祖武皇帝努儿哈奇实录》卷二,叶 11。

〔63〕明代女真已经蒙古化。例如语文方面,正统九年(1444)位于松花江沿岸的玄城卫等四十卫的指挥使行文明朝廷,请求日后敕文用蒙古文,勿再使用女真文,因已无识者。参看金光平、金启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 7 月),页 31。又成化二十年(1484,朝鲜成宗十五年)建州卫女真达罕之子李包多罗入朝朝鲜国王,有如下问答:"问:前所送谕书之辞,汝等解

否？（包多罗）答云：我等本不解汉字，故未得知耳"云。朝鲜方面也以为，"且虽百度谕书，不知汉字，则亦无益矣"。池内宏编《明代满蒙史料　李朝实录抄》（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 年 8 月）第八册，页 414—415。李民寏《栅中日录》页 43—44："胡中只知蒙书，凡文簿皆以蒙字记之。若通书我国时，则先以蒙字起草，后华人译之以文字"。《清太祖武皇帝弩儿哈奇实录》卷二（页 1a）记：己亥年（万历廿七，1599）正月，"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二月，太祖欲以蒙古字编成国语，榜识厄儿德溺、刚盖对曰：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我等实不能"云云，结果太祖依蒙古字造满洲字。和田清（1890—1963）谓"满洲"西南部的女真往往有蒙、汉文意兼通者，参看氏著《清の太祖の顾问龚正陆》（1952），载其《东亚史研究（满洲篇）》（东京：东洋文库，1955 年 12 月），页 637—649。

〔64〕乾隆朝钦定《太宗实录》（台湾华文书局影印伪满国务院本）卷五，页 69。

〔65〕*Daičing ulus un maγad qaoli*, qoyaduγar emkidgel, *Taidzong gegegen uqaγ-a du quwangdi yin maγad qaoli* (nige), tabuduγar debter, niγur 137b.

〔66〕乾隆朝钦定《太宗实录》卷八，页 135。

〔67〕*Daičing ulus un maγad qaoli*, qoyaduγar emkidgel, *Taidzong gegegen uqaγ-a du quwangdi yin maγad qaoli* (nige), naimaduγar debter, niγur 235a - b.

〔68〕杨起鹏《重建玉皇庙碑记》，载曹汛《〈重建玉皇庙碑记〉曹振彦题名考述》，《红楼梦研究集刊》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 3 月），页 356—358。另外，囊素喇嘛舍利塔庙乃敕建、立满洲、汉文二体碑记，玉皇庙则皇太极以下集资众建、立汉文碑记，显得在满洲领袖看来，二者意义仍有不同。

〔69〕关于满洲人宗教信仰中特殊的方面，或可参考鸳渊一《〈满文满洲实录〉に見える满洲族の天と地への崇拜——abka・na・baの语を通じて——》，《东方学》31（1965 年 1 月），页 1—14；《〈满文老档太祖纪〉に见える满洲族の天地に对する思想に就いて——特にabka・na・baの三语を对象として——》，《东方学》33（1967 年 1 月），页 1—14；《〈满文老档太宗纪〉に见える满洲族の天地の崇拜に就いて——特にabka・na・baの语を通じて——》，《东方学》35（1968 年），页 1—15；《满文老档による研究の一齣 = 续篇——特に"满洲民族の思惟风习の一斑"》，《东方学》45（1973 年 1 月），页 1—12。陈捷先《清入关前满族的宗教信仰》，《台大历史学报》17（1992 年 12 月），页 273—285。

〔70〕当时从宣大到辽东，北方边境的汉人、蒙古均视关公（关老爷）是保佑自己打仗得胜的神，建有关公庙，例如满、汉文《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ujui debtelin）万历十二年（甲申，1584）条记有：开原"关王庙"/guwan yei miyoo；三体对照《满洲实录》同处（卷一，页 24b）则记作：

《满洲实录》原文		意思
满洲文	guwan yei miyoo	关爷庙
汉　文	关王庙	
蒙古文	geser ün süm-e	格萨尔庙

这儿的 geser，就是蒙古的 Geser Qan，西藏文作 Ge-sar Rgyal-po，"格萨尔王"，乃西藏蒙古史诗（称为"史诗"是二十世纪的事，如果隶之以荷马与维吉尔 *epic*，则严重误解了）主角，一位善战而成神的国王，受供奉为军神；在蒙古并与关老爷同化。参看札奇斯钦《库伦城小史》，《蒙古史论丛》下册，页 1115、1130。而关老爷跟格萨尔同一化的最早证据，无疑就是我们指出的这部三体《满洲实录》了。如今辽宁省彰武县大四家子乡千佛山清末民初摩崖造像中有关公身骑赤兔马、右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像和关公松下读《春秋》的像以及独自端坐像；同乡喇嘛庙圣经寺壁画有一独立的关

公正面坐像,对称位置则画 Geser Qan 骑马戎装像(近乎前述关公骑马立像)。看李勤璞《圣经寺壁画初考》,《美苑》(鲁迅美术学院学报)4(2000 年 8 月 20),页 58—59。此地一九四九年之前属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前旗(J̌irim un čiɣulɣan u qorčin u ǰegün ɣarun emünetü qošiɣun,即宾图郡王遊牧地,ǰasaɣ törö yin bingtü ǰiyün wang un nutuɣ)。至迟在十七世纪初,崇拜关老爷/Geser Qan。李光涛先生有专文论述皇太极的关公崇拜,尚涉及明神宗以降蒙古情形点滴,见其著《清太宗与三国演义》,《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2(1948 年),页 264—272。但他未指出关公崇拜上的 Geser 的因缘。而关老爷在信仰上有不同功能角色,在蒙古满洲方面有不止一个源头的起源史,事涉民族一区域文化,值得细考。

〔71〕徐恒晋校释,李民寏著《栅中日录 建州闻见录》(页 44),说黑秃阿喇时代女真人"死则翌日举之于野而焚之",这或是西藏经蒙古传来的火葬之俗。李勤璞《白喇嘛与清朝藏传佛教的建立》,页 70,注 1;《明末辽东边务喇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1.3(2000 年 9 月),页 598,注 129 参看。另有如下论文未能获读:川胜守,《東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火葬法の文化史——三~一四世纪について——》,[九州大学東洋史论集]18(1990 年 9 月)。

〔72〕稻叶岩吉(1876—1940)、乔吉(Čoyiǰi)注意到这一点。前者谓:在清的纪录上,以此时始,建立佛寺和道家的玉皇庙。稻叶岩吉《清朝全史》上卷(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14 年 4 月 18 日),页 153。乔吉《内蒙古寺庙》(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 年 9 月),页 28。

〔73〕黄彰健说,"奴儿哈赤建立国号,并不自万历四十四年始。从万历二十四年起,一直至他的死,他的国号凡五变。最初系称女直,旋改女真,又改建州,后又改后金,最后改称金。在万历三十三年时,已称建州等处地方国王;在万历四十四年时仍沿用建州国号,并未另定新名;其改称后金,则在万历四十七年己未三月;其改称金,则在天启元年辛酉。后金系其自称,並非史家所追称。女直、女真、建州、后金及金,系不同时间所定,各有其行用的时间,而后金与金亦有分别,是不可像一部分明人及近代史家那样混称的";"奴儿哈赤对外行〔汉〕文……未用满洲为其国号"。见黄彰健《奴儿哈赤所建国号考》,页 421,448。参看河内良弘《李满住と大金》,《松村润先生古稀记念清代史论丛》(东京:汲古书院,1994 年 3 月 1 日),页 5—18。

〔74〕关于金国的兴起,再参考杨成能译,稻叶君山著《满洲发达史》(奉天:萃文斋书店,1940 年 10 月 10 日),页 183—190;户田茂喜《赫图阿拉城构成の素描》,楪溪会编《山下先生还历记念东洋史论文集》(东京:六盟馆,1938 年 9 月),页 670—676;陈捷先《明清史》(台北:三民书局,1990 年 12 月),页 161—177。朝鲜侧对奴儿哈赤的印象,可看庄吉发《朝鲜人心目中的努尔哈齐》,载氏著《清史拾遗》,页 1—8。

〔75〕关于首里口的解说,看建国大学研究院《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建国大学研究院历史报告第一》(新京:〔伪〕建国大学,1939 年 12 月),页 21—22;三田村泰助《满文太祖老档の编纂》(1950),载氏著《清朝前史の研究》,页 344。今对照 *Daicing gurun i taidzu horonggo enduringge hūwangdi yargiyan kooli*,以后者为是。

〔76〕《清太祖武皇帝弩儿哈奇实录》卷一,叶 8a。

〔77〕*Daicing gurun i taidzu horonggo enduringge hūwangdi yargiyan kooli*, ujui debtelin.

〔78〕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满文档案丛考 第一集)》,页 44。

〔79〕《清太祖武皇帝弩儿哈奇实录》卷一,叶 8a。

〔80〕满文本相应处作 daiming gurun wanli qan,"大明万历皇帝"。

〔81〕建国大学研究院《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建国大学研究院历史报告第一》,图版八。

〔82〕建国大学研究院《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建国大学研究院历史报告第一》,页 29—30,34,71,88。参看石桥崇雄《清初皇帝权の形成过程——特に"丙子四年四月〈秘录〉登ハン大位档"にみえる太宗ホン・タイジの皇帝即位记事を中心として——》《东洋史研究》53.1(1994 年 6 月),页 123—129。

〔83〕《清太祖武皇帝弩儿哈奇实录》卷二，叶11a—b。

〔84〕《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册一，页82；册二，页52—53。

〔85〕三体《满洲实录》卷四，页202。

〔86〕《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一，页70a。

〔87〕稽诸三体《满洲实录》，"tangse"往往对"庙""堂子"；对"玉帝庙"的，仅这一例而已。

〔88〕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的变动》（1996）指出这是"部落国家"，见氏著《许倬云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页187；苏秉琦（1909—1997）以为清朝是中国北方民族建立的"续生型国家"之一。见其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6月），页135—139。这都是由比较得出的富有启发的珍贵见解。

〔89〕这句话出《左传》成公十三年。关于春秋时代戎与祀，看斋藤道子《春秋时代における统治权と宗庙》，伊藤清司先生退官记念论文集编集委员会编《中国历史と民俗》（东京：第一书房，1991年10月25日），页239—257；《祖先と時——宗庙・祭器に込められた春秋时代の时间观念——》，《东海大学纪要文学部》77（2002年11月2日），页21—39；水野卓《春秋时代における统治权の变容——「器」の意味を中心として》，《东方学》106（2003年7月），页39—52。高木智见的《春秋时代の神・人共同体について》《中国——社会と文化》5（1990），未得读。

〔90〕可把奴儿哈赤这个"后金国 *Amaga Aisin Gurun*"跟金国（1115—1234）的情况做比较。关于后者，陶晋生的研究可以参考，即其著《金代政权合法地位的建立》，载许倬云等著《中国历史论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1月），页519—531。"*amaga aisin gurun*"这个自称至少在旧满洲档天命六年三月致朝鲜国王书中使用，参看李德启《满文老档之文字及史料》，《（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十一周年纪念）文献论丛》，论述二页22。

〔91〕本表依据资料如下：Fe Ala：申忠一建州图录，载建国大学研究院《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建国大学研究院历史报告第一》，图版八，参看页21，29，34，71，88—89。Hetu Ala：李民寏《建州闻见录》。Mukden：佟悦《清盛京太庙述略》，《沈阳故宫博物馆文集1983—1985》（沈阳：沈阳故宫博物馆，1985年12月），页43—48。明朝和清朝的北京：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页536，543—546，553—554，556；和珅等《钦定大清一统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坛庙，叶11a："堂子。在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每年元旦亲祭；凡历国家有征讨大事，必亲祭告"云云；参看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卷四十九、城市（内城南城），页773。关外时期诸城再参看李凤民《清入关前都城述略》，载《沈阳故宫博物馆文集1983—1985》，页34—42。

〔92〕李民寏没有指出位置，但前后期堂子位置相比较，祭天所应该在此方位。

〔93〕杨宽遗忘了堂子的存在，图上未表现出来。这或者可以理解为：这位汉学者没有注意清朝的特性。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页553—554，556。

〔94〕明代蒙古人对明朝认识的一斑：把"京都"谓大都合托，"朝庭"称作大明哈。此出郭造卿《卢龙塞略》卷十九译部（上），见载 Ü. Manduqu emkidgen tailburilaba, *Mongγol i ioi toli bičig*（《蒙古译语词典》，Begejing：Ündüsüten ü keblel ün qoriy-a, 1995 on u 1 sar-a du），niγur 421。还原成蒙古语，前者即 dayidu qota，即元时旧名"大都"；后者即 daiming qaγan，"大明哈罕，大明皇帝"。

〔95〕《礼记正义》卷十二，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7年8月），页1335b。

〔96〕《礼记正义》卷十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页1321c。

〔97〕参照佟悦《清盛京太庙述略》，页43；石桥崇雄《清初皇帝权の形成过程》，页98—135。有时也在堂子内祭天，看石桥前揭文，页123—129。

〔98〕天聪四年（1630）辽阳喇嘛坟碑文、玉皇庙碑文以及天聪朝汉人官员的皇文（见于罗振玉编辑《天聪朝臣工奏议》，载《史料丛刊初编》，东方学会，1924年印行）已经视奴儿哈赤与皇太极为"皇帝"了。

〔99〕比如罗马皇帝跟中国皇帝全然两样。看邢义田《从比较观点谈谈秦汉与罗马帝国的"皇帝"》,载同氏《古罗马的荣光 I——罗马史资料选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8 年 12 月 16 日),页 319—332。另可比较:近藤治《アブルファズルの皇帝观について》("On the Abu'l-Eazl's Conception of Kingship"),《东洋史研究》59.2(2000 年 9 月),页 98—121。

〔100〕奴儿哈赤当时曾自称夷人、夷主。

〔101〕黄丽生就历史意识有专门讨论。黄丽生《〈尚书〉历史意识之研究》上篇,《人文数理学报》2(台湾海洋大学共同科,1993 年 6 月),页 220—221。

〔102〕参考张启雄《"中华世界帝国"与近代中日纷争——中华世界秩序原理之一——》,页 18—26。

〔103〕参考乾隆朝钦定《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一,页 390—391。另有一篇《刘学成请设立坛郊社及设通政司奏》(天聪八年十二月十四日),收在罗振玉编辑《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下,叶 10a—11a。

〔104〕三国故事是奴儿哈赤他们熟悉的。弘治本罗贯中(约 1330—1400)《三国志通俗演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 4 月)卷二十四"司马复夺受禅台"节(页 1152—1153)说到易代之际的天子七庙:"贾充、裴秀二人再拜而奏曰:王上当法曹丕绍汉故事,复筑'受禅台'(soorin de sirara tai),布告天下,以即'正位'(amba soorin,'大位'),岂不美哉?(中略)以十二月甲子日,(曹)奂亲捧传国玺,立于台上,大会文武,请晋王司马炎登(受禅)台,授与大礼。奂下台,具公服,立于班首(中略)。晋帝司马炎,追谥祖司马懿为宣帝,伯父司马师为景帝,父司马昭为文帝,立七庙(nadan miyoo)以光祖宗(mafari be eldembuhe)。哪七庙?汉征西将军司马钧,钧生豫章太守司马量,量生颍川太守司马隽,隽生京兆尹司马防,防生宣帝司马懿,懿生景帝司马师、文帝司马昭:是为七庙也。大事已定,每日设朝,计议伐吴之策"。括号中拉丁字乃转写满洲字,取自同书清初满洲文译本相应字句:Lo guwan jung, *Ilan gurun-i bithe*(Urumci: Sinjiyang niyalma irgen cubanše, 1985ci aniya 2 biyade) duici dobton, abdaha 516 - 520。这部译本前边录有多尔衮("doro be aliha qan i ama wang")命令内三院将之续译完成的谕旨(hese)和顺治七年正月十七日译者们给他的奏书(俱满洲文)。这部珍贵的满译本往年永志坚先生代为购致。

〔105〕参看《后金檄明万历皇帝文》,潘喆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年 1 月),页 292—294;黄彰健《清太祖天命建元考》,页 475—476;神田信夫《爱新觉罗考》,《东方学》80(1990 年 7 月),页 4—8;敦冰河《清初国家意識の形成と転換——アイシン国から大清国へ——》,页 29—32。

〔106〕例如矢野仁一(1872—1970),《满洲支那领土说の批判と满洲国の建国》(财团法人启明会第五十回讲演集),东京:启明会,1933 年 8 月 30 日;黑田源次(1886—1957)《满洲史观(满洲史の时代的区分)》,新京:满洲民族学会,1943 年(伪康德十年)6 月 25 日(计二八页)。参考以下的分析:刘学铫《介评征服王朝、渗透王朝、骑马征服王朝诸说之不当》,《中国边政》(台北;中国边政协会)147(2000 年 3 月),封二及页 1—3。

〔107〕例如姚从吾(1894—1970)的"东亚儒家大同文化"论(1957),栗原朋信(1909—1979)的"中华世界",西嶋定生(1919—1998)的"东アジア世界"论(1970),张启雄的"中华世界秩序原理"论(1992 年以来),以及多位日本学者(如田村实造)称述的"北亚细亚世界"或"内陆亚细亚世界"、最近石滨裕美子的西藏、蒙古、满洲间之所谓"チベット仏教世界"论(见其著《チベット仏教世界の历史的研究》,东京:东方书店,2001 年初版)。关于"东亚世界",栗原、西嶋以来日本、台湾学者一直有深入的讨论,近年又烈,深具学术和意识形态涵意。参看杨联陞《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1968),载氏著《国史探微》(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 3 月),页 1—14。

案:姚从吾自己的解说首先在其《国史扩大绵延的一个看法》(1957)一文中,此文载于其《东北史论丛》(台北:正中书局,1976 年 6 月)上册,页 1—26。参考萧启庆《姚从吾教授对辽金史研究的贡献》(1982),载该氏著《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年 6 月),页 341—351。姚氏后来又作两文阐发这个思想,即《从历史上看东亚儒家大同文化的立国精神》

(1969)、《儒家大同文化的基础和在东亚的影响》(1979)。参考王民信:《姚从吾先生研究史学的心路历程》,《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27期(台北:中国历史学会,1995年9月),页235—241。张启雄先生就"中华世界秩序原理"论的阐明一直进行中,对理解亚洲史非常有用。

〔108〕岩井茂树撰文《十六、十七世纪的中国边境社会》(1996)认为16世纪后半期在东亚形成跨越语言和种族的华夷共同体社会,他还对女真人和倭寇进行了比较,也涉及板升(baising)问题。见包国庆译,永井匠著《隆庆和议与右翼蒙古的汉人》,《蒙古学信息》2(2004年7月15日),页10,注4。



斯文赫定收集品的新刊楼兰文书

陈　凌

缘　起

楼兰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在古代中西交通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汉代的楼兰是西域南北两道的分途点[1]。《汉书·西域传》称："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担粮，送迎汉使。"楼兰的作用与繁盛由此可见一斑。东汉至十六国时期，楼兰作为西域长史的驻所，在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过程中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此后，由于欧亚大陆整体政治格局的改变，塔里木盆地北缘的通路日趋重要，而位于南道的楼兰则日渐没落，千百年后竟陆沉于荒漠之中。

1901年3月，斯文赫定意外地闯入楼兰城。从那时起，建构楼兰的历史，除了利用有限的文献记载外，更多的则是倚靠考古材料。其中，简牍文书占了相当大的份量。斯文赫定、斯坦因、橘瑞超等人先后从楼兰搜罗的文书有数百件之多。新疆考古工作者后来在楼兰找到的零星文书，已是斯氏等人的劫后之余。百年来发现的楼兰文书，经过学者们的整理，大部分已经刊布了[2]。不过，斯文赫定收集品中仍有一批文书正在整理之中，尚未公诸于世[3]。所幸的是，近年来我们终于有机会了解这批文书的一鳞半爪。

1988年，日本学者福田俊昭到瑞典留学，时值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研究所罗森（S. Rosen）教授主持整理瑞典国立民族学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graphy in Sweden）藏赫定中亚收集品。罗森请福田氏帮助鉴定赫定收集品中的五件相当完整的汉语纸文书。这些文书用油纸精心包裹，封存于茶色纸筒中。福田认为它们大概是斯文赫定在楼兰城发现的文书。回日本数月后，福田做了报道，不仅给出录文，而且刊布了黑白照片[4]。事隔十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冨谷至教授发表了他们对新刊楼兰文书的最新研究成果，并首次公布了五件文书的彩色原大照片[5]。这就为人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

如所周知，对楼兰文书的研究存在相当多的争论。最纷繁的纠葛莫过于"李柏文书"出

土地与西域长史驻所问题。日本学者刊布的五件楼兰文书，与业已刊布的楼兰文书有很多重要联系，因而为深入讨论上述问题提供了新线索。王国维先生曾对古代简牍检署制度详加考证[6]，而这批文书相当完整，且为简与纸并用时代之物。这就为研究古代尺牍制度的演化过程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7]。现存魏晋书迹寥寥无几，像新刊文书这样完整的实物更属罕见。文书字迹魏晋气息醇然，略带章草意味，是研究古代书法流变的极佳素材，洵非近来冒称晋人索靖《出师颂》那样的伪滥之作可比。新刊文书可供研究的方面还有许多，这里不能备举。令人遗憾的是，自文书刊布以来，尚未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我们草成此文，权当引玉之砖，其中错误不当之处，还望方家不吝赐正。

一　文书校注

福田俊昭和冨谷至的录文解决了五件文书释读的大部分问题。由于部分文书字迹过于潦草，不易辨识，他们的录文还有可以改进之处。笔者对文书重新作了校录，体例说明如下：

1）[ ]表示该字已残，[ ]中的字是根据残剩的笔画所补；文书前后缺字数不详用////表示；文字上加 = = 表示原稿涂抹。根据笔者对其内容的理解，加以现代标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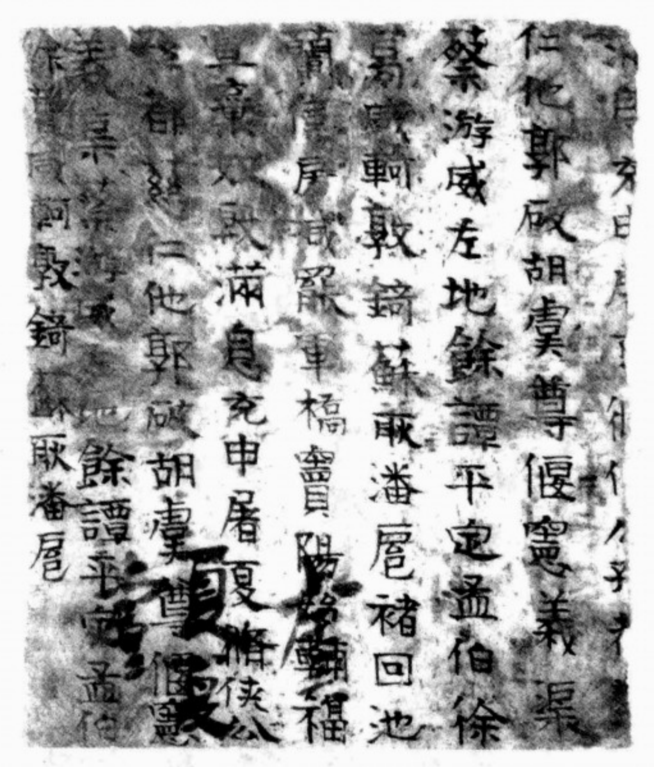
2）福田俊昭、冨谷至的录文，分别称“旧录一”、“旧录二”。

3）厘定文字所参考的《淳化阁帖》，简称《阁帖》；唐人张彦远《法书要录》，简称《要录》[8]。传世魏晋诸帖，一般取前数字作为帖名。为避免烦琐，仅标该帖所在页码。

4）为便于检索楼兰文书原始编号和出土地点的关系，本文采用林梅村的编号，以“林※※”表示[9]。林书未收部分文书采用郭锋编号，以“郭※※”表示[10]。录文均据图版重新校核，与旧释不同之处，随文注出。

录文

1　[滿息充申屠夏修俠公孫都慈]
2　仁他郭破胡虞尊偃憲義渠
3　蔡游威左地餘譚平定孟伯徐
4　葛咸軻敦錡蘇耿潘扈褚回池
5　蘭偉房減罷軍橋竇陽始輔福
6　宣棄奴殷滿息充申屠夏修俠公
7　孫都慈仁他郭破胡虞尊偃憲
8　義渠蔡游威左地餘譚平定孟伯
9　徐葛咸軻敦錡蘇耿潘扈



《急就章》残片(正面):

褐色草纸,宽 19.7 厘米,高 24.0 厘米,楷书。

注释

【第 1 行】旧录无此行。按文书自第 4 行“褚回池”起,重复书写《急就章》第六节的内容,可以推知第 1 行的内容,亦应如此。

录文

1 六月一日暈白:別已二年,相思

2 之情,勞不可言。熱過差,想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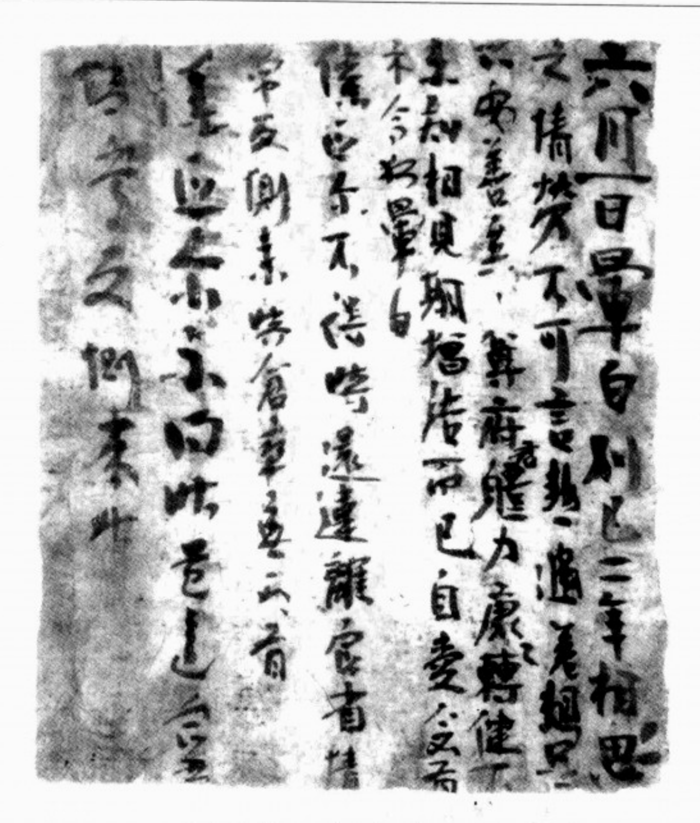
3 下安善矣,·尊府君體力轉康健不?

4 未知相見期,增結而已。自愛念。有

5 示。令狐暈白。

6 仆正尔不得時還,違離宦省,情

7 常反側。来时仓卒,无所有。



《令狐晕信稿》(背面):行草书

8　仆正尔不得时还,违宦省,

9　情常反侧。来时

注释

【第2行】劳不可言:这句大意是两年的分别,相思忧扰,不堪言表。相近的如“诸疾苦忧劳非一,妹转佳庆不?及啼不?忆念奴,殊不可言”(《要录》页160);“向遣书……诸怀何可言”(《要录》页186)。这类相近的说法都是表示心情的复杂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热过差:旧录一作“□□卷”,旧录二作“悲□差”。我们认为应作“热过差”为是。“过差”一词指过度,过分。例如“笃不喜见客……给领与公同,殊为过差”(《要录》页173,此句原点校有误)。《文选》卷四十三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惟饮酒过差耳。”[11]《三国志》卷十《魏书·荀彧传》裴注引《平原祢衡传》:“衡字正平,建安初,自荆州北游许都,恃才傲逸,臧否过差,见不如己者不与语,人皆以是憎之。”[12]《三国志》卷三十六《蜀书·张飞传》:“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

戒之曰:‘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挞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13]可见“过差”是中古时代的常用词,按旧录则不可解。“热过差”,意思是天气太热。

足:旧录一作“只”。

【第3行】下:旧录一作“不”。此字与上一行最后一字成“足下”一词,指收信对方。

安善:安善乃当时的嘉语,例如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就是近例。《文选》卷三张平子《东京赋》“京室密清,罔有不韪”一句,薛综注称:“韪,善也,谓无复疫疠,皆得安善也。”[14]可知“安善”有“无复疫疠”的意思。

矣:旧录二释“无”,查图版可知不是草书“无”字。

转康:旧录均原释为“康转 =”,文意不通。按图版可知旧录是将原文书中表示文字顺序更正的符号“乙”误认作表示重复的符号“ =”。“转……”的表达常见于魏晋书帖。如“知阮生转佳,甚慰,甚慰”(《要录》页162);“晴快,足下各佳不? 长素转佳也,甚耿耿,故知问”(《要录》页173);“数得桓公问,疾转佳也”(《要录》页167);“卿转胜向平复也”(《要录》页161)。这里“转康”意思是“逐渐恢复健康”。

【第4行】未:旧录一作“在”。

结:比喻心中有事未能释然。司马迁《报任安书》“意有所郁结”正是这个意思。其他如《快雪时晴帖》“未果为结”、“未近见君,有诸结”(《要录》页161)、“且书至也,得示为慰,云小大多患,忧念劳心,迟见足下,未果为结”(《要录》页172)、“念驰情,未异果为结”(《要录》页181)等,皆为此意。

【第5行】狐:旧录一作“独”。楼兰文书多处见到令狐氏,如令狐兴(林52)和令狐承(林538)等等。令狐羣者始见于该件文书。

【第6行】正尔:旧录一作“近尔”,旧录二同。“近尔”一词颇不可解,笔者尚未在魏晋隋唐文献中发现这种表达方式。相反,“正尔”一词却较常见,作“恰好”、“正在”解。例如:《三国志》卷六十四《吴书·孙綝传》裴注引《江表传》:“作版诏敕綝所领皆解散,不得举手,正尔自得之。”[15]《世说新语》卷下之上《容止第十四》“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条引《嵇康别传》:“康长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北史》卷十三《后妃传上·魏献明皇后贺氏》:“后乘车避贼而南,中路失辖,乃仰天曰:‘国家胤胄岂正尔绝灭也! 惟神灵扶助。’遂驰,轮正不倾。”[16]《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责躬悔过,明君之义,诸君何故从此小人作不义之事! 殿内武旅正尔相寻,目前之危,悔将无及。”[17]因此我们认为,无论从字迹或从用法而言,这里释作“正尔”较妥。

违离宦省:旧录一作“连离官”,殊不可解。我们认为旧录二作“违离宦省”是正确的。

按《说文》:"违,离也。""违离"意指离开,不在一处。文献中这种表达所在多有。晋帖之例如,"五月二十七日州民王羲之死罪、死罪,此夏复便半……惟违离,众情兼至,时增伤悼。"(《要录》页186),史籍中,如《魏书》卷八十三《外戚上·杜超传附杜凤皇传》:"世祖追思超不已,欲以凤皇为定州刺史,凤皇不愿违离阙庭,乃止"。[18]《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温上疏曰:'……臣违离宫省二十余载,鞸鞯革戎务,役勤思苦,若得解带逍遥,鸣玉阙廷,参赞无为之契,豫闻曲成之化,虽实不敏,岂不是愿!"[19]同书卷一百二十九《沮渠蒙逊载记》:"(张)潜劝蒙逊东迁。(沮渠)挐私于蒙逊曰:'吕氏犹存,姑臧未拔,硕德粮竭将还,不能久也。何故违离桑梓,受制于人!'"[20]《魏书》卷六十四《张彝传》载张彝表称:"未几,改牧秦蕃,违离阙下,继以谴疾相缠,宁丁八岁。"[21]《隋书》卷五十九《杨昭传》:"高宜尝谓曰:'当为尔娶妇。'昭应声而泣。高祖问其故,对曰:'汉王未婚时,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妇,便则出外。惧将违离,是以啼耳。'"[22]《隋书》卷五十七《薛道衡传》:"上不欲道衡久知机密,因出检校襄州总管。道衡久蒙驱策,一旦违离,不胜悲恋,言之哽咽。"[23]《隋书》卷五十《郭荣传》:"九年,帝至东都,谓荣曰:'公年德渐高,不宜久涉行阵,当与公一郡,任所选也。'荣不愿违离,顿首陈让,辞情哀苦,有感帝心,于是拜为右候卫大将军。"[24]《北史》卷十六《太武五王·临淮王谭附元彧传》:"彧性至孝,自经违离,不进酒肉,憔悴容貌,见者伤之。"[25]同书卷五十七《宇文护传》:"区宇分崩,遭遇灾祸,违离膝下,叁十五年。"[26]由上引各例可知,"违离"一词在中古时代是常用词。其中《魏书·杜凤皇传》"违离阙庭"、《晋书·桓温传》"违离宫省"、《魏书·张彝传》"违离阙下"三例,和"违离宦省"的意思最为接近,因此我们认为旧录二是录文可从。

宦省:旧录二注引《艺文类聚》卷五十九曹植《东征赋》"余典禁兵,卫宦省"为例证。《东征赋》中,"宦省"一词似指宫省。而《唐会要》卷六十五《内侍省》引魏征语"宦省之徒,古来难近","宦省"则指宦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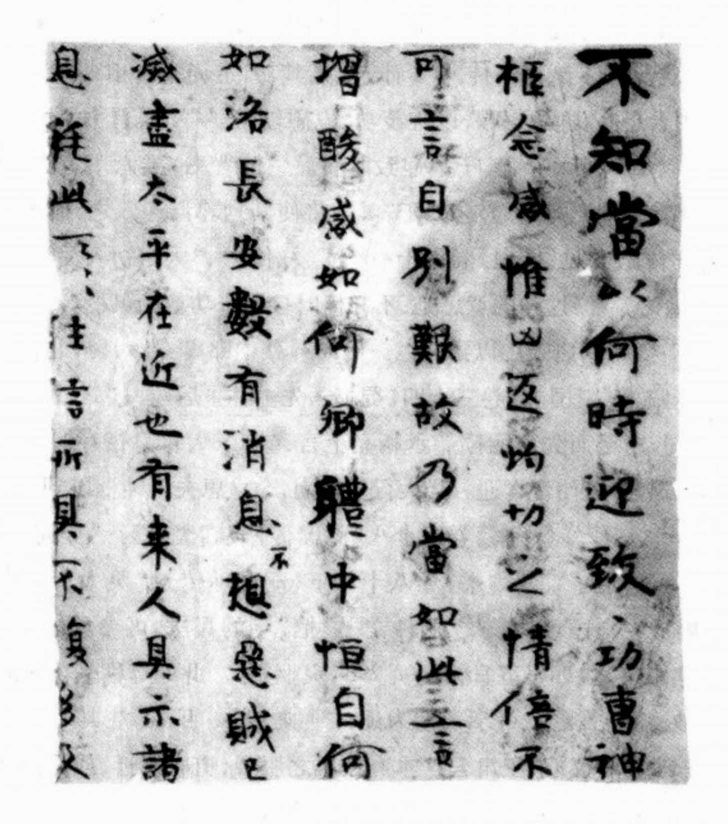
【第7行】反侧:意指不安。如《三国志》卷六十四《吴书·诸葛恪传》:"恪乃著论谕众意曰:'……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夙夜反侧,所虑如此,故聊疏愚言,以达二三君子之末。'"[27]又如"旦极寒,得示,承夫人复小欬,不善得眠,助反侧,想小尔"(《要录》页168)。文书这里的意思是,因为远离朝廷,所以心中常不自安。

无所有:冨谷释为"无□有"。其中,"一"、"无"两字的笔画连在一起,而"无"字后当为"所"字。

【第8—9行】这两行草书中的"昨"字,估计是令狐晕书写"时"字的草书时写错了字,误写成"昨"字的草体。第8—9行,重复书写第6—7两行文字(其中字有脱讹),第8—9行草

书“昨”字恰恰对应第6－7两行的“时”字。可知令狐辈是当成“时”字来写的。旧录把误写的“昨”字径直释作“时”，没有意识到令狐辈写了错别字。

宦：旧录一作“官”。据文书第6行当读“宦”。



张超济信稿：淡黄色纸，
宽19.1厘米，高22.7厘米，楷书。

录文

1　不知當以何時迎致・功曹神
2　柩。念感。惟凶返，灼切之情，倍不
3　可言。自別艱故，乃當如此！言
4　增酸感。如何！卿體中恒自何
5　如？洛、長安數有消息。[不]想惡賊已
6　滅盡，太平在近也。有來人具示諸

7 息秏,此一＝＝往信所具,不復多及。

注释

【第1行】迎致:"致"字下有一墨点。"迎致"与迎接、迎请意思相近。史书屡见不鲜。例如:《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其母后归,以状白帝,于是使迎致诸子。"[28]《三国志》卷六十九《吴书・诸葛恪传》:"(孙)权嘉其功,遣尚书仆射薛综劳军。综先移恪等曰:'……故遣中台近官,迎致犒赐,以旌茂功,以慰劬劳。'"[29]《晋书》卷五十八《周访传附周琥传》:"琥竟以病卒于太原,其子兴迎致其丧。"[30]《晋书》卷六十三《李矩传》:"时刘琨所假河内太守郭默为刘元海所逼,乞归于矩,矩将使其甥郭诵迎致之,而不敢进。"[31]《周书》卷二十《贺兰祥传》(并见《北史》卷六十一《贺兰祥传》):"太祖初入关,祥与晋公护俱在晋阳,后乃遣使迎致之。"[32]这句的意思是:不知何时接回张功曹的灵柩。

【第2行】神柩:魏晋隋唐人用以指灵柩。例如:《蔡中郎集》卷六《济北相崔君夫人诔》:"既殡神柩,薄言于归。"《三国志》卷三十四《蜀书・先主甘皇后传》:"章武二年(222),追谥皇思夫人,迁葬于蜀,未至而先主殂陨。丞相亮上言:'……大行皇帝存时,笃义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远飘飖,特遣使者奉迎。会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以到,又梓宫在道,园陵将成,安厝有期。……'"[33]《晋书》卷四十八《阎缵传》载阎缵疏云:"今迎太子神柩,孤魂独行,太孙幼沖,不可涉道。"[34]《魏书》卷八十三下《胡国珍传》:"灵太后迎太上君神柩还第,与国珍俱葬,赠襚一与国珍同。"[35]这件文书"柩"字的写法,可参见《阁帖》页77钟繇《得长风帖》、页63王羲之《四月五日帖》、页293《灵柩帖》。此处尊称张功曹的灵柩。

【第3行】艰故:意指丧亡。可举数例为证:《通典》卷一百二《礼典六十二・沿革六十二・凶礼二十四・改丧服议》引王肃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道有远近,或有艰故,既葬而除,不得待有三月之限。"同书又引范宣曰:"礼云一时,时逾思变,故取节焉。若道远艰故,不得时毕,则犹礼云久丧不葬,主丧者不除,可待葬讫而除。"《魏书》卷一百五之三《天象志一之三第三》:"既而晋太后李氏殂,桓玄擅命江南,仍有艰故云。"[36]《南史》卷六十九《虞荔传附虞寄传》载虞寄与陈宝应书称:"东山居士虞寄致书于明将军使君节下:寄流离艰故,飘寓贵乡,将军待以上宾之礼,申以国士之眷,意气所感,何日忘之。"[37]虞寄在侯景乱后到闽。按《虞荔传》:"初荔母随荔入台,卒于台内,寻而城陷,情礼不申,由是终身蔬食布衣,不听音乐。"[38]虞寄书中所称"流离艰故"当是指这段往事而言。可知"艰故"意指丧亡。

倍不可言:更不可说。

乃当如此:意思是"竟致如此地步"。

【第4行】言增酸感:这句大意是"提到这件事,更增加心中的悲伤"。传世晋帖多见类似表达。如,王羲之《频有哀祸帖》:"频有哀祸,悲摧切割,不能自胜,奈何奈何!省慰增

感。"《平安帖》:"此粗平安,修载来十余日,诸人近集,存想明日当复悉来,无由同增慨。""玄度先乃可耳……省君书增酸悲,大分自不可移,时至不可以智力救,如此"(《要录》页157);"若可得耳,要当须吾自南,但增感塞"(《要录》页161);"日月如驰,一娙弃背再周,去月穆松大祥,奉瞻廓然,永惟悲摧,情如切割。汝亦增慕。省疏酸感"(《要录》页162);"痛念玄度,立如志而更速祸,可惋可痛者。省君书,亦增酸"(《要录》页163)。据上引晋帖诸例来看,似乎言及"增酸"之类的,都与凶丧事有关。这件文书的情况也不例外。

体中:犹言身体、体内。魏晋时期,凡言及身体状况时常用"体中"一词。例如:《要录》页160:"七日告期……但昨来念玄度,体中便不堪之耶。""体中恒自何如",乃是问收信对方身体近来如何,此乃当时常用之书信问候语。《齐民要术》卷七《笨麴并酒第六十六》引《博物志》胡椒酒法:"若病酒,若觉体中不调,饮之,能者四五升,不能者可二叁升从意。"[39]《三国志》卷二十九《魏书·方伎·管辂传》裴松之注引《管辂别传》:"(孔曜)于是遂至冀州见裴使君。使君言:'君颜色何以消减故邪?'孔曜言:'体中无药石之疾,然见清河郡内有一骐骥,拘絷后厩历年,去王良、伯乐百八十里,不得骋天骨,起风尘,以此憔悴耳。'"[40]《晋书》卷七十五《王湛传》:"(王)济尝诣湛,见床头有《周易》,问曰:'叔父何用此为?'湛曰:'体中不佳时,脱复看耳。'"[41]以上诸例之"体中"指"体内"均较明白。至于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上之下《文学第四》"或问顾长康"条载:"宋明帝《文章志》曰:"桓温云:'顾长康体中痴黠各半,合而论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绝,画绝、文绝、痴绝。"[42]其中的"体中"一词意义已有所引申。

恒自:意即经常。例如,《南齐书》卷二十五《垣崇祖传》:"上谓朝臣曰:'崇祖许为我制虏,果如其言。其恒自拟韩、白,今真其人也。'"[43]《周书》卷二十二《柳庆传》:"有贾人持金二十斤,诣京师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执管钥。无何,缄闭不异而失之。谓主人所窃,郡县讯问,主人遂自诬服。庆闻而叹之,乃召问贾人曰:'卿钥恒置何处?'对曰:'恒自带之。'"[44]《周书》卷三十七《裴文举传》:"(宇文)宪矜其贫窭,每欲资给之。文举恒自谦逊,辞多受少。"[45]文书这句是询问对方近来身体如何。

【第5行】洛:洛阳之省称。

恶贼:指刘渊、王弥之流,详见后文讨论。

【第6行】具示:意为详细告知。例如《宋书》卷二《武帝纪中》载刘裕与韩延之书有云:"吾处怀期物,自有由来。今在近路,正是诸人归身之日。若大军登道,交锋接刃,兰艾吾诚不分。故具示意,并示同怀诸人。"[46]比照"并示同怀诸人"一句,其中"具示"之意更加明白。

【第7行】息秏:旧录作"息耗",此据原文书图版改录。所谓"息秏"也作"息耗",原意

是消长，先转为善恶之意，再转为消息之意。《韩非子》卷六《解老》："治乡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科适观息耗则万不失一。"《淮南子》卷一《原道训》："天下之物，莫柔弱于水，然而大不可极，深不可测，修极于无穷，远沦于无涯，息耗减益，通于不訾……"《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载董仲舒对策称："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颜师古注："息，生也；耗，虚也。耗，音呼到反。"[47]这三例里"息耗"的意思是消长。王先谦《集解》："惠栋曰：《仓颉篇》'耗，消也'，董仲舒《对策》云'察天下息耗'，师古注'息，生也；耗，虚也'。《韩非子》'适观息耗，万不失一'，《淮南子》'息耗减益，通于不訾'，义并同。"[48]《后汉书》卷十上《章德皇后传》："家既废坏，数呼相工问息耗，见后者皆言当大尊贵，非臣妾容貌。"唐李贤注："薛氏《韩诗章句》曰：'耗，恶也。'息耗，犹言善恶也。"而后，息耗引申为消息、情况之意。如，《晋书》卷八十八《颜含传》："含二亲既终，两兄继没，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课励家人，尽心奉养，每日自尝省药馔，察问息耗，必簪屦束带。"[49]《魏书》卷五十《尉元传》载尉元表云："然彭城、下邳信命未断，而此城之人，元居贼界，心尚恋土。辄相诳惑，希幸非望，南来息耗，壅塞不达，虽至穷迫，仍不肯降。"[50]同书卷六十三《王肃传》："肃还京师，世宗临东堂引见劳之，又问：'江左有何息耗?'"此件文书"息耗"一词当作消息解。这句话大意是：有人来详细地告诉了这些消息。耗，又通眊。《荀子集解》卷二《修身篇》："少而理曰治，多而乱曰耗。"王先谦集解引王念孙说："眊与耗，古同声而通用。"[51]

此一＝＝往信所具："一"字和后面的双字重叠符，旧录都没有释录。"信"字仅存右半，旧录二也没有释录。旧录一将此句录作"息耗此所ㄗ往信所具"。

多及：指多言。意思相近的例子，如《南齐书》卷二十二《豫章文献王传》载永明二年(484)齐武帝萧赜答萧嶷书曰："凡诸普敕，此意可寻，当不关汝一人也。宜有敕事，吾亦必道，顷见汝自更委悉，书不欲多及。屋事慎勿彊厝此意，白泽亦当不解何意尔。"[52]在有些文献中，"多及"一词的含义虽与此相同，但是语气略有区别。例如：《魏书》卷二十一下《献文六王传下·彭城王传》："高祖大笑，执勰手曰：'二曹才名相忌，吾与汝以道德相亲，缘此而言，无惭前烈。汝但克己复礼，更何多及。'"[53]这句的意思是：这些我在以前的信里都已经提到过，就不再多说了。

录文

1 忠惶恐死罪。所致即付之，入

2 其人致少勿（物），不知是何等勿（物）也，成（盛）在革囊中，付廣。

3 城校，至外田，不在須還。當往與

4 到取之。囊撻（縫）上，墨□黑記爲信。

忠与马从郎君牋：淡黄色纸，宽 11.7 厘米，高 22.5 厘米。章草。

5　相見，值信複白，忠惶恐死罪，死罪。

6　所啓馬從＝郎君所宜。

注释

【第 1 行】致：送来。《说文》："致，送诣也。"

【第 2 行】等：旧录一作"方"。

广：旧录一作"庶"，旧录二作"厉"。

成在革囊中:“成”通“盛”。按《要录》页157:“青李、来禽、樱桃、日给藤子皆囊盛为佳,函封多不生。”这里的“盛”字与新刊文书用法相同,类似的用法可参见林211号文书。“在”字,旧录二漏录。

【第3行】校:从上下文看,该字似为“郊”的通假字。

往:旧录一作“住”,旧录二未释。“与”,旧录一作“互”。按这行最后三字与下行前两字连读作“当往与相见”。

【第4行】到:旧录一作“致”。

摓:通“缝”。

墨□黑记为信:“墨”下一字,疑为忠某的画押记号。旧录一作“墨□黑故为信”,旧录一作“墨书黑记为信”。

录文

1 故吏太守從[事] 掾[~~位~~]馬厲死罪白。近日得狀,誠受

2 教敕。會當遠離,虔恪不備。昨日至府爲曹所

3 處,坐前道路遇賊,不來治郡,更道東縣,·爲解言

4 當行。問一百匹,職二等,署從事掾。絕休二更,伏自

5 忖省,~~抵宦~~單持獨立,世朝无援,被蒙天恩,顯擢道府,孤

6 負偏施,如集危木,大恩緒坐若~~日日~~有緣,白

7 事治府,乞蒙[见] 垂及。謹以陳聞。死罪 = = 。

8 □□□□□□□□□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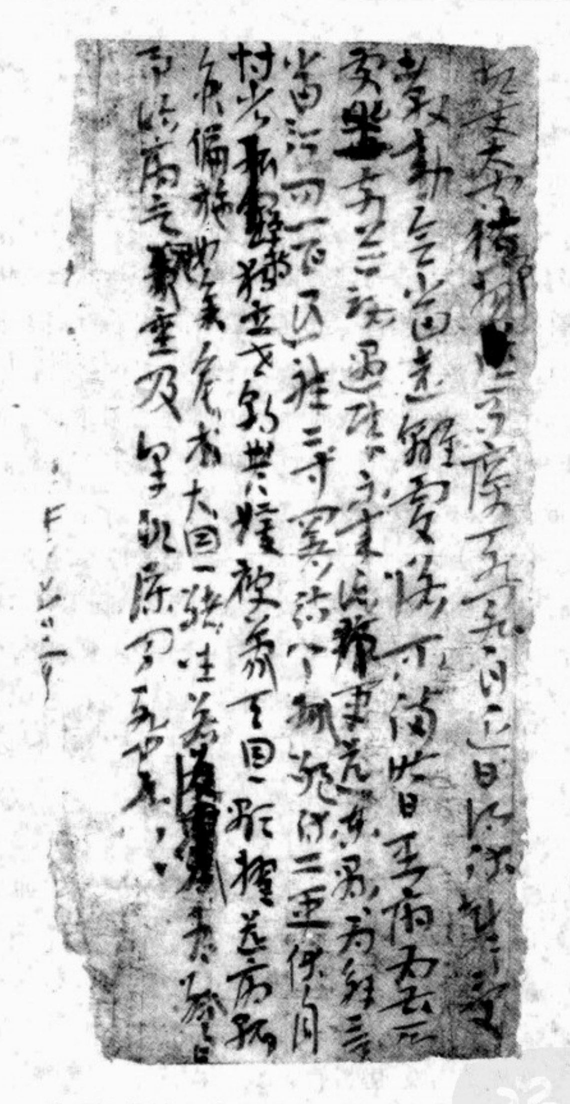
【第1行】故吏太守从事掾:太守当是敦煌太守。太守从事掾为马厉前职。“从事掾”:旧录一作“侍郎杨”,旧录二作“侍卿□”。“从事掾”一词亦见本文书第4行。在楼兰文书中,马厉称“从事马君”(林56)或“从掾位马厉”,而“从事掾马厉”在其他文书中似乎尚未出现过。“掾”字后面尚有一字,但是写后又被涂掉,看不太清楚,似为“位”字,旧录未释。关于从掾位,王国维《屯戍丛残考释》有详细解说,不赘述[54]。

状:旧录一作“伏”。

诚:旧录一作“奉”。按“诚受”二字写法参见林199号简。

【第2行】会:旧录一作“令”。

虔恪不备:旧录一作“处慉可满”,不可解。按当作“虔恪不备”,即谦言自己不够逊敬。虔恪一词,史书多见,如《扬子云集》卷六《元后诔》:“允恭虔恪。”蔡邕《蔡中郎集》卷一《朱公叔鼎铭》:“制诏尚书朱穆:立节忠亮,世笃尔行;虔恪机任,守死善道。”《旧唐书》卷一二



马厉致敦煌太守牋稿：土色纸，宽10.4厘米，高22.6厘米。草书。

○《郭子仪传附郭鏦传》："鏦恭逊虔恪，不以富贵骄人，士无贤不肖，接之以礼，由是中外称之。"这一句的大意是：近日得到您的来函，恰逢我要远行，因此礼数不够周全。

曹：旧录一作"去"，旧录二作"甚"。按此字实为草书写法的"曹"字，参见传《松江本急就章》第4节"曹富贵"一句"曹"字的写法[55]。

【第3行】此行旧录一作"处坐前慈诸遇奉示来陈郡更□东县为解晋"。其中"处"，旧录

二释为“虔”。

道路遇贼：旧录二释为“善诺遇诚”，不可解。

不来治郡：旧录二作“不来郡”。

更：旧录二释为“吏”。

解言：旧录二释为“辞言”。

【第4行】旧录一释作：“当河问一百退□二寸署待令孤绝沐二更伏自”；旧录二释作：“当行□一百□□二等□待卿掾孤绝休二吏伏自。”“职”字，旧录均未释出，关于该字的草书写法，可以参看传智永《真草千字文》及唐怀素《小草千字文》中“摄职从政”一句“职”字的写法。虽然录文如此，但由于学识所限，我们对该句的意思还有不能完全理解的地方。

【第5行】旧录一释作：“恃省　单持独安□朝□媛被蒙天目一离擢□府孤。”旧录二释作：“忖省孤塞持独立世朝无媛被义天恩显擢道府孤。”

【第6行】旧录一释作：“□偏施如集危省大同一绪坐若护　有孙ㄗ忘。”旧录二释作：“疾偏施□矣危有大恩绪坐若□□为掾白。”“大恩”以下一句，原文书不易辨认，我们无法完全释读，暂时录文如此，留待将来进一步研究。这句的大意是：我心想，自己孤立无援，幸受大恩，被提拔到郡守府工作。我辜负了您的恩情，就好比站在危枝之上，心中忐忑难安。

【第7行】旧录一释作：“事诸病气见重及□□澡门死罪ㄗㄗ。”旧录二释作：“事诣府今□重及谨以厉闻死罪死罪。”均不可解。

“乞见垂及”，意思是：请您体察我的区区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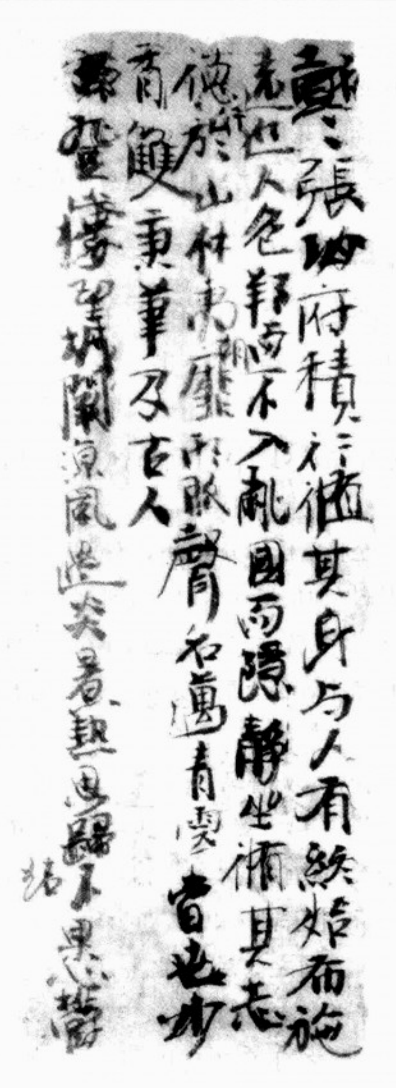
“谨以陈闻”：《文选》卷四十阮嗣宗《为郑冲劝晋王牋》末云：“冲等不通大体，敢以陈闻。”与本文书“谨以陈闻”相类。

录文

1　郁郁张功府，积行修其身；与人有终始，布施
2　远近人。危邦而不入，乱国而隐[居]；静坐修其志，
3　德行于山林。夷胡靡形服，声名迈青云；当世尠
4　有双，秉笔及古人。
5　即登此楼，望城阙，凉风过，炎暑热，思归不果心郁
6　　　　　　　　　　　　　　　　　　　结。

注释

【第1行】修：旧录一作修，旧录二作“随”，疑不确。此句典出《大学》“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



诗文残纸(No. 5):茶色纸,宽 7. 1 厘米,高 25. 5 厘米。行草。

国治而后天下平”。

【第 2 行】危邦而不入,乱国而隐[居]:按此句典出《论语 · 泰伯》:“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邦不入,乱邦不居。”从文句结构看,“隐”字后显然有脱漏,可据前引《论语 · 泰伯》补入“居”字。

【第3行】夷胡靡形服：胡，补在“夷”字旁，旧录一此句作“夷朝靡所服”。

尠：即“鲜”的异体字，旧录一作“吵”，旧录二释为“少”。

【第4行】秉笔：即执笔。如，《乐府诗集》卷三十一唐李益《从军有苦乐行》：“一旦承嘉惠，轻命重恩光。秉笔参帷帟，从军至朔方。”此句意思是称颂张公府下笔能写好文章，不让古人。

【第5行】即：旧录二未释。

不结果心郁：“结”字补在“不”字旁。果，旧录一将“果心”合录为一字。“结”参前文注释。此句意思是：想回乡却不能够，心中郁郁不平。

二　《急就章》残片与《令狐晕信稿》的定名

这件文书两面有字，冨谷至将信稿部分编为文书A－1，《急就章》一面编号为A－2。据图版，《急就章》部分前半部残缺，而信稿一面内容完整。可知是裁取写有《急就章》的字纸。依据两件文书的书写先后顺序，《急就章》当系正面，定名为《急就章》残片；信稿一面则为背面，定名《令狐晕信稿》。正面楷书还留有隶书余绪。背面前五行为行楷，后四行为草书，但是颇有章草的意味。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小学家类著录“《急就章》一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传世《急就章》凡三十二节，每节六十三字。《急就章》残片所书是第六节的文字。按照宋晁公武的说法，“《急就章》杂记姓名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谓字之难知者缓急可就而求焉[56]”。所以历来有“汉魏以后，童子皆读史游《急就篇》”之说[57]。西晋夏侯湛《抵疑》略云：“今天子以茂德临天下，……乡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讽《急就》、习甲子者，皆奋笔扬文，议制论道。”[58]《北齐书》卷二十九《李绘传》：“绘，字敬文。年六岁，便自愿入学，家人偶以年俗忌，约而弗许。伺其伯姊笔牍之间，而辄窃用，未几遂通《急就章》。内外异之，以为非常儿也。”而“自唐以下，其学渐微[59]”。唐张怀瓘引用王愔的说法，谓“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隋，渐以行之”。张怀瓘也说：“此乃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俗急就，因草创之义，谓之草书[60]”。他还进一步说明，这种书体只适用于“君长告臣下”的文书。因此，至少唐人眼里，史游作《急就章》所用书体是章草。

既然《急就章》为童蒙之用，又可备缓急之用，原来通用本应是西汉通行书体——隶书。至于魏晋以后用作儿童习字的《急就章》，则应为楷书。而历代书法家写《急就章》所用不同字体，宜当别论。

旧刊楼兰文书中林334亦为《急就章》残片，抄自第一节部分文字[61]。这件残纸是斯坦

因在楼兰 LA. II. x. 号遗址发现的。楼兰所出《急就章》残纸表明，当地与中原教学取径并无二致。

值得注意的是，一般通行本《急就章》的第六节文字为“褚回池，兰伟房，减罢军，桥窦阳，原辅福，宣弃奴，殷满息，充申屠，夏修侠，公孙都，慈仁他，郭破胡，虞荀偃，宪义渠，蔡游威，左地余，谭平定，孟伯徐，葛咸轲，敦锜苏，耿潘扈”。这件文书却有两处不同，一是将“原辅福”写作“始辅福”，二是将“虞荀偃”写作“虞尊偃”。为何有此不同，我们尚不明原因，也许是传本不同，也许是书写讹误。

三 《张超济信稿》的作者与年代

我们认为，这个信稿的作者就是楼兰文书中频繁出现的“张超济”，建议定名为《张超济信稿》。

楼兰文书中有一些文书涉及张超济、超济、济、张济逞或济逞。它们不仅字迹相似，而且内容相关。日本学者小山满认为张超济、张济逞和“济”之书信，为同一个所写[62]。郭锋在整理斯坦因第三次考察未刊楼兰文书时，也遇到类似情况。他认为“文书中的‘超’、‘济’，在斯文赫定文书中也屡有所见，是一个名叫张济的人的不同简称，有时也称为‘张济’[63]”。孟凡人注意到，在楼兰文书中，凡提到“超济”、“张超济”，或“济逞”、“张济逞”的，都是纸文书，书体相同。甚至字句重叠和倒书手法也一致，而且事件相连，所以他主张“张超济、张济逞实为一人，“济”是其简称，为同人异名而已[64]。这些文书中倒书或重叠，其实是因为这些纸文书原件皆为草稿，弃置后用来练字，以致形成今天这个样子。据我们研究，与上述人名相关的楼兰文书可分四组：

第一组：4 件，林 128、188、183 号、郭 128 号文书。这组文书提及的人名都是一个字“济”。

第二组：4 件，林 179、35、172 号、郭 134 号文书。这组文书的人名是“超济”或“张超济”，这两个人名所指无疑是同一个人。其中郭 134 号文书较为特殊，详见后文。

第三组：5 件，林 42、34、106、184 号文书。这组文书的人名是“济逞”或“张济逞”，这明显也是同一人。林 106 号文书：“////[济]逞言洛////”，原来各家均未录第一个字，查图版，可知当为“济”字。

第四组：14 件，分别是林 80、46、47、48、49、82、83、658(《西域考古图谱》8 号文书)号文书，郭 127、131、132、133、137、138 号文书。这组文书过于残损，没有留下人名，但是从字迹和内容判断，当与张超济文书相关。郭峰书中刊布的几件文书，已指明与张超济有关。林

80号文书是以前没有注意的一件与张超济文书字迹相似的残片。

楼兰文书尚未全部刊布，已刊部分还有一部分无图版。估计还会有一些相关文书有待日后辨识。我们倾向于四组文书为同一人所书。对此，我们还可从另一个角度略作补充。郭134为褐白纸，正、背两面都有文字，行书。其背面文字读作："1　////舍人如常皆有////2　////已付足////3　////超府白卿所云////。"此外，该文书与林184、林35号文书也有关。林184号内容如下：

【正面】 1　此月十三日发郡奉姑臧十三日告
2　云得世龙故月九日书夫人湌食如
3　常以为欣慰烧奴日□□南昌兄
4　弟甚大小平安临来养错□不
5　得书疏此月九日发发发发发发
6　顷来多事故不复不复悉发

【背面】 1　张济逞□□□还□□□□□□□
2　无□复□□□□□□□□事
3　舍人功甚已达主□□□南州告悉
4　如常也烧奴□□□此月十四日发
5　郡奉姑臧十三日郡内□□□平安
6　□□□□故月九日书＝夫人湌食康□
7　酒泉□□万福烧奴□□□南昌兄
8　////□□康

林35号文书内容如下：

1　超济白超等在远弟妹及
2　儿女在家不能自偕乃有衣食
3　之乏今启家指南州彼典计王
4　黑许取五百斛谷给足食用愿
5　约勅黑使时付与伏想笃恤无
6　念当不须多白超济白

研究者一般将郭134号文书背面第3行人名读作"超府"。其实，正确的读法应是"超"，林35号文书中张超济就自称"超"。这三件文书都涉及其家人指南州从典计处取得食用物资之事。林35号内容是事先写信属托他人约勅典计王黑，让他务必按时付与，而郭134号文书则言"已付足"。由此可知，这两件文书不仅内容相关，而且郭134号书写时间当

在林35号之后。郭134号背1行"////舍人如常皆有////",而林184号背3行则称"舍人功甚已达主□□□南州告悉"。林35号第3行"今启家恉南州",又与上引林184号背3行"南州告悉"内容相应。可见林35、184号和郭134号三件文书,皆出自张超济之手。《张超济信稿》多处与上列四组文书相关,如第5—7行为:"5 如? 洛、长安数有消息,不想恶贼已/6 灭尽,太平在近也。有来人具示诸/7 息秏,此一==往信所具,不复多及。"其中"息秏"一词的使用,恰与林188号文书相同。林188号文书正面1—2行读作:"1 济言即日东西未更有问此耕/2 种息秏弘举一=故不繁启济言。"文中提到的洛阳、长安发生之事,并见林172和106号文书。林172号文书第3—6行读作:"3 超济…数得洛长[安]////4 息云何乎///□更念闻////5 王弥刘渊等灭尽////6 极想此辈。"而林106号文书甚残,可复原作:"////[济]逞言洛[长安]////。"

冨谷至注意到大谷收集品中楼兰文书残片有"///平在近///"(《西域考古图谱》8号文书),所以他将此句复原作"太平在近"。其说甚是。由此可证,这件新刊楼兰文书亦出自张超济之手。第一组文书中的"济",必为"张超济"无疑。至于同一人为何使三种不同署名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林128号中"羌虎"和"烧奴",再次出现于郭137和林184号文书中。羌虎之"虎",旧释"帝"或"帝",而实际应是章草的"虎"字。例如:《松江本急就章》第十四节"系臂琅玕虎魄龙"一句中"虎"字就采用这种写法。

目前学界对张超济文书的年代有不同看法。对林172号文书,郭锋认为"刘渊起兵反晋,史载在晋永兴元年(304),永嘉四年(310)病死。王弥为石勒所杀是在永嘉五年(311),则此信件写于刘渊、王弥未死('无尽')以前,当在公元304—310年之间,时中原已乱,张超济流露出担忧的情绪[65]"。孟凡人认为写于329年刘曜死后不久,并提出林35号文书写于323—324年[66]。他还提出张超济在楼兰的活动年代的上限应在王弥死前的310年,因为楼兰前凉纪年简牍上限就在这一年,而活动的下限年代则在公元330年前后。主要理由是刘曜死于329年,而楼兰前凉纪年简牍的下限在330年。所以他提出林35号、172号文书的年代在310至323/324间的某一年[67]。事实上,林172原文应读作"王弥刘渊等灭尽",而非"无尽"[68]。考虑到出土纪年简牍毕竟有限,不一定完全涵盖张超济在楼兰的活动时间。所以这件文书的年代有必要重新讨论。

史载永嘉五年(311)六月,刘曜、王弥等攻入洛阳。八月,兵入长安。十月,石勒杀王弥。林172号文书与新刊《张超济信稿》,或云"王弥刘渊等灭尽",或云"不想恶贼已灭尽,太平在近",可知时间一定是在永嘉五年(311)之后。永嘉六年三月,张轨檄关中,共尊辅秦王司马业。在楼兰的张超济对此应当会有耳闻。此时,洛阳与长安都还在汉兵控制之下。

而张超济的消息又得自洛阳长安，因此文书不可能写于永嘉六年三月以前。永嘉六年(312)四月，贾疋等迎秦王司马业至长安。刘曜虽多次进逼，但长安始终控制在晋愍帝一方手中。永嘉七年(313)正月，汉主刘聪杀晋怀帝。四月，晋愍帝司马业在长安即位，改元建兴。此后凉州张氏直至东晋还使用建兴这个年号[69]。此时算是长安情况相对较好的时候。建兴二年(314年)二月，晋封张轨为太尉、凉州牧，封西平郡公。五月，张轨死，张寔代立。十月，晋以张寔为都督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西平公。建兴三年(315)九月，刘曜拔冯翊，转寇上郡。长安以西不复贡奉朝廷。建兴四年(316)四月，张寔遣兵入援长安，且送诸郡贡计。诏拜张寔都督陕西诸军事，以张茂为秦州刺史。八月，刘曜逼长安。九月刘曜攻长安，张寔叔父张肃请击刘曜。张寔没有同意[70]。这些事情，张超济在楼兰当也有耳闻。十一月刘曜入长安，晋愍帝出降，西晋灭亡。建兴五年(317)三月，司马睿即晋王位于建康[71]。

据上述永嘉、建兴年间发生的史事，可知文书年代不会晚于建兴四年九月。所以林172号与No.2号文书的年代当在永嘉七年(313)四月与建兴四年(316)九月之间。《张超济信稿》"太平在近"当指司马业入长安称帝后的时局。所以与此相关的几件文书应写于313年下半年间。

四 《忠与马从郎君牋》的定名

蔡邕《独断》卷上说："凡群臣之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独断》还提到表的格式是"表者不需头。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诚惶诚恐，稽首顿首，死罪死罪"[72]。这件文书的格式，前用"惶恐死罪"，后用"惶恐死罪死罪"，虽然与《独断》所言表一类的文书颇为接近，但实际上并非表文。因为上书的对象并非天子，而是"马从＝郎君"。所以它应属于牋之类的文书。梁刘勰《文心雕龙》卷五《书记第二十五》云："战国以前，君臣同书；秦汉立仪，始有表奏；王公国内，亦称奏书。张敞奏书于膠后，其义美矣。迄至后汉，稍有名品，公府奏记，而郡将奏牋。记之言志，进己志也。牋者，表也，表识其情也。"又"原牋记之式，既上窥乎表，亦下睨乎书，使敬而不慑，简而无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书响，盖牋记之分也[73]"。可见行之于公府的牋与表有十分相近的地方，但是对象却有很大的不同。表是呈给皇帝的，而牋、启却是"于其长亦为之，非公文所施[74]"。《文选》卷四十所载牋的格式形式与表相近，前言"死罪死罪"，后言"死罪死罪"。该文书所致者是"马从郎君"，又不是"公文所施"，因此是牋。故定名为《忠与马从郎君牋》。

我们注意到，出土于LA. II. ii号遗址的林103号文书有"////[忠]始安惶恐////"，而同一遗址出土的林105号文书有"忠惶[恐]////"残句，它们不仅与《忠与马从郎君牋》字迹

相近，而且用语相同，当系同一人所书。那么《忠与马从郎君牋》很可能出土于楼兰 LA. II. ii。

《忠与马从郎君牋》提到的"马从 = 郎君"，也许就是楼兰文书常见的"马厉"。如果这个推测不误，那么该文书时代亦在晋武帝泰始至咸宁时期。详见下文讨论。

五 《马厉致敦煌太守牋稿》的定名与年代

从人名、字迹、职官看，此件的作者即楼兰文书中常见的"马厉"。该文书前言"故吏太守从事掾马厉死罪白"，后言"谨以陈闻死罪死罪"，是牋或奏记之类。《文选》卷四十谢玄晖《拜中军记室辞隋王牋》前称："故吏文学谢眺死罪死罪"，同卷任彦昇《到大司马记室牋》末云："谨诣厅奉白牋谢闻，昉死罪死罪"；阮籍《为郑沖劝晋王牋》末云"敢以陈闻"。皆与此件相似[75]。知此件可能也是牋。

曹魏、西晋统治西域承东汉旧制，西域长史受敦煌太守统辖[76]。高昌设郡晚至东晋。此文书属西晋时期，因此提到的"太守"应指敦煌郡太守。类似的文书，如林 189 云"泰始五年七月廿六日从掾位张钧言敦煌太守"[77]。我们将此文书定名为《马厉致敦煌太守牋稿》。

马厉在楼兰文书中频繁出现，如某曹马厉（林 501）、主薄马厉（林 350 和 531）、从掾位马厉（林 291 和 296）等。所有这些马厉，显然是同一个人。

旧刊楼兰文书中，除"马厉"或"厉"之外，还有"马君"。孟凡人认为所有这些"马君"都是马厉，甚至连"文泰"也是马厉[78]。侯灿则极力反对[79]。

楼兰文书有马氏的有林 35、39、51、54、55、56、59、67、70、273、291、296、307、308、350、501、532，凡十七件，可分两组：

第一组，未明言马君为何人：林 35、54、55、56、70，共五件。

第二组，明确属于马厉文书：林 39、51、59、67、273、291、296、307、308、350、501、532 等，共十二件。

第一组中的马君是否皆为马厉，目前不能完全确认。

马厉文书中林 291、296 有明确纪年。林 291 为泰始五年（269）十一月五日，林 296 为泰始六年（270）三月十五日。两件中马厉都是楼兰的从掾位。林 501 背面"////六年三月八日"，孔好古推测残缺的年号也是泰始，研究者大多遵从他的看法。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林 501 正面马厉结衔是某曹，职位高于从位掾[80]。如果纪年在泰始六年三月八日，则马厉应还是从掾位，而非"某曹"。泰始前后纪年超过六年的年号有魏齐王曹芳的正始（240—249）、嘉平（249—254）、晋武帝的咸宁（275—280）、太康（280—289）、晋惠帝元康（291—

299)、晋怀帝永嘉(307—313)和晋愍帝建兴(313—318)。其中最有可能是武帝咸宁六年或太康六年。不过究竟在哪一年,我们尚不能确定。不过无论咸宁还是太康,马厉在楼兰的活动时间至少要推后到咸宁六年三月(280)。

《马厉致敦煌太守牋稿》中原称"故吏太守从掾位",可知年代不早于咸宁六年三月。文书第三行云"前道路遇贼,不来治郡,更道东县"云云,我们推想可能与当时河西鲜卑的反侧有关。曹魏时,邓艾以鲜卑降者数万置于雍梁之间,是为河西鲜卑。鲜卑一直是凉州地区不稳定的因素。晋武帝泰始五年二月以雍州陇右五郡及凉州之金城、梁州之阴平置秦州,以胡烈为刺史以镇抚[81]。次年,胡烈与鲜卑秃发树机能战败被杀。《晋书》卷八十六《张轨传》称张轨到官之前,凉州"鲜卑反叛,寇盗从横"[82]。张轨刺凉州在晋惠帝永康二年(301)正月[83]。而凉州地区到了张骏统治的时候(324—326)才比较太平,史称"自轨据凉州,属天下之乱,所在征伐,军无宁岁。至骏,境内渐平"[84]。这件文书与当时西域形势的关系,我们拟另撰专文讨论,此不多赘。

六 新刊文书的出土地点

我们从文书之间的共存关系,来推断这批新刊文书以及斯坦因第三次探险所获楼兰文书的出处。下面是张超济文书、马厉文书出土编号一览表。

	收集者	林编号	郭编号	孔好古编号	沙畹编号	其它编号	斯坦因编号
张超济文书	斯文赫定	34		C.2			LA. II. ii
		35		C.3,1			
		42		C.7			
		46		C.9,1a			
		47		C.9,1.b			
		48		C.9,1.c			
		49		C.9,2			
		80		C.20,2			

	收集者	林编号	郭编号	孔好古编号	沙畹编号	其它编号	斯坦因编号
		82		C.21,1			
		83		C.21,2			
		106		C.22,13			
		128		C.25,1			
		172		C.31,1a			
		179		C.31,6			
		183		C.32,2			
		184		C.33,1			
		188		C.35			
						新刊 No.2	
	大谷探险队	658				西域考古图谱8	
	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		127				
			128				
			131				
			132				
			133				
			134				
			137				
			138				
马厉文书	斯文赫定	39		C.5,2			LA.II.ii
		51		C.10			
		59		C.15,2			
		67		C.18,3			
		103		C.22,10			
		105		C.22,12			
		273		C.84			
		291		C.102			
		296		C.107			
		307		C.118			
		308		C.119			
						新刊 No.4	
	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	350			CH.746		LA.III.i.10
		501			CH.748		LA. VI. ii. 0137
		532			CH.747		LA. VI. ii. 0175

从上表可知,除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的收集品外,张超济文书全出自楼兰 LA. II. ii 号遗址[85]。据前文所论文书之间的关系,可知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张超济文书和《张超济信稿》也出自 LA. II. ii 号遗址。既然目前所见马厉文书皆出自 LA,那么不妨可以推断《马厉致敦煌太守牋稿》亦出自同一地点。冨谷至教授引大谷收集品中林 658 号残片"///平在近///",以为原文当据楼兰新刊文书复原作"太平在近"。这个证据再次说明大谷收集品的楼兰文书出自 LA 城。总之,作为同一批收集品之一的"李柏文书"无疑也出自 LA 城。关于李柏文书出土地点问题,历来争论纷纭,目前还存在分歧,由于涉及内容较多,我们将拟专文另作讨论,在此不做过多枝蔓。

结　语

我们为这五件新刊布的文书重新做了录文和定名,并就其中部分问题做了些简略的讨论。根据上述研究,我们认为文书应该属西晋时期之物,可能都出自于 LA 遗址。而且通过这几件文书,也为确认"李柏文书"出土于 LA 提供了新的证据。

2004 年 1 月 11 日

注　释

〔1〕王国维《屯戍丛残考释》,罗振玉、王国维著《流沙坠简》,中华书局,1993 年版,第 155—157 页。

〔2〕A. Conrady, *Die chinesischen Handschriften und sonstigen Kleinfunde Sven Hedins in Lou-lan*, Stockholm: Generalstabens Litografiska Anstatlt, 1920. 该书刊布了 277 件楼兰文书(36 件/组纸本文书和 121 组/件木简)。沙畹(Edouard Chavannes)整理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所获楼兰文书,刊于《斯坦因在突厥斯坦沙漠发现的汉文文书》(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kestan Oriental. Oxford, 1913)。1917 年沙畹去世后,由马伯乐(Henri Maspero)继续整理,1953 年发表《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eme Expé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 London, 1953),其中包括斯坦因重访楼兰发现的文书。

〔3〕罗森撰,阿拉腾奥其尔译《斯文赫定中亚抄本及刻本收藏品概述》,收入马大正等编《西域考察与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年。

〔4〕福田俊昭《〈ヘデイン文书〉新たに5 片を"发现"》,《书道美术新闻》257,1989 年;福田俊昭《楼兰文書の発見》,《东洋研究》vol. 96,1990 年 9 月,第 43—62 页。斯文赫定为何没有及时公布这几件文书,目前尚不得而知。

〔5〕冨谷至主编《流沙出土の文字資料——楼兰·尼雅文书を中心に》,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 年,第 177—214 页。

〔6〕王国维《简牍检署考》,《王国维遗书》第九册,上海书店,1983 年。

〔7〕新刊文书及两件较完整李柏文书的尺寸如下表所示(晋尺采用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1 晋尺 = 23.04 厘米"的说法):

	宽(长)		高		文书性质	备注
	厘米	晋尺	厘米	晋尺		
西晋文书 A	19.7	0.855	24.0	1.042	正面信稿,背面《急就章》	
西晋文书 B	19.1	0.829	22.7	0.985	书信	左边残损
西晋文书 C	11.7	0.508	22.5	0.977	书信	
西晋文书 D	10.4	0.451	22.6	0.981	书信	左边残损
西晋文书 E	7.1	0.308	25.0	1.085	诗文	右边残损
前凉李柏文书一(538A)	39	1.693	23	0.998	书信	
前凉李柏文书二(538B)	27	1.172	23	0.998	书信	

〔8〕《淳化阁帖》,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肃府本,1999 年版。[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刘石点校,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
〔9〕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5 年。
〔10〕郭锋《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未经马斯伯乐刊布的部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1〕[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北京,1977 年版,中册,第 602 页。
〔12〕[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吴金华点校,岳麓出版社,2002 年版,上册,第 213 页。
〔13〕《三国志》下册,第 634 页。
〔14〕《文选》上册,第 63 页。
〔15〕《文选》,下册,第 958 页。
〔16〕[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二册,第 492 页。
〔17〕[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十册,第 3151 页。
〔18〕《魏书》第五册,第 1815 页。
〔19〕《晋书》第八册,第 2575 页。
〔20〕《晋书》第十册,第 3192—3193 页。
〔21〕《魏书》第四册,第 1431 页。
〔22〕[唐]魏徵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 年版,第五册,第 1435 页。
〔23〕《隋书》第五册,第 1408 页。
〔24〕《隋书》,第五册,第 1320 页。
〔25〕[唐]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二册,第 606—607 页。
〔26〕《北史》第七册,第 2062—2064 页。
〔27〕《三国志》下册,第 949—950 页。
〔28〕[清]王先谦《后汉书补注》下册,中华书局,1984 年版,第 990 页。
〔29〕《三国志》下册,第 947 页。
〔30〕《晋书》第五册,第 1585 页。
〔31〕《晋书》,第六册,第 1707 页。
〔32〕《北史》第七册,第 2180 页。
〔33〕《三国志》下册,第 609 页。
〔34〕《晋书》第五册,第 1355 页。
〔35〕《魏书》第五册,第 1835 页。
〔36〕[唐]令狐德棻《周书》第二册,中华书局,1971 年版,第 336 页;《魏书》第七册,第 2390 页。

〔37〕[唐]李延寿《南史》第六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681—1682页。
〔38〕《南史》,第1680页。
〔39〕[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缪启愉校释,北京:农业出版社,1998年版,第519页。
〔40〕《三国志》上册,第551页。
〔41〕《晋书》第七册,第1959页;汤球《九家旧晋书辑本》臧荣绪《晋书》卷十五《王湛》。
〔42〕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73页。
〔43〕[梁]萧子显《南齐书》第二册,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62页。
〔44〕《周书》第二册,第370页。
〔45〕《周书》第三册,第669页。
〔46〕[梁]沈约《宋书》第一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3页。
〔47〕[清]王先谦《汉书补注》下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6页。
〔48〕《后汉书补注》上册,第156页。
〔49〕《晋书》,第七册,第2286页。
〔50〕《魏书》第三册,第1111页。
〔51〕王先谦《荀子集解》上册,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9月版,第24—25页。
〔52〕[梁]萧子显《南齐书》第二册,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13页。
〔53〕《魏书》第二册,第573页。
〔54〕《流沙坠简》,第115页。
〔55〕《松江本急就章》,上海书店影印,1987年1月版。
〔56〕[宋]晁公武著,孙猛点校《郡斋读书志校证·后志》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49页。
〔57〕[明]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二十一《急就篇》,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760页。
〔58〕《晋书》卷五十五《夏侯湛传》,第五册,第1493页。
〔59〕《日知录集释》卷二十一《急就篇》,第760页。
〔60〕[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七载张怀瓘《书断》卷上《章草》,新世纪万有文库本,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8—119页。
〔61〕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第59—60和第107页。
〔62〕小山满《张济文书の一考察》,《东洋学术研究》11—1,1972年。
〔63〕郭峰《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未经马斯伯乐刊布的部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页。
〔64〕孟凡人《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楼兰文化研究丛书),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第20—21页。
〔65〕郭锋,前揭书,第11页。
〔66〕孟凡人《楼兰新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第246—247页;孟凡人《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第24页。
〔67〕孟凡人《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第24页。
〔68〕文书图版见侯灿编《魏晋残纸书风》(二),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69〕《晋书》卷八十六《张骏传》称:"时骏尽有陇西之地,士马强盛,虽称臣于晋,而不行中兴正朔。"楼兰出土的简牍证明了这一点。楼兰出土所见纪年最晚的有建兴十八年(330)。建兴十八年也即东晋成帝咸和五年。
〔70〕《晋书》卷八十六《张骏传》。
〔71〕本段所述史事主要依据《晋书》、《资治通鉴》相关记载,并参考了唐长孺《高昌郡纪年》,《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7,香港中华科技出版社,1992年,第31—34页。

〔72〕[汉]蔡邕《独断》,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1990 年版,第 4 页。
〔73〕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 456—459 页。
〔74〕《大唐六典》卷一左右司郎中员外郎条注,广池千九郎本,三秦出版社影印,1991 年版,第 19 页。
〔75〕《文选》中册,第 568—570 页。
〔76〕苏治光《东汉后期至北魏对西域的管辖》,《中国史研究》1984 年第 2 期,第 31—38 页;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上编之三《曹魏、西晋与西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 104—120 页。
〔77〕《楼兰尼雅出土文书》,第 50 页。
〔78〕孟凡人《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15—16 页。
〔79〕侯灿《楼兰简纸文书集成》,天地出版社,1999 年,上册,第 179 页。
〔80〕王国维称"从掾位谓品秩之视掾者,犹唐之员外置"(参见《流沙坠简》,第 115 页)。
〔81〕《晋书》卷三《武帝纪》(第一册,第 58 页);同书卷四十七《傅玄传》(第五册,第 1322 页);《资治通鉴》卷七十九晋纪一泰始五年二月纪事,中华书局点校本,1956 年版(精装本第三册,第 2509 页)。
〔82〕《晋书》第七册,第 2221 页。
〔83〕《资治通鉴》卷八十四晋纪六惠帝永宁元年正月条(第 3 册,第 2650 页)。按此年正月犹是永康二年,至四月方改元永宁。
〔84〕《晋书》卷八十六《张轨传附张骏传》(第七册,第 2237 页)。
〔85〕参见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之《文书出土地点编号与著录编号一览表》。

“发郎”勘同与十三世纪前后的欧亚北极地

王 颋

一

检阅有元一代人的文集，见有一段“古怪”的文字。王恽《秋涧集》卷八十一《中堂事记》：“中统二年五月七日，是日，发郎国遣人来献卉服诸物。其使自本土达上都，已踰三年。说其国在回纥极西徼，常昼不夜。野鼠出穴，乃是入夕。人死，众竭诚吁天，间有苏者。蝇蚋悉自木出。妇人颇妍美，男子例碧眼黄发。所经涂有二海，一则踰月，一则期月可度。其船艘大，可载五十百人。其所献醆斝，盖海鸟大卵分而为之，酌以凉醑即温，岂世所谓温凉盏者耶？上嘉其远来，回赐金帛甚渥”[1]。作者的“身份”，《元史》卷一六七《王恽传》：“中统元年，左丞姚枢宣抚东平，辟为详议官。时省部初建，令诸路各上儒吏之能理财者一人，恽以选至京师，上书论时政，与渤海周正并擢为中书省详定官。二年春，转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寻兼中书省左右司都事。”[2]以上文字的“来历”，翔实可信。《秋涧集》卷八十《中堂事记序》：“甫及壮年，弹冠应聘，适际夫风云庆会、千载一遇之时，荷囊载笔，从事其间，以至密迩论思、酬酢吏务。”“况今日就衰谢，百念灰冷，有求田问舍、躬耕种树而已。然觉吾胸中耿耿者尚在，及阅故书，复得当时直省日录，观其与诸贤聚精会神于一堂之上，所以开太平之基，播无疆之休者，班班可见，因略为修饰，题之曰《中堂事记》”[3]。

“发郎”，或以为即“富浪”。《元史》卷一四九《郭侃传》：“戊午（元宪宗八年），旭烈兀命[郭]侃西渡海收富浪。侃喻以祸福。兀都算滩曰：吾昨所梦神人，乃将军也。即来降”[4]。《多桑蒙古史》第4卷第6章引“诺外利书”、《眼历诸国行纪》：“蒙哥皇帝死讯至，旭烈兀乃决定归国，命怯的不花代统西利亚军，法忽鲁丁为阿勒颇（Alepo）长官，伯答剌为大马司（Damascus）长官。”“阿失剌夫命人堕哈马特（Hamat）之子城，然此城之外城未毁，盖有扑买课税人名亦不剌辛者，曾进言于此城长官忽思老沙，谓富浪人近在希申阿克剌德（Hissn-ul-Acrad），设将哈马特城垣堕毁，居民将失其防御之具，并以重赂献，遂免于堕”。“海边之富

浪人,遣使赍赠物至默儿只巴儿忽忒营,以献怯的不花"[5]。张星烺先生于《中西交通资料汇编》第1册第1编《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摘录的相关资料云:"《郭侃传》此节,乃记在叙利亚之欧洲十字军与蒙古人之交涉也。波斯人称欧洲为Farang,富浪即其音译"[6]。于化民先生《佛朗机名号源流考略》一文云:"富浪乃Franks之译音,系蒙古人在征服欧亚大陆时间接闻诸中亚、波斯、阿拉伯人之口者。法兰克人初为日耳曼蛮族部落之一支,原居莱因河下游,于克洛维时形成统一之墨洛温王朝。"[7]

如果"发浪"真的就是"西利亚"、亦今叙利亚西方的"富浪",那么,从陆上来到上都,必然经过"阴山"亦今天山南北的地区。然而,当使者行经的岁月,这片广袤的区域,却在"劫立"的阿里不歌的控制之下。郝经《陵川集》卷三十八《复与宋国丞相论本朝兵乱书》:中统二年,"不意一二惧罪不逞之徒,纠合奴隶间离骨肉,劫立阿里不歌大王,缔起兵端,拒命漠北","夫开平至和林四千余里,彼所据之地,又去和林西北三千余里,在金铁山外。其极北则骨利干等,西南则火石林牙诸回鹘也,乃汉西突厥北偏,地穷荒徼,阴寒少水,草薄土瘠,大抵皆沙石也。其所从之人,惟是西域近左小小部族,为所胁制者。如为必死之寇,并命冲突,不过乎闯瀚海、窥河湟,摇荡遐裔。而波斯外五大食、安息等皆西域强国,与相犬牙,亦足相制"[8]。当时,弃家投奔忽必烈汗的耶律铸的儿子希亮,被拘在由"河西"撤往迤西的军中。危素《危太仆集》卷续二《耶律希亮神道碑》:"中统元年八月,大兵与战,阿蓝答儿、浑都海皆死,其残卒北走,众推哈剌不华为主将。十月,涉雪踰天山,肌肤皴瘃,补敝靴、煮牛鞹,窘苦万端。十二月,卧疾北庭都护府民家。二年三月,至昌八里城。四月至马纳思河,五月,至叶密里城,乃定宗潜邸汤沐之邑。十月,至于火孛。"[9]

根据原文,"发郎国"具有以下"特征":一、方位,"在回纥极西徼"。二、道路,"自本土达上都,已踰三年","所经涂有二海,一则踰月,一则期月可度"。三、居民,"妇人颇妍美,男子例碧眼黄髪"。四、生态,"常昼不夜。野鼠出穴,乃是入夕","蝇蚋悉自木出","其所献醆斝,盖海鸟大卵分而为之"。核以同时代关于"富浪"地区的记载,几乎无一符合。《秋涧集》卷九十四刘郁《西使记》:"西有密乞儿国,国尤富,地产金,人夜视有光处,志之以灰,翼日发之,有大如枣者。至报达六千余里,国西即海,海西有富浪国。妇人衣冠如世所画菩萨状,男子胡服,皆善,寝不去衣,虽夫妇亦异处。有大鸟驼蹄苍色,鼓翅而行,高丈余,食火,其卵如升许。失罗子国出珍珠,其王名换思阿塔卑云,西南海也,采珠盛以革囊,止露两手,腰絙石坠入海,手取蚌并泥沙贮于囊中,遇恶虫以醋噀之即去,既得蚌满囊,撼絙,舟人引出之,往往有死者。""西域之开,始自张骞,其土地、山川固在也。然世代浸远,国号变易,事亦难考。今之所谓瀚海者,即古金山也。印毒,即汉身毒也。曰驼鸟者,即安息所产大鸟爵也。密昔儿,即唐拂菻地也。《新唐书》载拂菻去京师肆万里,在西海上,所产珍异之物与今日地

里正同,盖无疑也。"[10]因此,"发郎"不可能是"拂菻"。

二

"常昼不夜"即"极昼",和其相对应之"极夜",乃是"北极圈"地方才有的现象。就是在北纬六十二度,也不过是"冬夜绵长"。伊·冈察洛夫(И. А. Гончаров)《巴达拉号三桅战舰》(Фрeгам Παмαдα)9《到达伊尔库次克之前》:"我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在零下三十六度的严寒里,离开了雅库次克,冬夜绵长,占了一昼夜的三分之二时间,令人觉得单调乏味。太阳懒懒地升起,抵挂在山颠之间,在那里徘徊三四个小时,不久就复归山后了,留下的是火红的晚霞,让你长时间地等待夜幕重合。"[11]而在北纬七十二度,始有长达三个月的"常夜不昼"。尼·皮涅金《千里冰原》7《正常生活》:"根据计算,太阳最近一次原应在十月三十一日出现,但(新地岛)连日来天空一直被云块遮住,提前告别了太阳。北极夜来临了,今后几乎有一百天绵延不断的黑夜,拆裂声不绝的严寒和风暴。"[12]而在西方的今芬兰,也有相似的情形。赵长春、杜新《千湖之国芬兰》第1章《千湖之国》:"这里虽然也有春、夏、秋、冬之分,但冬季长达六七个月之久,夏季却十分短暂。在黑暗的冬天,最北部地区有五十天是见不到日出的极夜。夏天则截然相反,从五月中旬到七月底,太阳终日盘桓于天穹,被称为不落的太阳,这种昼夜不分的自然现象形成了著名的北极奇观。"[13]。

"野鼠出穴,乃是入夕"之"野鼠",盖"北极圈"地区当秋末进入"极夜"前,从地下栖息处成群出来的哺乳纲啮齿目动物旅鼠。陈鹏《世界各地珍奇动物》7《寒带苔原地区》:"旅鼠(Lemmus sibiricus)属于鼠科,尾巴很短,毛非常柔软,背面毛色灰黑或黄褐,腹部白色。有些种类冬季背毛亦变白色。旅鼠栖于干燥的高地,吃草和草根,冬季在积雪的地方,有时把雪分开,探食雪下的地衣。旅鼠每胎产仔五至六个,繁殖相当快,一对旅鼠,经过几年便繁殖成几千万只的大群。每当秋末便开始大规模的旅行,由高地向低地迁移。旅鼠的迁移非常有趣,通常都是直线行进,除遇到险峻的绝壁,否则决不变更路线。遇到河就过河,遇到湖就下湖。沿途所经之处,一切作物都受到糟蹋、蹂躏。在旅行中它们被狼、野猫、鼬、貂等食肉兽以及鹫、鹰、隼等猛禽吃掉的不在少数。"[14]小原秀雄《动物的生态》5《动物的形态构造》:"旅鼠以到处旅行而闻名,栖居在阿拉斯加和北欧等北极圈附近。旅鼠体长二十厘米,体形短胖。冬天藏在雪下生活,到了夏季,草木茂盛,又隐藏在那里生活"。"有时候,旅鼠的数量剧增,草被吃光,于是只好一起来一次迁移,据说在挪威等地迁移的大群旅鼠全部跳入海中,一个个被怒涛卷走,最后全军覆没。"[15]

北极地带能生下"大卵"的"大型"鸟,不啻一二。在"陆鸟"中,与"旅鼠"有"共荣"关系

的猛禽"雪鸮"即是其中之一。王家骏《世界猛禽》之《极地的居民》:"雪鸮是猫头鹰中最大的种类之一,然而它和一般猫头鹰全然不同的是,它可以在光天化日下活动,几乎完全成了昼行性的猛禽种。""极地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它夏有极昼,冬有极夜。在这些地区生活的猫头鹰,必须学会在大白天或者并不黑的时候捕食"。"雪鸮繁殖高潮的出现,和当地旅鼠数量增长的周期惊人地吻合。旅鼠每五年出现一次数量高峰,雪鸮也随之出现繁殖的高峰。"[16]要论"海鸟",就在"新地岛"的岸崖前,飞翔着一种被称为"王鸥"的"巨大"贼鸥。《千里冰原》11《北纬七十六度的夏天》、20《谢多夫不在之后》:"迎面有许多悄然无声的海艭、巨大的王海鸥和五月海鸥。""在被我们打死的海豹旁,一群白象牙似的海鸥在同一只巨大的王海鸥为争夺海豹的内脏而拼搏"。"偶而才抬眼看看悬崖后飞出的一只白色幽灵似的王鸥,这是一种凶残的海鸥。这时,小鹈鸭快活的呷呷声静息下来,它们藏匿到岩缝中,或者成群结队地急速冲入高空。王鸥捕到猎物时,掀起一阵可怕的忽哨。冲入高空的小鹈鸭群迅速飞下,努力夺回自己的同伴。但是王鸥的喙十分坚硬,它从容地飞去撕碎猎物"[17]。

毗近或位于北极地区、来到上都"已踰三年",而又能在对音上与"发郎"勘同的地名,则数同时符合"妇人颇妍美,男子例碧眼黄髪"条件的"芬兰"。约翰·亨·伍里宁(John H. Wuorinen)《芬兰史》(A History of Finland)第1章《国土与人民》:"芬兰人是比较高的,他们绝大多数都是金发、碧眼、白肤的。就是说,浅色的混合型的人占优势,大约只有百分之六的人是褐色的,只有不到百分之二的人头发是深褐色或黑色的。"[18]这种"复杂性",意味着白色人种的"芬兰"人与黄色人种的"拉普"人之间的通婚,换言之,"芬兰"男子曾经北上掳掠"拉普"女孩为妻。"颇妍美",正是从同是黄色人种的蒙古人的审美角度所认定的。布赖恩·富勒顿(Brian Fullerton)、艾伦· 威廉斯(Alan F. Willian)《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第29章《挪威北部》:"拉普人本来是猎人和渔民,但在17世纪末叶,某些拉普部落由驯鹿而发展起游牧文化。这些所谓山地拉普人,沿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山脊,逐渐向南扩展到特伦纳拉格和哈耶达伦。""拉普兰被挪威、瑞典、芬兰和俄国在1751年完全瓜分,给这些流动的牧民造成许多困难"。"海上拉普人已经在挪威沿海定居下来,他们主要依靠渔业和农业为生"。[19]

三

"芬兰"的文明,早在13世纪以前就已展开。《芬兰史》第2章《中世纪的芬兰》:"塔西陀也谈到一种他称为芬尼人的人,就是这一个字使得芬兰历史学家抓住《日耳曼尼亚志》,当做是无论何时谈到芬兰人的远古时代,都必须提到的一部著作。事实上,塔西陀只在他的

文章的末尾以三小段总共约一百字专谈芬尼人。他的叙述是很概括的,好几个注释都已提出过这种见解,认为芬尼人指的是拉普人。""只发现过两个文件明确提到十二世纪中叶以后的芬兰:一个是教皇亚历山大三世 1172 年的至关重要诏书,另一个是教皇英诺森三世 1209 年的晓谕你们的诏书。至关重要诏书表明:芬兰是被看做基督教世界在北欧的一部分,按照罗马流行的看法,芬兰人一向不注意对他们的教士给予应有的尊敬,他们对于世俗事物的关心超过了对于解救他们的灵魂的关心"。"罗森《中世纪时期》:这些传说中唯一可以被认为可靠的材料大概只有一点:一个争夺瑞典王位的名叫埃里克的人,在 12 世纪中叶的某个时候,对芬兰发动了一次远征,一个名叫亨利的担任教职的人在芬兰西南旅行的时候被杀害,这两个人的活动有些联系。其它的那些一向被用作关于那时瑞典与芬兰之间的关系的那种假设的根据的说法,都必须认为是站不住脚的"[20]。

自"芬兰"往东,可以由北部沿北冰洋岸而行。这个地区,早在 9 世纪就已有了永久的居民。托·金·德里(T. K. Derry)《挪威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Norway*)第 2 章《海盗时代》:"890 年,一个商人从挪威遥远的北方来到阿尔弗烈德大王(Alfred the Great)的宫廷,他将奥太亚(Ohthere)所能告诉他的一切都编入他的世界史的盎格鲁撒克逊文译文,这是根据奥罗西阿斯的拉丁文本翻译的。他根据亲身经验所描写的一切,是一个住在现代特罗姆瑟(Tromsö)纬度附近的酋长的生活。这位酋长拥有他自己的六百头驯鹿群,一些其它的牲口和马匹,一块不大的耕地,还做海象牙、海象皮以及拉普人作为贡品交纳给他的各种兽皮、绒毛等手面巨大的生意。他本人进行过一次海盗航行绕过北角,向东远至白海。"[21]几个世纪后,当地成了"不乏人烟"的所在。约·彼·马吉多维奇(Иосиф Пемрович Могидович)《世界探险史》(*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й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мкрытий*)第 6 章《诺曼人在北大西洋的发现》:"从公元 8 世纪开始,诺曼人从自己的海岸出发,向四面八方侵掠。向北航行,绕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达白海。到了 14 世纪,沿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整个北部海岸,直到宽广的瓦朗厄尔峡湾,布满了诺曼人的渔猎村舍。"[22]

今科拉半岛迤东,也在 13 世纪中成为"文明"所到达的区域。《世界探险史》第 11 章《俄罗斯人对北欧的发现和对西伯利亚的首次远征》:"到了 12 世纪,从科拉半岛一直延伸到伯朝拉河流域,诺夫哥罗德人向东甚至越过了石带(乌拉尔山脉)。""贵族的战俘奴隶们在西北地区征服了卡累利阿人和萨阿米人或称拉普兰人,在东北地区征服了涅涅次人,并强迫这些人为他们主要从事手工业劳动"。"早在 13 世纪,下游地区的大公们宣布对泰里斯克海岸线有至少对诺夫哥罗德人没有到达的地区拥有主权,同时宣布对冬季海岸和自古以来以捕猎各种鸟类而闻名的伯朝拉边区拥有主权"。"在 13 世纪中期,诺夫哥罗德人把自己的北部地区划分成几个州,不仅有科洛州和特雷州,而且还有彼尔姆州、伯朝拉州和尤格

拉州"[23]。安·米·潘克拉托娃(А. М. Панкратова)等《苏联通史》(*История СССР*)第5章《十二至十三世纪的封建公国》:"当时聂聂茨人在毗连北冰洋的冻土带游牧。聂聂茨人的主要职业是养鹿,副业是猎获水禽和北极狐。""冻土带以南的森林地带住着猎人部落科米人,通称贝尔米人。诺夫哥罗德人称住在北乌拉尔山山坡的各族人为尤格腊人,这就是现今的曼西人(沃尔古人)和汉特人(奥斯恰克人),他们的住地以畜产毛皮兽驰名"[24]。

"剑河"、"谦河"即今叶尼塞河所在的区域,八世纪时,曾是"骨利干"部落的栖息地。《旧唐书》卷三十五《天文志》:"又有骨利干,居回纥北方瀚海之北,草多百药,地出名马,骏者行数百里。北又距大海,昼长而夕短,既日没后,天色正曛,煮一羊胛才熟,而东方已曙,盖近日出入之所云。"[25]《新唐书》卷二一七下《骨利干传》:"骨利干处瀚海北,胜兵五千,草多百合,产良马,首似橐它,筋骼壮大,日中驰数百里。其地北距海,去京师最远,又北度海,则昼长夜短,日入烹羊胛熟,东方已明,盖近日出处也。既入朝,诏遣云麾将军康苏蜜劳答,以其地为玄阙州。其大酋俟斤因使者献马,帝取其异者号十骥,皆为美名,曰腾霜白,曰皎雪骢,曰凝露骢,曰县光骢,曰决波騟,曰飞霞骠,曰发电赤,曰流金𩦪,曰翔麟紫,曰奔虹赤,厚礼其使。龙朔中,以玄阙州更为余吾州,隶瀚海都督府。延载初,亦来朝。"[26]周致中《异域志》卷下《骨利国》:"在西北澣海之中,南望回鹘,出良马,乃天外地极际之所,故日长而夜短,日光于地下所照故也。日没后,天色正曛,煮羊方熟,天已曙矣。"[27]夏夜只有一二个小时的现象,只有在北纬六十五度地区才有。而那个地区出产野性十足的"良马",迄于今依然[28]。

四

早在14世纪之前,今贝加尔湖两岸及"周边"居住着"巴儿忽惕"等"林木中百姓"[29]。其后,这个地区的居民,在兵锋的压迫下,成了新兴"大蒙古国"的臣属。《蒙古秘史》卷十(第239节):"兔儿年(太祖二年),成吉思命拙赤领右手军,去征林木中百姓,令不合引路,斡亦剌种的忽都合别乞、比万斡亦剌种先来归附,就引拙赤去征万斡亦剌,入至失黑失惕地面,斡亦剌、秃巴思诸种都投降了。至万乞儿吉思种处,其官人也迪亦纳勒等也归附了,将白海青、白骟马、黑貂鼠来拜见拙赤。自失必儿等种以南林木中百姓,拙赤都收捕了。"[29]所称"万斡亦剌"、"万乞儿吉思",涵:"不里牙惕"、"巴儿浑(巴儿忽惕)"、"兀儿速(乌思)"、"哈卜哈纳思(撼合纳)"、"康合思"、"秃巴思"、"客思的音(克失的迷)"、"巴亦惕"、"秃合思"、"田列克"、"脱额列思(帖良兀)"、"塔思"、"巴只吉"等部落[30]。《圣武亲征录》:"戊寅(太祖十三年),先吐麻部叛,上遣征兵乞儿乞思部,不从,亦叛去,遂命大太子往讨之,以不花为前锋,追乞儿乞思至亦马儿河而还。大太子领兵涉谦河水,顺下招降之,因克乌思、憾合纳、

帖良兀、克失的迷、火因亦儿干等部。"[31]

为了加强对今叶尼塞河"源头"地区的控制,有元当局设立了"吉利吉思等处断事官"。《元史》卷一六七《刘好礼传》、卷六三《地理志》:"(至元)七年,迁益兰州等五部断事官,以比古之都护,治益兰。其地距京师九千余里,民俗不知陶冶,水无舟航。好礼请工匠于朝,以教其民,迄今称便。或言榷盐酒可以佐经费,好礼曰:'朝廷设官要荒,务以绥远,宁欲夺其利耶?'言者惭服。""至元七年,诏遣刘好礼为吉利吉思、撼合纳、谦州、益兰州等处断事官,即于此州修库廪,置传舍,以为治所。先是,数部民俗皆以杞柳为杯皿,刳木为槽以济水,不解铸作农器,好礼闻于朝,乃遣工匠,教为陶冶、舟楫,土人便之"[32]。"谦州"即"缣缣州",以产岩盐著名。杨瑀《山居新话》:"朔方缣缣州,其西南有二石洞。一洞出石盐,皆红色,今湮没矣。一洞出青黑色者,尚存,缣人皆食之。石文粗矿,如南方青石然,调味甚适口。他处亦皆有捞盐海子,或出青盐,或红盐,或方而坚,或碎而松,或大块可旋成盘者。大营盘处,亦以此为课程,抽分不假人力,乃天成也。予友完者经历、夏石岩经历,皆曾以此盐遗余,彼亦尝亲历其地。缣缣州,即今南城缣州营,是其子孙也。自大都至彼一万四千里,与怯里吉思为邻境,过此即海都家望高处也。"[33]

令人惊叹的吃苦耐劳精神,曾使蒙古人的足迹深入到了北纬七十二度的海岸。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五《丁灵》:"圣朝太宗皇帝尝诏和端(兀敦)等入北海,往复数年,得日不落之山,未始闻有马脑、马蹄之民。是知诸家所说,不加考核,递相祖述耳。好怪不经,世俗之所不免者也,可胜诧哉!"[34]在此前后,在拖雷寡妻唆儿忽黑塔尼别吉的策划下,还曾进行过对"银矿"的开采。《史集》第一卷第一册《部族志》:"昂可剌沐涟(**Anqüreh Mürän**)河非常大,河上住着被称为兀速秃—忙浑(**Aüsütü-Mankqün**)的蒙古部落。该河邻近一座名为康合思(**Qängkäs**)的城,并在那里与谦河(**Kem**)汇流。据说,这条河流入海滨地区。(那里)到处是白银。据说,他们(当地人)的马全都毛色斑驳;每匹马都健壮得如同四岁的骆驼;(居民的)一切器皿用具都是银制的。禽类很多。""唆儿忽黑塔尼别吉曾派遣三个异密带着一千个人乘坐一条船(前往该国),那三个异密是:客儿朱古儿部落的统黑里黑、合剌—秃惕部落的别客术和□□□部落的蒙忽儿—希惕纳。他们将许多银子(从该国腹地)运到岸边,但未能装上船。这支军队中,有三百多人没有返国,留下的人都死于瘴气和潮湿。(但)三个异密都顺利归来,(后来)活了很久。"[35]

有元一朝对"极北"地域的"搜索",在两个方面同时进行:一是沿稍东的今叶尼塞河而下,二是沿偏西的今鄂毕河而下[36]。前者,《元史》卷六十三《地理志》:"吉利吉思者……南去大都万有余里……其境长一千四百里,广半之,谦河经其中,西北流。又西南有水曰阿浦,东北有水曰玉须,皆巨浸也,会于谦,而注于{昴}[昂]可剌河,北入于海。俗与诸国异,其语

言则[与]畏吾儿同。庐帐而居,随水草畜牧,颇知田作,遇雪则跨木马逐猎。土产名马,白、黑海东青。{昴}[昂]可剌者,因水为名,附庸于吉利吉思,去大都二万五千余里。其语言与吉利吉思特异,昼长夜短,日没时炙羊肋熟,东方已曙矣。"[37]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谭》卷一:"许献臣佥事说:盎古剌日不落,只一道黑气遮日,煮羊膊熟,日又出也。保定刘敬之往仕断事官,亲见之。观此则日月不出入乎地中,绕北极之下,以为昼夜,信而有证。"[38]后者,耶律楚材《西游录》卷上:"黑色印度之西北有可弗叉国。数千里皆平川,无复丘垤。吁!可怪也,不立城邑,民多羊马。以蜜为酿,味与中原不殊。此国昼长夜促,羊胛适熟,日已复出矣。寻思干去中原几二万里,印度国去寻思干又等,可弗叉国去印度国亦等。虽萦迂曲折,不为不远矣,不知其几万里也。"[39]

五

从以上的勘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公元1261年来到大蒙古国首都的使臣,来自遥远的"芬兰"。也只有在这个国度,同时具有北极的生态特征和居民的种族差异。使者之东来,循北冰洋沿岸,自挪威北部经科拉、卡宁、亚马尔等半岛,至今叶尼塞河口,遵岸南行,由支流安加拉河入贝加尔湖[40],溯色楞格河至中游,再穿越蒙古高原、内蒙古高原而至滦河上游。这条路线即使对今天的人们而言,如果没有飞行工具,其绵远和困难的程度,似乎也超乎想像。不过,约略数来,这条路线不过五千公里上下。全程三年,走走停停,以有效时日五百天计,每天不过二十里。所称的"二海",一为今"新地岛"西的"巴伦支海",一为今"新地岛"东的"喀拉海"。而作为出发地的今北部斯堪的纳维亚,最为突出的"自然"风光,当然就是进入"极夜"前,既壮观又奇特的"旅鼠"之"迁徙"景象,这就是所称的"鼠出入夕"。小原秀雄《动物的故事》6《食者与被食者》:"挪威旅鼠确实集体移动,并能渡过宽阔的河面和湖泊。但是,一旦风大浪急,就有很多被溺死。当旅鼠因数量增加,在原来的生息所容纳不下时,便开始移动。移动时,看上去就好像发了疯。据说,甚至连人和狗都不怕。"[41]

元王朝的北部疆界,张箭《地理大发现研究十五至17世纪》第11章《俄罗斯在北亚、北冰洋的地理大发现》:"北海测影所的地理位置:北极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晷影长六尺七寸八分,昼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北半球任何地区的北极高度角与该地的地理纬度同值,鉴于中国古代一圆周为三百六十五度,所以北海测影所的位置在北纬六十四度左右"。"蒙元的疆域势力向北达到北纬五十多度的贝加尔湖地区一线,比较属实可信"[42]。实际上,如前引所示,"吉利吉思断事官"所辖的"昂可剌"地区就已在"贝加尔湖地区一线"之北。而将测影所命名为"北海",意味着蒙古人知道更北部的"北洋",并宣告"领土"的"隶属"。将今贝

加尔湖视为"北海",只是"西汉"的观念[43]。就是元代中叶以后,虽然不知"北海"的"确切"所在,但也不将"封界"之内的"大泽"充作"北海"。朱思本《贞一斋稿》卷上《北海释》:"四海其东与南者,密迩中国,人得以耳目接也。西海虽远在万里外,而驿使贾胡时或至焉,惟北海不闻所在。""今考夫大碛以北、金山之东,水皆北流,赴大泽中。大泽绵亘万里,蛇龙居之,蒲苇生焉。舟车不通,姑莫有绝泽而北者。然则大泽之外,海之远近不可知已"[44]。

"芬兰"使者经行道路的南方,则是从合罕治下分离出来的"金帐汗国"。赫德逊(C. F. Hudson)《欧洲与中国》(*Europe and China*)第5章《鞑靼人统治下的和平》:"在陆地上,金帐与拉丁文明的腹地之间隔着一个无论经商或打仗都难以逾越的障碍。在一方面是意大利、法国和德国西部,另一方面,顿河一伏尔加河大草原之间是匈牙利和波兰的大片疆土,这片地区只不过最近才被拉丁基督教所争取,在蒙古人到来之前人口就很稀少,而现在由于他们的劫掠就更加荒凉了。拉丁世界东部边界的势力不够强大,难以向蒙古人发动攻势,它们也不那么富足,不能激起蒙古人多大的贪婪之心;同时散居在林区和沼泽地的那些依附土地的人民是草原上游牧民族很难使之臣服的,从而防止了金帐把他们的边界推到更富足、人口更多的西欧国家。"[45]正是由于其间分布着面积广阔、既寒冷又潮湿的地带,这个方向对北极地区的认识就颇有偏差。《马可波罗行纪》第219章《黑暗之州》:"此国境外偏北有一州名称黑暗,盖其地终年阴黑,无日月星光,常年如是,与吾辈之黄昏同。""其地之人饶有贵重毛皮,盖其境内多有贵重之貂,又有银鼠、北极兽、灰鼠、黑狐及其它不少贵重毛皮。人皆善猎,聚积此种毛皮,多至不可思议"。"大斡罗思境界一端与此州相接"[46]。

关于"骨利干",刘迎胜《丝路文化草原卷》5《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有一些操蒙古语的部落混杂在铁勒人之中,例如隋、唐时代十五个部中,有一个拔野古,它应当就是后来的蒙古八儿忽部。还有一些操蒙古语的部落很早就迁居到今贝加尔湖周围地区,他们曾采用卢尼突厥文作为自己的书面语。其中最著名的是骨利干,分为三个部落,称三姓骨利干,后来成为蒙古豁里部。"[47]实际上,这个地区的民族"成份"非常复杂,甚至还有到这里来采办货物的"回回"人。《元典章》卷十九《刑部诸禁》:"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至元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成吉思皇帝降生,日出至没,尽收诸国,各依风俗。这许多诸色民内,唯有回回人每为言:俺不吃蒙古之食。上[曰]:为天护助,俺收抚了您也。您是俺奴仆,却不吃俺底茶饭,怎生中?么道,便教吃。若抹杀羊呵,有罪过者。么道,行条理来。""如今直北从八里灰田地里将海青底回回每,别人宰杀来的,俺不吃。么道,骚扰贫困百姓来底上头,从今已后,木速忽蛮回回、术忽回回每,不拣是何人杀来的肉交吃者,休抹杀羊者,休做速纳者"。[48]云"发郎"在"在回纥极西徼"之"回纥",或指唐为"回纥"故地的漠北?或指以上"回回"人所至之今贝加尔湖东的"八里灰"地区?

注 释

〔1〕王恽《秋涧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至治刊本,页374上、下。
〔2〕《元史》,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页3933。
〔3〕王恽《秋涧集》,页359上。
〔4〕《元史》,页3525。
〔5〕多桑《多桑蒙古史》,上海书店出版社冯承钧中译本,2001年,页115、116。
〔6〕《中西交通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朱杰勤校订本,1977年,页176。
〔7〕载《文史》第27辑,北京,中华书局刊本,1986年,页195。
〔8〕郝经《陵川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正德刊本,页830下。
〔9〕危素《危太仆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元人文集珍本》影印嘉业堂刊本,页506下、507上。
〔10〕《秋涧集》,页493上、494上。又,《新唐书》卷二二一下《拂菻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6260、6261:"古大秦也,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国。去京师四万里,在苫西,北直突厥可萨部,西濒海。有迟散城,东南接波斯。地方万里,城四百,胜兵百万。""土多金、银、夜光璧、明月珠、大贝、车渠、码碯、木难、孔翠、虎魄,织水羊毛为布,曰海西布。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舶,堕铁网水底,珊瑚初生盘石上,白如菌,一岁而黄,三岁赤,枝格交错,高三四尺,铁发其根,系网舶上,绞而出之,失时不取即腐"。
〔11〕伊·冈察洛夫《巴达拉号三桅战舰》,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叶予中译本,1982年,页754、755。
〔12〕尼·波涅金《千里冰原》,北京:海洋出版社沈治中译本,1984年,页67。
〔13〕赵长春、杜新《千湖之国芬兰》,北京:时事出版社刊本,1977年,页2。
〔14〕陈鹏《世界各地珍奇动物》,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刊本,1980年,页120、121。
〔15〕小原秀雄《动物的生态》,北京:人民出版社《日本少年博物馆丛书》随利中译本,1982年,页94、95。
〔16〕王家骏《世界猛禽》,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刊本,1984年,页117、118。
〔17〕《千里冰原》,页124、126、251。
〔18〕约翰·亨·伍里宁《芬兰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73年,页23、25、30、31。
〔19〕布赖恩·高勒顿、艾伦·威廉斯《斯堪的纳维亚》,天津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79年,页279、280、281。
〔20〕《芬兰史》,页46、47、58、59、60。
〔21〕托·金·德里《挪威简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73年,页47、48。
〔22〕约·彼·马吉多维奇《世界探险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屈瑞、云海中译本,1988年,页56、57。
〔23〕《世界探险史》,页99、102、103、104、106。
〔24〕安·米·诺克拉托娃《苏联通史》,北京:三联书店中译本,1978年,页131、132。
〔25〕《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页1304。
〔26〕《新唐书》,页6144、6145。
〔27〕周致中《异域志》,北京: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陆峻岭校注本,1981年,页46。
〔28〕斯图尔特·柯尔比(E. Stuart Kirby)《苏联的远东地区》(*The Soviet Far East*)第8章《雅库特,主要的腹地》,上海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76年,页192:"雅库特是世界最北的养马地区,拥有十万匹左右。大部分的马甚至冬季也放牧户外,在雪地里寻找食物。"
〔29〕《史集》第1卷第1分册《部族志》,北京,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余大钧、周建奇

中译本,1983年,页192、193、198、200、201:"这些斡亦剌惕部落的禹儿惕和驻地为八河地区。诸河从这个地区流出,然后汇成一条名叫谦河的河,谦河又流入昂可剌沐涟河。这些河流的名称为:阔阔沐涟、温沐涟、合剌兀孙、散必敦、兀里黑沐涟、阿合儿沐涟、主儿扯沐涟和察罕沐涟。""巴儿忽惕、豁里和秃巴思部落,这些部落彼此接近,他们被称为巴儿忽惕,是由于他们的营地和住所位于薛灵哥河彼岸,在住有蒙古人被称为巴儿忽真脱窟木地区的极边"。"秃马惕部落,这个部落的所在地,靠近上述巴儿忽真脱窟木地区,它也是从巴儿忽惕人的亲属和支系分出来的"。"不剌合臣和客列木臣部落,这两个部落都住在巴儿忽真脱窟木地区,靠近乞儿吉思人地区的极边上"。

〔30〕《蒙古秘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蒙古历史丛书》额尔登泰、乌云达赉校勘本,1980年,页1029、668、669。

〔31〕《圣武亲征录》,上海古籍出版社《王国维遗书》王国维校注本,1983年,页74上、下。

〔32〕《元史》,页3925、1575。

〔33〕杨瑀《山居新话》,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笔记小说大观》影印上海进步书局刊本,页2下。

〔34〕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四库全书》本,页10下。

〔35〕《史集》第1卷第一册,页164、165。

〔36〕佩里·麦克多诺·柯林斯(**Perry Mc Donough Collins**)《阿穆尔河纪行》(***Voyage down the Amoor***)八《从伊尔库次克到恰克图》,上海人民出版社斯斌中译本,1974年,页88、89:"安加拉河泻入距伊尔库斯克西北还几百公里的的上通古斯卡河,通古斯卡河再泻入离叶尼塞斯克城南不远的那段叶尼塞河,从这里走过一段不算长的连水陆路,就到了鄂毕河的一条东向支流。而鄂毕河的依然往西流的主河道会把你引到额尔齐斯河。""所有这些北方的大河都流入北冰洋,而其河流的宽度、深度都可以通舟楫"。

〔37〕《元史》,页1574。

〔38〕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谭》,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笔记小说大观》影印上海进步书局刊本,页349下。

〔39〕耶律楚材《西游录》,北京: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向达校注本,1981年,页4。

〔40〕瓦西里·帕尔申(**Василий Паршин**)《外贝加尔边区纪行》(***Поездка в Забайкальский Край***)第1章,北京,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76年,页11、12:"贝加尔湖特有的现象之一,就是湖里有时也会或多或少地出现一些海豹,这是大海才有的特征。""海里动物是溯安加拉河游入贝加尔湖的。令人奇怪的是,流入贝加尔湖的有色楞格河和许多小河小溪,而从贝加尔湖流出的却只有一条安加拉河"。

〔41〕小原秀雄《动物的故事》,北京:新华出版社新峰、秀臣中译本,1980年,页196。

〔42〕张箭《地理大发现研究15—17世纪》,北京:商务印书馆刊本,2002年,页362、363。

〔43〕《汉书》卷五四《苏武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3年,页2463:"匈奴以为神,乃徙[苏]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

〔44〕朱恩本《贞一斋稿》,扬州:广陵书社《宛委别藏》本,页20。

〔45〕赫德逊《欧洲与中国》,北京:中华书局《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王遵仲、李申、张毅中译本,1995年,页116、117。

〔46〕《马可波罗行纪》,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党宝海新注冯承钧中译本,1999年,页737。

〔47〕刘迎胜《丝路文化·草原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刊本,1995年,页240。

〔48〕《元典章》,台北:故宫博物馆影印元刊本,1976年,页18上、下。



试论清中期的南疆[1]经略政策

——以对内地人的政策为中心

贾 建 飞

清朝统治边疆民族地区的目的主要有三:1. 防范外敌入侵;2. 维护边疆稳定;3. 发展边疆经济[2]。对于因地区、民族不同而导致的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等方面的差异,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清王朝对这些边疆民族地区并不抱歧视态度,相反,能够以一种全新的角度来对待和处理,比以往任何王朝都更重视把边疆政策、民族政策的制定、推行和完善摆在基本国策的突出地位。清王朝强调"中外一体"(即内地与边疆为一整体),一变前代汉族王朝作茧自缚、消极自保的惯用手段,主张以积极态度治理边疆民族地区,使其起到"屏藩"、"拱卫"的作用[3]。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清王朝因地制宜,制定和实施了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来维护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如在内外蒙古实行盟旗制,西藏实行以达赖和驻藏大臣协同管理的噶厦政府制,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但酌情保留土司制等。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其政策的实施不仅达到了统治各族的目的,而且对于巩固边疆、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推进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有着积极意义。

在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中,新疆,尤其是南疆地区相较其他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在政治、经济、社会风俗、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的不同而更为独特,因此清王朝在对其之治理中,经略政策也颇具特色。本文即以南疆为中心,以清中期政府管理南疆内地人的政策为线索,对此种政策的出台及发展变化略作分析。

一

清政府统一新疆后,鉴于新疆的重要战略位置,对新疆的经略颇为重视。不过,鉴于新疆南北的具体情况有别,清政府的经略政策亦有所不同,如在北疆驻以重兵,既为维持地方安定,亦有防范潜在的外来威胁之意。因为虽说此时清王朝威名远震西域,外藩臣服,但鉴

于自古以来边患莫过于塞外西北的游牧民族，清自然注重对这些地区的经营。它通过联络漠南蒙古，收服喀尔喀蒙古，首先消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而在西北，又经康雍乾三世，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平定准噶尔之乱，但是乾隆少见地对准噶尔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使准噶尔的人口锐减，其意自然为彻底消除准噶尔的威胁。这样北疆不复构成对清王朝的威胁。但在清西北边疆之外，依然有像哈萨克和布鲁特这样的游牧民族，且俄罗斯也正在东进，虽尚未对清西北边疆构成威胁，必要的防范措施却必不可少，因此清政府驻重兵于北疆，实为防患于未然。同时，北疆经过多年战乱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千里空虚，渺无人烟”[4]，因此，清政府积极在北疆组织移民屯垦，发展各种屯田，以达实边和开发北疆的目的，减轻内地负担。而且，清政府将伊犁作为新疆的政治、军事中心，其对新疆的经营必然重北，以恢复北疆的重要战略地位。

但在南疆，情况却颇为不同。首先，南疆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等民族聚居之地，风俗信仰与内地截然不同，形成了一个较为封闭的地区，对其之统治措施必然有异；其次，南疆在清政府的平叛中，大部分地区未作任何抵抗，因此遭到的破坏极小，其社会经济基本保持了稳定的发展；再次，南疆以农耕为主，社会组织较为稳定，农耕经济较为发达，不似北疆游牧经济，行国无常。清人称，南疆“城村络绎，视准疆数千里，土旷人稀，形势迥别”[5]，因此清政府的南疆经略政策与北疆大有不同。正如乾隆在平定南疆前所言：“回部与伊犁不同，伊犁入我版图，控制辽阔，不得不驻兵降压，至回部平定后，不过拣选头目，统辖城堡，总归伊犁军营节制。即从前准噶尔之于回人，亦只如此，可传谕兆惠，将来办理回部，惟于归顺人内，择其有功而可信者，授以职任，管理贡赋等事，具奏请旨。至伊犁，则必需大兵驻防。”[6]这表明，清政府早已确定南疆经略政策之大概，即：保持南疆相对独立的地位，以其人治其地，中央政府不过多干涉其事务。虽说这种观念在南疆统一后略有调整，但其主旨仍然得以保持。我们试以清政府对待南疆内地人的政策为例，来对此加以分析。

清政府管理南疆内地人的政策主要如下：

其一，不许前来南疆的内地人携带家眷。这主要针对两种人而论：驻守南疆的清官兵；前来南疆贸易的内地商民。事实上，在清王朝统一南疆之后，并没有实行如北疆那样的屯田制度，因此当时在南疆的内地人主要以这两种人为主。

清政府在统一新疆后，最初在北疆和南疆均实行换防兵制，不允许携带家眷，但鉴于换防兵制耗资大，加之为稳定北疆统治起见，后驻守北疆伊犁、乌鲁木齐等地的满蒙八旗及绿营军逐渐改为驻防军，携眷永驻。南疆依然实行换防兵制，正如清人记载，驻防兵乃携眷之兵，永远驻守，“惟伊犁及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满洲绿营皆然，土鲁番满营官兵亦如之”，而南路之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乌什和阿克苏的满兵则自乌鲁木齐、古城和巴里坤调

拨,绿营兵则自内地调拨,皆轮班更替,非常驻者[7]。

至于贸易商民,早在清军挺进南疆的过程中,内地商民就已追随其踪迹,来到南疆从事贸易活动。乾隆二十四年,内地商人即已在阿克苏、乌什、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南疆城市设立市集,运来绸缎茶叶等,换取南疆的牲畜、毛皮等[8]。至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喀什噶尔都统永贵奏称:"自平定回部以来,内地商民经由驿路,彼此相安无犯,坐台回人又挑引河渠,开垦田地,往来行人,并无阻滞。若将此晓谕商民,不时往来贸易,即可如哈密、吐鲁番,与官兵亦有裨益。"对此,乾隆表示赞同,并命"著寄信杨应琚,将此传谕商民,若有愿往者,即办给照票,听其贸易,若不愿,亦不必勒派,如此,行之日久,商贩自可流通"[9]。因此,可以看出,在乾隆中期统一南疆之初,清政府并不禁止内地商民流入南疆,政策是较为宽松的,内地商民赴南疆进行贸易,只须申领照票而已。但是,史料记载,"内地商贾民人,向不准携眷前赴回疆"[10],因此贸易商民同样不许携眷。

其二,不实行普遍的屯田。北疆在统一后,清政府很快就积极组织内地人移民屯垦,是为户屯,并组织绿营兵和遣犯发展兵屯和犯屯,还组织善于耕作的南疆维吾尔人前往伊犁屯田,发展回屯,此后又在伊犁组织满人进行旗屯。清政府在北疆发展多种形式的屯垦政策,一方面因为北疆在战乱后人口锐减,发展屯垦,且耕且驻,可以召集流亡,且北疆一向以游牧为生,不事农耕,不发展屯垦,不足以满足北疆驻扎官兵所需;一方面,发展屯垦,可以减轻内地负担,正如史书所言,"不惟腹地不资转运,而给饟之羡,陈陈相因,减费更广[11]"。同时也是吸取了前朝西北屯垦专为养兵,而未能兵民并济,无法达到战守兼宜的教训,希望借此达到移民实边的目的,减少外来威胁,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但在南疆,清政府除在东四城实行有限的兵屯外,几乎没有发展其他形式的屯田[12],尤其在南疆人口最为稠密的西四城,清政府甚至连兵屯也未实行。与北疆相比,无疑是鲜明的对比。

那么,为什么清政府在南疆会实行这样的政策呢?原因分析如下:

其一,这是清政府"因俗而治"方针的产物。

因俗而治是清政府治理新疆的总方针。其具体表现主要有:1. 因俗设官[13];2. 顺其俗抚治之[14];3. 不以内地之法治之;4. 尊重其宗教信仰等等。也就是说,以拉拢利用作为手段,维护其原有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等,而非轻视鄙夷。

清政府清楚,南疆的长久稳定与如何安抚和统治当地维吾尔等民族关系极为密切。清统治者以"因俗而治"为其制订政策之方针,对于稳定甫经统一的南疆地区实乃最佳选择,即在保证中央政府对其统治的前提下,通过制定适宜的政策来保护其民族性最大限度地不受破坏,以其人治理其地,即古人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如清政府在南疆实行的伯克制便是清政府所谓"因俗设官"的一种具体表现,在南疆传统伯克制的基础

上，结合现实之需，进行了必要的调整，使之既符合清政府的统治，又能满足维吾尔族的要求和习惯。

为使其民族性最大限度地不受破坏，同时考虑到“回疆甫经戡定，恐回民交涉生事”[15]，清政府在相当长时间内限制外界与南疆的接触，限制内地与外藩人口向南疆的流动，甚至限制南疆内部人口的自由流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虽然清在统一新疆后将新疆作为重要的流放遣犯之地，但流放地主要集中在北疆和天山东路，南疆遣犯极少，以厚南疆之俗，避免遣犯对当地的风俗和社会安全造成破坏。因此，清政府不许内地人携带家眷，意图乃在于将进入南疆的内地人的数量控制在最低限度，并禁止他们定居南疆，不令其在当地落地生根，这与北疆实行的移民实边政策显然不同。

限制外来人口（尤其是内地人）进入南疆，还可以避免在教育问题上与南疆传统相悖而导致的纠纷。清王朝在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中，其统治理念逐步从以夷治夷向“以汉化夷”发展[16]，办法之一是兴办学校，以儒家的传统思想影响边疆民族，其重点在西南的苗疆地区。乾隆中期后，北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锐减，内地人口急剧增加，内地的传统教育便有了实施的土壤和氛围，因此逐步开始兴办学校，儒家教育随之兴起。但在南疆，由于其为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聚居之地，传统的儒家教育方式与伊斯兰教传统经院教育必然存在冲突，如果在时机尚不成熟时强行推行儒家教育，势必造成民族间的冲突，甚至对边疆的稳定也会形成强烈的冲击，因此清政府不令官兵及贸易商民携眷，内地人口不多，在教育方面暂时便不用同内地接轨，也可避免因此产生的矛盾。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19世纪80年代新疆建省后，虽然南疆与内地的融合大为增强，但是这种民族间的融合在阿古柏叛乱后仍未得到很好地实现，因此当左宗棠和刘锦棠在新疆广设义塾、推行儒学教育后，由于没有考虑到南疆的实际情况，围绕这种教育而产生了很多的问题，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骚乱[17]。

同样，清政府在南疆不实行普遍的屯田显然也是基于这种考虑。因为如果内地人大量涌入，势必造成与南疆穆斯林的杂处，滋生事端。而且，南疆本身农耕较为发达，社会经济较为稳定，驻军又少，其军需通过少数兵屯及征收的粮赋即可满足，因此北疆那样普遍的屯田对于南疆来说并不迫切。另外，清政府也考虑到农耕为南疆维吾尔族之恒业，如果组织不好，势必造成对资源的争夺，从而影响南疆的稳定。虽然这种政策会影响到南疆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但显然这在当时并不是清政府考虑的主要问题。

清政府显然是希望给南疆这样的“回夷杂处”的边防重地一个较为宽松的生存环境，这与中国自古坚持的一种宽外严内原则是相符的，也就是对边疆民族地区以及外藩属国的政策相对内地而言较为宽松，因为在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对类似西域这样的边徼之地的经营中，

徕远人和致殊俗是最为重要的内容,其目的在于宣扬中央王朝的文治武功,扩张其影响。因此在"因俗而治"下,清王朝对南疆的统治极为讲求"抚"与"驭"的结合,讲求恩威并用,一方面曲示怀柔,一方面对于应行惩创者,亦不姑息,以此来使边圉永靖,震慑外藩,其中尤为讲求怀柔之"抚"。而这种"因俗而治"所造成的宽松环境显然在一定时期内对维持边疆稳定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在其统治之初更是如此。清王朝之所以在统一南疆后,大幅降低了南疆维吾尔人在准噶尔时期所承担的税收[18],原因同样如此。

其二,是清政府在南疆实施民族隔离的产物。

民族隔离也是清王朝为维持其在新疆的统治而坚持的一项原则,在北疆主要表现为满汉间的隔离,通过分设满城和汉城来将满人聚居区和汉人聚居区相隔离。在南疆,维吾尔族聚居的特点又使这种民族隔离体现出新的特点,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南疆特殊的环境经常导致绿营军和满、蒙旗人共同居住一城,只有维吾尔族被排除在外[19]。在北疆及内地被隔离的满汉民族,在南疆却共同生活在一处(包括满汉兵丁,后又将内地商民包括入内)[20],以与回城相隔离。

这种民族隔离原则的实行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清统一南疆之初,对于民族隔离尚没有明确的规定,那时,驻扎南疆的官兵并没有建筑单独的城池以供居住,如乾隆二十七年,参赞大臣永贵指出驻扎喀什噶尔官兵因旧回城"房屋稠密,街衢错杂,难以设营",官兵均驻扎郊外[21]。在叶尔羌,最初官兵亦居于城外,正如叶尔羌办事都统新柱于乾隆二十六年称:"查大兵凯旋后,所留叶尔羌之满洲、索伦、绿旗兵丁,除看守城垣仓库及办事处差遣兵役外,俱于城外驻扎。后因帐房日久损坏,分居城内回人房屋。"[22]此时,对于内地商民的贸易地点也尚无更多的限制,其与维吾尔人的贸易是自由进行的。正如前文所述,早在乾隆二十四年,内地人即已在阿克苏、乌什、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南疆城市设立市集,与维吾尔人进行贸易。

但不久后,鉴于"官兵不便与回人杂处"[23],清政府开始在喀什噶尔新建城池,供官兵居住,而其他城市,如叶尔羌在回城之一隅添建房舍,移兵驻之,与维吾尔族所居之回城以墙相隔,英吉沙尔亦如叶尔羌例,"城中隔一墙,南半回民居之,北半官兵居之"[24]。这样,官兵居住之地与维吾尔人所居之地就进行了初步的隔离。对于贸易商民,清政府很快也有了限制措施,这主要发生在乾隆三十年爆发的乌什事件之后,在处理善后事宜中,清政府为避免事端的再度滋生,开始对这种贸易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尤其是作出了"民回之居处宜别"的决定,认为"内地贸易商民将来渐多,所居或与官兵相近,尚可弹压,不令生事。若听其随意栖止,与回人相杂,不免易滋事端",因此"俱令赴驻兵处所贸易,若仍与回人杂处,即行治罪"[25],希望借此将当地维吾尔人与内地人予以隔离,减少彼此间的冲突。嘉庆十五年时,

清帝针对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哈半阿奏请分拨弁兵安设讯防一摺指出："喀喇沙尔所属库尔勒、布古尔二回城，贸易汉民渐多，且距喀喇沙尔本城较远，应如该大臣所奏，于该城拨出把总二员，兵十六名，分驻两城，以资弹压。"[26]这些都体现出维持稳定、避免滋生事端是清政府坚持民族隔离原则的重要目的，尤其担心内地人的日益增多会对南疆的稳定造成冲击，因此必然要对内地人前来南疆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清政府显然认为，前来南疆的内地人越少，便越容易坚持民族隔离的原则，这样，便不允许内地人携带家眷，同时不实行普遍的屯田。

一些学者虽然把清政府不许南疆的内地官兵及贸易商民携带家眷也归因于清政府坚持的民族隔离，但却认为这是清政府为了防范汉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反抗清朝[27]，这显然值得商榷。因为清政府直到乌什事件后，方才明确提出"民回之居处宜别"，其意图并非为了防范各民族之间的联合，相反，是为了避免各民族间的杂处滋生事端。另外，从当时清政府在南疆采取的其他一些行动来分析，也会看出，清政府的主要意图是稳定当地维吾尔族民众的情绪，避免由于政策的不适而导致争端，如乾隆三十一年，针对明瑞、阿桂等人奏请"查核回人户口数目，造册存案，以均差务等语"，乾隆指出："各回城俱系新定地方，非内地可比，今若按乡逐户查核，则回人等不无疑惧。且村庄过多，各城大臣等断不能亲诣周查，不得不委之属员，不肖辈转得藉此扰累回众，甚属不便。"[28]从中足可看出乾隆实不欲打扰回人之平静局面，以求回疆稳定之意图。在道光时期所编纂的《回疆则例》中，诸如禁止南疆换防官兵及发遣人犯擅娶回妇，禁止兵丁私入回庄，禁止兵民强占回人园地及禁止商民重利盘剥穷回等条目无不有这种考虑。

其三，清政府之所以在南疆实施换防兵制，还有其他一些因素：

(1)清王朝重北而轻南，在战略上更重北疆，因此以重兵盘踞北疆。清王朝兵力有限，南疆并非其战略重点，因此便行以换防兵制；(2)清人一般认为，就北疆和南疆而言，由于地势的原因(北高南低，且北疆开阔，而南疆多沙漠、绿洲，不宜游牧)，因而长期以来南疆农耕之维吾尔族一向受北疆游牧民族所控制，可谓北强南弱，因此他们认为在北疆和南疆二者之间，北可制南，而南不可制北[29]，因此在北疆实行战斗力更强的驻防兵制，而南疆则仅以换防兵驻之；(3)易于控制，方便管理，能最大限度地限制其与当地维吾尔族的接触，减少不必要的麻烦[30]；(4)清政府力求减轻当地维吾尔族民众的财政负担，安定社会，同时也担心携眷驻扎会引起不同民族交涉生事，危及清政府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因此有意加以防范隔离[31]。

乾嘉时期清政府在南疆实施的这些因地而宜的政策，虽然对南疆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阻碍作用[32]，也影响到了南疆各民族——尤其是内地人与南疆当地民族间的融合，影响到

了南疆与北疆乃至内地在行政制度上的一体化进展，但是考虑到南疆甫经统一，而且，南疆毗连中亚诸国，其在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社会习俗、经济生活等方面与中亚诸国都有极强的认同感，政策的不适及因此而滋生的事端极易为其利用，容易受其影响，受其煽动挑唆，因此维持稳定乃是清政府统治南疆的首要目标，那么这种较为保守或是消极的经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便不难理解。事实证明，这种政策在南疆统一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成功的，也是符合南疆实际的，它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南疆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与社会习俗等的相对独立，保护了南疆维吾尔等民族的民族性和利益，使南疆在一个较为封闭和宽松的环境中得到了虽然缓慢但却稳定的发展，南疆人民的负担也较以前大为减轻。南疆之所以能在张格尔叛乱前维持长达六十余年的相对平静局面，与此关系极为密切，当然，这与此时中亚诸国（尤其是浩罕）势力尚不强大，盛名之下的清王朝对中亚仍具有威慑力也有一定的关系。

二

如果说上述政策在乾嘉时期对于稳定南疆的统治发挥了积极作用的话，到了道光时期，这种政策的弊端便在国力日衰的大背景下暴露无遗。张格尔叛乱的爆发不仅使南疆持续数十年的平静局面不复存在，清政府也不得不审时度势，开始对其南疆经略政策进行修订，以使之适应时代的要求，恢复南疆的稳定。

对于清政府南疆经略政策中的不适之处，嘉道年间，便有人不断提出建议，希望对其进行调整。这些建议普遍比较注重将解决新疆危机之道与解决内地日增的人口压力相结合，他们意识到内地人口的增长已经给社会造成巨大的压力，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与此关系极为密切，因此提出应移民新疆，从而达到开发新疆和减缓内地人口压力与社会危机的目的。嘉庆时期曾流放伊犁的洪亮吉是其中较早的一位，其后的龚自珍则最为著名，他在一系列作品中都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如在撰于嘉庆二十五年的《西域置行省议》中提出，如想达到以西域治西域，在政策上必须“人则损中益西，财则损西益中”[33]，即移民开发新疆，而这种移民是包括南疆在内的，并没有畛域之分。后来，龚自珍还针对当时清政府出于隔离汉回之道而限制内地人进入南疆的政策毅然提出应移民南路进行开垦，“开垦则责成南路，训练则责成北路”，这样新疆方能达到“官私一切裕”，而不再“仰给中国之解饷”。如此，则“匪但卡内之各城安，而卡外之哈萨克、布鲁特、爱乌罕、那木干、安集延以及巴克达山、温都斯坦之人亦慑我之声灵，而环向以安”[34]。其在新疆置行省，尤其是在南疆废除伯克之议，可谓济世良言，惜乎不为所用，直到六十年后，龚自珍之建议方得以实现。此后，魏源在其《答人问西

北边域书》和《圣武记》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尤其在《圣武记》中，魏源针对道光时期发生的张格尔叛乱提出，“其官兵则北路驻防，而南路仅换防；商民则北路携眷，而南路不得携眷。夫固畛域视之矣”，“且北路、南路，皆国家疆以戎索之地，何必一轮台，一瓯脱?”因此他认为南疆应“仿伊犁、乌鲁木齐移眷驻防之例，以回疆戍兵改为额兵，屯田裕饷，并许内地商民携家垦种，以渐升科”，如此，“不数年兵民愈衍愈炽”，就可以达到“外足以控制回户，内足以分中国生齿之蕃”的实边目的[35]。

而清政府之所以在张格尔叛乱后开始对其南疆经略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固然有针对其政策失误所作出的改变，最重要的因素却是，此时浩罕部落正在崛起，对清在南疆的统治形成了威胁，张格尔及其后的玉素普等发动的叛乱就得到了浩罕等势力的支持[36]。这种情况表明，清政府所持的内地人涌入南疆会对南疆稳定造成不利影响的担心并未成为现实，真正破坏性的因素主要来自外部世界。这种变化了的形势迫使清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南疆经略政策，防御外来威胁重新成为清政府南疆经略政策的重要着眼点。而且，张格尔叛乱的爆发及对张格尔叛乱的平定也许使清政府也认识到，南疆在种族文化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与内地的差异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了清对南疆的统治，南疆在文化的认同感等方面可能更容易受中亚外藩的影响，因此，南疆较为封闭的局面必须得到改变，而向南疆进行移民无疑是必须采取的措施之一，其目的就是要借此来增进内地与南疆的交流，增进清政府对南疆的影响力，并促进南疆与内地一体化的进程。同时，鉴于叛乱的频发以及浩罕的崛起，增加南疆的驻军势在必行，这势必牵扯到其他一系列政策的改变。

另外，清政府之所以对其政策做出调整，也是对存在于当时的“弃地说”的一种反应。早在康雍乾时期，就有人认为政府长期用兵西域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觉得不应该花费巨大财力物力去收服这块无用之地[37]。到了道光时期，由于张格尔和玉素普叛乱的爆发，加之清王朝国力已呈衰弱之象，因此“弃地说”又嚣然尘上，尤其是主张放弃南疆西四城。事实上，这种论调的出现首先与道光本人的态度有关。在平定叛乱前，道光帝就曾密下手谕：“以事平之后西四城可否仿土司分封之例，令将军、参赞筹议”[38]，显示出道光对在南疆西四城的统治感到有些力不从心[39]。此后，一些人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纷纷提出弃西四城的建议。如长龄在办理回疆善后事宜中，提出：“愚回崇信和卓，犹西番崇信达赖喇嘛，已成不可移之固习。即使张逆就擒，尚有其兄弟之子在浩罕，终留后患，势难以八千留防之兵制百万犬羊之众。若分封伯克，令其自守，则如伊萨克、玉素普等，助顺官兵，均非白回所心服之人。惟有赦故回酋博罗尼都之子阿布都里，乾隆中羁在京师者，令归总辖西四城，庶可以服内夷、制外患。”[40]武隆阿亦奏言：“善后之策，留兵少则不敷战守，留兵多则难继度支。前此大兵进剿，贼即有外袭乌什，内由和阗直驱阿克苏之谋。……臣以为，西四城各塞环偪外夷，

处处受敌，地不足守，人不足臣，非如东四城为中路必不可少之保障；与其糜有用兵饷于无用之地，不若归并东四城，不须西四城兵费之半，即巩若金瓯，似无需更守西四城漏卮。"[41]

长龄与武隆阿无非觉得清政府在西四城的军事力量有限，不利于其统治，而增兵自然要增加兵饷，南疆必将成为内地的沉重负担，因此他们希望清政府退守东四城，西四城交由伯克统辖，仿西南分封土司之例，接受清政府的羁縻，保持藩属关系。这样清政府就可以节省大量兵饷，而边疆亦能稳定。

这种荒谬的弃地之说在当时就遭到许多人的猛烈抨击，如沈垚称："夫汉不有西域地，然弃西域则河西受敌；唐不有龟兹以西地，然弃四镇，则伊西庭三州单弱。故当时君臣深谋远虑，悉力与匈奴土蕃争，而不肯弃也。"[42]同样，清政府对西四城的统治也关系着内地的安危，"夫回部者，安西关内之藩篱也；四城者，又回部之藩篱也。藩篱固，则腹心安，腹心实，则藩篱益固[43]。"因此他竭力反对这种弃地之说。道光帝虽然态度有些暧昧，但是由于平叛的顺利进行，张格尔与浩罕的矛盾爆发，同时在那彦成和松筠等强硬派的反对下，道光帝最终驳斥长龄与武隆阿之议，以那彦成代长龄，筹办善后事宜。而且，道光帝认为，"英吉沙尔为外藩各国入回疆之总道，弃之则朝贡路断，和阗南通后藏，叶尔羌等城岁解伊犁铜布棉数万，弃之则伊犁经费有缺……四城据葱岭之要，无四城是西面无门户也。"因此他认为"四城不可不复，非一劳不能永逸"[44]。虽然此后在玉素普叛乱后，这种弃地说又有所抬头，如署陕甘总督鄂山认为，西四城"不值糜饷劳师，以国家有用之经费，用之于无益之荒陬"，仍然建议仿土司之例，以阿奇木伯克进行统治[45]，即国家仅对其实行羁縻。后长龄又提出放弃西四城的主张。但由于长龄所议欲将参赞大臣由喀什噶尔移至喀喇沙尔，两地相距遥远，有事鞭长莫及，且示弱于贼，因此道光帝未允其议[46]。这种弃地的观点也遭到了一些官员的坚决反对，如当时的伊犁将军玉麟奏称："西四城为东道藩篱，南八城为西陲保障"[47]，坚决反对弃西四城而退保东四城的主张。此后，恩特亨额亦奏称："南路八城与伊犁、乌鲁木齐等处相为表里，处处有径可通，若南疆不守，则伊犁至巴里坤各城不啻断其右臂，偶有蠢动，北路必守御维艰"，"假令弃西四城，而退守阿克苏，不啻舍高阜而旧湫隘"，"一旦撤兵退守，该回众倘被诸夷滋扰，将为之救援，仍不免羁縻劳师，不为救援，则以数十年列入边氓之回，势难任其蚕食"。他还指出，如弃守西四城，这里的数万商民不免要"驱之内徙"，从而"遽令失业，众心涣散，尤为可虞"。因此坚决反对弃地之说[48]。

但是，弃地说的存在也反映了清政府南疆经略政策中的一些问题，如兵源不足势必对南疆防御外来威胁有不利的影响，但是在当时，南疆仅驻扎以有限的换防兵，正如长龄所言"势难以八千留防之兵制百万犬羊之众"，因此增兵势在必行。然而增兵必将增加兵饷，加剧清政府的负担，难怪武隆阿称"留兵多则难继度支"。所以有此争议在当时也属正常。正

如沈垚所言："但奉行成例，岁岁仰关内脂膏，以赡防守之卒，是守外徒以耗内，非卫内也。平时尚不免耗内，况有事乎？不欲耗内，则必弃外，此议者所以有四城悬远难守之说也。然则远终不可守乎？非也。"[49]这就要求清政府必须对其南疆经略政策作出适当的改变，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加快南疆的经济发展，最终达到稳定南疆统治的目的。

作为清政府处理玉素普叛乱善后事宜的代表，长龄经过调查后奏请道光帝对相关政策作出调整，主要有：(1)增兵西四城，移参赞大臣于叶尔羌，并驻重兵于叶尔羌，由参赞大臣相机遣援，无烦由内地征调；(2)新增兵额之粮饷，由内地拨付；(3)在南疆开展屯田，待回疆屯田兴举有效、地利日增、生聚日盛、兵民日固后，再停内地粮饷，以回疆兵食守回疆[50]。对此，道光帝表示同意。

在时势变化的影响以及外来威胁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基于长龄的奏议，清政府最终对其南疆经略政策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它首先改变了以前重北轻南的观念，增加了南疆的驻军。

张格尔叛乱的爆发使南疆军备不足的问题凸现无遗，御史钱吉仪在道光七年奏称："此次南路办善后，非增驻兵丁不足以壮军威。"[51]因此清政府在平叛中从内地调集了大批军队，道光七年统计，在平定张格尔第三次叛乱中，清政府共调遣官兵达三万六千余名[52]。即使在平叛后，出于财政原因，清政府对这些军队进行了裁减，但南疆留兵数仍达到一万八千名[53]，已大大超过乾嘉时期南疆驻军数，甚至接近乾嘉时期新疆总驻兵数。道光八年，那彦成协同杨芳、武隆阿亦奏请增设南疆各城将备，认为："除满洲兵照旧安设，无庸议增官员外，查喀什噶尔旧设绿营防兵六百二十余名，新增三千七百名，……英吉沙尔旧设绿营防兵二百名，新增防兵二百名，……叶尔羌旧设绿营防兵六百八十余名，新增六百名，……阿克苏旧设绿营防兵七百余名，新增一千名，……乌什旧设绿营防兵七百八十余名，新增一千名。"[54]尽管此后南疆驻军数又有一定的调整，但总体上并无更多的改变。

但清政府对其政策作出的调整，最主要的部分在于废弃南疆携眷之禁，积极发展屯田。

驻军的增多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就是粮食供应问题。清统治者一直希望能够通过实际的措施，尽量减少新疆对内地的依赖，甚至要达到以新养新的目的。在北疆，通过各种屯田措施，其农业发展速度是较快的，乾隆中期乌鲁木齐的粮价甚至远远低于内地就是佐证[55]，因此粮食问题并不突出。在南疆，由于乾嘉时期驻军较少，因此粮饷负担亦较小，但在平定张格尔叛乱后，驻军的迅速增加造成粮饷问题骤然突出，以前的政策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改变势在必行。正如沈垚所说："夫所谓守之之道，则屯田积谷而已矣。四城兵火之后，田庐芜没，邑郭空虚，宜及时量留官兵田要地，徙他处回户实四城，宜垦荒废之土，不足则募民无田而壮健敢远徙者，诣田所就耕垦为本业，又令于闲暇时，习骑射战陈之法，使人皆可用，且耕且守，有变不至遥遥于万里外劳蔽索伦兵，庶几威服西国。"[56]

而且，虽然乾隆统一南疆以后，不断涌入的内地人对南疆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毋庸置疑，相较北疆而言，其发展速度是缓慢的，这与清政府不准携眷以及在南疆不实行屯田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时人所谓"南路各城商民非携眷久居者可比，时来时去，其开设铺房，耕种地亩，不免有启闭垦荒情事"[57]。它所造成的后果是，南疆内地商民的流动性大大高于同时期北疆的携眷商民[58]，这不仅影响到内地人在南疆的定居以及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正如魏源所言，不推广携眷之措，则"家室不成，生聚不盛，人心不固，垦辟不富。且北路、南路，皆国家疆以戎索之地，何必一轮台，一瓯脱？"[59]这必将影响到南疆的发展以及内地人向南疆的流动。

清政府在平定张格尔叛乱的过程中对此亦渐有所识。正如道光帝于道光七年指出："驻兵屯田自古备边之良策。现在回疆西四城虽经戡定，而逆首仍窜逸稽诛，尚须多留防兵，豫筹粮饷。"此后，长龄奏请于喀什噶尔大河拐处空地"先行试垦，如有成效，陆续添设屯兵，以岁获粮石供支兵饷[60]"。同年，御史钱吉仪也奏请增兵南疆，并称"官兵既多，难尽取于回部，自应仿照北路开设屯田"[61]；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武隆阿同年也在向道光密陈善后情形时指出："(回疆)将来大局安定，似应仿照伊犁乌鲁木齐携眷驻防，作为回疆额兵，俾得族处群居，安心驻守，或认种地亩，或贸易经营。……至于内地商贾民人，向不准携眷前赴回疆，今官兵既议设眷，则商民携眷前来，亦听其便，其中偿有认垦开荒者，并准拨给地亩试种纳粮，从此兵民愈久愈多，回势渐形单弱，自不敢萌他志。"[62]

乾嘉时期清政府不许内地官兵商民携眷屯垦，主要担心涌入南疆的内地人与当地人之间会滋生事端，影响稳定，但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相反，在平叛中，内地人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有资料统计，在清政府平定张格尔的叛乱中，在喀什噶尔共有来自内地的一千多名商民为保卫城市牺牲了生命[63]。而在道光十年叶尔羌参赞大臣壁昌守护叶尔羌时，"时存城防兵仅1200名"，其中还包括"字识匠役"等人，但叶尔羌的内地商民与官兵联为一体，最终取得了保卫叶尔羌的胜利[64]。正如后来恩特亨额所指，"道光十年叶尔羌、喀什噶尔被围，该商民志切同仇，守御颇为得力"[65]。同年在英吉沙尔，当局也召集了大约500名内地人帮助抵抗入侵，这些人基本都由内地来的贸易商民组成，而当时驻扎在英吉沙以及台站附近的士兵总共只有360人[66]。尤为重要的是，在平叛中，当地的维吾尔族和其他一些民族的民众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平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就使清政府认识到，南疆的稳定离不开内地人，而且，包括内地人在内的南疆各族人民能够和睦相处，清政府是有凝聚力的。无论是内地人，还是当地维吾尔等民族并不会构成对清统治的威胁，关键在于统治者领导能否得力得法，政策能否代表和保护民众的利益。正如龚自珍所指，"今之守回城者何如？曰：令回人安益安，信益信而已矣。信生信，不信生不信，不以驼羊视回男，

不以禽雀待回女","守回之大臣,惟当敬谨率属以导回王回民,刻刻念念,知忠知孝,爱惜翎顶,爱惜衣食,唪诵经典,耕者毋出屯以垦,牧者毋越圈而刈。上毋虐下,下毋藐上,防乱于极微,积福于无形"[67]。清政府亦言:"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去秋守御极得兵民之力,即回众亦咸知兵威民力实足以捍卫地方,正宜因势利导,俾联为一体。"[68]

在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道光十一年,即在玉素普叛乱后,清政府终于废弃南疆携眷之禁,允许内地官兵商民携带家眷,同意和鼓励内地人移民扎根南疆,发展屯田。在长龄等人的建议下,清政府首先决定在西四城(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和和阗)实行屯田,"将西四城可种之闲地,招民开垦,有愿携眷者听之,其回子地亩,亦不禁其私给民人耕种",还命令叶尔羌参赞大臣壁昌"出示招谕,著妥为办理",并称"如试种有效,皆知地利可守,安家者渐多,有愿入伍者即准其充食名粮,收一眷兵,即撤一换防兵额,其防兵在戍既久,有自愿徙眷安家者亦听其便。数年之后可成一半眷兵一半换防之局,节费自属不少。且既有眷兵,即有余丁种地之人,日多挑兵之人不患其寡,彼时换防之额不难陆续撤回内地,所谓以回疆物产供回疆兵粮,兵民日益繁昌,则回心日益固结,是屯田一事实为安边便民、足兵足食之良法"[69]。后又针对喀什噶尔、巴尔楚克两处地方屯田事宜指出:"创办之始,只有民人到屯认垦,尚无携眷而来者……,并出示晓喻认垦屯田民,广为招集,如有内地无业贫民,携眷踵至者,拨给地亩,令其开垦谋生,妥为安抚。……总期草莱日辟,田亩日增,兵食攸赖,足以壮声势而实边储。"[70]甚至规定"其单身无业之人,一概不准给票"[71],禁止前往南疆。此后又进一步将这种政策施行于东四城。

道光后期,针对兵屯已不再适合形势发展的需要,清政府又适时地裁撤南疆的兵屯,改为民田。同时,对于屯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清政府也能及时做出调整,如道光十八年,由于管理不善,巴尔楚克屯田眷户纷纷逃回[72],道光遂命官员详查,对眷户妥为安集,稳定了眷户的情绪,没有造成更大的影响。这些都使南疆的农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清政府对其政策作出的这种调整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在19世纪30年代后,南疆的内地人明显增加,正如西方人所论,道光十二年在南疆出现了第一次移民浪潮,汉语和突厥语在当地同样可以"通行无阻"[73]。足见内地人增多所造成的影响。到道光后期,史料记载,仅喀什噶尔在册内地商民已达1968名,分布于城厢地带及各乡庄,未能统计在册的"年年续次来喀者,"还有"约计数千余人"[74]。道光十八年,恩特亨额奏称,"回疆各城商民聚集不下数万"[75]。我们还可以通过道光二十七年的一条史料来对此进行分析。针对以前鼓励移民的"内地民人前赴回疆领地耕种,由各省官为资送"条文,有官员提出异议,认为"若官为资送,则无业游民势必藉赴回疆为名,希图领费,甚至不肖之徒或半路折回,或潜在他处",因此道光指出,对于呈报愿携眷属前住种地民人,"由该地方官印给路票,发交

该民自行前往"[76]。虽然其中没有进一步的说明,但由此可见,当时自愿前往回疆的内地人是很多的,清政府已经不愿负担这种花费,而改为由民人自行承担。这说明内地人向南疆的涌入速度是比较快的。

在这种形势下,南疆的农业得到了极快的发展,屯田数大幅度增加,其增加额甚至超过了北疆。根据统计,从道光二十年到道光三十年,新疆新垦荒地125万多亩,其中南疆占了58%,北疆占了42%[77]。这对发展南疆的经济,改善南疆维吾尔族的生活以及促进人口的进一步增长自然有较为明显的作用。

尽管清政府对其政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并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然而鉴于这种调整仍然是在因俗而治和民族隔离原则下进行的,加之清政府受时代及认识的局限,因此改变并不彻底,依然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换防兵制没有得到彻底改革。事实上,在长龄提出的善后事宜中,并未涉及换防兵制的改革,或者说长龄本人根本就不想对此进行改革,正如长龄所言:"如贼敢深入,以主待客,前后夹攻,必可一痛创之无后患。即可酌减新兵,以复旧制。"[78]因此,道光时期,对南疆换防兵制只是作出了谨慎的调整,并未完全改为驻防兵制。正如上文所述,清政府鼓励移民屯垦,然后从移民中吸收兵额,"收一眷兵,即撤一换防兵额",而原有换防兵中如有愿携眷者听其便,其意图在于节省经费。这与北疆实行的政策其实刚好相反,北疆是从驻防兵子弟中发展屯户,而南疆则是从屯户中发展眷兵,这种区别反映出清政府在对待南疆问题上的谨慎态度,避免稍有不适而产生更大的争端。正如咸丰所言,"回疆各城,向无内地妇女,如改防兵为眷兵,纷纷迁驻,更易滋生事端。"加之改制费用巨大,因此命"所有该处换防兵丁均著仍照旧章办理"[79]。然而这种谨慎的态度在边疆危机逐渐凸现并日益恶化的时期,无疑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咸丰四年,在陕甘总督易棠等人的奏请下,清帝终于决定改革换防兵制,"添派伊犁满洲营兵二百名,乌鲁木齐绿营兵一千二百名,满洲兵三百名,裁叶尔羌、喀什噶尔、乌什、阿克苏四城防兵一千六十二名,以现裁及告留各兵补充缺额,并就近招募,易为眷兵"[80]。不过,由于内地危机对新疆的影响(主要是财政上的影响),这种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也没得到彻底的执行。

其次,清政府虽然允许内地民人携眷移住南疆,但是这种人口的流动并不自由,而是受很多条件限制,正如道光中期编撰的《回疆则例》中规定:"内地汉民前往回疆各城觅食佣工者,如无原籍年貌职业印票及人票不符,即行递解回籍";"内地汉回前赴回疆贸易佣工者,令在原籍请票出关,注明年貌职业,行抵各城,缴票注册,回日请票进关"[81]。这种非自由的流动对于欲赴南疆的内地人而言,自然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势必影响到流动的积极性。事实上,内地人真正实现向南疆的自由流动,已经是清末新疆建立行省之后了。

再次,清政府在南疆一直坚持的民族隔离原则不仅没有取消,反而在平叛后进一步加强。由于种种原因,民族隔离的原则在乾嘉时期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得到严格的实施,即使在乾隆五十九年,喀什噶尔专门兴建关厢用以内地商民贸易经商和居住,不使其混居于回城,其他城市等虽没有专门兴建关厢,但均在城内外建有铺房供商民贸易居住,这样的措施与其说是为隔离内地商民与当地穆斯林,还不如说是为了财政所需。因为政府通过向商民出租房屋可以获取相当的利益,来弥补财政的不足。如乾隆二十七年,乾隆针对乌鲁木齐拟收取前来贸易之民人租税一事,表示"即如所奏办理",而且"至伊犁及叶尔羌等城,有似此者,自当一体查办。著传谕将军大臣等,各城商民所居,酌定租额,既有裨公用,亦可就便稽查约束"[82]。

张格尔叛乱后,负责善后事宜的钦差大臣那彦成认为以往的驻兵之所距离回城太近,容易滋生事端,且修缮费用极高,因此他于道光八年奏请"与其修复旧城,不如择地重建"[83],此后清政府在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阿克苏等地专门兴建新城。修建这些城池的目的,首先是出于军事所需,即在张格尔叛乱后采取的一种防范措施;其次为隔离维吾尔族与包括驻军在内的内地人,史称至此时,"始与回子隔别而居"[84]。这样,民族隔离的原则就得到了具体、严格的贯彻。事实上,鉴于新城的环境氛围更接近于内地,因此内地商民等也更愿意居住于此,而非回城。

清政府在《回疆则例》中也做出了许多的规定,来限制内地人与当地维吾尔人的交往,如其中的"禁止回妇私进满城"、"禁止兵丁私入回庄"、"稽查汉回擅娶回妇"等条莫不有隔离之意。而且,清政府后来针对一些内地商民在回城开设当铺,放债重利盘剥维吾尔人的事情指出:"内地商民远赴回疆,自应安分守己,贸易经营",但据查,"回城内开设小押当铺户竟有五十四家之多",清政府遂令这些铺民于三十日内搬出城外,"不准再于回城逗留",且对其重利盘剥维吾尔人之事予以严惩,还命令这些内地民人在搬出回城后,不准将房屋等转卖给其他内地民人,"以免盘踞回城之弊"[85],这些都显示出清政府直到此时对于内地人与维吾尔人的交往依然存在着很强的戒备心理,依然认为他们之间的交往容易导致纠纷,从而影响到南疆的稳定。

再次,它影响到了南疆与内地在行政制度上的一体化进展。南疆由于内地人稀少,在政治上实行伯克制,清政府对其的统治实际上是一种间接统治。而在北疆和天山东路,由于内地人日益增多,其氛围几与内地无异,因此清政府在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地设立了与内地一样的行政管理机构州县制,其民事方面归陕甘总督管理。这样,这些地区就与内地首先在行政制度上实现了一体化,对于清政府的稳定统治必然有积极的影响。而南疆八城地区实行的伯克制,虽然统一归由新疆军府制的最高统治者伊犁将军管辖,但是相继爆发的张格尔和

玉素普叛乱,已经充分暴露出军府制的缺点,即"治兵之官多,治民之官少",南疆的民事问题多由维吾尔族伯克官员掌管,这些人经常从中弄权,直接影响到了清政府对当地的统治,正如左宗棠后来所言,在伯克制度下,"官民隔绝,民之畏官不如其畏所管头目"[86],在各地容易形成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87],从而对清王朝在南疆的统治产生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南疆的稳定,以致出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新疆的大动荡。因此,伊犁将军领导下的伯克制无疑是造成动荡的重要因素,许多官员学者都曾呼吁对伯克制实行改革或是废除伯克制,甚至有人主张在新疆设立行省。难怪后来左宗棠认为南疆非割除旧俗,渐以华风,难冀久安长治[88]。清政府在处理善后事宜中,虽然曾对伯克制作出一定的调整,削弱了伯克的权力,但这并不能起到根本的作用。而且,针对军府制存在的问题,清政府也只是增加了几个治民的官吏,这显然不能适应时势的发展。至于在新疆设立行省,使其早日实现与内地在行政制度上的一体化,促进其发展之议,在当时更是应者寥寥,根本就没有实现的可能[89]。只能让人引以为憾。

这些都说明,虽然道光时期清政府在南疆经略政策上做出了一定的调整,但鉴于回疆的特殊居住群体及其地处边隅,清政府在制定南疆的各项政策时,始终是小心翼翼的,不敢做出任何大刀阔斧的改革,譬如对待南疆屯田一事,尽管清政府鼓励内地民人到南疆屯垦,但对于民回杂处是否能够相安无事却没有把握[90],因此在落实具体政策时必然有所掣肘,从而影响对南疆的经营和南疆的发展。

因此,虽然在道光中期以后,南疆的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清政府对南疆的统治有所加强,但总体而言,由于清王朝国力日益衰微,危机重重,尤其在鸦片战争后,边疆危机日益严重,俄国更是构成了对中国西北边疆的最大威胁,加之清政府经略南疆政策中存在的种种失误和政策执行的不彻底性,这些因素都使得南疆的发展充满了波折,最终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清政府在南疆的统治势力于阿古柏入侵期间暂时退出。而在清政府收复新疆的行动中,围绕新疆问题的争论又将南疆置于一个较为尴尬的地步,这场争论首先是"海防"与"塞防"之争,当以左宗棠等为首的"塞防"派获得清帝的支持后占据上风时,对南疆的"弃取"之争又成为新的争论焦点[91]。虽然最终在左宗棠等人力主之下,包括南疆在内的几乎整个新疆又重新为清政府统一,然而几乎持续整个有清一代的这场争论还是说明清政府对南疆的重视程度的不足,这必然导致其政策的不彻底性和摇摆性,并容易使时人对南疆产生歧义。

直到光绪十年,新疆建省之后,南疆许多人为的壁垒方得到消除,与内地的融合进程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只可惜此时清王朝已是日薄西山,南疆所面临的问题又非此能解决了。

注 释

〔1〕此处之南疆,仅指南疆八城,即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英吉沙尔(以上四城为西四城);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以上四城为东四城)。

〔2〕参见成崇德《清朝前期的边疆经略》,见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页266—267。

〔3〕参见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西域研究》,2002年第4期,页1—15。邸永君《清代边疆民族政策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9月2日,第3版。

〔4〕《西域闻见录》卷一,页4,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民俗文献》第一卷,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总页166。

〔5〕傅恒等编《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三十一,"兵防",文海出版社,1970年,页15。

〔6〕《清高宗实录》(八)卷五七○,乾隆二十三年九月戊戌,中华书局,1986年,页240。

〔7〕祁韵士《西陲要略》卷三"伊犁驻兵书始",中华书局,1985年,页39。

〔8〕《清朝通志》卷九三,食货略卷十三,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志7296。

〔9〕《清高宗实录》(九)卷六五六,乾隆二十七年三月甲午,页337-338。

〔10〕曹振镛等纂《钦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六)卷五十五,道光七年十二月癸酉,页9—10,文海出版社,1966年,总页3218—3219。

〔11〕《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屯政一,页2b。

〔12〕至嘉庆末年,南疆的兵屯仅有喀喇沙尔3工,乌什4工,阿克苏1屯,另在喀喇沙尔所属曲惠有民垦地1处(参见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页134)

〔13〕《清朝通典》卷十六,职官四,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典2175。

〔14〕赵翼《清朝武功纪盛》卷二,"平定准噶尔正编述略",文海出版社,1967年,页91。

〔15〕《清宣宗实录》(五)卷二六七,道光十五年六月己丑,页96—97。

〔16〕可参见李世愉《清前期治边思想的新变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1期,页5—14。

〔17〕参见贾建飞《马继业与辛亥革命前后英国在新疆势力的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1期,页64—76。

〔18〕准噶尔统治南疆时,凡本地回人往外贸易带回物件者,抽税十分之一,外处回民贩来物件,抽税二十分之一,见《清高宗实录》(八)卷五九三,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庚午,页599。乾隆二十五年,回城伯克等恳告云:"旧例收税稍重,彼时牲只价贱,尚不甚累,今逆酋扰害之后,叶尔羌、喀什噶尔,羊一只,价至十余两,肥马一匹,价至五六十两,商贾未免观望不前,祈暂减收",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将此种税率做了一定的改动,"回人买来牲只,暂改为二十分取一;外来商人牲只,暂改为三十分取一,其余皮张缎布,仍照旧例收纳",见《清高宗实录》(八)卷六○,乾隆二十五年正月辛未,页794。此后这种税率基本确定下来,"外藩商人在回部贸易者,三十分抽一,皮币,二十分抽一。回部商人自外藩贸易者,二十分抽一。皮币,十分抽一"。成为定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理藩院资料辑录》,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8年,页297)。

〔19〕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32.

〔20〕南疆维吾尔人所居之城,一般称为回城;而对于南疆的内地官兵与贸易商民等居住之城,历来称呼不一,最普遍的称呼是汉城,也有满城、新城、镇城等等称呼。如果从时人记载来看,乾嘉时期仅存在新城和镇城,而没有与"回城"相对之"汉城"或是"满城"。因此,一些学者将乾嘉时期的这些城池也称为满城或是汉城显然是不妥的。满城和汉城这样的称呼均出现于道光前期,它的出现一方面显示出随着张格尔叛乱的爆发,清王朝逐步加强了其在南疆早已实行但却并未严格执行的民族隔离政策,因此史书记载,至此时"始与回子隔别而居"(璧昌《守边辑要》,文海出版

社,1978年,页199);另一方面也说明,道光以后,尤其在张格尔和玉素普之乱后,涌入南疆的内地人日益增多,生活在这些城市中的主体民族逐渐在发生某种变化。满城的称呼一般仅存在于清统治者中,这也许是基于包括军府大臣在内的满蒙八旗官兵所占据的主体地位而言,即他们是这些城市的真正主导者,其他人则处于一种从属地位。而汉城称呼的出现以及流传则显示出以汉人为主的内地人逐渐在这些城市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汉城作为对这些城市的称呼无疑更能反映出历史真正的发展趋势,更加深入人心,同时以主体民族而论,其相对"回城"而言也是最为合适的。因此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这些城市的称呼也是不同的:乾嘉时期,有新城之说,亦有镇城之说,如以性质而论,镇城相对而言较为合适;满城的说法始自张格尔叛乱后,但其存在的时间极短,鸦片战争后便很少出现;汉城的出现与盛行与南疆日益增多的内地人的影响有关,其盛行在鸦片战争后。因此,我们在使用相关的术语时务必要考虑到具体的历史时段,使其更为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

〔21〕永贵、固世衡原撰,苏尔德增撰《新疆回部志》卷一"城池",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民俗文献》第二卷,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页17。《清高宗实录》(九)卷六七四,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辛未,页542-543;傅恒等编《平定准噶尔方略》(三)续编,卷十九,页12-13,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辛未,《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总页764。

〔22〕《平定准噶尔方略》(三)续编,卷十一,页20,乾隆二十六年五月癸丑,总页658。

〔23〕《新疆回部志》卷一"城池",页17。

〔24〕和宁《回疆通志》卷七,页28,文海出版社,1966年,总第200页。

〔25〕《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三十二,页22,乾隆三十年十月甲寅,总页952。

〔26〕《清仁宗实录》(四)卷二三一,嘉庆十五年六月己酉,页107。

〔27〕参见罗运治《清高宗统治新疆政策的探讨》,台北里仁书局,1983年,页88。另外,曾问吾在其《中国经营西域史》中也指出,清政府严禁汉回交通,其原因之一在于"防止汉人教唆回人携贰计"(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中编,文海出版社,1978年,页296)。

〔28〕《清高宗实录》(十)卷七五四,乾隆三十一年二月辛亥,页306。

〔29〕如龚自珍称:"督抚必皆驻北路者,北可制南,南不可制北。昔者回部未隶天朝,无不甘心为准夷役者,亦国势然也。"(《西域置行省议》,《龚定庵全集类编》卷7,中国书店,1991年,页169)

〔30〕参见罗运治《清高宗统治新疆政策的探讨》,页88—89。

〔31〕华立《新疆的军府制度》,见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页343。

〔32〕以农业为例,乾嘉时期,政府不许内地民人携眷前往南疆,事实上关闭了内地民人进入南疆落户屯垦的大门,除单身商民时来时去,往返贸易外,在南疆从事农业生产的内地人寥寥无几。这一时期,南疆农业的发展主要是在当地维吾尔族农民的努力下得以实现的,清政府的某些政策和措施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南疆农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页134)。因此南疆的农业发展远在北疆之后。正如龚自珍在其《西域置行省议》中指出:"(西域)屯田总计,北才二十三万八千六百三十一亩,南才四万九千四百七十六亩,合计才二十八万八千一百零八亩。"(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龚定庵全集类编》卷7,页165)魏源在其《圣武记》中也指出,"乾隆二十三年戡定新疆经画善后之计,北路详于南路,故屯田二十八万余亩,而南路不及五分之一"(魏源撰,韩锡铎、孙文良点校《圣武记》卷四"外藩·道光重定回疆记",中华书局,1984年,页190)。而且,南疆的屯田主要是兵屯,其性质决定了这种生产仅以保障军粮为其目的,当军粮满足需要时,其规模便不再扩大,甚至缩小,难以与当地形成紧密联系和保持稳定持久的农业生产能力。(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发展史》,页112)这必然对南疆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当地群众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样,由于禁止携眷,内地与南疆的民间贸易往来必然受到严重影响,如影响到贸易者的贸易积极性,贸易规模,等等,因此,与北疆相比,南疆的这

种贸易要远为落后。
〔33〕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见《龚定庵全集类编》卷七，页165。
〔34〕龚自珍《御试安边绥远疏》，《龚定庵全集类编》卷七，第187—189页。
〔35〕《圣武记》卷四，"外藩·道光重定回疆记"，页190—191。
〔36〕据说其中还有英国人的影响，见包尔汉《论阿古柏政权》，载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79年，上册，页472—498。
〔37〕可参考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页39—43。
〔38〕《圣武记》卷四，"外藩·道光重定回疆记"，页188。
〔39〕详见厉声《那彦成新疆善后制外浅析》，《新疆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页40—48。
〔40〕《圣武记》卷四，"外藩·道光重定回疆记"，页188。
〔41〕《圣武记》卷四，"外藩·道光重定回疆记"，页188。
〔42〕沈垚《新疆私议》，《落帆楼文稿》卷一，中华书局，1985年，页4。
〔43〕《新疆私议》，《落帆楼文稿》卷一，页7。
〔44〕《新疆私议》，《落帆楼文稿》卷一，页4。
〔45〕《清宣宗实录》（三）卷一七八，道光十年十月甲寅，页799。
〔46〕《圣武记》卷四，"外藩·道光重定回疆记"，页196。
〔47〕赵尔巽《清史稿》传三六七，列传一五四，"玉麟"，中华书局，1977年，页11464—11465。
〔48〕恩特亨额，朱批奏折·民族事务0093－1，道光十八年五月二日。
〔49〕《新疆私议》，《落帆楼文稿》卷一，页6。
〔50〕《圣武记》卷四，"外藩·道光重定回疆记"，页196。
〔51〕《清宣宗实录》（二）卷一二五，道光七年九月戊申，页1086。
〔52〕《清宣宗实录》（二）卷一二五，道光七年九月辛亥，页1089。
〔53〕《清宣宗实录》（二）卷一二九，道光七年十一月辛亥，页1154。
〔54〕《钦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七）卷六七，道光八年秋七月辛丑，页10—12，总页3848—3852。
〔55〕纪昀《乌鲁木齐杂诗》中云："割尽黄云五月初，喧阗满市拥柴车。谁知十斛新收麦，才换青蚨两贯余。"（天下粮价之贱，无逾乌鲁木齐者。每车载市斛二石，每石抵京斛二石五斗，价止一金，而一金又止折制钱七百文。故载麦盈车不能得钱三贯。其昌吉、特纳格尔诸处，市斛一石，仅索银七钱，尚往往不售）（纪昀撰，孙致中等点校《纪晓岚文集》第一册，《乌鲁木齐杂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页601）
〔56〕《新疆私议》，《落帆楼文稿》卷一，页6。
〔57〕录副奏折·民族事务，嘉庆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那彦保奏。
〔58〕华立《乾嘉时期新疆南八城的内地商民》，载马大正主编《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384。
〔59〕《圣武记》卷四，"外藩·道光重定回疆记"，页191。
〔60〕《清宣宗实录》（二）卷一三〇，道光七年十一月戊午，页1157—1158。
〔61〕《清宣宗实录》（二）卷一二五，道光十年九月戊申，页1086。
〔62〕《钦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六）卷五五，道光七年十二月癸酉，页9—10，总页3218—3219。
〔63〕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著《新疆简史》第一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330。
〔64〕璧昌《叶尔羌守城纪略》，《守边辑要》，文海出版社，1978年，页159—163。
〔65〕恩特亨额，朱批奏折·民族事务0093－1，道光十八年五月二日。
〔66〕Beyond the Pass，p145.
〔67〕以上引文见龚自珍《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龚定庵全集类编》，第176－178页。
〔68〕长龄《长文襄公办理善后奏议》上卷"覆议筹办情形旨"，见马大正、吴丰培主编《清代新疆稀见

奏牍汇编》(道光朝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 年,页 85。

〔69〕《长文襄公办理善后奏议》上卷"覆议筹办情形旨",见《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道光朝卷),页 85。

〔70〕《清宣宗实录》(四)卷二五二,道光十四年五月辛巳,页 817。

〔71〕《清宣宗实录》(三)卷一六六,道光十年三月甲午,页 568—569。

〔72〕《清宣宗实录》(五)卷三一四,道光十八年九月乙丑,页 902—903。

〔73〕《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页 416—417。

〔74〕珠克登所著《喀什噶尔略节事宜》,转引自《乾嘉时期新疆南八城的内地商人》,载马大正主编《西域考察与研究,页 373—390。

〔75〕恩特亨额,朱批奏折·民族事务 0093 - 1,道光十八年五月二日。

〔76〕《清宣宗实录》(七)卷四四,道光二十七年五月壬寅,页 545。

〔77〕陈延琪《1840—1949 年新疆人口的发展变化及其原因初探》,《西域研究》,1992 年第 1 期,页 86—93。

〔78〕《圣武记》卷四,"外藩·道光回疆善后记",页 196。

〔79〕《清文宗实录》(一)卷四十一,咸丰元年闰八月丁亥,页 563。

〔80〕《清文宗实录》(三)卷一一八,咸丰四年正月庚申,页 35。

〔81〕《钦定回疆则例》卷八,续纂,"禁止回妇私进满城",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续编·西北史地文献卷》,第五册,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 年,页 455,457。

〔82〕《清高宗实录》(九)卷六七四,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戊辰,页 541。

〔83〕《钦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六十五,页 17,总页 3747—3748。

〔84〕壁昌《守边辑要》,页 199。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多数人认为是指将当时的贸易商民与维吾尔族相隔离,但事实上,更应该理解为这些善后重建的新城与回城的隔离,因为在此前只有喀什噶尔有独立于回城的驻扎官兵之所,其他城市则是官兵、内地商民与维吾尔族共处一城,只以界墙相隔。

〔85〕富兴阿《晓喻回民兴利除弊抚绥回众订立十五条款希格禀遵》,见《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道光朝卷),页 197,201。

〔86〕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三,页 34,"覆陈新疆情形摺",文海出版社,1979 年,总页 2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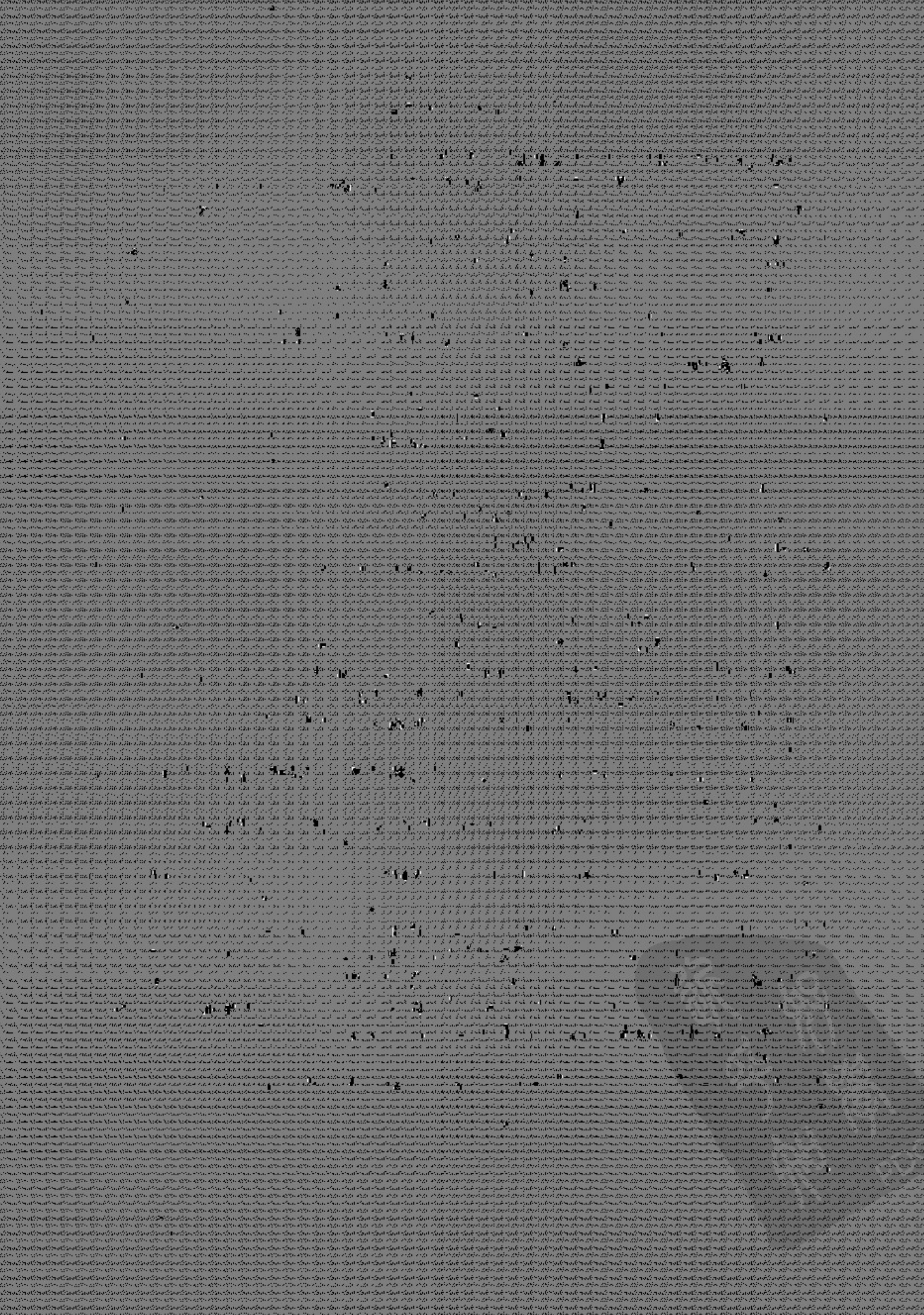
〔87〕齐清顺《新疆建省及其历史意义》,见《西域史论丛》(第一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年,页 224—242。

〔88〕《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三,页 34—35,"覆陈新疆情形摺",总页 2135—2136。

〔89〕对于新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可参看苏德毕力格《边疆危机与传统治边政策的转变:清政府对新疆蒙古西藏一体化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00 年。

〔90〕如道光二十四年,道光帝针对阿克苏等城屯田事宜提出:"民回杂处,现在开垦荒地,若令民户认种,究竟能否相安",就表现出了他的这种顾虑(《清宣宗实录》(七)卷四一〇,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壬戌,页 148)。

〔91〕可参考赵春晨《清季关于新疆问题的争论》,《西北史地》,1983 年第 4 期,页 37—45。



靺鞨与朝鲜半岛诸国关系述考

——以7世纪末之前为中心

马 一 虹

中国史书所记靺鞨部族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内容中(不包括对中原王朝),涉及朝鲜半岛国家最多,特别是和高句丽。史籍所见,由于靺鞨在地理上受高句丽的阻隔等因素,与百济和新罗联系甚少。另一方面,在《三国史记》中,"靺鞨"自公元前1世纪起即已活跃在朝鲜半岛,比中国史书早出六百余年。这些"靺鞨"(为便于区别两国史籍中不同时期的靺鞨,本文凡属于《三国史记》所出563年以前的靺鞨,一律加引号,以区别于中国史籍563年后的靺鞨记事)与中国史书中的靺鞨部族是何种关系;6世纪后在朝鲜半岛活动的靺鞨人都有哪几种势力,这些势力及与诸国的关系对其自身历史发展进程以及对半岛地区的政治局势产生了何种影响。上述情况,史书记载既不详,后世学者或有研究,但仍有许多问题待进一步究明。限于篇幅,本文只试对7世纪末即渤海建国前的有关问题进行讨论。

一 《三国史记》中的"靺鞨"考辨

(一)问题的提出

《北史·齐本纪下》(卷七)载:"河清二年(563)……是岁,室韦、库莫奚、靺鞨(一作靺羯)、契丹并遣使朝贡"。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史籍可考靺鞨的最早记录。但是,在朝鲜史籍《三国史记》中,自百济温祚王二年(前16)起,"靺鞨"就已多次出现。这些"靺鞨"与《北史·齐本纪下》中所载、活动在今中国东北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靺鞨部族属同一集团,还是另有他属,学界意见不一。

最早谈及这个问题的,是高丽僧一然著《三国遗事》[1]:

又《三国史记》云:百济末年,渤海靺鞨、新罗分百济地据此则鞨海又分为二国也。罗人云北有靺

鞨，南有倭人，西有百济，是国之害也。又靺鞨地接阿瑟罗州。又东明记云卒本城地连靺鞨或云今东真。罗第六祇麻王十四年乙丑(125年)靺鞨兵大入北境，袭大岭栅，过泥河。《后魏书》靺鞨作勿吉。指掌图云挹屡(应作"娄"——本文作者)与勿吉皆肃慎也。

显然，《三国遗事》作者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并没有能够做出较有说服力的解释，依旧将"靺鞨"与勿吉联系在一起。

后世学者研究这段史料时，提出了种种主张和推测。朝鲜学者丁若镛认为"靺鞨"即是东沃沮[2]。那珂通世直接相信《三国史记》的记载，认为靺鞨之名并非始自隋唐，肃慎之后，就是靺鞨[3]。小川裕人认为早在高句丽灭亡之前靺鞨族就已经南下到今江陵附近[4]。干志耿、孙秀仁则认为可备一说[5]。鸟山喜一、金毓黻等认为《三国史记》"靺鞨"记事不是中国载籍中出现的靺鞨，或可认为是秽貊的易名[6]。

对此，我认为还有必要对《三国史记》一书本身作些考察。其理由是，以往的研究将《三国史记》中所见"靺鞨"与中国东北的靺鞨之间关系，或是全盘认可，或是一概否定掉，而没有注意分析"靺鞨"的内涵在《三国史记》中可能因时期和地域而有所不同。《三国史记》大量、直接袭用中国史籍的有关记事，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考虑到作者将《三国史记》中的"靺鞨"与中国东北的靺鞨部族掺杂、混合在一起的可能，弄清高句丽灭亡以前书中大量出现的"靺鞨"的性质。

在《三国史记》中，"靺鞨"经常单独或跟随高句丽侵扰百济和新罗的"北境"、"北边"：自公元120年到611年，"靺鞨"侵入新罗共计12次；自公元前16年到公元548年，侵入百济则有24次。

从上述记事看，"靺鞨"似乎有自己相对固定的居住地域，且邻近百济和新罗北境。因此不能认为是分布于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靺鞨流寇式地南下入侵新罗、百济国北境附近，而很可能他们就生活在地近三国的某地。新罗和百济的北部是高句丽，在一般情况下，"靺鞨"不可能越过高句丽直接南下，攻打新罗和百济，何况又是如此频繁地出兵。这样，"靺鞨"的住域，就应当求诸高句丽的东边。

据《三国志》和《后汉书》，汉代以来，生息、活动在这一地区的是濊人，濊有时也作"秽"，有时与貊连称为"秽貊"[7]。《三国志·魏书·濊传》(卷三〇)载："南与辰韩，北与高句丽、沃沮接，东穷大海，今朝鲜之东皆其地也。"《三国志·魏书·东沃沮传》(卷三〇)载："东沃沮在高句丽之盖马大山之东，滨大海而居。其地形东西狭，南北长，可千里，北与挹娄、夫余，南与濊貊接。"公元前后，东沃沮就活动在咸镜南北道一带。东沃沮存世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世纪中叶左右。虽然现在无法正确指出东沃沮的南边在哪里，但是其中心

地区在咸镜南道金野，该地区考古文化的典型器物细形青铜剑，最南端分布到江原道文川一带。据此，东沃沮的南界似大体应在江原道的德原一带[8]。若如此，则濊的北边就不难判明，也应在其附近。

从中原史书看，中原王朝对此一地区的了解，实际上始自245年毋丘俭伐辽东。《三国志·魏书》的“濊”传与“东沃沮”传是记录3、4世纪前朝鲜半岛北部历史的珍贵资料。据上述记载可知，至少濊的南部住域与《三国史记》中“靺鞨”是重合的。如此，则“靺鞨”与《三国志》、《后汉书》时代的濊，很可能是同一处所同一部族的别称。

《三国史记》中还有一些记载可以佐证“靺鞨”即濊。据《百济本纪》圣王二六年(548)条：“春正月。高句丽王成与濊谋。攻汉北独山城。王遣使请救于新罗。罗王命将军朱珍领甲卒三千发之。”检索《三国史记》，入侵百济、新罗者(包括与高句丽合谋入侵者)，均为“靺鞨”，而惟独此处作“濊”，因此，似乎这里的“濊”除去“靺鞨”而无其它可能。

问题是，《三国史记》编纂者为什么要以“靺鞨”代“濊”(“秽貊”)，以往的研究往往多注重从东北古代民族性质、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脉络来分析[9]，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我以为还有必要从《三国史记》这部史籍本身挖掘一下原因。

(二)《三国史记》史料来源与构成

三国时代，各国都有编纂史书的事业，《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卷一五)婴阳王十一年(600)条载，太学博士李文真将高句丽古书《留记》一百卷改编成《新集》五卷；《三国史记·百济本纪》(卷二四)载，375年，百济博士高兴编“书记”，是为百济历史有文字记载之始，只是“高兴未尝显于他书，不知其何许人也”；《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卷四)载，541年，新罗大阿飡居柒夫等广集文士，编“国史”。但是这些史书无一传世，所以金富轼在编纂《三国史记》时，是否引用、以及引用了哪些所谓三国古史资料，今已无从查证，但他大量借鉴了中国史籍的记事，许多方面甚至直接引用，体例上也多借鉴中国史籍，却是毋庸质疑、有据可查的。其中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等为多[10]。金富轼对于“秽貊”的认识亦直接受到中国史籍的影响。

《后汉书》只载高句丽(骊)史事，未设百济、新罗传(同卷有“韩传”记三韩史事，其中“马韩”即后来之百济，“辰韩”即后来之新罗)。汉魏之间史事，凡是中国史籍有记载的，金富轼在《三国史记》中均原文保留；对于中国史籍中未涉及到的濊人和百济、新罗间关系的，则一般将濊记作“靺鞨”。金富轼既然极为重视《新唐书》，则他对靺鞨七部、以及靺鞨与高句丽有关的部分，应当是非常了解的；同时他也该了解中国史籍中“濊”(秽貊)、“靺鞨”等的所指。因此，他用“靺鞨”取代中原史书中的“濊”，应当另有原委。

在古代中原史家和现今许多研究者的认识中，靺鞨是承肃慎—挹娄—勿吉谱系而来的，

但如果仔细玩味《隋书》以后的各“靺鞨传”，就会发现，肃慎系很可能只是后来的靺鞨部族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隋书·靺鞨传》和《北史·勿吉传》并没有提到靺鞨（勿吉）即古之肃慎，而是在介绍过七部名称及所在之后，特别补充一句：“自拂涅以东，矢皆石镞，即古之肃慎氏也。”两书的编撰者说得很清楚：七部之中只有拂涅以东的诸部才是古肃慎国。也就是说，拂涅以西各部则属于另外的系统。同样，靺鞨部族中含有勿吉的成分，但并不就等同于勿吉。《旧唐书·靺鞨传》、《新唐书·黑水靺鞨传》等所载靺鞨人语言、生业、习俗、法制等许多方面与挹娄“基本一致”[11]，但这些“基本一致”，主要体现在靺鞨中肃慎系（或者说分布在北方的）这一部分靺鞨的特征，并不一定代表靺鞨部族全体的情况。靺鞨部族实际上是多种部类组成的“多元体”。其中有所谓“肃慎”系，有“夫余—秽貊”系，有鲜卑－室韦系，还有古亚细亚系。但是中原史家并没有了解得如此详细，而将所有被其称做“靺鞨”者一概划入肃慎系。

有学者指出，“濊”（亦即秽）也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统一的部族，而应是一个原始族群，分布在今吉林省大部、黑龙江一部、朝鲜今江原道、咸镜道以及俄罗斯滨海部分地区[12]。可见，濊人的分布地域与“靺鞨”的分布地域是间杂交错的。很可能是金富轼看出了濊人与位于高句丽北边、东边的粟末、白山靺鞨非常相近，为着叙述上的方便，把隋唐时代的靺鞨白山、粟末等部和活动在濊故地，风俗、语言等较为接近的濊（秽）貊系南北两部类统称为“靺鞨”。《三国志》以后的中原史书，不再为“濊”（“秽貊”）立传。这个被金富轼记作“靺鞨”而实为濊（秽貊）的部族，其实并没有被高句丽吞并，只是受其役使而已；他们不再向向中原王朝朝贡，很可能是为高句丽阻隔所致。高句丽时常不对中原王朝行臣属之礼，自然也不排除不许自己的属国再向中原王朝朝贡的可能性，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从历史舞台上消失。而中原王朝不是很清楚发生在两国之间的变故，所以漏载。有学者认为“秽貊”二字被颠倒顺序，取其谐音“靺鞨”[13]，这一推测来自对《三国史记》中“靺鞨”二字的逆向推论[14]，但是可能没有考虑到《三国史记》的资料来源的特殊性，更不论“靺鞨”二字本来更可能发音为“mo jie”而不是“mo he”。

金富轼作《三国史记》，出于叙述方便的考虑，以“靺鞨”一族名覆盖了中国史籍所谓的靺鞨部族和实际上并非属于中国史籍中的靺鞨部族的濊人，给后世研究造成诸多混乱，以至于在此地区活动的真正的靺鞨人也被怀疑甚至被否定。

由上可知，靺鞨部族出现于中国史籍之前《三国史记》所见之“靺鞨”，就是曾经分别在咸镜南道与江原道一带活动的濊人。由于在种族上的近缘性，他们在很多方面都与“濊貊”系的粟末靺鞨、白山靺鞨等部表现出相似的特征，金富轼注意了到这一点，为了与后来真正的（白山、粟末）靺鞨部在叙述上保持一致，而常常以“靺鞨”取代濊人。

至迟到4世纪,“濊”就从中国史籍中消失,查《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北史》、《魏书》、《北齐书》和《周书》,均不见“濊”活动的记载。当然,作为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个部族,也曾被提及,例如《梁书·高句骊传》(卷五四)载:高句丽“汉、魏世,南与朝鲜、秽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15]。563年以后,靺鞨作为一个部族在中原史籍中登场,并且开始与以高句丽为主的朝鲜半岛诸国发生关系;而同时,被称作“靺鞨”的濊(秽貊)系人仍然在活动。

二 高句丽灭亡前后靺鞨与朝鲜半岛诸国的关系

(一)6世纪末、7世纪前期靺鞨对高句丽关系

中国史籍关于6世纪末以后靺鞨与半岛诸国关系的记载,主要集中在其受高句丽役使,多次随从高句丽入侵辽西之地等方面。《北史·高句丽传》(卷九四)载,开皇十七年(597),隋文帝赐书高句丽王汤,指责其不尽藩附的义务,并“驱逼靺鞨,禁固契丹”。翌年,高句丽率靺鞨万余骑入侵辽西。这是靺鞨随高句丽行动的最早记录。

高句丽历史上疆域盈缩的分界主要见于《周书》和《旧唐书》的“高句丽传”。《魏书·高句丽传》载:高句丽在“辽东南千余里,东栅城,南小海,北故夫余”。《周书》说其领土“东新罗,西至辽水二千里,南至百济,北邻靺鞨,千余里”。《隋书》没有具体给出高句丽的四至,只说“其国东西二千里,南北千余里”,幅员与《周书》相同,或可认为此时高句丽的四至较《周书》时没有大变化。而《旧唐书·高丽传》则说其“东渡海至于新罗,西北渡辽水至于营州,南渡海至于百济,北至靺鞨。东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这说明,从《隋书》到《旧唐书》阶段,史书反映出高句丽的疆域有所扩展[16]。从与《周书》本传比较看,《旧唐书》阶段,高句丽疆域在西北方面可能有所扩大,南面主要与新罗在边境一带激烈争夺,各有消长,但远不至于超过千里。“千里”这个数字有些夸张,其拓展部分还应主要集中在北部与靺鞨接境地区。

《旧唐书·高丽传》载:高句丽“东渡海至于新罗,西北渡辽水至于营州,南渡海至于百济,北至靺鞨。东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东面渡海到新罗,是指高句丽与新罗隔汉江对峙,南面渡海到百济,是因为当时新罗西境已经到达半岛西海岸,截断了高句丽与百济间的通路,所以高句丽与百济要“渡海”才可以交通。这时,新罗已经将原“濊”地几乎全部收入本国领域。进入7世纪,新罗与高句丽接境部分似无大变化[17]。

按《旧唐书·高丽传》,此一时期高句丽南北疆域几乎成倍扩大。这里除去中原史家对半岛实际情况可能不甚了解的因素以外,还应该考虑到高句丽在北方的疆域可能确实有所

伸展。如果《旧唐书》本传对东西方向领土拓展的记载基本可信的话，其西北境可能越过辽水到达营州附近，东北向又将靺鞨的一部分收入领下。而南北方向，高句丽对于南部的新罗和百济方面并没有大作为，其疆域的扩大只能是得益于对北部地区靺鞨（中国史籍所载）的某些部住地的吞并。

此一时期，高句丽北部疆域呈锐角突入契丹和靺鞨两部族之间，直抵嫩江，那里大体分布着靺鞨粟末部、伯咄部[18]。6世纪后半期，高句丽靠近靺鞨的部分几乎是紧贴粟末水即第二松花江向北延展[19]，这意味着高句丽直接与粟末部为邻。史书明确记载白山部臣属于高句丽。至于粟末部，据《太平寰宇记》（卷七一）引隋《北蕃风俗记》："初，开皇中，粟末靺鞨与高丽战，不胜，有厥稽部渠长突地稽者，率忽使来部、窟突始部、悦稽蒙部、越羽部、步护赖部、破奚部、步步括利部，凡八部，胜兵数千人，自扶余城西北举部向关内附，处之柳城。"但是这八部并不就是粟末靺鞨的所有属部；《隋书·靺鞨传》又载粟末部"与高丽相接，胜兵数千，多骁武，每寇高丽中"。可见，粟末靺鞨与高句丽之间频繁发生战争，有一部分被迫西走内附中原，但由于粟末靺鞨的骁勇顽强，高句丽北部疆域似乎因此没有能够充分扩展。不过，按《新唐书·渤海传》开篇记载："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可知，粟末部一部分或全部直至高句丽灭亡前臣属于后者[20]。

据《隋书》相关记载，高句丽势力尚未达到嫩江地区，所以只记粟末靺鞨与高句丽相接，完全没有提及位于粟末部北的伯咄和安车骨两部。《旧唐书·靺鞨传》记靺鞨"南界高丽"，其中只明确提到粟末部，但并没有说只有粟末部与高句丽相接，这时与高句丽北部相接的很有可能就加入了伯咄、安车骨等部。同传又载靺鞨各部"或附于高丽，或臣于突厥"，从高句丽亡国后伯咄、安车骨、号室等部"奔散微弱"的情形看，很可能这些部也曾经臣属于高句丽，至少，三部的命运与高句丽的兴衰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三部势力微弱，它们曾依附于高句丽以求自存而免于被其它势力吞并的命运；高句丽灭亡后，三部失去支撑从此破落无闻，或被并入南部粟末部，后来成为渤海的编户。

唐武德五年（622），靺鞨渠长阿固郎朝贡于唐，太宗贞观二年（628）正式向唐称臣，唐朝将其安置在辽东，以其所居地为燕州。太宗伐高句丽时，其北部反，与高句丽合军共同对付唐朝军队。645年，唐军围攻安市，高句丽防线吃紧，高惠真等率高句丽军及"靺鞨兵"十五万救安市[21]。"每战，靺鞨常居前"[22]。安市之战结束后，唐军俘靺鞨兵三千余，全部坑杀。仪凤二年（677），唐王朝以高句丽故王高藏为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让他回辽东安抚并集合高句丽遗民。但是高藏回到辽东之后便"潜通靺鞨，谋叛"，被流放邛州[24]。这里，与高藏合谋的靺鞨，很可能就是与高句丽军共同作战的辽东靺鞨部。

由上可知，6世纪末以后，跟随高句丽南征北战的，已不只是以前被记作"靺鞨"的濊人，

而加入了真正的靺鞨人：白山部、粟末部以及居处辽东的内属靺鞨部，并且，在高句丽与隋、唐王朝征讨军队作战中，靺鞨兵的比例在逐渐增加。津田左右吉推测白山部"素附高丽"始自魏代，参加高句丽对隋唐作战的靺鞨主要是该部；高句丽亡国后白山部被安置在营州或其附近[25]。这是有道理的，但是也不排除靺鞨其它部参加的可能性。伯咄、安车骨、号室等高句丽的属部，同样负有随同宗主国出兵打仗的义务。不可无视这些弱部、小部的存在及作用。

（二）7 世纪中期以后的靺鞨与高句丽、新罗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卷五）载：太宗二年（655），"高句丽与百济靺鞨连兵。侵轶我北境。取三十三城。王遣使入唐求援"。如果沿袭前文对 6 世纪前高句丽与靺鞨连兵入侵百济及新罗的分析，则似乎这一次与高句丽、百济一同入侵新罗的仍有濊人。事实上这段史料系完全照搬中国史籍，《旧唐书》、《新唐书》"高丽传"和"新罗传"唐高宗永徽六年（655）记事都有同样的内容：旧书"新罗传"说"百济与高丽、靺鞨率兵侵其北界，攻陷三十余城"；新书"高丽传"谓"新罗诉高丽、靺鞨夺三十六城"，"新罗传"谓"百济、高丽、靺鞨共伐其三十城"；旧书"百济传"谓"新罗王金春秋又表称百济与高丽、靺鞨侵其北界，已没三十余城"。这里的"靺鞨"已经不是此前频频侵入新罗或百济的濊人，而是中国史籍所指称的靺鞨人。特别是，旧书"百济传"明确记载这段内容是新罗王金春秋向唐皇帝上表告状，"靺鞨"应为表状原文中的称谓，不可能是所谓后世史家的篡改或附会。南部靺鞨中的大部都臣属于高句丽，随高句丽王出征助其攻击邻邦是完全有可能的。

668 年，高句丽亡国，唐与新罗随即陷入为争夺高句丽与百济旧地的战争。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卷六）文武王十年（670）载："以（新罗）王擅取百济土地遗民，皇帝责怒，再留使者。三月，沙飡薛乌儒与高句丽太（后空三字）延武，各率精兵一万，度鸭渌江，至屋骨（后空三字）靺鞨兵先至皆敦壤待之。夏四月四日，对战。我兵大克之。"这里的"靺鞨兵"是迁徙入唐的靺鞨人部队。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卷七）文武王十一年（671）载："靺鞨兵来围舌口城，不克，将退出。出兵击之，斩杀三百余人。闻唐兵欲来救百济，遣大阿飡真功……。"这里的"靺鞨兵"显然不是被新罗编入"九誓幢"的靺鞨兵，而是与新罗敌对的一方。大唐总管薛仁贵在致新罗文武王书中，说到唐准备讨伐叛逆。参战军队有"高将军之汉骑，李谨行之蕃兵"。这里，"高将军"当指高侃（一作"保"，页 82）。李谨行，靺鞨人，粟末靺鞨人突地稽之子（《旧唐书・靺鞨传》）[26]，"麟德中累迁营州都督。其部落家童数千人，以财力雄边，为夷人所惮"。本传及《新唐书・李谨行传》（卷一一〇）均没有提到李谨行在朝鲜半岛的战绩；但显然这里的"靺鞨"，指的就是李谨行率领的靺鞨兵。《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卷七）载：文武

十三年(673)九月,“唐兵与靺鞨、契丹兵来侵北边,凡九战。我兵克之,斩首二千余级。唐兵溺夸泸、王逢二河,死者不可胜计”。《资治通鉴·唐纪》(卷二〇一)载:673年“闰五月,燕山道总管、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大破高丽叛者于夸泸河之西”,已经明确点出是李谨行率领的唐属靺鞨军。

在唐朝对高句丽关系中,出兵震慑和回击高句丽侵袭的主要军事力量,是内属于唐朝的、营州地区的靺鞨人。这也说明唐朝在大军采取行动灭高句丽前,还主要依靠靺鞨人来牵制高句丽。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卷七)文武王十五年(675)九月条载:“靺鞨入阿达城劫掠,城主素那逆战死之。唐兵与契丹、靺鞨兵来,围七重城,不克,小守儒冬死之。靺鞨又围赤木城,灭之。县令脱起率百姓拒之,力竭俱死。唐兵又围石岘城拔之。”七重城位于新罗西部临津江边,是唐朝军队、靺鞨人部队对新罗作战的主战场。攻击阿达、赤木二城的靺鞨,不排除是李谨行所率联军的一部的可能性,但也可能另为一股独立的力量。赤木城,据池内宏考证位于新罗东北部,大体相当于今淮阳西南三十鲜里处[27]。从记载看,阿达城距赤木城似应不远,而从两城在史书中出现的顺序看,阿达城似更在赤木城北面。根据《三国史记·素那传》(卷四七):“初素那以阿达城邻敌国”,可判断出袭击上述二城的靺鞨人住地应当在阿达城北不远处。由此可知,高句丽灭亡后,靺鞨人的势力前锋已经接近淮阳以北一带。不过,高句丽灭亡前夕,即668年三月,新罗置比列忽州,即新罗朔庭郡,今安边。可知,当时新罗已经控制了安边地区,则靺鞨人不可能占据这一带,而应该在较其更北的地方。

李成市指出,高丽灭亡后,濊人才最后从历史上消失:南部的濊被归入新罗,而新罗所放弃的元山湾以北的濊人则融入靺鞨,他们后来成为以粟末靺鞨人为核心的渤海国的一部分[28]。668年起历时8年,唐王朝与新罗间围绕高句丽故地的归属战事不断,战场主要集中在半岛西部南北线;靺鞨人则在东方坐收渔人之利,将濊人故地、高句丽东北方之地收归已有。到唐上元二年(675),唐王朝与新罗间较大规模的战事结束,新罗事实上领有百济与高句丽南部,停止了进一步北上[29]。西部战事结束后,新罗方面又将其北部疆域推进到永兴湾一带。永兴湾北部一带,在渤海建国前,由靺鞨人占据着。他们与新罗的关系,史无记载,不过从大祚荣在建立政权之初与唐朝关系紧张时期,向新罗靠近,以求得战略支持,并受封第五品大阿飡[30]等事情看,这些靺鞨人集团恐怕对新罗也曾有过臣属关系。

(三)靺鞨人进入高句丽本土考——以大祚荣为例

《旧唐书·渤海靺鞨传》(卷二一九)记渤海政权的建立者大祚荣“本高丽别种也。高丽既灭,祚荣率家属徙居营州”[31]。《新唐书·渤海传》(卷二一九)载:“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可知,以高句丽灭亡为契机,大祚荣率领其部下向唐营州迁移。以往的研

究多集中在对大祚荣的族属，即他是靺鞨人还是高句丽人问题的争议上，而对于他迁往营州之前的活动、特别在高句丽的活动及所受影响则极少关心。这一段史事并不是很清晰，而事实上正是大祚荣这一阶段的活动，奠定了渤海建国初期旧高句丽人在统治阶层占据重要地位的基本格局，也造成后世史书对其族属的矛盾记载。

大祚荣及其家族部下是在何种情况下、以何种方式迁移至营州的，史籍所示不一：《旧唐书》、《唐会要》和《资治通鉴》等的记载显示大祚荣等是自发迁移；《五代会要》、《新五代史》和《宋史》等则暗示是被强制迁移。在后一种情况中，文献并没有直接记述靺鞨人的被迫迁徙，而是说大祚荣及所部随高句丽遗民一同背井离乡。以《五代会要》为例，"渤海靺鞨，本高丽种。唐总章中，高宗平高丽，徙其人散居中国，置州县于辽外，就平壤城置安东都护府以统之"[32]。不过，当时，在营州，除了大祚荣集团外，还有其它高句丽人[33]。营州一带本来是唐朝强行迁移高句丽遗民的中转地，他们很有可能是在迁徙过程中被留下来的。因此，大祚荣等被强制迁移的可能性要更大些[34]。《新唐书・高丽传》载："[高]藏与靺鞨谋反，未及发，召还放邛州，厮其人于河南、陇右，弱窭者留安东。"从大祚荣一行被强制迁徙的情况看，他显然不属于那些留在辽东的贫弱者。这说明，大祚荣在高句丽时期已经具备一定的实力和影响。

根据史书记载，隋唐时代，靺鞨七部之一的粟末靺鞨部，主要居住在粟末水，即今吉林市第二松花江流域。问题是，大祚荣集团是迄高句丽灭亡一直停留在原地，并从那里再迁往营州，还是先进入高句丽本土，再被强制移民至营州。史书并没有明确记载大祚荣率领的粟末靺鞨部或其它臣属于高句丽的靺鞨人集团进入了高句丽本土，并成为那里的住民。但按目前所知的史料分析，后者的可能性似更大。大祚荣集团在高句丽灭亡后成为被强制迁移的对象，而且他们在离开李尽忠之乱之后"东走"，"东走"的目的地并不是粟末水流域而是东牟山这一事实，也说明了一些问题。如果大祚荣集团曾经长期居住在粟末水地区而没有到达高句丽本土，史家仅仅因为粟末部在政治上受制于高句丽便称大祚荣为"高丽别种"，显然是说不通的。

关于这一点，新罗末期的名儒崔致远为新罗国王执笔的《谢不许北国居上表》[35]中似有所提示：

> 臣谨按渤海之源流也，句丽未灭之时，本为疣赘部落，靺鞨之属，实繁有徒，是名粟末小蕃，尝逐句丽内徙。其首领乞四（比）羽及大祚荣等，至武后临朝之际，自营州作孽而逃，辄据荒丘，始称振国。（后略）

在这篇史料价值很高的表文中，崔致远承认渤海为粟末靺鞨人大祚荣所建[36]；与本题有关的一句在于粟末部人"尝逐句丽内徙"。这六字可能引出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是

粟末部曾经跟随高句丽内迁入唐,“内徙”的去向是唐朝;另一种解释是粟末部跟随高句丽征服者进入高句丽本土,“内徙”的去向是高句丽。既然“内徙”发生在高句丽灭亡前,高句丽与唐朝关系紧张,并不曾有高句丽人成规模的内迁活动,也就没有粟末靺鞨部随其内迁入唐的道理。因此,比较合理的解释应当是后者,即粟末部大祚荣集团随高句丽征服者移居到高句丽本土某地。《三国遗事》引《新罗古记》云:“高丽旧将祚荣,姓大氏。”[37]如果大祚荣仅仅在本部族所在的粟末水流域向高句丽称臣,役属后者,无论如何也不至于被称作“高丽旧将”的。

我们不能够对大祚荣在高句丽的活动和影响作过高的估计,他之得以在朝鲜史籍中留下行踪,恐怕更多是由他创立震(振)政权,以及他的后继者们与南邻新罗间关系紧张所致。但另一方面,大祚荣既然能做到“高丽旧将”,则他在高句丽停留的时期肯定不会很短[38]。上述文献记载无疑提供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大祚荣所在的粟末部的一支的确进入过高句丽本土,且大祚荣本人还在高句丽做过军将[39];高句丽亡于唐后,他们又被强制移居到营州地区。

由上可知,靺鞨部族,具体到粟末靺鞨部,其对高句丽的臣属,已不只停留在政治军事上受其役使、经济上受其剥削这样臣属方对宗主国的一般性关系的层面上,而是已经有相当数量的粟末靺鞨人集团性地进入高句丽本土,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主干、兼收其它非血缘关系人群组成的部众集团。这一点,从后来大祚荣率“家属”(《旧唐书·渤海靺鞨传》)由营州“东走”树立政权的过程中得到反映。

这就又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即大祚荣所在的粟末部是在什么时候进入高句丽本土的。由于完全见不到确证资料,因此只能根据现有材料进行推断。粟末靺鞨部的一支迁入高句丽,并不一定是在大祚荣这一代,而很可能是他的父亲乞乞仲象那一代[40],或甚至更早一些。《太平寰宇记·燕州》(卷七一)引隋《北蕃风俗记》云:“初,开皇中,粟末靺鞨与高丽战,不胜,有厥稽部渠长突地稽者”,率领忽使来等八部胜兵数千人向关内附。”[41]此时,由于高句丽的压力,粟末靺鞨部内部处于离乱状态,突地稽率一部分部众投奔唐朝,这是史籍明记的,很可能与此同时,粟末部另有一部分,即大祚荣所在的那一支,在本部首长的率领下,投奔了高句丽。

乞乞仲象、大祚荣集团可能与中国正史或《三国史记》中记载的那些被迫跟随高句丽与唐朝作战的靺鞨人部队不同,后者属于因为战事发生而应宗主国的召唤出征,而乞乞仲象及大祚荣集团则恐怕已经被整编入高句丽的军队中,当然这种整编是很有限的;高句丽对唐作战时,靺鞨人的部队仍然有独立的组织。事实上,同样或类似的情况在新罗也可见到。在新罗与高句丽领土争夺中,新罗开始直接役使一部分靺鞨人。在新罗军队的编制中,其著名的

九誓幢(即九支作战部队)中,就专有一幢为靺鞨人的部队。在此期间,除了政治影响外,大祚荣集团也受到了高句丽文化的浸染,并产生了某种认同意识,很可能正因此,大祚荣才会被称为"高丽别种"。在大祚荣建立渤海政权过程中,有众多高句丽遗民追随其后,析出这些人试图匡复旧国的心理之后,还必须看到这些高句丽遗民对大祚荣的认可和接受。认可与接受的基础,首先应该是大祚荣对高句丽文化的认可和接受。

(四)靺鞨与新罗、百济的关系

由于地理上的关系,与靺鞨关系更密切的还是位于半岛北部的高句丽和濊人,只是由于濊人最终未能形成一个政权实体,因此被史家忽视,以至更无法探明其与靺鞨的往来与交涉。靺鞨与新罗发生关系之始,似应在6世纪中期以后。

6世纪,是新罗大发展的时期。法兴王(514－540年在位)时期大肆扩张领土,北面侵食高句丽南境。到真兴王(540－576年在位)治世,新罗的北境又大幅度向北拓展,根据真兴王巡视北境时所立"真兴王戊子巡境碑"(亦称"黄草岭碑"),可知其势力已经到达今咸镜南道南端的真兴里一带;从"磨云岭碑"的立碑地看,其东境已经越过后来成为渤海国东京龙原府所在地北青,到达利原地区、端川地区;根据"北汉山碑",知其西边已经到达今汉城地区[42]。濊人之地,均被收入新罗势力范围内。这段时期,靺鞨已经出现于中国史籍。新罗与靺鞨可能已有接触。

7世纪前期,新罗在与高句丽争夺领土过程中失利,新罗北部势力范围一度回缩至何瑟罗附近。新罗善德王八年(639)"春二月,以何瑟罗州为北小京,命沙飡真珠镇之"(《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卷五)。前引太宗武烈大王五年(658)条载:"三月,王以何瑟罗地连靺鞨,人不能安。罢京为州,置都督以镇之。又以悉直为北镇。"据此推测,占据何瑟罗以北地区的很可能是靺鞨。6世纪末以后,朝鲜半岛东北地区各种势力消长、变化很激烈,控制这一地区的可能是如池内宏所主张的高句丽领内的靺鞨人,也有可能是尾随新罗人回撤而南下的靺鞨人。到675年,新罗与唐王朝对半岛北部高句丽故地领土纠纷结束,新罗在东北也确定了与靺鞨以及其后的渤海国间的疆界。

《日本书纪》(卷二九)天武天皇五年(676)十一月"是月"条载:"肃慎七人,从清平(新罗遣日本使金清平)等至之。"此时,新罗已经完成了对高句丽故地、大同江以南地区的事实占领,自然也可能吸收了一些曾经受高句丽役使的靺鞨部。随同新罗使者前往日本的七名"肃慎"人,很可能就是白山或粟末的某一部。在当时日本人眼中,中国史籍中的"肃慎"与"靺鞨"是通称,训读日语的发音也是一致的(ashihase)[43],因此日本史书将靺鞨记作了"肃慎"。曾经役属高句丽的靺鞨人,其中一部分可能又成为新罗的臣属民。

史书对靺鞨与百济之间的关系所记甚少。但是两唐书"百济传"最末一句却谈到了"渤

海靺鞨”与新罗瓜分百济故地一事。

《新唐书·百济传》载:“仪凤时,[扶余隆]进带方郡王,遣归藩。是时,新罗强,隆不敢入旧国,寄治高丽死。武后又以其孙敬袭王,而其地已为新罗、渤海靺鞨所分,百济遂绝。”《旧唐书·百济传》载:“仪凤二年(677)……时百济本地荒毁,渐为新罗所据,隆竟不敢还旧国而卒。其孙敬,则天朝袭封带方郡王、授卫尉卿。其地自此为新罗及渤海靺鞨所分,百济之种遂绝。”武则天的统治终结于704年,而事实上,在676年以前,新罗在对唐朝的八年抗战中已逐步攫取了百济故地,并把其北界推进到大同江一带。“渤海靺鞨”一般指渤海,渤海政权建立于698年,因此,渤海并无与新罗瓜分百济故地的现实可能。此处所谓新罗与“渤海靺鞨”瓜分百济之地一事,只能是白江口之战百济灭亡后,新罗与处在高句丽和新罗两势力之间的靺鞨人瓜分百济故地。当然,靺鞨人最终没能守住这份战利品。

由上可知,靺鞨部族在发展初期,与朝鲜半岛诸国发生联系的主要是粟末部、白山部以及伯咄、安车骨、号室等部,又大体表现为四种势力:一是隋末内迁营州的靺鞨粟末部突地稽之子李谨行所率的靺鞨人(《隋书·靺鞨传》),他们为唐王朝与高句丽作战。二是622年内附唐朝的阿固郎率领的靺鞨部,其中一部分跟随高句丽与唐王朝对抗(《新唐书·黑水靺鞨传》)。三是靠近今咸镜南道附近的白山部,他们在臣属于高句丽的同时,与濊人和新罗发生过关系。四是粟末部,他们对高句丽及新罗或对抗或臣属。此外还有伯咄和安车骨等部。在渤海建国前,靺鞨部族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和一个统一政权,在强有力的宗主国的夹缝中谋求生存和发展。他们与朝鲜半岛诸国诸集团间虽然始终存在对抗关系,但从结果上看,仍然主要是靺鞨人臣属于高句丽和新罗。

在唐朝与高句丽的对峙中,内迁入唐(营州地区)的靺鞨人集团,以及臣附于高句丽的白山、粟末部等,分别为各自的宗主冲锋陷阵,其作用显然不可低估,否则唐朝就不会在安市之战后,坑杀三千靺鞨士兵进行报复。但是,长期臣属于高句丽并生活在那里的靺鞨人集团,与宗主国之间,似乎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简单的附庸关系层面上,他们深受高句丽文化的熏染,并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高句丽的政治生活。高句丽亡国后,唐王朝让高句丽故王高藏去辽东安抚并管理高句丽遗民,但高藏到达辽东后便暗通靺鞨,以图谋叛。他所联络的靺鞨人当主要是长期生活在高句丽、后被唐朝强制迁往辽东的那一部分。

岑仲勉先生在分析百济、高句丽灭亡后[44],新罗与唐王朝由联盟发展为兵戎相见,并以新罗统一全境告终的主要原因时指出“突厥脱离,北边屡警”,还有契丹、奚两部“渐多作梗”[45]。我在这里想指出的是,靺鞨的存在及其活动,对朝鲜半岛政治形势的变化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个影响可能不是决定性的,但绝不是微不足道的。

靺鞨部族在发展初期,曾经役属南、北两大强邻高句丽、突厥,突厥对于靺鞨部族的影响

颇大[46]，对于靺鞨而言，这些影响不一定是靺鞨人主动选择的结果。同时，靺鞨人深受中原文化和文明发展程度相当高的高句丽的影响。从结果上看，突厥对靺鞨的役使和控制，虽然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突厥文化在靺鞨地区的广泛流布，但并没有引发靺鞨社会内部的变动；而粟末靺鞨终于脱颖而出，建立起古代国家渤海，却是得益于深受中原文化熏染又保有本民族特性的高句丽先进的文物制度的影响。

注 释

〔1〕《三国遗事·靺鞨(一作勿吉)渤海》，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东学丛书第二，页42。

〔2〕丁若镛《大韩疆域志·靺鞨考》。董万崙沿用此观点，又指出汉魏之世的"靺鞨"多指汉江流域的韩秽。见《白山靺鞨五考》，载《北方文物》1986年第2期；《朝鲜半岛境内"靺鞨"人再研究》，载《世界历史》2001年第4期。

〔3〕那珂通世《古代之满州》，载《地学杂志》第101号，页28；见鳥山喜一《渤海史上的諸問題》，風見書房，1968年，页51。

〔4〕小川裕人《关于靺鞨史研究的诸问题》，载《东洋史研究》，二卷五号，1937年，页69—70。

〔5〕干志耿、孙秀仁等《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228—229。

〔6〕鳥山喜一《渤海史上的諸問題》，風見書房，1968年，页51。后为我国著名东北史学者金毓黻(《东北通史》辽宁大学1981年印本)等承袭。

〔7〕实际上，濊亦即秽，与"貊"分别为两个不同源流的部族集团。秽作为部族名称出现得比貊(貉)要晚一些。"秽貉"一词最早见于《管子》，在史书中两字常常连用，是个多义词，有时泛指，有时又特指。见刘子敏《貊族考》，载《北方民族》，1996年第1期，页86。另见河野六郎《中國歴代正史の外夷伝による民族の興亡、特に「靺鞨」について》，载日本平成2、3、4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一般研究成果報告書《三国志に記された東アジアの言語および民族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1998年，頁42—43。三上次男《秽人とその民族的性格》，载《古代東北アジア史研究》，吉川弘文館，1977年版，页360—363。此处当指濊人。以下同。

〔8〕刘子敏《貊族考》，载《北方民族》，1996年第1期，页84。

〔9〕参考前引刘子敏，页81—86；金岳《东北貊族源流研究》，载《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第2期，页51—66；李德山《貊族的族源及其发展演变》，载《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1期，页191—196等。

〔10〕坂元義種《"三國史記"と中国史書》，時野谷勝教授退官記念会编，日本史論集，清文堂，1975年，页53。

〔11〕董万崙《关于粟末靺鞨几个问题的探讨》，载《黑河学刊》，1989年第1期，页83。

〔12〕刘子敏《高句丽历史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年，页10—11。

〔13〕王颋《秽貊徙封》，载《圣王肇业——韩中交涉史考》，学林出版社，1998年，页14。

〔14〕《三国史记》中多处出现"秽貊"、"貊"等字样，当也是借自中国史籍；有时记作"秽貊"，有时两字独立表述，但不见颠倒次序的表记方式，如"貊秽"等。

〔15〕按同时期秽貊与沃沮的分界，大概相当于今咸镜南道与江原道间的分界。

〔16〕在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高句丽北与靺鞨接壤部分看不到上述变化(第五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页19—20)。

〔17〕参考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科学院编《朝鲜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年，页150。

〔18〕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页19—20。

〔19〕参考武田幸男编《朝鲜史》，东京，山川出版社，1984年，页77。

〔20〕《资治通鉴·唐纪五·高祖纪》(卷一八九)武德四年(621年)三月庚申条注云:"靺鞨有七种,粟末靺鞨居最南,本附高丽。"

〔21〕《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卷二一)。王承礼先生推测高惠真为白山靺鞨酋长(见《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与东北亚》,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页18注1)。但从高惠真的的身份为南部傉萨、大兄、前部军主(见《旧唐书·高丽传》(卷一四九)、《册府元龟·来远》(卷一七〇、太宗贞观十九年条)、以及唐授高延寿高惠真官爵诏书中称两人为"马韩酋长"(见《全唐文》卷七)等情况看,高惠真似应为高句丽人。

〔22〕《新唐书·黑水靺鞨传》、《新唐书·高丽传》(卷二一九)。

〔23〕有研究者以白山"素附于高丽",而将跟随高句丽作战的靺鞨兵一律划在白山部名下。但是从内附唐朝的阿固郎所部倒戈,跟从高句丽与唐朝作战,以及粟末部也臣属于高句丽等事实看,实际上随同高句丽的靺鞨人部队已经远不止于白山一部。《隋书·靺鞨传》说白山部胜兵"并不过三千",到唐朝初年即使有所扩充,也不至于被唐朝坑杀的三千余靺鞨兵都是白山部出身。

〔24〕《册府元龟·外臣部·亡灭》(卷一〇〇〇)。

〔25〕津田左右吉《勿吉考》,《满鲜地理歷史研究報告》,第一,丸善株式会社刊本,1915年,页108。

〔26〕突地稽为粟末靺鞨酋帅,见《太平寰宇记》(卷七一)燕州条引隋《北蕃风俗记》;《通典》(卷一七八)归德郡条:《太平寰宇记》(卷六九)幽州幽都县条引《郡国县道记》。

〔27〕池内宏《高句麗滅亡後の遺民の叛乱及び唐と新羅との関係》,载《满鲜史研究》上世第二册,吉川弘文馆,1960年版,页481—482。

〔28〕李成市《渤海史をめぐる民族と国家——国民国家の境界をこえて》,载《歷史学研究》626,1991年,页68。

〔29〕《新唐书·新罗传》(卷二二〇)。《新唐书·高丽传》说"旧城往往入新罗"。

〔30〕《东文选·表笺》卷三三。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本(该表为崔致远代新罗孝恭王所撰致唐昭宗的谢表。表文中有"其酋长大祚荣,始受臣藩第五品大阿飡之秩"。该表不见《三国史记》等载籍)。

〔31〕长期以来,关于"别种"涵义的讨论已经有很多,参考拙文《从唐、日本及新罗典籍中有关的称谓看三国对渤海的认识》,载《欧亚学刊》第三辑,中华书局,2002年,页191。

〔32〕《五代会要·渤海传》(卷三〇),江苏书局刻本。

〔33〕日野開三郎《小高句麗国に関する研究》,载《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学論集》第八卷,东京,三一书房,1984年,页77注7。

〔34〕杨保隆《新旧唐书渤海传考辩》,载《学习与探索》,1984年第2期,页128。

〔35〕《東文選·表笺》卷三三。

〔36〕虽然他在其它的文章中又说"昔之句丽,则是今之渤海",但那主要是为贬低渤海而故意为之。

〔37〕《三国遗事》附录载《帝王韵记》卷下,称大祚荣为"前丽旧将"。(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刊本,1963年。又见孙玉良编《渤海史料全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页394。

〔38〕这使得研究者有兴趣从大祚荣的年龄对其在高句丽的活动作出推测,进而对其高句丽将领的身份提出质疑。见朱国忱、魏国忠《再论渤海王国的族属问题》,载《北方论丛》,1983年第1期,页104。

〔39〕关于这一点,高句丽、靺鞨、奚等入唐的蕃将的经历可资参考。如高仙芝、王思礼、王毛仲等高句丽人,李谨行、李多祚等靺鞨人,张孝忠、张茂昭等奚人,李光进、李光颜等回纥人等。参考两唐书列传部分。

〔40〕按《新唐书·渤海传》,率领原高句丽境内的粟末靺鞨部迁往营州的,是大祚荣的父亲乞乞仲象。仲象死后,大祚荣子承父业,接替了对所部的支配权。《旧唐书·渤海靺鞨传》不载乞乞仲象事,故围绕仲象与大祚荣二人关系,渤海史研究界尚存争议,有日本学者指出二者实为同一人。

〔41〕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刻本。另见同书(卷七〇)河北道平州幽都县条。

〔42〕以上三碑,均参照池内宏《真興王戊子巡境碑と新羅の東北境》参照图,载《満鲜史研究》,上世第二册,吉川弘文館,1960年,卷末。池内宏、津田左右吉等质疑真兴王时新罗领域已经到达黄草岭地区,同上书页6。但今西龙等则指出真兴王从海上至咸兴平原,以黄草岭为界,见今西龙《新羅真興王巡狩管境碑考》,载《考古学雑誌》,第一二卷第一号,页21—22。近年,后一说的支持者渐多,见武田幸男编《朝鲜史》,1989年;李成市《東アジア文化圈の形成》,山川出版社,2000年。根据《朝鲜通史》,黄草岭碑和磨云岭碑立于568年,页137。

〔43〕儿島恭子《エミシ、エゾ、蝦夷、毛人の意味》,载《律令制と古代社会》,东京堂出版,1984年,页320—321。

〔44〕亦称白村江之战。662年,唐、新罗联军与日本、百济联军在白江口展开战斗,后者战败,百济事实上亡国。

〔45〕岑仲勉《隋唐史》,中华书局,1982年,页131—132。

〔46〕参考拙文《靺鞨与东突厥关系考述》,载《史林》,2003年第4期,页53—60。





试论高丽王王璋与元中期时政及其与文人画家朱德润之交游

刘 中 玉

高丽之于元代,诚如元人陈旅所言犹如"古封建国"[1]。这一方面揭示了元廷对朝鲜半岛涉入之深甚于其他朝代的事实,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双方联系因此而得到加强的信息。其联系的密度和频度从双方人员往来、文化交流方面便可蠡测一粟。当时高丽国王或世子大都深受汉文化的薰养,他们每入元朝觐或入侍时,往往带有大批的文学之士随行,在政事之余,其君臣经常参与文会,与元士夫文人研讨学术、交游唱酬,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互动氛围。其中高丽忠宣王王璋与汉族文人朱德润[2]的交游便堪称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亮点,颇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王璋(1275—1325),旧名謜,字仲昂,蒙古名益智礼普化。他是世祖忽必烈的外孙(母为忽必烈女齐国大长公主),韩国大长公主宝答实怜(一作卜达失利,晋王甘麻剌之女)的驸马都尉,后因与谋"平定内难"而被武宗海山封为一字王——沈王。他自幼便熟读儒家经典,又长期入侍大都,耳濡目染中原文风之瀀盛,故常以文人自许,热心于谈经论道、雅集唱酬之事,并常延请硕儒彦学集聚其在大都的居所——万卷堂,该堂也因此成为当时一个颇具影响的文苑集会中心。王璋与朱德润的交游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发生的。然而二人交往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受到当时政治的极大影响。具体而言,二人交游因当时帝位的更迭、朝政的变换而明显分成三个时期:仁宗时期、英宗时期和泰定帝时期。而王璋一生共经历六位元帝: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和泰定帝,其命运每随皇权更迭而沉浮,或被废黜,或受荣宠,或遭流放,或遇恩赦,可以说是曲折之至。特别是成、武更替,不仅对他本人命运之转折影响甚大,而且对朱德润的仕进起决定性作用。因此,欲考察王璋与朱德润交游之状貌,并管窥当时双方文人交流之大略,必先对这一时期王璋与大都即与元帝的关系,也即二人交游的政治生态背景有较清晰的认识。故而本文拟从如上两方面具体论之。陋识愚见,就教于方家。

一 王璋与大都的关系

(一)成宗时期:改制被废黜

公元1298年(元成宗大德二年,高丽忠烈王二十四年)正月,王璋经大都册定受内禅继高丽国王位[3],是为忠宣王。但是同年八月,成宗铁木耳突然又以“擅权滥杀”的罪名将其废黜,让王昛复位,并责令他重新入侍宿卫,以至十年之久。王璋究竟专擅何权、滥杀何人而受到成宗如此严厉的处罚呢?对这一突发事件《元史》中有详细记载:

(大德二年)秋七月壬寅,诏诸王、驸马及诸近侍,自今奏事不经中书,辄传旨付外者,罪之。高丽王王謜擅命妄杀,诏遣中书右丞杨炎龙、佥枢密院事洪君祥召其入侍,以其父昛仍统国政。[4]

二年七月,中书省臣奏謜有罪当废,复以其父昛为王。

三年正月,昛遣使入贡。丞相完泽等言:“世祖时,或言高丽僭设省、院、台,有旨罢之,其国遂改立佥议府、密直司、监察司。今謜加其臣赵仁规司徒、司空、侍中之职。又昛给仁规赦九死奖谕文书。又擅写皇朝帝系及自造历,加其女为令妃。又立资政院,以崔冲绍为兴禄大夫。又尝奉太后旨,公主与謜两位下怯薛合并为一。謜不奉旨。謜又擅杀千户金吕,而以其金符给宦者朮合儿。又仁规进女侍謜,有巫蛊事。今乞将仁规、冲绍发付京兆、巩昌两路安置,不得他适。昛行事不法,謜年少妄杀无辜,乞降诏戒饬。”帝命杖仁规、冲绍而遣之。二月,诏谕昛并阖境臣民:“自今以始,勉遵守国之规,益谨畏天之戒。凡在官者,各勤乃事,协力匡赞,毋蹈前非,自干刑宪,缁黄士庶,各安其业。”[5]

从上列史文中可以看出,王璋被废与其在1298年五月擅权改制有直接关系[6]。在中书省的奏呈中详细列举了他在位七个月中所犯下的“七大罪证”:1. 僭建省、院、台之制;2. 擅写皇朝帝系;3. 擅自造历;4. 擅封赵女为妃;5. 不奉太后旨意;6. 擅杀千户金吕,并私授其金符与宦者朮合儿;7. 作巫蛊事,等等。对于以上“罪证”又可归纳为三条罪状:1. 僭越之罪;2. 抗旨之罪;3. 滥杀之罪。王璋的这些做法暴露了其“妄图”自行政制的野心。这对大都而言无异于挑衅,自然为成宗所不能容忍。所以成宗得到举报后,立即派中书机要大臣前往钩察问罪。那么究竟是何人将这一严重事态举报给成宗的呢?对此,《元史》中并没有交待,而《高丽史》中不仅对处罚结果有详细记载,而且对引发此事的“导火索”有明确记录:

(1298年五月)丙戌,公主妒赵妃,公主之乳媪与无赖之徒潜谋,以公主失爱,遣阔阔不花、阔阔歹与大将军金精、吴挺圭等如元告太后。[7]

(五月)甲辰,公主遣彻里如元。……王使人请公主留彻里,不听。……六月丙辰,彻里还自元。丁巳,元遣右丞阿里灰、洪重喜、中书左丞杨炎龙来,凡传者百余,鞫赵仁规。(王)遂与元卿往监察司收新定官制。戊午,王朝德慈宫,宥二罪已下。己未,复遣彻里如元。……甲子,杨炎龙封生成库,乃王府珍宝所藏也。……[8]

戊辰,太后遣佥枢密院事洪君祥及帖木儿不花来。……七月丁亥,彻里还自元,帝命国王、公主以八月入朝。辛卯洪君祥享王于内。壬辰,王朝德慈宫,翌日,偕公主又朝,洪君祥设宴。戊戌,复改官制,以洪子藩为三重大匡佥仪侍郎赞成事、判兵曹、监察司事等。[9]

八月甲子,元遣孛鲁兀等来趣王及公主入朝。……辛未,王与公主如元,宥二罪已下。壬申,太上王饯于金郊,酒酣,使臣孛鲁兀以帝命取国王印,授逸寿王,于是,太上王复位。王如元,宿卫凡十年。[10]

从表面上看,王璋擅权改制败露的导因是宝答实怜公主"失爱"告密:先是公主乳媪遣阔阔不花等人密告太后,随后公主又两次派彻里到大都汇报。大都旋即派中书前往钩察后下令"鞫赵仁规"、"收新定官制"、"封生成库",夺王璋国王印玺并责令其入朝。但透过上引史料不难看出,高丽国内的一举一动其实完全处于元廷的监控之中,改制之举败露是迟早的事,而所谓公主"失爱"告密只不过是一个诱发因素。

为以儆效尤,成宗命中书省严厉处置参与政改的高丽官员,赵仁规等人不仅被杖笞,而且被流放:

(大德)三年春正月壬辰,安置高丽陪臣赵仁规于安西、崔冲绍于巩昌,并笞而遣之,以正其附王謜擅命妄杀之罪。复以王昛为高丽王,遣工部尚书也先铁木而、翰林待制贾汝舟赍诏往谕之。[11]

并且为了防止高丽再生"叛逆",成宗重设征东行省,并派员严密监视高丽动向[12],稍有违僭便下诏严斥。如在朝仪问题上,王昛便受到征东行省平章阔里吉思的弹劾:

四年二月,征东行省平章阔里吉思言:"高丽国王自署官府三百五十八所,官四千五十五员,衣食皆取之民,复苛征之。又其大会,王曲盖、龙扆、警跸,诸臣舞蹈山呼,一如朝仪,僭拟过甚。"遣山东宣慰使塔察儿、刑部尚书王泰亨赍诏谕之,使厘正以闻。三月,阔里吉思复上言:"佥议司官不肯供报民户版籍、州县疆界。本国横科暴敛,民少官多,刑罚不一,若止依本俗行事,实难抚治。"[13]

对阔里吉思的弹劾,王昛不得不上表陈释,以求元廷谅解,《元史》中载:

(大德五年)秋七月,昛上表言:"昔居海岛时,尝用山呼,后改呼千秋。今既奉明诏,一切皆罢。又革官府九十余所,汰官吏二百七十余员。他如杂徭病民、驲骑烦扰驿

传者，亦皆省之。”诏曰：“卿其谕朕意，所言当始终行之，或有不然，宁不羞惧？”[14]

又“（大德七年）九月戊午，遣刑部尚书塔察而、翰林直学士王约使高丽，以其国相吴（祈）〔祁〕专权，征诣阙问罪[15]。”可见元廷俨然把高丽视为帝国的一部分，对其行政可以随意变更，对其官员乃至国王可以拘钩问罪，由此可证陈旅所言并非牵强夸饰之辞。就王璋被废之事而言，对高丽的“越权”行为进行惩处既是大都的“分内”职责，同时又具有震慑宗藩以强调中央权威的政治意义（成宗刚刚被西北诸王承认宗主权，得偿乃祖忽必烈之夙愿）。而王璋虽不敢明正反抗，但内心必对成宗以及成宗系有所怨恨，从其入侍大都长达十年之久而未被放归这一情形来看，他与成宗很可能并未真正和解，我们也无法从史录找到他为修复双方关系而进行努力的蛛丝马迹。与此相反，《高丽史》中却记载了他与成宗系潜在的帝位争夺者，即宗王中实力最强大的答剌麻八剌系的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兄弟过往甚密，“武宗、仁宗龙潜，与王（指王璋）同卧起，昼夜不相离”[16]。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友谊，使他在成宗病逝后毅然站在卜鲁罕皇后的对立面，积极参决了海山兄弟争夺帝位的密谋。

（二）武、仁时期：“定策”得荣宠

公元1308年（大德十三年）成宗病逝，而嗣君早夭，帝位虚座，暂由皇后卜鲁罕代理朝政，一时宗王皆蠢蠢欲动。而最有实力的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兄弟率先行动，在右丞相哈剌哈孙的支持下一举粉碎了卜鲁罕皇后称制的企图，取得了帝位，首开入定大都后政变夺权之恶端。王璋由于在政变中表现积极而受到武宗海山的格外封赏，《高丽史》中载：

> 忠烈王三十三年（1308），皇侄爱育黎拔力八达太子及右丞相答喇罕（即哈剌哈孙）、院使别不花与王定策，迎立怀宁王海山。左丞相阿忽台、平章八都、马辛等谋奉安西王阿难达（即阿难答）为乱，太子知其谋，先一日执阿忽台等，使大王都喇、院使别不花及王按诛之。五月，皇侄怀宁王即皇帝位，是谓武宗。三十四年五月戊寅，元以定策功封沈阳王。……又令入中书省参议政事，赐金虎符、玉带、七宝带、碧钿金带及黄金五百两、银五千两。皇（太）后、皇太子亦宠待，所赐珍宝锦绮未可胜计。[17]

不久他又被给予制同宗王的待遇，晋升一字王，“（至大三年）夏四月己酉，赐高丽国王王（章）〔璋〕功臣号，改封沈王”[18]。亲历时局的姚燧在《高丽沈王诗序》中也提到：

> 当储皇之敉宁内讧也，王与定策，故皇上报之，加开府仪同三司、太子太师、上柱国、沈阳王、驸马都尉、征东行中书省左丞相、高丽国王。后以宗王封大国者惟一字，遂与同之。又原降制，惟曰沈王，进尚书右丞相，加推忠揆义协谋佐运功臣。湛露恩光，可谓无以尚者。[19]

宝答实怜公主也受到晋封和赏赐，“（至大三年秋七月）庚辰，封皇伯晋王长女宝答实怜为韩国长公主”[20]；“（皇庆元年）二月庚寅……赐韩国公主宝答实怜钞万锭”[21]，等等。

很显然,王璋与决"平定内难"并非只是出于友谊,更主要的应是基于政治投机。从此以后,他在大都的处境大为改观,由原来的入侍罪藩一夕成为定策功臣,受到前所未有的恩宠,这使他大有乐不思蜀之感。次年即公元1308年(元武宗至大元年,忠烈王三十四年)七月忠烈王去世,王璋复继王位,本应趁双方交好的时机就国,但他在同年十一月料理丧事后却把国政委以他人[22],自己又返居大都。虽然国内臣民多次请其东归,但他却每以武宗兄弟及答己太后眷顾而不予采纳。而武宗时期也的确对他特别宽容,不仅对其犯罪行为不予追究,而且多有庇护。如1310年(至大二年)三月,己丑,"辽阳行省右丞洪重喜诉高丽国王王(章)〔璋〕不奉国法恣暴等事,中书省臣请令重喜与高丽王辩对",但是武宗却"敕中书毋令辩对,令高丽王从太后之五台山"[23],此事最终不了了之;又如在征东行省设官这种重大问题上,武宗也一反成宗严苛成法,对其听而任之:

(至大元年)夏四月,丙辰,高丽国王王(章)〔璋〕言:"陛下令臣还国,复设官行征东行省事。高丽岁数不登,百姓乏食,又数百人仰食其土,则民不胜其困,且非世祖旧制。"帝曰:"先请立者以卿言,今请罢亦以卿言,其准世祖旧制,速遣使往罢之。"[24]

不仅如此,武、仁两朝的时政他也多有参决,如仁宗时在复开科举这一重大举措上他就起到了相当重要的桥梁作用,《高丽史》中载:"科举之设,王尝以姚燧之言白于帝,许之,及李孟为平章事奏行焉。其原盖自王发也。"[25]

但是长期侨寓不仅使其臣民疲于奔波运输,而且对于财政赤字已经相当严重的元廷而言,也是一种额外的负担,"……王既受命复位,谄事妇寺,淹留燕京于五年。国人困苦供馈,从臣久劳思归,至谋相谄,元亦厌之"[26]。仁宗曾多次催促他回国,但他每以藉口相拖延。如公元1312年(仁宗皇庆元年,忠宣王四年)春正月,"帝与太后诏王归国,王不欲行,使朴景亮言于用事大臣,曰:今方农月,请待秋成。制可"[27]。最后他无以为辞,竟以逊位来换取在大都的居留权。《高丽史》中载:"(皇庆二年三月甲寅,)(王璋)以长子江陵大君焘见于帝,请传位。帝乃策焘为王。是时,朝廷欲王归国,王无以为辞,乃逊其位。"[28]对此《元史》中也有记载:"(皇庆二年夏四月)丙子,高丽王辞位,以其世子王焘为征东行中书省左丞相、上柱国,封高丽国王。"[29]

王璋为什么一再推辞就国,并宁愿舍弃王位,也不愿利用这难得的时机回国革弊兴政呢?他不仅对本国政事不再感兴趣,而且对于元廷所授予的官职也多推辞不就,如当仁宗让他担任右丞相一职时,他便百般推诿[30]。而与对政治的淡漠态度相反,他对文学应酬的兴趣则日渐浓厚[31],并在逊位后的第二年(公元1314年,元仁宗延祐元年,高丽忠肃王元年)于大都的居所构筑万卷堂,以招邀名儒学士[32],营建一个以他为主的文苑中心。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王璋的思想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呢?本文认为,王璋之所以会如此,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避害远祸的心理在起作用。政改之祸已让他深受十年入侍之苦，而其亲历并参决的血腥政变更使他认识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经验告诉他远离政治就是远离灾难，因而与其归国如履薄冰，不如留在大都与元廷保持和谐的关系以保无虞，这从仁宗称他"善避权"便可知其心态[33]；二是长期与文人雅集唱酬使他流连于大都的文苑生活，因而把对政治的热心转移为对文事的投入。当时的大都是名儒贤俊集聚之地，特别是在带动下，形成了两大文苑交集中心：一是仁宗皇帝的奎章阁，一是鲁国大长公主的公主府。当时的经筵大儒如姚燧、程钜夫、李孟、阎复、赵孟頫、虞集等人都是主要的参与者。这种氛围对自幼便熟读儒家经典、自诩为"词垣之臣"[34]的王璋而言自然有很大的吸引力。他认为"京师文学之士皆天下之选，吾府中未有其人，是吾羞也"[35]，于是，他一方面广泛结交元士夫文人，与之交游唱酬，前引赵孟頫、程钜夫等人都与他交谊匪浅，并有诗词唱和，试举两例：

赵孟頫《留别沈王》诗：

珍重王门晚受知，一年长恨曳裾迟。
分瓯共酌人参饮，绕径同看芍药枝。
华屋焚香凝燕寝，画屏摘句写乌丝。
吴船万里东南去，采尽苹花有所思。[36]

程钜夫《太常引·寿高丽王》词：

沁园岁岁菊留芳，待此日，庆真王。金鼎燮和元造寿，域同开八荒。带河山砺，一传千岁，地久与天长。晴日上扶桑，便先照、璚阶玉觞。[37]

另一方面又令从臣安cite珦、白颐正等向阎复、姚燧等研习程朱之学[38]，同时从国内选拔贤才，召至大都，如"召(李)齐贤至都，时姚燧、阎复、元明善、赵孟頫等咸游王门，齐贤相从，学益进。燧等称叹不置"[39]。并鼓励本国士子来元应试科举(如朴仁干、崔瀣等人)，一时蔚成风气。陈旅曾在《送李中父使征东行省序》中对这种风尚评论曰：

高丽在我朝如古封建国，得自官人，其秀民皆用所设科任于其国。……今高丽得自官人，而其秀民往往已用所设科仕其国矣，故复不远数千里来试京师者，盖以得于其国不若得诸朝廷者之为荣。故虽得末第冗官，亦甚荣于其国。[40]

此外，他还积极帮助本国从元朝输入文化典籍，如延祐元年(高丽忠肃王元年，公元1314年)派博士柳衍到江南"购地经籍一万八百卷而还"；同年七月，仁宗又应高丽之请，"赐王(忠肃王)书籍四千三百七十一册，共计一万七千卷，皆宋秘阁所藏"[41]，等等，皆与他有直接关系。

这些举措为王璋赢得了良好的声誉，特别是他乐于提携后进的做法使许多文人士夫特别是那些渴望仕进的汉族文人都倾慕与之结交。文人画家朱德润正是由于得到他的襄助而

开启仕宦之门的。

二　王璋与朱德润交游考察

如前所述，王璋与朱德润的交游共分为三个阶段。

(一)仁宗时期:初遇获荐征

朱德润是一位早成的艺术家，年仅二十便已闻名苏杭一带，当时前辈文人如冯子振、郭畀等都对他在绘画、诗文方面的杰出才艺十分嘉赏，并经常与之切磋往来[42]。在求学期间，他还受到与其师姚子敬相交颇深、素有画坛上"南赵(赵孟頫)北高"之誉的"北高"——高克恭的激励[43]，从此技艺大进。像当时众多的南方文人一样，他也冀望于北上一展才艺，获得入仕的机会[44]，曾作《古意》诗寄托自己的鸿鹄之志：

无盐生齐东，短发没双白。
有容不谩饰，有志不轻就。
终日在闺闱，麻枱不纨绣。
一朝黄金聘，去做齐王后。
自谓出世材，宁知天下丑。
黄金岂不贵，更问齐王意。
聘德不聘容，王心肯同美。
恩礼虽云厚，或恐中道弃。
苟无双翟车，宁死不求配。[45]

"有志不轻就"、"苟无双翟车，宁死不求配"，与其说是在称赞齐后玉不玷瑕的高贵品节，毋宁说是在表白其不愿因仕降志的决心，从中可看出他是一个颇有信念和抱负的青年。而冯子振、郭畀等人的多次鼓励，更坚定了他北上求仕的决心，只是一时苦于无权贵引荐。机会在延祐六年降临了。是年春王璋到江南行香[46]，其师姚子敬的故交、当时颇受元廷礼遇的赵孟頫由于对朱德润颇为赏识，于是便把他引荐给了求贤若渴的王璋。王璋也很欣赏他的才华，对他"尤爱重之"[47]，便又把他举荐给爱好文艺的仁宗皇帝，为他的仕进铺平了道路。对于这一段佳话，周伯琦在《有元儒学提举朱府君墓志铭》中的记载颇为生动：

> 吴兴赵文敏公子昂荐之驸马太尉沈王以闻。仁宗皇帝召见玉德殿，命为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明年，正旦日食，越三日，受朝。君从沈王再见，上注视久之。[48]

他自己在以后的回忆中对此也多次提及："延祐之秋，仆以文艺见召，随天使而北辕。

曾待命于公车,屡承宣于禁垣……"[49]"延祐六年冬(冬应为秋),德润以太尉沈王见知征入京师……"[50]等等。能得到像王璋、赵孟頫这样的显贵的奖掖,特别是皇帝的征召,朱德润自然十分得意,这从他于是年秋北上途中所作《延祐六年九月廿二日渡扬子江》一诗中便可看出他当时的张扬情怀:

驱车丹阳麓,津吏迎晚渡。
击鼓动连艘,楫急浪花舞。
水深蛟龙蛰,日落鸥鸟度。
金山山畔楼,双塔逾青楸。
黄金铸古像,岁月逐江流。
谁云限南北,停桡歌壮游。[51]

"谁云限南北,停桡歌壮游",一语尽扫先前怀才不遇的掩抑之气。在他看来,美好的仕途已然展开。

(二)英宗时期:患难见真心

在王璋的关照下,初入大都的朱德润如鱼得水,经常出入于禁苑、王公府邸[52],当时"公卿贵人,咸加礼遇"[53]。在王璋的万卷堂里他还结识了高丽的饱学士夫李齐贤、朴全之等人,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54]。但是好景不长,局势在延祐七年(1319)急转直下。是年正月二十一日,仁宗病逝,年仅十七岁的皇太子硕德八剌即位,朝政被权臣帖木迭儿把持。帖木迭儿是蒙古贵族中的顽固守旧派,对汉法一直持排拒态度,所以在他主政时期,汉法派受到了沉重打击。

首当其冲的是帝师李孟。这位在至大四年曾被仁宗授以中书平章政事、赐爵秦国公的经筵名儒,是当时汉法的主要主持者,因而最受守旧势力痛恨,也最先受到打压:

(延祐七年)二月丁丑,夺前中书平章政事李孟所受秦国公制命,仍仆其先墓碑。[55]

三月壬寅,降前中书平章政事李孟为集贤侍讲学士,悉夺前所受制命。[56]

到了四月,帖木迭儿加大了打击力度和广度,并对行省进行改革:

夏四月庚戌〔朔〕,有事于太庙,告即位。追夺佛速司徒官。罢少府监。复仪凤、教坊、广惠诸司品秩。罢行中书省丞相。河南行省丞相也先铁木儿、湖广行省丞相朵儿只的斤、辽阳行省丞相,并降为本省平章政事,惟征东行省丞相高丽王不降。[57]

虽然因为牵涉到东藩屏护的重要性,高丽作为行省的地位没有被降低,但是由于王璋与李孟诸人过往甚密,又是汉法的重要支持者,并且对当时政事多有参决,所以其处境也非常不妙。王璋也注意到了时局的发展对自己不利,于是便借口六年曾到江南行香而请求前往还愿[58],即《高丽史》中所称:"七年四月,复请于帝降香江南,盖知时事将变异,以避患

也。"[59]但是依然没能躲过这场劫难：

> 六月王行至金山寺，帝遣使急召，令骑士拥逼以行，侍从臣僚皆奔窜。九月，王还至大都，帝命中书省护送本国安置，王迟留，顾望不即发。十月，帝下王于刑部，既而祝发置之石佛寺(在当时徐州西十里，参见《存复斋文集》卷2，《云龙山石佛寺记》)。十二月戊申，帝流王于吐蕃撒思吉之地。[60]

在这一系列危急事件中，除流徙吐蕃外，朱德润几乎一直相伴，南下行香与之同行：

> 沈王以忤中贵人斥外，太皇太后命驰芗于鄞(古地名。春秋时属越，即今浙江省鄞县)之天童寺，君遂与偕。[61]

其中所谓"中贵人"，很显然是指帖木迭儿。在这场政治风波中，朱德润并未受到严厉的打压，这主要是因为他初涉政坛尚未引起帖木迭儿的注意。不过在王璋被流放后他也被迫闲居平江，直到至治二年英宗北狩时始被召回[62]。可能是王璋为朱德润患难与共的忠诚所感，所以即便在流放之中，依然上书英宗，"表授(朱德润为)镇东行中书省儒学提举"[63]，而朱氏也颇受英宗皇帝赏识[64]，因而被获准。时运的再次降临使朱德润以为大展抱负的时候来了，从他应诏进呈的《雪猎赋》中便能感受到他这种意图有为的心态[65]。同时他对辅弼英宗兴政的右丞相拜住也寄以厚望，并在英宗北狩期间屡以诗呈，如《寿安山呈拜相》：

> 岳宗镇下土，降神生贤辅。
> 巍巍千寻高，伟作天一柱。
> 触石起浮云，济民洒甘雨。
> 木茂鸟翔集，溪深鱼游聚。
> 佳氛凝四时，胜境环百武。
> 行乐随意众，陈迹历可数。
> 仲尼登东山，诸葛吟梁父。
> 人生驹隙耳，忠孝事明主。
> 曷以写勋名，丹青耀千古。[66]

《居庸霁雪诗呈拜相》：

> 雨露承恩彻九重，曾经密雪上居庸。
> 黑云卷地江河立，玉柱撑天草木浓。
> 瑞象远瞻连北阙，尺书常拟报东封。
> 太平粉饰虽无用，青史千年在笔锋。[67]

诗中对拜住不吝溢美之辞，虽然也对其努力的成效表示怀疑，但认为"太平粉饰虽无用"，也至少能够青史留名。

也许正是在这种心态的驱动下，朱德润在征东儒学提举任上尚能克职尽守[68]，与高丽僧俗两界都保持了很好的关系，并以"鸡林"(高丽地名)取号[69]。这既体现了高丽地域文化对他的影响，同时也说明他具有一定的政治调和能力。

(三)泰定时期:生死两茫茫

1322年(至治三年)，英宗被铁失等人谋刺于南坡，史称"南坡之变"，标志新政失败[70]。随后也孙铁木儿继位，是为泰定帝。这场血腥政变彻底击碎了朱德润要在仕途上一展抱负的幻想。作为英宗皇帝欣赏的词臣，他意识到自己很难在泰定帝那里获得安全，并且也确实受到了构陷和威胁，这在他的诗文中多有反映。如《黄鹄歌悼亡妻》中便隐晦地表达了自己无辜遭陷的愤慨:"何检人之构难兮，使易其辞"，"世路险艰兮荆榛交馋，人构我兮使我心切"[71];又如《幽怀赋》:"苟余心之无慊，虽众毁而何疑? 岂矫世兮独立，俟同心而可为。嗟哉，盛年不偶，抚朱弦兮自悲;倘效用之得所，虽殁身其何辞?"[72]因而他决定退隐，以避祸全身，陈基《题朱泽民山水》一诗便道出了他当时的这种心态:"东曹兴遂秋风起，长揖齐王归故里。托言鲈脍与莼羹，远害全身良有以。神交海上陶朱公，遭世虽殊心则同。读书把钓松江尾，仰看浮云行太空。"[73]

不过，最终让朱德润下决心退隐的乃是王璋的去世。当时泰定帝为笼络安抚人心，大赦天下，王璋因此得以回京，但由于长期流放对身心的摧残，使他不幸于次年病逝。王璋的死对朱德润打击很大。在他看来，王璋作为附藩，又贵为帝甥帝婿，且有功于元廷，但仅因政见不同，便屡遭劫难。虽然也曾刻意避免，但最终仍未得逃脱，以致早殁。"胡为纤痍竟至于音"，朱德润在祭沈王文中不仅对王璋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还表露了他对大都政局彻底失望的情绪[74]。

此后他回到平江，以问学自娱。周伯琦称他是"杜门屏处，讨论经籍，增益学业，不求闻达。垂三十年，声誉弥著"[75]。他对这种隐逸潜学的生活似乎也颇为属意，所谓"南归以来，饘粥之暇，犹能勉强先儒已定之经史，已详之典礼。下追遗文小录，亦不敢不究心……"[76]

江乡五月雨，历气方爵隆。
轩窗面南开，潇洒吾庐中。
有志乐经史，无心较穷通。
嗤彼名利涂，交攻不兼容。
家给知礼仪，非谓食万钟。
薄宦识衣冠，非待禄位崇。
南俗尚富贵，此道非华风。
君看物候变，岁晏惟青松。[77]

从这首《写怀》诗中也可看出归隐后的朱德润内心已然淡泊平和，所以，当至正年间出任南台御史的兀颜思忠要举荐其复出时[78]，他能够婉谢不敏[79]。虽然至正十一年农民起义爆发，他又出来做官，但他的动机已不是着眼于仕途的荣升，而是出于为国效力靖难的忠心了。

余　论

综而观之，朱德润的仕宦生涯前后不过七年时间，然而在七年之中却经历了元代历史上最惨烈的帝位争夺[80]，最终使他心悸而退。而王璋作为一个颇有远见的高丽国王，在这种错综变乱的政局下，能够忘乎个人沉浮，始终致力于两国文人、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并且作出了重要贡献，这种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从长远来看，他的努力也颇具前瞻性，为以后两国在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奠定了深广的基础。

注　释

〔1〕《安雅堂集》卷四，元代珍本文集汇刊本，台北中央图书馆 1971 年版。

〔2〕朱德润(1294—1365)，字泽民，平江(今苏州)人，元中期著名文人画家。

〔3〕《元史・成宗二》卷十九，页 510 下："大德元年(1297)十一月，高丽王王昛告老，乞以爵与其子謜。"页 414，中华书局 1976 年 4 月第一版；《高丽史・忠宣王一》卷三十三："(忠烈王)二十四年正月甲辰，元遣使册为国王，以忠烈王为逸寿王。丙午受内禅，即位于康安殿。"日本明治四十二年缩印本。

〔4〕《元史・成宗二》卷十九，页 420。

〔5〕《元史・外夷一・高丽》卷二〇八，页 4622—4623。

〔6〕《高丽史・忠宣王一》卷三十三，页 513。

〔7〕《高丽史・忠宣王一》卷三十三，页 512 下—513 上。

〔8〕《高丽史・忠宣王一》卷三十三，页 514 上。

〔9〕《高丽史・忠宣王一》卷三十三，页 514 下。

〔10〕《高丽史・忠宣王一》卷三十三，页 515 下。

〔11〕《元史・成宗三》卷二十，页 425。

〔12〕《元史・外夷一・高丽》卷二〇八：(大德三年)五月，哈散使高丽还，言昛不能服其众，朝廷宜遣官共理之。遂复立征东行省，命阔里吉思为高丽行省平章政事。九月，昛遣使入贡，以朝廷增置行省，上表陈情，其略言："累世有勤王之功，凡八十余年，岁修职贡。尝以世子入侍，得联婚帝室，遂为甥舅，实感至恩。使小国不替祖风，永修侯职，是所望也。"

〔13〕《元史・外夷一・高丽》卷二〇八，页 4623—4624。

〔14〕同上。

〔15〕《元史・成宗四》卷二十一，页 454。

〔16〕《高丽史・忠宣王一》卷三十三，页 515 下。

〔17〕《高丽史・忠宣王一》卷三十三，页 515 下—P516 上。

〔18〕《元史·武宗二》卷二十三,页524—525。
〔19〕《牧庵集》卷三,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20〕《元史·武宗二》卷二十三,页524—525。
〔21〕《元史·仁宗一》卷二十四,页550。
〔22〕《高丽史·忠宣王一》卷三十三,页519上:“壬申,王如元,命齐安大君淑权署征东省事。”
〔23〕《元史·武宗二》卷二十三,页510。
〔24〕《元史·武宗一》卷二十二,页498。
〔25〕《高丽史·忠宣王二》卷三十四,页527下。
〔26〕《高丽史·忠宣王二》卷三十四,页528上。
〔27〕《高丽史·忠宣王二》卷三十四,页526上。
〔28〕《高丽史·忠宣王二》卷三十四,页527上。
〔29〕《元史·仁宗一》卷二十四,页556。
〔30〕《高丽史·忠宣王二》卷三十四,页527下:“右丞相秃鲁罢,帝以王为相,王固辞曰:臣小国藩,宣之寄犹惧不任,乞付与子,陛下许之。况朝廷之上相哉?安敢贪荣冒处以累陛下之明。敢以死请。帝笑曰:固知渠善避权也。”
〔31〕王璋自幼便熟读中原文化典籍,在他十八岁如元时,元世祖就曾与他进行过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关于中原典籍的对话,当时的王璋就能够应对自如。参见《高丽史·忠宣王一》卷三十三,页510上。在他即位后,非常看重其翰林四学士(文翰学士承旨崔𪨶、学士仆全之、侍读学士吴汉卿、李真等人),并经常与他们“论三教业”。可参见《高丽史·忠宣王一》卷三十三,页511下,页512。
〔32〕《高丽史·忠宣王二》卷三十四,页527上:“帝命王留京师,王构万卷堂于燕邸,招致大儒阎复、姚燧、赵孟頫、虞集等与之从游,以考究自娱。”
〔33〕参注9。
〔34〕《牧庵集》卷三,《高丽沈王诗序》。
〔35〕《高丽史·李齐贤传》卷一一〇。
〔36〕《松雪斋文集》卷五,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37〕《雪楼集》卷三〇,陶氏涉园本。
〔38〕《高丽史·白颐正传》卷一〇六。
〔39〕《高丽史·李齐贤传》卷一一〇。
〔40〕《安雅堂集》卷四,元代珍本文集汇刊本,台北中央图书馆1981年版(民国59年)。
〔41〕《高丽史·忠肃王一》卷三十四。
〔42〕可参见《存复斋文集》附录冯子振作《赠朱泽民序》;《存复斋续集》《题徽太古所藏郭天锡画卷后》。
〔43〕《存复斋续集》,《题徽太古所藏郭天锡画卷后》:皇庆中,仆因受学于霅川姚子敬先生,先生谓:艺成而下,足以掩德,戒以勿勤画事。适彦敬高侯至,见仆弄翰,语先生曰:是子画亦有成,先生勿止之。由是日新月染,不觉堕于艺成。
〔44〕当时元廷已经重开科举,虽然受到种族等级、名额的限制,但对于“考其学业,科举之外无他业也;窥其志虑,求取功名之外无他志也”(汤成烈《学校篇·上》,参见《经世文续编》卷65)的汉族文人而言,毕竟是一线曙光,特别是在经历元初长达三十多年的禁考之后。
〔45〕《存复斋文集》卷八。
〔46〕参见《高丽史·忠宣王二》卷三十四。
〔47〕《存复斋文集》附录,黄溍语。
〔48〕《存复斋文集》附录。
〔49〕《存复斋文集》卷三。

〔50〕《存复斋文集》卷一。
〔51〕《存复斋文集》卷八。
〔52〕参见《存复斋文集》卷八,《(鲁国)大长公主群花屏诗》。
〔53〕《存复斋文集》附录。
〔54〕参见《存复斋文集》卷十,《送李益斋之临洮》诗:“绿荫满京畿,送子之临洮。临洮何茫茫,流出长城壕。长城岸阻玉关,于阗葱岭河凉高。羌氏儿郎走带箭,哀笳风起斗击刁。良人西征二三载,宝幢车马声尘遥。如今不用酒泉郡,岂必坐使朱颜雕。蒲萄苜蓿味虽美,异方土俗殊乡里。避地犹当似管宁,受封应得论箕子。愿从列骑拥旌旄,归来燕处华堂里。却话人情翻掌难,曾浥征袍泪如洗。”
〔55〕《元史·英宗一》卷二十七,页599。
〔56〕《元史·英宗一》卷二十七,页600。
〔57〕《元史·英宗一》卷二十七,页601。
〔58〕《高丽史·忠宣王二》卷三十四:“六年三月,请于帝降香南游江浙,至宝陀山而还,权汉功、李齐贤等从之。命从臣记所历山川胜景,为行录一卷。”
〔59〕《高丽史·忠宣王二》卷三十四。
〔60〕同上。
〔61〕《存复斋文集》附录,周伯琦《有元儒学提举朱府君墓志铭》。
〔62〕参见《存复斋续集》,《书赠故朴公秋山图》:“延祐庚申春,德润居京都,三韩相国朴公两来寓所,屡请仆作山水图。仆以公务,未遑也。是年五月,又携书南归,期以再会唯命。至治二年,春,德润始受朝命还京,及携斯图诣报前诺,公殡墓之木拱矣。”
〔63〕参见《存复斋文集》附录,周伯琦《有元儒学提举朱府君墓志铭》。
〔64〕如至治二年,英宗皇帝北狩,朱德润被召回,还作《雪猎赋》进呈。此后,英宗皇帝还让他负责抄录浮屠经。“国家用浮屠法,集善书者,以金泥写梵书,有旨命君综其事,盖旌其能书也。”(《存复斋文集》附录,周伯琦《有元儒学提举朱府君墓志铭》)可见,英宗皇帝对他还是挺看重的。
〔65〕《存复斋文集》卷三,《雪猎赋并序》:“至治二年春,二月既望,时雪初晴,天子大搜于柳林。还至寿安山,命集贤大学士臣泰思都、学士臣颡哥识律、功德副使臣三旦、班召小臣朱德润图而赋之……皇元受命,四海来格,游猎之盛,武备粲然,所以明国家之制天备矣。臣德润谨援笔墨图成雪猎,而并陈其赋曰:……今圣天子励精图治,宽宥有容,绍祖宗鸿熙之运,体上帝好生之功,将以仁义为基,道德为宗,诗书礼乐为治,政刑法度为公。正以纲罗俊乂,……”
〔66〕《存复斋文集》卷八。
〔67〕《存复斋文集》卷九。
〔68〕从其当时的诗作《得家书》:“乡关隔万里,执策辽海东。山川何寥廓,草木撼霜风。中原有兄弟,贻我书数封。离别皆不道,努力强吾宗。回观亲舍下,白云正重重。”便可看出他想用事于功名的愿望,参见《存复斋文集》卷八。
〔69〕杨维桢在《朱泽民山水》诗中就称他为“鸡林道人”,参见《草堂雅集》卷后二。
〔70〕参见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4期(1980年),页36—46。
〔71〕《存复斋文集》卷三。
〔72〕《存复斋文集》卷三,《幽怀赋》。
〔73〕《草堂雅集》卷二。
〔74〕参见《存复斋文集》卷七:“维泰定二年五月己酉朔越十五日,癸亥,门士某等谨以元醴、少牢、饮盛庶品敬祭于推忠揆义协谋佐运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太尉、上柱国、驸马都尉、沈王之灵曰:

于乎惟灵!帝甥帝婿,贵崇世爵,富有国位。生为功臣,殁有庙祀。英姿杰特出于人

表，忠烈义勇，本乎天性，粤自世祖神武皇帝，经营四方，赫赫皇皇，中土既平，无远弗届，无人不将。于时先王挈国内附，相平辽荒，爰降帝女，式配于京。……丁未之岁，翊赞仁宗定策邸内，殛除奸薛，以扶武皇，遂拜师傅，增封沈阳。仁宗嗣位，念兹戎功，复加太尉，显显令闻，聿昭先世，三韩之民，式义式康，贻绝孙子，用保其疆。惟王之生，盖亦勤苦跋涉世途，东西北南，靡所定处。后播西裔，或颠其趾，及来再期，竟至于仆。于乎哀哉！初以荣名，如月必亏，既让爵位，将顺将适。胡为纤痍竟至于音。天夺斯人，俾贻后忧。凡我门士，如蹶如踬，有噎于怀，有泪如洗。茫茫逝川，匪昼匪夜。岂伊降神，祭天惟岳……"

〔75〕《存复斋文集》附录，周伯琦《有元儒学提举朱府君墓志铭》。

〔76〕《存复斋文集》卷七，《寄王君实侍御书》。

〔77〕《存复斋文集》卷八。

〔78〕兀颜思忠，字子中（忠），女真人。至正元年为南台御史。

〔79〕参见《存复斋文集》卷七，《谢兀颜子忠御史荐启》："某启窃以迁选，在省部式，尝用于贤材，荐章出宪台。爰下录于贱士，过蒙褒奖，益重兢拳，切念某学本荒疏，材非器使，自结发受在三之教，惟孝惟忠，至成人知无二之诚，……年逾五十，窃位儒台，学惭四科，叨举文翰，自惟满溢，敢望迁升。再廑奖裁，抑深侥幸。此盖子忠御史相公以人伦为重，以儒道为宗，推贤尚能，录不遗于小善，……尝忘其鄙愚，而某分已过，隆材莫充用，蒲柳之质，难期老成，驽蹇之材，终惭远到……"

〔80〕他曾在《申生论》中映像帝位争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申生论》："骊姬构难于晋，嬖献公谋于宗卿，赂其幸臣，使太子申生竟罹不辨之祸。由是二公子出奔，逐群公子，晋氏之衰，实基于此。初姬以申生贤且长，国人所归，故速之死。然申生虽亡，奚齐亦灭，二公子蹑踵而归，重耳卒以霸国，二十年间，斯民涂炭，晋之社稷不绝如线，而惠怀无亲，秦嬴失节，晋之宗盟于是乎乱。当时使申生生徒为梁余之言，如二公子者出，幸而天假之年得返晋国，以主社稷，不紊宗祧，则亦何害于名义？倘使二公子皆如申生，不过获一孝恭之名，晋之有国其能国乎？女嬖之祸甚矣。自古国乱家亡，靡不有兹。嗟夫！"参见《存复斋文集》卷五。



康熙年间中朝查界交涉与长白山定界

李 花 子

一 清朝初年中朝鸭绿江、图们江边界

中朝两国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的局面是在明朝初年形成的，是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和朝鲜王朝不断向北拓展领土的结果。元末明初旧元势力退出朝鲜半岛形成势力真空，高丽王朝趁机向北拓展领土，在鸭绿江下游南岸一带，沿昌城、碧潼、江界一线，设置了一系列邑镇。向北收复双城总管府一直推进到吉州，并在吉州以北、图们江以南地区与女真人展开攻防战[1]。1392 年李成桂发动易姓革命，建立新兴的朝鲜王朝，继续向鸭绿江上游及图们江下游一带推进。特别是朝鲜第四代国王世宗(1419—1450 年在位)积极推行北进政策，沿图们江下游南岸设置六镇，在鸭绿江上游南岸设置四郡，从而以鸭绿江、图们江天险做为其北拓领土的前哨基地[2]。但是，上述地区本属于女真领地，由于女真人不断反抗和偷袭，世宗去世后不久，朝鲜不得不放弃鸭绿江上游的四郡，女真人重回旧地，形成朝鲜历史上所谓"废四郡"地区。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正值努尔哈赤兴起时，朝鲜获得了经营北方领土的绝好机会，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的过程中，征调鸭绿江上游、长白山南麓及图们江中下游女真壮丁统统撤归兴京编入八旗[3]。从此，女真人再也没有回到上述地区，这对朝鲜巩固鸭绿江、图们江边界是十分有利的。

学界一般认为，明代中朝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清朝代替了明朝，那么清代理应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这在逻辑上虽说得通，却把历史问题过于简单化了。明初以来中朝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是事实，因为朝鲜从未越过此线在江北设立行政建置，但是清朝作为一个新兴王朝，有一个认同这一边界的过程。那么，清初统治者是如何看待中朝边界的呢？

皇太极时期同朝鲜达成遵守鸭绿江边界的约定。1627 年(丁卯)1 月和 1636 年(丙子)12 月，皇太极先后两次征兵朝鲜，朝鲜史称丁卯、丙子胡乱。皇太极征兵朝鲜的目的不是为了掠夺领土，而是为了割断明朝和朝鲜的宗藩关系，解除进攻中原时的后顾之忧，并且从朝

鲜获取必要的军粮[4]。皇太极从朝鲜撤军以后，遵守同朝鲜的“各守封疆”约定，满足朝鲜保护领土、边界的要求。1627年第一次征兵时，皇太极担心战线过长，急于同朝鲜求和，而朝鲜方面由于军力衰微，难于抵抗后金攻势，因此同意后金的讲和要求。同年3月，皇太极派使臣与朝鲜国王在江华岛“焚书盟誓”，“誓约凡三条：曰结为兄弟之国也；曰各守封疆永世相好；曰翌日撤兵还归，不复逾鸭绿江岸也”[5]。即两国达成以鸭绿江为界“各守封疆”的约定，这主要反映了朝鲜将后金势力挡在鸭绿江以北，阻止其南下侵犯的意志。

再看一看图们江边界。皇太极关注图们江下游地区，是因为居住在图们江北岸珲春一带的女真人库雅喇。库雅喇是东海女真的一部，原住在珲春以东沿海各岛，崇德四年(1639)其酋长加哈禅发动叛乱，皇太极派兵镇压，同时要求朝鲜派舟师援助，清兵与朝鲜舟师联合攻打，很快征服了库雅喇，将库雅喇的一部分带往沈阳编入各旗披甲，其余部分留驻珲春，并要求朝鲜供应口粮。库雅喇的驻地形势孤绝，经常遭到朝鲜六镇边民的侵袭，图财害命遭暗算者有之，被抢猎物、猎具者有之。为了保护库雅喇的生命财产安全，皇太极向朝鲜发去如下咨文：

> 从来以江为界，纵见倦雉堕地亦无越取之理，今反出边偷取。但雕乃微物，恐由小及大，渐成乱阶。[6]

这里所谓“从来以江为界”，是关乎图们江南岸朝鲜训戎、庆源边民，渡江偷窃库雅喇猎物、猎具之事，所以指图们江确定无疑[7]。即皇太极承认两国从来以图们江为界，要求朝鲜约束边民不得越过图们江，以免“由小到达，渐成乱阶”。同样地，朝鲜庆兴等地边民，也面临着江北清朝兵民越江无理讨索的问题。朝鲜在给皇太极的咨文中，强调两国“虽义同一家，而彼此疆场自有界限”，约束兵民不许擅越图们江[8]。由此可知，皇太极时期与朝鲜达成彼此约束边民不得擅越图们江的约定。

顺康年间，为了阻止朝鲜边民越境采参，清朝实行严厉的禁江措施。顺治元年(1644)清朝举族入关，鸭绿江、图们江以北大部分地区变成空旷无人区，江北丰富的人参资源吸引无数朝鲜人趋之若骛。这一时期，中朝两国围绕越境事件的重大外交交涉，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三道沟事件等，是由于朝鲜边民结伙越境采参引起的[9]。清廷通过咨文、敕书一再警告朝鲜“国有一定疆界，岂容私越”，“盗参事小，封疆事大”，强调疆界的重要性，试图阻止朝鲜边民的越境行为。为此，清朝实行极其严厉的禁江措施，越过鸭绿江、图们江即意味着犯越，要求朝鲜予以处罚。迫于清朝的压力，朝鲜对越境者实行严厉惩处，一旦发现边民越境，无论是采参、打猎还是伐木，都在江边枭示以警众人，地方官则远配边地[10]。顺康年间严厉的禁参政策和伴之而来的禁江措施，有效地扼制了朝鲜边民向江北扩散，保证了中朝之间鸭绿江、图们江边界。

表1:清朝要求朝鲜严守疆界的事例[11]

时间 \ 内容	越境事件	文书	原文	沿江
顺治三年 1646	云宠土兵10名越境打猎	户部咨文	“国有疆界岂容私越”	图们江
顺治五年 1648	会宁、钟城人集体越境打猎	户部咨文	“地方各有疆界越境营利明有严禁”	图们江
顺治六年 1649	六镇边民2人给珲春赖达胡送去肉和米	户部咨文	“国有一定疆界岂容私越”	图们江
顺治九年 1652	碧洞人23名越境采参	敕书刑部咨文	“盗参事小封疆事大” “外国之民不得擅入大国之境”	鸭绿江

表2:鸭绿江、图们江被称作“禁江”的事例[12]

时间 \ 内容	越境事件	文书	原文	沿江
康熙元年 1662	义州人越江伐木	礼部咨文	“违禁越江入我境界,伐木挖参非止一次” “今又给与印文纵放禁江伐木”	鸭绿江
康熙十九年 1680	柔远人越江伐木	礼部咨文	“尔等前供过江取椵皮作绳是虚,令有他故,过禁江是实” “你们口供讨取木皮被人拿住是假,岂为木皮违禁过江来么”	图们江
康熙二十四年 1685	三道沟事件	敕书	“违禁渡江将采参人马用鸟铳伤亡”	鸭绿江

以上所及,从皇太极到顺治、康熙年间,中朝两国虽未达成有关国界的正式协定,但是通过越境事件的频繁交涉,鸭绿江、图们江已经成为两国彼此公认的、事实上的国界。康熙五十一年(1712)长白山定界就是从这一前提出发的。

二 康熙年间清朝历次查界与朝鲜的阻挠

此章标题定为“查界”，而不是学界惯用的“查边”，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清朝历次调查中朝边境，不仅调查鸭绿江、图们江以北清朝境内，同时调查其南边的朝鲜境内，所以有别于单方面查边；其二，康熙五十一年长白山定界以前，鸭绿江、图们江已经是中朝两国彼此公认的、事实上的国界。

康熙年间清朝先后四次计划探查鸭绿江、图们江及长白山，是为了编纂地理志。这不仅与圣祖注重实际地理调查的科学精神分不开，还与圣祖注重长白山发祥地，欲遍审其内外形势有关。早在康熙十六年(1677)5月，圣祖就派遣内大臣武默讷、侍卫费耀色、塞呼礼等四人，探查长白山及宁古塔一带。四人由吉林沿松花江而上，6月，达山巅，观天池，7月，巡阅宁古塔、会宁等处，8月，还京[13]。9月，圣祖说：“长白山发祥重地，奇迹甚多，山灵宜加封号，永著祀典。”12月，封“长白山之神”，实行春秋二祭[14]。

两年以后，康熙十八年(1679)圣祖又派通官张孝礼同乌喇将军到达朝鲜会宁，探问通往长白山的道路和里程。圣祖听张孝礼等报告，朝鲜北部邑镇极度衰残，担心探查人员在中途受累，于是命令停止[15]。当时盛京地区正在编纂府州县志，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派遣董秉忠督促此事，第二年，完成三十二卷本《盛京通志》。前述张孝礼第一次到达会宁，寻问长白山道里，估计与编纂《盛京通志》有关。由于此次探查计划搁浅，《盛京通志・盛京舆地全图》中有关鸭绿江、图们江及长白山部分，极其简单疏漏(参见地图1)。

三藩之乱平定以后，清朝国内形势渐趋稳定，康熙二十五年(1686)圣祖任命勒德洪等7人为一统志总裁官，着手编纂《大清一统志》[16]。随之，探查中朝边境及长白山提上议事日程。康熙三十年(1691)清廷向朝鲜发出咨文，派遣宗室查山、尚书图纳等五人，于第二年(1692，壬申)春，从鸭绿江南岸至图们江南岸探查，要求朝鲜指派熟悉地形的人指引道路，这就是朝鲜所称“壬申查界”[17]。

查界消息传来以后，朝鲜朝廷一片哗然。许多朝臣认为，清朝国内必有不得已返回宁古塔故地的原因，所以借口画舆图，实际上是欲探查朝鲜西北道路形势，以备将来中原形势危急时返回宁古塔。有人甚至提议修筑北汉山城作为国王的临时驻跸所[18]。充斥朝鲜朝廷、给朝鲜北方政策以极大影响的“宁古塔回归说”由此发端。按照此说，清在中原溃败以后，势必退入朝鲜西部，穿过朝鲜内地，经由朝鲜北部六镇地区，返回女真故地宁古塔。这种对清的中原统治心存疑虑的“宁古塔回归说”，首先源于朝鲜士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即“夷无百年之运”，其中还夹杂着朝鲜经历两次清兵蹂躏所形成的仇清心理。其次，康

熙初年清朝接连不断的征战(三藩之乱、统一台湾、平定准噶尔部),特别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皇帝亲征噶尔丹(朝鲜称太极韃子)等消息,通过使臣源源不断地传回国内,加重了朝鲜的疑心。

尽管如此,清廷以皇旨通告派遣五使查界,朝鲜不能不预做准备。朝鲜首先令西北道臣描绘沿边山川形势,并差出接伴使准备迎接清使。朝鲜内心虽充满敌意,表面上不得不做出顺从的样子。出于侥幸,朝鲜以地形险峻、支供难筹为由企图回避查界。接到朝鲜路险咨文以后,圣祖认可了朝鲜的请求。他指出"地方险隘是实,前驻防协领勒楚来时,亦曾奏过地方险阻,若去,朝鲜国人及往看大臣官员俱徒受劳苦,我们地方既经详明,着再议具奏"[19]。圣祖在查界问题上,对朝鲜采取不强迫为其所难的宽容态度,与这一时期清对朝鲜怀柔政策分不开。纵观清朝对朝鲜的政策,曾出现两次转机。一次是顺治初年清朝入主中原以后,对朝鲜的政治压迫大大减轻,顺治元年不但遣返朝鲜质子,还减轻朝鲜贡物数量;另一次是在平息三藩之乱以后,对朝鲜的政策由强硬转为宽容。康熙年间几次查界交涉及康熙五十一年长白山定界,就是在这种宽容气氛中进行的。

壬申查界搁浅以后,康熙四十六年(1707)圣祖采纳西洋传教士的建议,对全国各地进行经纬度实测,编纂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探查中朝边界,特别是长白山一带地形、地势,再次提上清廷议事日程。

同年12月,传教士张诚、白晋等牵头,从北京开始测定经纬度,到康熙五十年(1711)东北地区的实测基本结束,完成《盛京全图》、《乌苏里江图》、《黑龙江口图》、《热河图》[20]。地图送到北京以后,圣祖发现鸭绿江、图们江之间不甚详细,决定集中调查两江之间的连陆地方,于是有了乌喇总管穆克登的第一次查界。清廷考虑壬申查界时,朝鲜极力回避查界,所以决定借调查朝鲜边民越境杀人事件(渭源事件)之机,行查界之实。圣祖认定,中朝两国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俱已明白",只是"鸭绿江、图们江两江之间地方知之不明",于是密谕穆克登:"乘此便至极尽处(指长白山极尽处)详加阅视,务将边界查明来奏。"[21]即下达了调查两江之间连陆地方即长白山地区中朝边界的命令。

但是,清廷以密谕的形式查界,没有向朝鲜发出公开的查界通告,反而加重了朝鲜的疑心。康熙五十年(1711)清使穆克登以调查清人被杀现场的名义到达渭源,要求朝鲜继续指引道路,遭到朝鲜接伴使宋正明等的百般阻挠。宋正明为了避开经由朝鲜内地通往北道的雪罕岭要路,故意将穆克登一行引入地势绝险、人迹罕至的废四郡路。宋正明自认为清使经历路险以后,自然会越入清朝境内平坦的路行走,然而倔强的穆克登坚持溯鸭绿江而上,结果行到狄洞附近折掉门齿,才不得不结束这次行查[22]。

三 中朝定界设想与康熙五十一年(1712)长白山定界

康熙五十一年2月圣祖吸取上一年查界失败的教训,正式向朝鲜发出查界通告,有关查界的谕旨如下:

> 今年穆克登等自凤凰城至长白山查我边境,因路远水大未获即抵彼处。俟明春冰泮时,另差司员同穆克登,自义州江源造小船,溯流而上,若小船不能前进,即由陆路往土门江,查我地方。此去特为查我边境与彼国无涉(下划线为作者所标),但我边内路途遥远地方甚险,倘中途有阻,令朝鲜稍为照管。[23]

上述谕旨若单从字面含义看,就是通告朝鲜派遣穆克登从鸭绿江到图们江查看地形,是为了"查我边境"、"查我地方",与朝鲜无涉。不少人据此主张,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探查长白山是清朝自我查边,不是中朝定界。如光绪十三年(1887)丁亥勘界时,中方代表秦煐指出,查边既与朝鲜无涉,自非定界,如属定界,岂云无涉[24]。秦煐否定长白山定界,自有他的一番道理。从碑文内容"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为分水岭上勒石为记"看,碑理应立在鸭绿江、土门江分水岭上,也就是三池渊、虚项岭附近的小白山。而实际上,碑却立在天池东南边,其一端连着鸭绿江,另一端连着松花江支流。而松花江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实上,根本不可能成为中朝国界,所以秦煐认为穆克登此行是查边,非定界。但是许多证据表明,穆克登探查长白山确系中朝定界,这已成为中外学界共识,在此不再赘述[25]。

细分析起来,上述谕旨隐含如下两层意思。第一,清廷前两次探查计划,都因朝鲜的阻挠受挫,所以意在排除朝鲜干涉。第二,由清廷主导定界,朝鲜只需指引道路。表明清朝没有视朝鲜为平等的定界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定界结果就是不公正的。定界前的康熙四十九年(1710)圣祖在畅春苑接见朝鲜使臣,询问两国分立境界的事,就是为了了解朝鲜对于边界的想法,确保定界的公正性[26]。

下面通过朝鲜朝廷讨论定界对策的过程,考察朝鲜的定界设想与目标。

当接到清廷派遣穆克登探查鸭绿江、图们江及长白山的正式通告后,朝鲜朝廷反映要比上一年平静得多。虽然仍有一些强硬派力主回咨拒绝,但国王和多数臣下认为,清使牌文出来之后回咨拒绝,只会给朝廷带来麻烦[27]。于是,接待清使的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制定了"差官接待事宜别单",规定清使的登山路线、投宿处、饮食、译官、礼单等具体事项[28]。其中,清使登山路线,朝鲜可谓费了一番功夫。本来从鸭绿江边的惠山,到图们江边的茂山,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甫多会山北路,另一条是甫多会山南路。南路靠近江边是由鸭绿江边通往图们江边的捷径。但是在选择登山路线时,国王却下令避开近江捷径,绕道甫多会山北

路[29]。其原因,一是受"宁古塔回归说"的影响,不想让清使知道通往北道的捷径;二是尽量将清使引到北面,因为这样做在定界时对朝鲜有利。从现存汉城大学奎章阁"穆克登定界路线图"看[30],当时中朝查界人员在惠山分手后,一路由穆克登带领清朝画员、从役及朝鲜译官、军官、引路人等,直上长白山顶天池,寻鸭绿江、图们江水源;另一路朝鲜接伴使朴权、李善溥等年老体弱者,沿甫多会山北路前往茂山等候[31]。

朝鲜朝廷讨论定界问题,关注点很快落在两江之间的连陆地方即长白山以南。该地过去是女真人的住地,自16世纪末17世纪初女真人离开后,一百多年来空置无人。康熙五十一年3月昼讲入侍时,知经筵崔锡恒提出如下忧虑:

> 差官来到后,如或有查境之举,则自我所以应之之道,不可不预为熟讲。鸭绿、土门两江流大处,则自可以江为界,而两江源头众水杂流,有难以水为限处,则必须审查地形,详考故实,细询土人,的确断定以待之,然后方可无临时差失之患。[32]

朝鲜之所以关注长白山以南空旷地,有以下两方面原因。其一,从领土方面考虑。17世纪初女真人离开此地后一百多年来,已经有不少朝鲜流民入住并开垦土地。如图们江边茂山,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新设都护府。茂山以北的朴下川(图们江上游)临江台附近,朝鲜虽未设行政机构,因这里土地肥沃、又有参皮之利,到康熙四十五年(1706),已有一百多户朝鲜流民入住,形成几百人的大村[33]。这些地方的归属尚不明确,因此朝鲜认为这是疆场重事。对此,侍读官吴命恒指出:

> 鸭绿、土门则以江为界宜无可论,而臣闻三甲(三水、甲山)茂山之境无江之处,自白头抵长白[34](朝鲜称小白山)之间,绵亘旷漠,本无界限。虽以《舆地胜览》见之,朴下川在于彼境,而今则我民居之,未知彼境又有他同名之地。而此等处亦不分明,系是疆场重事,不可不预为看审。[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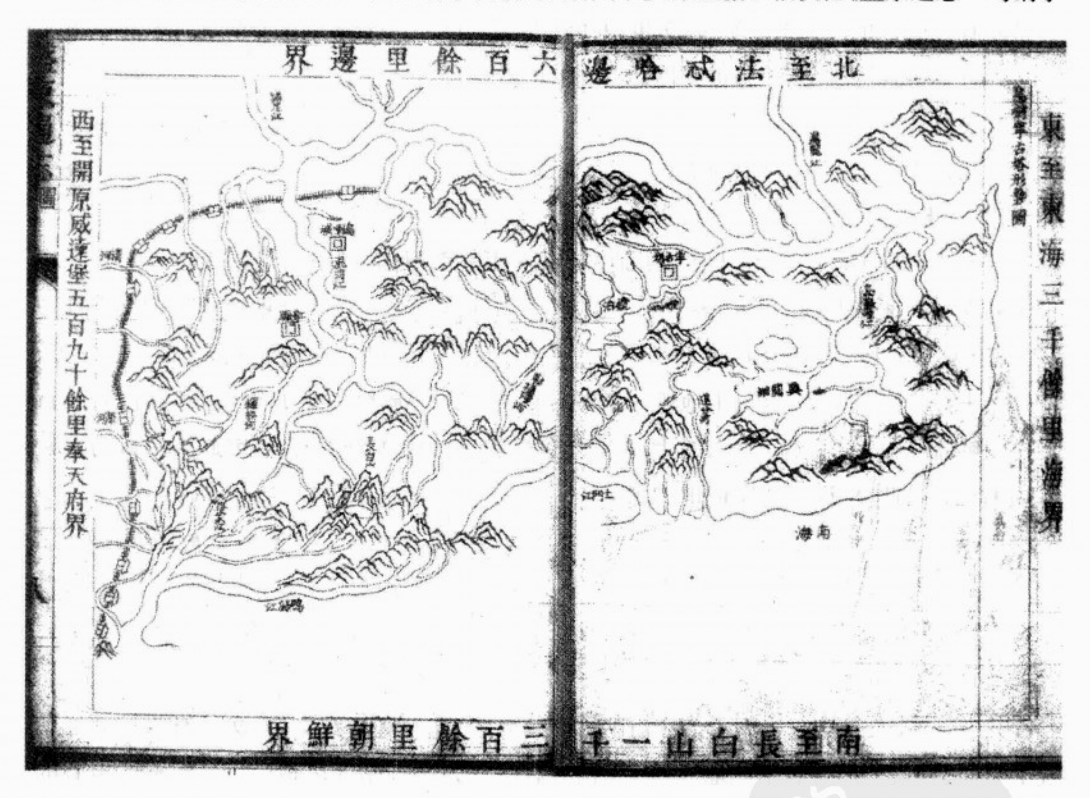
其二,从安全及防御方面考虑。清朝历次查界时,朝鲜疑心很重,此次仍有人担心清朝说不定会"移山外部落居于此地",或者"预为看审将为异日据夺之地"[36]。朝鲜所担心的是一旦此空旷地划入清朝界内,就等于朝鲜北门洞开,安全就没了保障。对清的不信任与戒备是朝鲜极力争取长白山以南空旷地的重要原因。

由于以上原因,在讨论定界对策时,多数朝臣建议要避免以朝鲜所设把守处为界,这成为朝鲜的定界原则。把守处是朝鲜的实际控制线,但是均在离长白山5、6日程的地方,如果以把守处为界,长白山以南的空旷地就要划入清朝界内,这是朝鲜不愿看到的结果。那么以何为界呢?都提调李颐命提出:

> 我国(朝鲜)既以豆(豆满江即图们江)、鸭两江为界,则毋论发源处与下流,水南皆当为我地。[37]

即发源处同下游一样,也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但是,两江发源地众水杂流,要想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绝非易事。为了探明两江水源,朝鲜在穆克登到达之间,事先派出南、北兵使前往长白山探查。二人踏查后绘制地图呈进,结果鸭绿江水源基本一致,图们江水源出现分歧[38],可见图们江水系的复杂。其实在整个定界过程中,不但穆克登本人,就连朝鲜也没有弄清图们江正源到底在哪里。

在派出南北兵使探查两江水源的同时,朝鲜开始寻找文献证据。很快在《盛京通志・乌喇宁



地图 1　《盛京通志・乌喇宁古塔形势图》,康熙二十三年(1684)

古塔形势图》傍注上,找到"南至长白山 1300 余里朝鲜界"的记述[39]。其实,这一段文字表述十分模糊,只是说明乌喇、宁古塔南界到长白山,连接着朝鲜,并没有说清楚乌喇、宁古塔与朝鲜的界线到底在哪里。朝鲜却如获至宝,据此得出长白山以南为朝鲜境的结论。

另外《盛京通志・山川志》之"长白山"条中,有关长白山天池为鸭绿江、图们江源头的记述,成为支持这一结论的又一证据。朝鲜接伴使朴权指出:

其山川卷中长白山□注有曰:其山巅有潭,周八十里,南流为鸭绿江,北流为混同江

(松花江),东流为阿也苦江,今考其地,西南流入海者为鸭绿江,东南流入海者为土门江云云,此亦可为以白头山为两江出源之左契,而白头山南,自当在于我界之中。[40]

由于中国地理志被清朝规定为禁书,不准流入藩国,所以经过朝鲜朝廷再三讨论,最后决定清使到来时,不要提以《盛京通志》为证据的事。即便如此,临出发时接伴使朴权仍感底气不足。首先,长白山以南空旷地曾经是女真人的故地,清朝若诚心要回,朝鲜也无计可施。其次,此空旷地朝鲜没有地名标识。图们江上游几大支流中,朴下川、鱼润江、红丹水尚有江名,而红丹水以上则无江名可考[41]。于是国王一再吩咐,"疆域定限所关甚重,必须终始力争"[42]。

后来穆克登查界行到厚州,向朝鲜译官金指南寻问两国国界时,金指南虽只字未提《盛京通志》,但是他所说"大池之南即我国界",就是依据《盛京通志》而发的。这从两人的对话内容可以看出。穆克登问:"尔能明知两国国界耶?"金指南答:"虽未目见,而长白山颠有大池(天池),西流为鸭绿江,东流为豆满江(图们江——作者注),大池之南即我国界。"穆克登问:"有可据文书耶?"金指南答:"立国以来至今流传,何待文书乎。"穆克登问:"白山(指长白山)之南连有把守耶?"金指南答:"此地绝险,人迹不到,故荒废无把守,有同大国栅门(柳条边)外之地耳。"意即如栅门外空旷地归属清朝一样,长白山以南空旷地归属朝鲜。对金指南的以上回答,穆克登反映极其平静,没有大段诘问之举。随行接伴使朴权大松一口气,他即刻向国王报告"争界事无甚可虑"[43]。

分析一下穆克登对金指南所谓"大池之南即我国界"的说法,不置可否的原因有二。其一,穆克登所掌握的有关长白山天池为鸭绿江、图们江源头的地理知识,同金指南所说的基本一致。其二,清朝对长白山以南空旷地,不像朝鲜那样从领土及安全战略的高度去重视,只不过是为了编纂地理志,划清彼此界限而已。

下面结合穆克登的登山路线及界碑位置,探讨一下穆克登的定界思路及依据。穆克登一行从兴京出发,出头道沟沿鸭绿江水陆并进,到达朝鲜废四郡尽处厚州,与朝鲜译官金指南等见面,继续向前渡虚川江到达惠山。在惠山中朝定界人员分作两路,一路包括朝鲜接伴使朴权等年老体弱者过甫多会山北路到茂山等候,另一路由穆克登带领家丁、人夫及朝鲜译官、军官、引路人直接登上长白山顶,观天池,从天池南下后,开始寻找鸭绿江、图们江水源。穆克登很快确定了鸭绿江水源。图们江水源根据当地土人所谓入地伏流一段后,在甘土峰下重新涌出地面的说法,在东流之三派水中,定北边的初派为正源,并在鸭绿江与此正源之分水岭上刻石立碑。碑文如下"大清乌喇总管穆克登奉旨查边,至此审查,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为分水岭上勒石为记。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碑上记名的有清朝笔帖式、通官各 1 人,朝鲜军官、差使员、译官等 6 人,总共 8 人[44]。

定水源、在分水岭上立碑以后，穆克登仍担心土门江入地暗流处界线不够分明，所以他要求朝鲜利用农闲季节在断流处徐徐设栅[45]。这是为了在图们江上游众多水派中，辨认他所指定的水派是图们江正源，但是恰恰在这一他自认为是图们江正源的地方出了差错。立碑后不久，朝鲜北评事洪致中派差员朴道常等，在断流处从事设栅工程时，发现穆克登所指定的初派水，不入图们江而入松花江，他们沿着水流一直走下去，竟然会走入清朝境内。北评事洪致中要求差员等，只从立碑处始役到涌出处停役，同时报告朝鲜朝廷土门江水源定错。当时虽有一些朝臣力主通告清廷重新定界，但是朝鲜担心一旦穆克登受罚更换其他勘界使，不一定像穆克登这么顺当，朝鲜多得领土有可能减缩，所以就将此事搁置起来。另外，差员朴道常等惟恐朝廷追究其误定江源的责任，竟然违背洪致中的命令，私自设栅于穆克登所指定初派南边20余里的次派。当时朝鲜朝廷虽然知道此事，但是一方面认定朴道常等用木栅、土墩、石堆连接的水源确系土门江正源，另一方面决定不向清朝挑明穆克登误定江源的事，便认可了这件事。直到光绪年间乙酉勘界时，中朝勘界使才发现木栅所连的江源也不流入图们江，而是流入松花江，土门江水源一错再错[46]。

由于土门江水源定错，分水岭上碑的一端连着鸭绿江，另一端连着松花江，导致碑文内容与碑址地理形势不符，所以不少人提出穆克登最初的立碑位置不在天池南边，而是在鸭绿江、图们江分水岭之小白山上（三池渊、虚项岭附近），后来由朝鲜人暗移至天池南边。如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勘界时，中朝勘界人员发现碑址在天池以南10余里处，碑的西边是鸭绿江沟，东边是被中国称做黄花松沟子的地方，中方勘界代表秦煐等就提出如上质疑。再如，比秦煐稍晚一些晚清吴禄贞在亲身踏查研究长白山以后提出同样的疑问。他指出：

> 分水岭者，小白山顶也。距大白（长白山）数十里，稍偏东西。其山西建川沟为鸭绿江发源处，山东三汲泡流出之红丹水为图们江发源处。水东西分流，遂相沿呼其为分水岭。华人亦呼为黄沙岭。韩人又呼为虚顶（项）岭。故必至小白山，方足穷两江之源，必立小白山顶而左右顾，方足见东西分流之迹，玩"审视西为鸭绿，东为土门"二语，其原碑必立于此山之顶无疑。今碑在大白山（长白山），既与分水岭之意相背，且在山之东南麓，更与岭上之言不合，谓是碑之原处，其谁信之[47]。

至今仍有一些学者持同样的看法，认为碑是由朝鲜人在设栅时由小白山暗移至天池南边的。为了证明这一点，甚至提出穆克登从未登过长白山顶天池，他登的是小白山顶。这一点值得商榷[48]。

陪同穆克登查界的朝鲜官吏在叙述定界经历时，无一例外地证明穆克登登上长白山顶天池，并在天池东南不远处立碑。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接伴使朴权启曰：总管登白山巅审见，则鸭绿江源，果出于山腰南边，故既定为境界。而土门江源，则白山东边最下处有一



地图2　汉城大学奎章阁所藏《舆地图·穆克登定界路线图》,乾隆五十五年(1716)

派东流。总管指此为豆江(豆满江即图们江)之源,曰:'此水一东一西,分为两江,名为分水岭可也。'岭上欲立碑。"这里所谓"白山巅"就是指长白山顶天池,当时朝鲜称长白山为白头山,简称白山。朴权的这一段表述比较笼统,乍看起来似乎是说,总管穆克登登白山巅,分别审见鸭绿江和土门江水源,并在岭(分水岭——作者注)上立碑,即白山巅似乎就是分水岭。穆克登的实际登山情况是,他登上白山巅(天池——作者注)后,先审见鸭绿江源,从天池南下后,定长白山东边最下处东流之水为土门江源,之后再定分水岭,并在岭上立碑。显然,这个分水岭不是指长白山天池,而是天池东南边不远处的一个小山。朴权上述笼统的表述与他本人没有亲临长白山顶有关,由于他年事已高,穆克登没有带他上山,而是让他从甫多会山北路先行到茂山等候[49]。

与朴权相比,直接参与定界全过程,并在界碑上刻下名字的朝鲜译官金庆门和参与定界的其父金指南,对穆克登是否登上长白山顶天池最有发言权。父子二人是朝鲜王朝最出色的译官,在由其组织编写的《通文馆志》中明确记载,穆克登定界时"穷江源至白头山顶,潭

水边刻石立碑”。另记“壬辰北使穆克登来定白头山地界也，公(金庆门)父子俱膺别遣之命，穷源陟巅，指画区域”[50]。明确指出穆克登登上长白山顶天池。

迄今为止，洪世泰的《白头山记》是对穆克登长白山定界过程叙述最为详细的。洪世泰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定界，但是他与金庆门是同时代人，他在《白头山记》中，转述了从金庆门处听来的穆克登定界全过程。《白头山记》收录于洪世泰的文集《柳下集》中，该文集成书于雍正九年(1731)，即他去世以后，说明《白头山记》的写作年代肯定要早于这一年，离康熙五十一年(1712)穆克登定界不远，其史料的真实性仍很高。《白头山记》记录穆克登登山、寻水源及立碑的过程如下：

> 及到山顶，日已午矣……顶有池，如人□穴，周可二三十里，色黝黑不测，时正孟夏，冰雪委积，望之漠漠一银海也……甫多会㒵氏小白诸峰，儿孙列耳……遂从岗脊冉冉而下约三、四里，而始得鸭绿之源。有泉泡，泡从山穴中出，其流汩□漂疾，不数十百步，峡坼为天壑中注之，掬而饮之爽然。又行东转逾一短岗得一泉，西流三四十步而别出二派，其一派流与西泉合一则东下，而其流甚细。又东而逾一岗则有泉东流，可百余步而中泉之歧面东者来合焉。克登坐中泉汊水间顾谓庆门等曰：‘此可名分水岭，立碑以定界乎?’庆门曰：‘甚善明，公此行此事当与此山而终古矣。’其水势分作人字，当中有小岩石，状如伏虎，克登曰：‘是山有是石亦甚奇，可作龟趺也。

从上段文字看，穆克登沿天池岗脊下山后，约走3、4里找到鸭绿江源，向东过两个山岗找到土门江源，确定分水岭并在岭上刻石立碑。这一段叙述由于不是洪世泰本人的亲身经历，所以叙述的准确性仍显不够。但是我们从中可以判定以下两个事实，第一，穆克登立碑处不在天池水畔。第二，穆克登立碑处即所谓分水岭在天池东南边几里外。这一碑址同光绪年间中朝勘界时所发现天池以南10余里处基本吻合，证明界碑不是由朝鲜人从数十里外的小白山暗移到天池南边的。

从前述穆克登定界过程和界碑位置，我们可以摸索出穆克登定界的基本思路，就是从两江源头天池出发，在天池附近寻找鸭绿江、土门江正源，一旦正源确定下来，那么分水岭上立碑就只是附带的结果了。后世虽然指出两江分水岭不在天池南边，而是在三池渊、虚项岭附近的小白山上，但是穆克登定界的着眼点不是寻找两江分水岭。虽然最终的结局是错定土门江源，但是其定界思路还是清晰可辨的。

不少学者指责穆克登是被朝鲜人诱引至长白山顶天池的，说他终为朝鲜人所骗，将清属地方糊里糊涂地送给朝鲜[51]。诚然，定界时清朝顾及到了朝鲜的意见，这一点从圣祖向朝鲜朝贡使问话及穆克登和金指南之间对话可以看出。但是，从前述穆克登的定界思路看，其定界的主要依据是《盛京通志》有关长白山天池为鸭绿江、图们江源头的地理知识。

如何评价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长白山定界结果呢？首先，碑文明确记载“西为鸭绿，东为土门”，使中朝两国以鸭绿江、图们江界的事实进一步得到确认，并且第一次用文字形式记录下来。其次，第一次划定长白山天池以南连陆地方的领土界限，使这一地区中朝国界较前清晰。从此，中朝两国以鸭绿江、图们江及长白山天池为界。再次，这次定界由于错定图们江水源，加上中朝两国对此江读音的差异，为后世围绕土门江及与此关联的所谓“间岛”（延边）领土纷争埋下了隐患。

四　长白山定界的影响

第一，对稳定中朝两国边疆秩序具有积极的意义。康熙五十一年长白山定界，使朝鲜的边界意识空前加强。一方面朝鲜更加严厉制止其边民擅越国境从事采参、打猎、伐木等活动，加之清朝的监督，有效地扼制了朝鲜流民向江北扩散。另一方面，向清朝提出禁止关内采参者骚扰朝鲜边境。清廷接受朝鲜的请求，除对越境者施以用鞭、板打，枷号一个月等惩处以外，还对地方官施以罚俸[52]。这些措施体现了清朝对朝鲜边疆的怀柔政策。由于中朝双方的共同努力，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边疆环境。

第二，朝鲜对清朝查界意图的疑虑大大减轻，“宁古塔回归说”渐失去说服力。通过穆克登查界及定界过程，朝鲜认识到清朝查界不是为了探查朝鲜西北道路，而是为了编纂地理志。同时，在讨论定界对策的过程中参考中国地理志，如《大明一统志》、《盛京通志》，从地理上克服了“宁古塔回归说”。朝鲜肃宗时（1675—1720 年在位）名臣南九万、英祖时（1725—1776 在位）承旨李日跻均向国王提出，清朝即使在中原败退，也不会舍弃沈阳—乌喇—宁古塔路线，走朝鲜境内的陌生之路[53]。

第三，对朝鲜开发西北边疆、百姓安居乐业具有积极意义。清朝兴起后，朝鲜一直视西北两界为边防前沿，加上朝鲜边民越境事件频发，清朝不断施加外交压力，严禁流民入住开垦。但是定界以后，特别是随着对清朝危机意识的减弱，西北边疆地区逐渐得到开发。朝鲜正祖时（1777—1800 年在位），鸭绿江上游新设长津府，正祖、纯祖时（1801—1834 年在位），废四郡复设并得到开发[54]。

第四，由于错定土门江源，造成朝鲜后世边界、领土观念极端混乱。光绪年间中朝两国围绕图们江及“间岛”（延边地区）领土归属的纷争，在很大程度上，与定界当时错定图们江源有很大关系。土门江（中国称呼）、豆满江（朝鲜称呼）本为一江二名，这在定界当时，中朝双方极为明确。但是到朝鲜英祖时，朝鲜地图就已经分别标示出土门江和豆满江来，如把与土栅、石堆连接的松花江支流标为土门江，有的干脆将土门江标为“分界江”，假定其在稳城

附近流入豆满江。到了光绪年间随着移居江北的朝鲜垦民增多,有人把在稳城附近流入图们江的海兰河、布尔哈通河比定为分界江,试图将图们江以北领土纳入朝鲜版图。

注 释

〔1〕参见[韩]车勇杰《四郡六镇的开拓》,《韩国史》22,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95年,第143—196页。

〔2〕朝鲜世宗时在图们江下游南岸设置庆源、会宁、庆兴、钟城、稳城、富宁等六镇,在鸭绿江上游设置闾延、慈城、茂昌、虞芮等四郡,作为防御女真人进攻的前哨基地。参见[韩]宋炳基《东北、西北界的收复》,《韩国史》9,国史编纂委员会,1973年,第151—189页。

〔3〕《朝鲜仁祖实录》仁祖元年六月壬午,仁祖二年四月丁亥、四月己亥、九月乙卯。朝鲜王朝历代实录均引自吴晗编《朝鲜王朝实录抄中国史料》,韩国景仁文化社发行,1982年,以下同。

〔4〕参见[韩]金钟圆《近世东亚关系史研究》,惠安,1999年,第113页。

〔5〕[韩]《国朝宝鉴》卷一,第8页。转引自白新良主编《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210页。

〔6〕《同文汇考》别编卷三《犯越》,第33—34页。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78年影印本,以下同。

〔7〕同上注。

〔8〕《清太宗实录》卷五十四,崇德六年正月丙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以下同),二册,第720—722页。

〔9〕又称"乙丑事件",1685年为乙丑年。同年8月朝鲜咸镜道三水、江界等地边民几十名越境采参,在鸭绿江三道沟地方,与奉皇旨画舆图的清官役遭遇,打伤清官役数名,朝鲜人亦有若干死伤。参见[韩]李洪烈《三道事件及其善后策》,《白山学报》第5号,1968年12月;李花子《17—18世纪朝鲜与清朝围绕越境问题交涉》,韩国汉城大学博士论文(待刊)2003年,第71—86页。

〔10〕清代中朝越境交涉,参见前引李花子博士论文。

〔11〕《同文汇考》原编卷四十九《犯越》,第2—7页。

〔12〕《同文汇考》原编卷五十《犯越》,第8、20、24页;卷五二《犯越》,第16页。

〔13〕《八旗通志》初集卷一八五《武默讷传》;《吉林通志》卷一《武默讷奏文》;《清史稿》列传卷七十。转引自张存武《清代中韩边务问题探源》,《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1年第2期,第474页。

〔14〕《清圣祖实录》卷六五,康熙十六年九月二日丙子。中华书局本四册,第880页。

〔15〕参见《同文汇考》补编卷二《使臣别单》,第8页。

〔16〕《清圣祖实录》卷一二四,康熙二十五年三月五日己未。中华书局本五册,第324页。

〔17〕《同文汇考》原编卷四八《疆界》,第1—2页。

〔18〕《朝鲜肃宗实录》肃宗十七年十一月己卯。

〔19〕《同文汇考》原编卷四八《疆界》,第4—5页。

〔20〕参见秦国经《18世纪西洋人在测绘清朝舆图中的活动与贡献》,《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38页。

〔21〕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五,康熙五十年五月癸巳。中华书局本六册,第441页。

〔22〕参见《朝鲜肃宗实录》肃宗三十七年五月甲寅、六月甲子。

〔23〕《同文汇考》原编卷四八《疆界》,第5—6页。

〔24〕张存武前引论文,第484页。

〔25〕康熙五十一年(1712)穆克登探查长白山为定界的主要证据如下。1. 穆克登在分水岭上立碑时称"定界立石,乃是皇旨";2. 穆克登指定土门江源时,定北边初派为正源,并称朝鲜"可以多得

地方";3. 同年 11 月朝鲜致清廷"谢定界表"。

〔26〕参见《备边司誊录》第 64 册,肃宗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 1959 年影印本,以下同。

〔27〕参见《备边司誊录》第 64 册,肃宗三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朝鲜肃宗实录》肃宗三十八年二月庚辰。

〔28〕《备边司誊录》第 64 册,肃宗三十八年三月五日。

〔29〕参见《备边司誊录》第 64 册,肃宗三十八年三月五日、三月二十四日。

〔30〕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所藏《舆地图》(1790 年制)中,收录有"穆克登定界路线图",是穆克登定界时所画《白山图》之模本。参见[韩]姜锡和《朝鲜后期咸镜道与北方领土意识》,经世苑,2000 年,第 63、262 页。

〔31〕洪世泰《白头山记》,转引自[韩]梁泰镇《韩国国境史研究》,法经出版社,1992 年,第 34—38 页

〔32〕《备边司誊录》第 64 册,肃宗三十八年三月七日。

〔33〕《茂山府邑志》建置沿革,《邑志》13,咸镜道篇。韩国亚细亚文化社,1996 年影印版;《朝鲜肃宗实录》肃宗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备边司誊录》第 57 册,肃宗三十二年四月十四日。转引自姜锡和前引论著,第 130—137 页。

〔34〕中国的长白山朝鲜称白头山,简称白山,二者经常混用。朝鲜另有被称作"长白山"的,又称小白山。而此小白山与光绪年间三池渊、虚项岭附近的小白山又有别。

〔35〕《备边司誊录》第 64 册,肃宗三十八年三月八日。

〔36〕参见《备边司誊录》第 64 册,肃宗三十八年三月九日。

〔37〕同上注。

〔38〕《朝鲜肃宗实录》肃宗三十八年四月乙未。

〔39〕参见地图 1。

〔40〕《备边司誊录》第 64 册,肃宗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41〕穆克登在定界时,就是在红丹水以上无江名之水中,寻找土门江水源发生错误。

〔42〕《备边司誊录》第 64 册,肃宗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43〕《朝鲜肃宗实录》肃宗三十八年五月丁亥;金指南《北征录》,[韩]《朝鲜时代士人的白头山踏查记》,惠安,1998 年版。

〔44〕《通文馆志》卷九《纪年》肃宗三十八年,韩国世宗大王纪念事业会 1998 年影印本,以下同。《朝鲜肃宗实录》肃宗三十八年五月乙巳、六月乙卯、十二月丙辰。

〔45〕《朝鲜肃宗实录》肃宗三十八年六月乙卯。

〔46〕《朝鲜肃宗实录》肃宗三十八年十二月丙辰。

〔47〕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第 72 页。

〔48〕刁书仁《康熙年间穆克登查边定界考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 年第 3 期。

〔49〕《朝鲜肃宗实录》肃宗三十八年年六月辛酉。

〔50〕《通文馆志》卷七《人物·金庆门》;卷九《纪年》肃宗三十八年。

〔51〕参见前引张存武论文;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年,第 179—206 页。

〔52〕参见李花子前引论文

〔53〕参见《朝鲜肃宗实录》肃宗二十三年六月辛亥;《朝鲜英祖实录》英祖十一年五月乙丑。

〔54〕参见姜锡和前引论著,第 130—178 页。

汉藏—阿尔泰语系亲缘关系试探*

芒·牧林

将来东方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有了伟大的成就的时候，汉语史上的许多难题可以迎刃而解了。

——王力

一

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是世界上的两个大语系。人们一致认为它们是区别显著、差异悬殊、各自独立形成的两个古老语言群体。从它们的现代语言表层质态上看，其词汇、语音和语法系统，确实各自具有较完整的体系，相互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所以，对汉藏、阿尔泰语系之间从发生学上是否有某种历史联系的问题，语言学界从来没有人提出来讨论过。

我是在研究蒙古语词源的过程中，接触到汉藏、阿尔泰语系之间联系的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末，在考查蒙古语的词源期间，积累了蒙古语和汉语之间音近（或谐音）义同的词近2000条。

对这些"谐音"词的语音和组词结构形态作深入的比较观察、分析时，它们显露出如下特点：(一)有着较为严整的语音对应规律；(二)它们大都是见于春秋、战国时代以及夏、商、周时代的古金文、甲骨文、古文（籀文）和大篆等文献所记载的词汇；(三)词类齐全，不仅有名词、动词、形容词，还有代词、数词、副词和虚词等；(四)在构词形态和语法结构上，表现出许多相同或相似的特点。这种情况给人的启示是：对属于汉藏、阿尔泰语系某些语言（主要以汉语和蒙古语为代表）之间的这些共性成分，很难以接触关系解释，相反，很大程度上在

---

* 本文于1997年用蒙文草就，其汉译稿在中国语言学会第九届年会上宣读，但未曾发表。蒙文稿发表在《蒙古语言文学》2000年第3期上。这次整理其汉译稿时，笔者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

发生学方面可能有某种历史联系。由此,引起了我对汉藏、阿尔泰语系主要语言之间联系问题作进一步探查的兴趣。本文以“解剖麻雀”的方式,采用斯瓦迪士修正的第一百个核心词[1],对汉、藏、满、蒙和突厥等五种语言的同义词进行了比较考查,并从考查结果整理出了自己的一些认识。

二

汉、藏、蒙、满、突厥五种语言的“百词”读音比较列表如下:

		1. 我(吾)I	2. 你 you	3. 他 he
汉语	现代	wǒ	nǐ	tā
	中古	ngɑ	na/njia	t'ɑ
	上古	* ŋa	* ŋjier	* t'a
藏语		ŋa/nad	khjod/khjed	kho/khoŋ/de
	书面	ŋa < La. Ba. Xi > *	che raŋ < La >	kho < La. Ba >
			nɸʔ < Ba >	kho/kha/ka < Xi >
	方言	ŋæ < A >	cçho < A >	kha rgo < A >
			tçho < Xi >	
蒙语	书面	bi/mi -/na -	ci/t'a	t'er -/teg
	中古	ma - (- n)		- t'e'ü
	口语	bi	ci/t'a	tere
满语	书面	me -/be -	si	ce/se
		mi -	hi	t'ese
	口语	bi		
突厥语	古族语	män ~ bän		
		- ni/ - n	san/si	ɑu/ɑl
		mɛn < U > *	sen < ka. kir.	u < U. Uz. s >
		men < ka. kir.	Uz. Tu. S. Y >	ol < Ka. Ta. Tu >
		Uz. Ta. S. Y >	sen ~ sin < Ta >	al < kir >
		men ~ min < Tu >		gol. ol. ɑ < Y >

4. 此(这、今) this		5. 那 that	6. 谁 who
cǐ(此)	jīn(今)	nà/nuò	shuí/shéi
ts'ti	kiam/kem	nɑ	dziui
* ts'jeɤ	* kiam	* na	* djiwər
red/hdi/de	jin/fin ni	de	su/kang
ti <La>	jin <Ba>	the <La>	su <la>、
ʔt/de <Ba>	jən <Xa>	e/de <Ba>	sew <Ba>
ndə <Xi、A>		kan <Xi>	shə <Xi>
			sə <A>
edü -/ede -	ene/egün	nög -/t'er -	hen/her
edü'e/eJe -	ene/eū -	nög -/cin -	her/ken
odo -	en/ūn	nö -	hen/heŋ
t'e	ne/än		wə < * he
ere			ŋi
idi	an - bu/bu emdi	ol	kan/kim/kam
mɑwu <U>	bu <U、Ta、S、Y>	su/ɑɛu <U>	kim <U、ka、Kir、Uz、Ta>
manɑw <ka>	bul ~ bu <ka、kir、Uz>	sol/ɑnow <ka>	kɤm <Tu>
mɑbul <kir>	bo <Tu>	uʃu/tigil <kir>	kem <S、Y>
mɑtɛm <Uz>		su/ɛnɛwu <Uz>	
bu <Ta、S、Y>		ʃol ~ ʃul/tigt <Ta>	
bo <Tu>		u <S> ol/un <Y>	

7. 何(什么)what	8. 不 not	9. 全,共 all	10. 多 many
hé	bú	quán	duō
ɣe/na/ɣa	piuəɣ/piəu/piuət	dziwæ	tɑ
* ga/ * gər	* piwə/ * piuet	* dʒjiwan	* tɑ/ * tar
gaŋ/tɕi/ga kha re < La > tɕhi < Ba > tɕhə zək < Xi > tɕhə zuk < A >	mi/min	tɕaŋ mə/joŋs tshəŋma < La > tsho ma < Ba > lox、lox ba < Xi > tshaŋ ma < A >	du ma/maŋbo mang ko < La > mö mbʋ < Ba > maŋ < Xi > maŋ ŋæ < A >
ya –/her	bǖ/ülü/ü –	čöm/hɑm –	①dɑb –(多)
yɑ: –/qɑ: –/ker	bǖ	čöm/kam –	②ol – < * hon(繁)
yǖ/hɑ̄/yā –			daw –, ol –
ai/ya	ume/wəka	gemu ele/yooni	labdu seng –(众)
ē			
qanĬ/nä ~ ni/ja	ämäs ~ – mə/ ma、bos	qamaq	tälim/köp
mimɛ < U、Uz、Y > ne < ka > emne < kir > ni、mersɛ < Ta > diyy、ʤyy < Tu > naŋ < S >	jɑq < U、Ta、Y > ʤɑq < ka、kir > jɑq ~ joq < Uz > ʤok < Tu > janə < S >	hɛmme < U、Uz > bɑrləq < ka > bɑrdəq < kir > hɛmme < Ta > tøtø < Tu >、 heme < S > barə, Xo < Y >	ʤiq < U > kɸ < Uz、ka、 Kir、Ta > gɸbɛj < Tu > kob, ɑtox < S > gɸhp ~ gehp < Y >

11. 一 one	12. 二 two	13. 大(亦奕)big	14. 长 long
yī	èr	dɑ̀/yì	chɑ́ng
ʔjit/ir	nji/nzi/zi	t'ai ~ dai/iak	t'iang/tiəng
* ʔjiet/ * jiĕt	* njier/ * njidh	* tar ~ t'ar/	* d(p –、k –)jang
		* ɣrak	* t(tʂ–)iang
gteig/tɕig	gnis/ȵis	tɕhen/tɕhe/dɦa	riŋ/riŋpo
tɕi <La>	ȵi <La、Ba>	tɕhe po <La>	riŋku <La>
tɕiʔ <Ba>	hȵi <Xi>	tɕhe/tehau <Ba>	rimbʊ >Ba>
ntɕəx <Xi>	ɣȵi <A>	thewo <Xi>	rəŋwo <Xi>
ɣeɕəx <A>		tɕhe <A>	rəŋkə <A>
nig –/iji	①hoyir < * hoir	①dɑ/dɑir/dɑr –	dam(长)
nik –	②jir	②yehe	
neg ~ nig	①ning –	dɑyir/yek –	dang –
mu/emke	②huwe	amba(颟?)	seng –
bir	aki ~ iki	①bɑl – ~ bul –	uzun/uzɑk
bir <U、Ka、Kir	ikki <U、Uz>	② tay ~ dɑyi,③ uluq	uzun <U、Ka
Ta、Tu>	eki <Ka、Kir>	tʃoŋ <U,Kir>,	Kir、Ta、Tu、Y>
bər <S、Y>	iji <Tu>	soŋ <Ka>	uzin <S>
	ʂgə <Y>	kɛtte <Uz>,	
		zor <Ta>	
		uluk <Tu>	
		dzɑtəx <Tu>	
		bezək <Y>	

(久)long	15. 小(少)small	16. 女(母)woman	
jiǔ(久)	xiǎo/sháo	nǚ(女)	mǔ(母)/mā(妈)
kiə/giu	siæu/ci'u	nio/niɑ	meu
* kjwəɣ	* sjiao	* niaɤ/ * nijagx	* məɣ
	tɕhuŋ ŋu/defiu	bu ma/na ma	əmo/ma/ʔa ma
	tɕhy tɕhy <La>	bho mo/ma	a ma <La>
	tɕhũ tɕhũ <Ba>	mo <La>	ʔa ma/məgē
	tɕhoŋ wo <Xi>	pāmʊ <Ba>	<Ba>
	tɕhoŋ <A>	sə mo <Xi、A>	ʔa ma <Xi>
			æ mæ <A>
egür - < * figur -	öčü -/čögen -	em - e	emē/momo
urt -	< * ficü -		
	čö -		
e'uri/urt -	üčü -/cön	nunʝi	mē -
	dsihan/ɑzige		emē
	osoh -		
æbidi ~ æbæt	①bidʒii(微)	isï ~ esï/qiz	ɑnɑ <U、ka、TU>
	②kitɕik(细)	qiz <U、Uz>	ene <kir、Uz>
	kitʃik <U、Uz、Y>	qəz <ka,kir,Ta>	ɛhij(且) <Ta>
	kiʃkene <ka>	Gaz <S、y>	
	kitʃii ~ kitʃy <kir>	urux <Tu>	
	bidʒji <Tu>		

17. 男(儿)(夫) man			18. 人 person
nán(男)	ér(儿)	fū(夫)	rén
nəm	nir	piuo/piu	njin
* nəm	* njiɛɣ	* pijuəɣ/ * piəg	* njien
skjes pa	ɕa lə <xi>	bu/po	Jəŋ/in/jŋ
cho ka <La>	ɕa lə <A>	phu <La>	həŋ(tɕo) mi
çe pa <Ba>		po <Ba>	mi <La、Ba>
ɕələ tɕho <Xi>			ȵə <xi>,
no shər <A>			mȵə <A>
nɑ'un/unu	ere	hü/heü	①hün –
			kü'ün
no'un	er	hübe –	② – čin/ – gin/ – ǰin
		kö'u –	
		hū	
namon	gigen	hu/jui	nyalma
	fer –	fu –	
	uri –		kisi
	ɛr ~ erk <U、Uz		①kiʃi ~ kisi
	Ta、Tu、Y>		<U、ka>
	er ~ erik		giʃi <Tu>
	<ka、kir>		kasi <S、Ta>
			②adem ~ adam
			<U、ka、kir>
			ɑdem <S>

19. 鱼 fish	20. 鸟(雀)bird	21. 犬 dog	22. 虱 louse
yú	niǎo	quǎn	shì/jǐ
ngio	tiɛu	k'iuɛn	kiai/giai
* ngɣəɣ	* teəw	* k'ewan	* kjər/ * giər
ŋa	bia/bieɦ u	khji	ɕig
na < La、Ba、Xi >	tɕha < La >	chi < La >	ɕi < La >,
ȵæ < A >	ɕy < Ba >	tɕnl < Ba >	Xiʔ < Ba >
	ɕa < Xi >	tɕnə ɣə < Xi, A >	ɕhax < Xi >
	wɕæ < A >		xak < A >
jigas –	sib – ɑ – gu	činu – ɑ	①sirhe
dzɑg –	siwū	činu'ɑ	sir –
	šowū	čon	šir –
			sir –
nima –	ečike t'su	inda –	širhe
balig ~ pulə	quš	ït	①pit, ②sirkɛ
bɑləq < U、Ka、	quʃ < U、Ka	it < U、kir、Uz、	pit < U、Ka、Uz >
kir、Uz、Ta、Tu >	kir、Uz、Ta >	Ta >	bijt < ka >
pulə < S, Y >	kuʃ < Tu >,	ijt < ka >, ɣt	bɣt < Tu >,
	Guʃ < S >	< Tu >	bid < S >
	Gus < Y >	id < S >	bəʂe < Y >
		əʂt < Y >	

23. 木 tree	24. 种 seed	25. 叶 leaf	26. 根 root
mù	zhǒng	yè	gēn
muk	dung/t'siuŋ	siæp/jiap	kən
* mewk	* dewng/ * tjewng	* sejiap/ * rəp	* kəm
çiŋ(森)	son/sa bo	lo ma	rtan ba
çlŋ <La>	sɸ <La>,	lo ma <La、	fsa:(tsa wa)
Xhi <Ba>(树)	shɸ <Ba>	Ba、Xi、A>	<La>
doŋ wo <Xi>	sha ʁoŋ <Xi>		hdʐɛʔ <Ba>
xhaŋ <A>	sæ woŋ <A>		ntsa pa <Xi>
			Ytsa <A>
mo –/mod –	①udum ②egul – der	nɑb –	ünd – < * hün –
mod/mudu	①hudum ②ül – < * hāl		undüs
mō	①hūn –	abda –	① fulehe ondo < * hon –
moo	②um –	giya –	②in –
jgəc	urug(果)	jalbir –/japir –	jiltiz ~ jeldes
jabatʃ ~ jiɣ aʂ	uruq(果)	jopur – <U、Uz>	<U、Uz、Y>
<U、Uz、Y>	<U、Uz、Ta>	ʤapar – <Ka>	tamər <Ka、
aʁaf ~ aʁatʃ	yrɸ:n <kir>	jafr – <Ta>	kir、Ta>
<Ka、S、Ta>	yrɸsin <Tu>	ʁal – <Tu>	dazɤl <Tu>
jijaʃ <Tu>	urlux <S>	jahrh – <S>	ozek <S>
djaʁatʃ <kir>	Xuxuzi <Y>	lahp – <Y>	

27. 皮 skin	28. 肤	29. 肉 flesh	30. 血 bloold
pí	fú	ròu/rū	xuē/xiě
biue/bie	piuo	niəu/niuk	xiuɛt/xiwet
	phiuə		
bjirar	* piwəɣ	* ȵjəw/ * ŋjəuk	* xwet/ * hwit
* biwa		ȵiəʔ <上海>	
		ȵiuk <广西>	
	lpag pa	ɕa	khrəq
	pak pa <La>	ɕa <la>	tʂha <La>、
	pa pa <Ba>	xha <Ba、xi、A>	tʂhaʔ <Ba>
	ʔox k wajko <xi>		tɕhax <Xi>
			cɕhax <A>
siri ~ ɑris – < * hɑri –	xör –	mih –	čis –
sir	xor –/gør –	mik –	čisu
		mah	čus/šus
sukuu	fur –	yali	sengi
terə	pasïq	ät	qän
terɛk <U、Ka	pose <U>	qøʃ <U、Uz>	qan <U、Ka
kir、Uz、Tu、Y>	qubəq <Ka、Kir>	et <Ka、kir	Uz、Ta、Y>
teri ~ tiri <Ta>	Xɑbɣ <Tu>	Ta、Tu>	xɑn <Tu>
tirə <S>	qox <S>	eht ~ jehde <Y>	Gɑn <S>
	qozdəq <Y>		

31. 骨(覈、核)bone		32. 脂(膏油)grease	
gǔ(骨)	hé(核)	zhī(脂)	gāo/yóu(膏、油)
kuət/rur	ræk	tsjii	kɑu
* kwət	* grək	* tjier	* kəw
rus pa		tshil lu/tsol	
ry pa <La>		hum tʂhi: <La>	
ʐʋ pa <Ba>		tʂhi <Ba、Xi>	
rə pa ~ rə pa		tʂhə <A>	
<Xi、A>			
	yas –	tos –/tɑr –	oge – < * ho –
	yɑs – < * hɑs	tos –/dos	o'ü – < * go ~ oh –
giran	faha	sim(萤)	nin –(腻?)
süŋ ük/songük		jag	semiz <U、Ka
søŋɛk <U>		mɑj <U、Ka	kir>
syiɛk <Ka、Uz、		Kir、Ta>	semus <S>
Ta>		jaʁ <Uz>	seməs <Tu>
sø:k <kir、Tu>		ys <Tu>	kur <Y>
sinik <S>		jɑɣ/jaʁ <S、Y>	
səmək <Y>			

33. 卵(鲲)egg	34. 角 horn	35. 尾 tail	36. 羽 feather
luǎn/kūn	jiǎo	wei/yǐ	yǔ
luɑn/kuən	kok	mjiwər	jiuo
* lwan/ * kwan	* krewk	* mjiwər	* ɣjwəɣ
sgo ŋa	rwa	rŋam ~ ɕʐuggu	sgro
koŋa < La >	re ko < La >	ŋa ma < La >	tɕhə pu/tʂo < La >
qu ŋa < Ba >	ʐajo < Ba >	ŋa mə < Ba >	ʥo < Ba、Xi >
goŋ ŋa < Xi >	ra tɕo < Xi >	hŋam < Xi >	rdzo/wɕ rpə < A
wGar rgoŋ < A >	ra tɕho < A >	rŋa mæ < A >	>
ün – /ön –	eber < * hèr	uq(?) < * qut –	ödü
üm – < * küm –	xəur < 达 >	godoi	yüd – /höd –
			öd – ~ edü –
umhan < * hum –	weihe/uihe	uce	①inggə—
		unče –	②dethe
jumurtğə	mungüz	qudruq	jüng
tuxum < U、Uz >		qujruq < U、Kir >	pɛr/pey < U、Uz >
ʤumərtgɑ < Ka、		qujrəg < Ka、Ta >	qowasa ~
Kir、Tu >		dum < Uz >	kuursu < Ka、Tu >
køkɛj < Ta >		qurux < S >	soŋo:r < Kir >
oja、aola < Y >		quzuruq < Y >	mɑmuq < Ta >
			jyɣə < Y >

37. 发 hair	38. 头(首)head		39. 耳 ear
fà	shǒu(首)	tóu(头)	ěr
piuat	siəu	dəu	ni/nzi
* piwat	* tjəw	* dew	* njiar/ * njəgx
skra	tʐu/tu	mog	rha
tɕa < La、Ba >	po/dba	ko < La >	əm tɕo < La >
ntɕa < Xi >		ŋgʋ < Ba、Xi >	na jo < Ba >
rcɕæ < A >		ŋgo < A >	rnæ < A >
			na ndzox < Xi >
üsü gej̆ –	teri –/tür –	tolo –(头颅)	cihi
hüs – ked –	teri'un		ciki/cig –〈 * gjig
üs < * hüs –	türün		čih
hasun < yo >	uzhu < * hzhu	toru	shən
fuiyəh –	teribun		cikin(边缘)
saǒ	töz/tüz	bas	qulǧaq ~ qulaq
ʧaʧ < U、Kir		baʃ < U、Kir	qulaq < U、Kir
Uz、Ta >		Uz、Ta、Tu、S >	Ka、Uz、Ta、Y >
saʃ < Ka >、		bas < Ka >	kulak < Tu >
saʤ < S >		baʂ < Y >	Galax < S >
baʃayk < Tu >			
ʂɯʐ ~ saʐ < Y >			

40. 目(眼)eye		41. 鼻 nose	42. 口(颔)mouth
mù(目)	yān(眼)	bì	kǒu(口)
miuk/bug	ngən/ngon	biult	kəu/khəu
* mjəwk	* ngən/ * ngɣən	* bjiwar/ * kiwər	* k'ew/ * khugx
mig/sraŋ	bjen	sna ~ ʃaŋs	kha
mi <La>		nə ku <La>	kha <La、Ba、Xi>
miʔ <Ba>		na <Ba>	khæ <A>
mi <Xi>		nna ʁoŋ <Xi>	
ɣɳ̥ak <A>		rnæ <A>	
nidü	ɑnis – < * yɑn –	habar < * ɦbar	ogoei < * hoe
nüd –/nid –		ha – mar	< * hō – c
		bijə/bur –	
nio –	yasa	oforo	ogijɑg ~ ōsihi –
			holɛ
koz		burun	ɑqiz
koz <U、Ka		burun ~ buran	eʁ iz <U、Uz>
kir、Uz、Ta>		<U、Kir、Uz、Ka>	ɑwaz <Ka、Ta>
karɑk <Tu>		burun ~ murun	o:z <Kir>
goz <S>		<Ta>	ɑds <Tu>
gɸz ~ gopz <Y>		xɑɑj <Tu>	ɑʁaz ~ ɑʁzi <S>
		qaŋaraq <Y>	dhec ~ dəm –
			<Y>

	43. 齿牙 tooth		44. 舌(言)tongue
hàn(颔)	chǐ(齿)	yá(牙)	shé
ɣam/ngəm	t's'i/ɣiet	nga ~ ngia/ ŋa/nga	ziæ/ȡ'e/çar * djiet/ * diat
* gəm/ * ngam	* tjiəɣ/ * giət	* ngrəɣ ~ * ng(ɣr -)əg	hi(温州)
kham	so so <La> sho <Ba、Xi、A>		ltço tçer/tçele <La> tçele <Ba> ntçe <Xi>, rtçi <A>
ama < * ham - aman am ①ang - ga ②feme	sid - ü sid - šüd weihe šaifa	ara - g - a ara'a < * har - ara argan	hel - (舌、言) kelen xəl ileng - < * hil - hele
	tis ʧiʃ <U、Uz> tiʃ ~ tiʃ <Ka、S、Kir> diʃ <Tu> des <Y>	aziiɣ azi <Tur>	til ~ tïl til ~ tɨl <U、Ka、Kir、Uz、 Ta> dɤl <Tu> dil ~ dəl <S、Y>

45. 爪 claw	46. 足(脚) foot		47. 膝 knee
zhǎo/zhuǎ	zú(足)	jiǎo(脚)	xī
tsau	tsiuk/tsjwok	kiak	silt
* tsɤəw	* tsjew/ * tsjik	* kjak	* sjit
sder mi/sbar mo		prkaŋ pa	pus mo
ter mo <La>		kaŋ pa <La>	py mu <La>
shē mʋ <Ba>		Kō mba <Ba>	pe mo <Ba>
der mo <Xi>		hkaŋ wa <Xi>	wiŋgo
rdbar mo <A>		rkoŋ næ <A>	<Xi、A>
sabar ~ sarma –	tabaq	kol/kül(踵?)	①cige ~ toiq(膝)
samar –	tawaq	hol	
sawar < * sar –			②tahim
①wasiha	bethe		①tobgiya
②oshono			②bohi
③ʒavə –(抓)			③cege(膝)
but(爪子)	adaq(底)		①tiz②tobig
tut –(抓)	ajaq <U、Ka		~ towiq
tut –(U、Kir	Y、Kir、Uz、Ta>		③tagiɤ
U、Tu、Ka、S)	daman <Tu>		tiz <U、Uz>
tirhk <Y>	jad <S>、		tize ~ tiz
	azaq <Y>		<Ka、Kir、Ta>
			disqak <Tu>
			dyz <S>、
			dez <Y>

48. 手(胳)	hand	49. 肚(腹)belly
shǒu(手)	gē(胳)	fù(腹)
siau/ɕɪau	kak	piuk
* st'jəw	* krak	* piəwk
hɕjig ma/sug (chiham)	lag pa lag pa <La> la pa ~ lax <Ba、Xi> lok kwæ <A>	gok pa paja <La> no <Xi、A>
šū ~ siau (手腕)	gar ~ gabir (胳膊) gar ~ ar	gedesu < * ɣet –
sabda(尺骨)	gala ~ nala(胳臂)	hefe –
	Gol(胳膊) qol <U、Ka Kir、Uz、Ta> xol <Tu> el <S>、 alaɣ <Y>	qarin,qeʁe qerin ~ qaran <U、Ka、Kir、Ta> qɛrin <Uz> kodu <Tu> Garən ~ garən <S、Y>

50. 脖(颈) neck		51. 乳 breast	52. 心脏 heart
bó(脖)	jǐng(颈)	rǔ	xīn
buat	kiæng/giæng	niuo	sijm/sjəm
* bwət	* kjieng/ * gieng	* njew	* sjim/ * siəm
	ske/mdʐiŋpa	ɦo ma/nu ma	sȵiŋ/sȵir
	/mgjin pa	o ma <La>	ȵiŋ <La>
mog pa	ke、tɕiŋ pa <la>	ȵǔ <Ba> nə	ni <Ba>
	ke <Ba> hke ta	ma ~ nə	hȵəŋ <Xi>、
	<Xi>、rke <A>	mæ <Xi、A>	ȵan <A>
①bog –	sili	①hohü	Jirühe
bögoljur			Jirkön
bagal – jur		kok –	Jül – de
②bor – gul		②ugarag < * hür –	J̌urhe
mongon	gen/ging	huhun	n'yaman
meifen			
①bojun		kôküz/ämig	jürək
②boɤuz		ɛmʧɛk ~ emʧek	jyrɛk ~ jirix
mojun/bojin		<U、Ka、Uz>	<U、Uz、Ta、S>
<U、Uz>		emʃek ~ imʧɛk	ʤurek ~ ʤyrɸk
mojən/mojun		<Ka、Ta、S>	<Kir、Ka>
<Ka、Kir、S>		emix ~ ieməɤ	djyryk <Tu>
bojən ~ mojen		<Tu、Y>	ɸrek ~ jɸrek <Y>
<Tu、Y>			

53. 肝 liver	54. 喝(服) drink
gān	hé(喝)
kan	ʔai/xat
* kan	* ʔrər
mtɕin、sn̥.iŋ	
tɕhi pa < La >	
n̥.i < Ba >	
hn̥.aŋ < Xi >	
rn̥.aŋ < A >	
elige	uguhu
helige ~ heil –	ūh < * hu –
kil –	
fahun	uki – ~ usi –
bagir(腑)	ic – /up
bebir ~ bɑwar	itʃ – < U、Kir、Uz >
< U、Tu >	iʃ – < Ka、Tu、S >
bɔ:r ~ bɑur	əʂ – < Y >
< Kir、Tu >	
bɑʁar < S、Y >	
dʒiger < Uz >	

55. 吃(食)eat

shí(食) > chī(吃)

zilk > kiai

* zʤɑk ~ * ɣiəɣ

* kiat

za

sa < La、Ba、Xi >

sæ < A >

jde –

jd – < * hid

jetere

ja –/ye –

yi – jɛ – ~ ji –

< U、Uz、S、Y >

ʤe – < Ka、Kir >

ɑʃa < Ta >

ʤi – < Tu >

56. 咬 bite

①jiáo②yǎo

①kəu②ʔau

① * krəu② * ʔkəw

ŋo(上海),

ȵiəu(长沙)

so rgjag

so ca < La >

ndʐɛʔ < Ba >

sho ndep < Xi >

wɑ di,

wjəp < A >

ǰagu –

ǰū

sai – mbi

šofɑ –

①tislə –

②kiʃli –/kɑʤi –

tʃiʃlɛ – ~ tiʃiɛ –

< U、Uz、Ta >

tiste – ~ tiʃle –

< Ka、Kir >

ɤzɤ – < Tu >,

tili < S >

dasde – < Y >

57. 见(视)see	58. 听 hear	59. 知 know	60. 睡(昏)sleep
shì(视) dzjIi/zji * djier/ * grjax	tīng t'jlng * t'eng	zhī tsilIk/ti/ci * tijək	huēn xuən * xmωən
lta ta < La、Ba > nta ~ nte < Xi、A >	ȵan/ȵion ȵɛ ~ nē < La、Ba > ȵan < Xi、A >	çes/rtog çē/tshɸ < La > xhe < Ba > çhi ~ xhi < Xi、A >	ȵal ȵɛ < La > ȵe < Ba > ȵa < Xi、A >
①sir – te ②hara –	čing – na –	seh – e –	① um – ta –(昏) ② hon – ①unta – < * hun – ② xon –
ših – ①ša – mbi ②kara	čang – don – zhi –	sehe – her – chun ser – bun se – mbi	amu – amga –
kör qar < U、Kir Ka、Uz、Ta > xar < Tu > Gar < Y、S >	①äsid ~ äsit ~ isit ②taiŋ – la – tiŋʃa – ~ tiŋlɛ – < U、Kir、 Uz、Ta > taŋda – < Ka > diŋ – na – ~ isdi – < S > tiŋ – na –, aŋ – na – < Y >	bii –(智觉) huʃ < U、 Uz、Ta > es、sezim < Ka > es、uʃ < Kir > sekil – sezek < TU >	udï – < * uncä uxia – < U、S > ujaqta – < Kir > uqta – < Kir > uxlɛ – < Uz > udu – ~ uzu – < Tu、Y > juqla – < Ta >

61. 死①②die

sǐ

siIi/siei

* sijɛr

çi

çi <la>

xhi <Ba>

xhə <Xi、A>

ühü – < * hüh – ~ söhü

yegü – ~ fügü

②seg

guku –

oI

øl – <U、Ka

Kir、Uz、Ta、Tu>

ul <S>

jyl – (Y) olür ~ olud

62. 杀 kill

shā

①se②tʂ'ai③ʂæe

① * sriat②tsar

③ * sriat

bkror/gsod/gsat

sɛ <La>

bsat <A>

ʈʂu/se <Ba>

sçl/ça <Xi>

①hid –

②yɑr – < * hir –

hidɑ –

ir – < * hir

①kiyar ~ kisa –

akuu –

öIür ~ ölud

63. 游泳 swim		64. 飞 fly	65. 走 walk
yǒu(游)	yǒng(泳)	fēi	zǒu
iəu	jiuəng	piuəi/piwěi	ʦəu/tsəu
* ɣiəw	* ɣiwang	* pijwər * piad	* ʦeu
(ʦhu)rkial		ɦphur	ɦgro/doŋ/tɕhə
(ʦhu)cɛ <La>		phir <La>	ʈʂo/phe <La>
ʦhʊ tse <Ba>		di <Ba>	ndʐo/xhɛʔ <Ba>
tɕhə ɕa <Xi>		phər <Xi>	ndzo <Xi>
		mpər <A>	ŋjio <A>
①heru-/hesu-	umba-	heis- >nis-	①güyü-
②yor-ci- Jor-ci-	humba < * hum-	keyis-	②jiru-a-
	xumba-〈土〉	busaq nise-	tub-
her-si-	seibi-	deye-	①yo②yabu
sar-a-sha-	olosi		③zhor-
jüz-/köz-		učk(* füs-?)	mang-/jopbi-
yz- <U、Uz、Ta>		uʧ <U、Kir Uz、Ta>	maŋ- <U、Y>、
djyz- <Ka、Kir>		uʃ <Ta>,	jyr- ~jør- ~ʤor- ~ʤyr-
eʃei- <Tu>		suʐ <Y>	<U、Ka、Kir Ta、Tu、S>
sugjiu- <Ta>		uʤe, bizi <Tu>	
		udji <S>	

66. 来 come	67. 卧 lie	68. 坐 sit	69. 立(止)stand
lái	wò	zuò	lì
ləi/lə/le	ngua	dzua/dzuai	lilp
* ləɣ	* ngwa	* dzwa * dzuarx	* liep, * piep, * tiep, * tsiep
joŋ, ɕog(至)/ ɦmoŋba joŋ/ɕo/bhe <La> ʔo, xhoʔ <Ba> joŋ/xhok <Xi、A>	ȵal ȵɛ/te <La> dʐau, ȵeje <Ba> lod <Xi> ȵæ <A>	bsdəd/ɦdug /ɦzhug te/ɕu <La> nduʔ <Ba> nacx <Xi> wtsat <a>	laŋ/ɦsag laŋ <La、Ba、A> lo <Xi>
①ire – ~ jire – ② ai – sui (< * nai –)	heb – ~ geb –	sag – ~ tug – ~ teh – sa'u	①Jog – (止) ②tog –
③inag – < * hn – ag – ~ nās – < * gaʃ	keb – t –	sū/tū	
①isini – ②jio/zhi – (至)	dedu	①tek – ~ tah – te – ~ teb – ②soo –	lli –
①kal – ②ir – kɛl – <U、Ka Kir、Uz、Ta> gel – <Tu、S、Y>	jat – jat – <U、Uz Ta、S> ʤat – <Ka、 Kir> ʤɤd – <Tu> jaht – <Y>	dur – ~ oltur – oltur <U、Kir> otar – <Ka Uz、Ta> olɣ r – <Tu> oder – <S> ʨoGe – <Y>	tur – , örla – pat – <U> bat – <Ka Kir、Uz> boj – <Ta> Tur – <S> dewangge bar <Y>

70. 给(与、予)give	71. 说 say	72. 日 sun	73. 月 moon
yǔ(与、予)	shuō	rì	yué
io	siuai * tsjiwər	nIt/nzjĕt	ngiuat
* ɣiəɣ	* sejwət	* ŋjìet/ * ȵiĕt	* ngjwat/ * ŋiw at
ster(赐) te/tʂ <La> tɛ <Ba> nter <Xi、A> wɕan <A>	fi tɕhad/ɕes cɛ <La> nɕal <Xi> kɛtɕha xɛ <Ba>	ȵi ma ȵi mə <La> ni mə <Ba> ȵə ma ~ ȵə me <Xi、A>	zla ba ta wa <La> nda ɣa <Ba> dza/da wa <Xi> rdwaa <A>
ög – ögü – < * hög –	①öči – < * höč	nar – ①nara(–n) ②emun –e(阳)	sar – sara(–n)
bari –(付) bure ~ bu(付)	ke'e/kel –(言) hel –/ge – ①giaan(言) ②hendu –(言) hel –	nar ①inang –(阳) ②shun(太阳)	sar biya
bar – ~ber(付) Bar – ~ber – 〈U、Uz、Ka、 Kir、Ta、TuY > ver <S>	aj –(言、音)、 ta – sozla – dɛ – ~de – <U、Ka、Kir、Ta> ajer – <Tu> di – ,jaʃa – <S> di – ~de – <Y>	kün(阳) kyn/gujaʃ <U、Uz、Ta> kyn ~ gun <Ka、 Kir、Ta、S、Tu、Y >	aj aj〈U、Ka、Kir Uz、Ta、Tu、S > ɛj <Y>

74. 星 star	75. 水 water	76. 雨 rain	77. 石(岩) stone
xīng ①siang②dziæng * seng/ * dzjeng	shuǐ siuIi/GǏwai * stjiwer/ * Giwai	yǔ jiuo/hiuə * ɣjwaɣ/ * gwjagx	shí dziæk/ʦshjakak * djiak/ * thjiak
shar mə ka:ma ~ ka ma <La、Ba> hkar ma/rkar ma <Xi、A>	tɕhu tɕuʋ <Ba> tɕhu <La> tɕhə <Xi、A>	tɕhar pa tɕha:pa <La> tɕha pa <Ba> tɕhar pa <Xi> tɕhar wæ <A>	rdo to <La> dʋ ~ do <Ba、Xi> rdo <A>
odu hodu < * hod – od	usu(–n) osün/su – us	hur – hura/qura	①cil – < * hal (岩) ②had – <hal –(岩) ③tas(石) cilau/chila'un culū
osiha	muke usi –	aha/aga	wehe bedun
jultuz ~ juldəz <U、Uz、Ta> ʤldəz <Ka、Kir> dur <Tu> jəldəs ~ jul – dus <S>	su/sub su <U、Ta、S、 Y、Ka、Uz、Tu> su: <Kir>	yamqur jamʁur ~ jamʁər <U、Kir、Uz、 Ta、Y> ʤaŋbər <Ka> jaʁmur/jaɣmər 〈S、Y〉	tas/tos taʃ <U、Kir、 Uz、Ta、Tu、S> Tas <Ka> das(Y)

78. 土(砂)sand	79. 地 earth	80. 云 cloud	81. 烟 smoke
tǔ	dì	yún	yān
tu'o/duo/tha	die/dil	jiaun/'un/ɣiuən	ʔiɛn/ʔiln/iən
* t'aɣ	* dia/ * tia/ * d'ĭa/ * diərh	* ɣjwən/ * gwjən * ɣiwen	* ʔen/ * ʔjien
同"地" = sa	sa/gʃi sa < La > sha < Ba、Xi > sgæ < A >	sprun ʈʂi pa < La > ʂən < Xi > wʈʂən < A >	du ba thuo < La > tɑ < Ba > to < Xi、A >
sir – siro'ɑi toru šoro	①gɑJar/gɑJɑd < * gdad ②göseri ③igiri ④edugen ~ ödgen	egül – < * fikül – ülen/e'üle üle	uniyɑr < * hun – huni – ~ funi – uni'ɑr
①torom ~ šorgi ②boihor/bürhun ③banaJi	①yargüdai ②sana ③ha ~ ba	togi(云彩)	①sanggiyan ①yan/sigən
qum/topɑ/saz qum < U、Ka、 Kir、UZ、Ta、Y > elesɣn < Tu > Gum < S >	jar/yer/yir jɛr ~ jer ~ jɑrə < U、Uz、Y、S > ʤer ~ jer < Ka、Kir Tu、Ta >	bulet ~ bülit bulet ~ bulət < U、Tu、Kir、Uz Ta、S > bult < Ka > bələt < Y >	bütün is < U、Kir、 Uz、Ta > əs < Ka、Kir、Y > ɣʃ < Tu > as < Y > tytyn < S >

82. 火(炎、焰)fire		83. 灰(烬)ash	84. 烧 burn
huǒ(火)	yán(炎、焰)	huī	shāo
xuɑ/xuai	jiam/iam	xuai	sjæu
* xwar	* hiam/ * ɣiam	xuai/ɣɑbi * xwəɣ	* st'jiaw/ * hrjagw
ɦot	me	ɦitʐi ro	ɦbar/sieg
	me <La>	sal bo	par/ʦ'ig <La>
	ŋ̥e <Ba、Xi>		mba <Ba> <Xi>
	mŋ̥e <A>		
①ot/oci/ hot/hor -	gɑl < * kiam	①ho(锅灰)	sit -
hot	ɣɑl/qɑl	②ünesü(烬)	
②örbis -	Gam <东方>	hünisu/hnüesü ünes	sitɑ
①tuwa(照)	yana < * hian	①ku(炅)	①sholo -
②fithen(火星)		②fule -(灰烬)	②deizhi -
③hori			③sise
ot ~ oot ~ ort		①kyjɛ(锅烟)	orta -/jan -(燃)
< * höt		②kül(烬)	jɑm - <U、Uz、
ot <U…>		kyl <U、Ka、	Ta、S>
		Kir、UZ、Ta、Tu>	ʤɑn - <Ka、Kir>
		kuli <S>,	KəP - <Tu>
		kul <Y>	tɑm - <Y>

85. 道(路、径)path	86. 山(峰)mountain	87. 红 red
lù(路)	shān	hóng
luo	sæn/san	gung
* laɤ	* srian/ * srian	* gewong
	ri/la	dmar po
	ri <La>	ma:po〈La〉
	ʐi <Ba>	ma ma <Ba>
	rə〈Xi、A〉	nma ro <Xi>
		ɣmæ ro〈A〉
	hān(山)	
mör(路)	agul -(峰)	ul - a - < * hul -
mör	aula < huna/gün -	hula'an ~ fūla'an
	u:l/hun	fulan <土>
zhuguun	alin	fulgiyan
örög	taɣ ~ taq(丘)	qizi(赤)al(炎)
oruk <Ta>	tab <U、S>	qizi <U、Uz>
	taw <Ka、Uz、Ta>	Gəzə <Ka、Kir、Ta>
	to: <Kir>	kɤzɤ <Tu>
	daɣ x <Tu>	Gazi ~ Gazə <S、Y>
	taɣ <Y>	

	88. 寒 cold	89. 满 mew
yán(炎)	hǎn(寒)	mǎn
jiam/iam/yam	ɣan	muan
* ɣ(k-)iam	* gan	* mwan
	grG ŋmo /sbajq pa tʂhahŋ ŋu <La> tʂaŋ <Xi>	gəng bo khaŋ pa <La> Kõ <Ba> kaŋ <Xi、A>
hal- qala'un/hal-	hoit- <hol- kol- ~ höl < * kan < * kul-	①mel- ②bil- ʤehūn
halhūn	beyen	bilte- zhalu
	tom/tomlug(冻) muzla- ~ muada- < * mil-(冰) <U、Uz> muzda- <Ka、 Kir> sox <S>、 doŋ- <Y>	tolu, tolun/toq toʃ ~ doʃ- <Uz> tol- ~ dol- <Ka、Ta、Tu、Y> Tɛl- <Ta>

90. 新 new	91. 好(善)good		92. 圆(周)round
xīn	hǎo 好	shàn 善	yuán(圆)
siIn/sien	xau	dziæn	jiuan
* sjien	* xəw	* djian	* ɣ(k –)jwan
gsar pa	legs pa/jəg po	bsaŋ	Gor sgor
sa pa <La>	jako/lek po <La>	zaŋ <Xi>	ko:kp: <La>
sɛ ba <Ba>	ja po/zo		ga ga <Ba>
sho ma <Xi>	bo <Ba>		rkor hko <Xi>
sho mæ <A>	a dzo <Xi>		kor rkor <A>
	jak ka <A>		
	ahuu ~ ogō		
sin –	~ <hò	sain ~ sayin	hom –
sini	ehei	sayi	homh – a
sin	gao〈东乡〉	sæn	hombogor
Iche			muhali
niyar –		sain	yong gi
jangi	ädgü/yeg	saɤ ~ sau	jumgaq
jeŋil – ~ jaŋa	obdan <U、Uz>	jaxei	domilaq <U>
<U、Ta>	æbden ~ abdan	ʤaqsə ~ ʤaqʃa	domalaq
ʤeŋil – <Ka、	<Ka、Kir>	<Ka、Kir>	<Ka、Ta>
Kir>	ɛjbat <Ta>	jɛxsi ~ jaxʃə	domɛlaq <Uz>
juttur <Uz>	ckke <S、Tu>	<Uz、Tu>	gosgur <S>
ʤaa <Tu>	deget <S>、	jax ʂ ~ jax ʂi <Y>	
jana <Y>	çaht <Y>		

93. 绿 green	94. 黄(漆)yellow		95. 白(素)white
lù	huɑ́ng(黄)	qi(漆)	bɑí(白)
liuok/ljwok	ɣuɑng/huoŋ	ts'it	buɑk/bɑk
* lewk/ * ljuk	* gwang	* ts'jiet	* brwak
ldʑaŋ khu	hoŋ	ser po	dkar po
tɕaŋ ku <La>		se:po <La>	ka po <La>
dʑo khʊ <Ba>		she she <Ba>	kɑ kɑ <Ba>
dʑaŋ khə <Xi>		she ro <Xi>	ka po <Xi、A>
rdʑaŋ khe <A>		ser ro <A>	
nog –	hulɑ	sir – ɑ	①pög –
nogo'ɑn/noq –	honggor	šɑr	②bug – būrɑl
nogōn			③bɑi
niowang –	kulan ~ hongko	suuayan	boge'en/bu'orɑl
~ niohon	guwa/kuuwa	sohon	boɣorol
jasil	Goŋur	sariǧ/az	
køk ~ gøk	qōr	sɑriG ~ sɑriq	
<U、Ka、Kir、		<U、Uz>	
Uz、Ta、Tu、Y>		sara <Ka、Kir	
gox <S>		Ta、S>	
		sɑrax <Tu>	
		sɑrəɣ <Y>	

	96. 黑 black	97. 夜(宵) night	98. 热(炎) hot
sù(素)	héi	yè	rè
suo	xak	a/ia/ɪa	niæt/nzjat
* saɣ/ * sagh	* xmax/ * hmak	* nɣaɣ/ * ɣtaɣ / * ɣaɣ	* n̊jiat/ * njæt
	maq po na ko <La> nak nɑʔ <Ba> nak koo <Xi> nok ko <A>	mtʂhan mo /mton mo tʂhɛ mo <La> tʂhē mo <Ba> nə mo <Xi>	tʂha po /tsha gudg tʂha po <La> tʂha mʊ <Ba> hŋu, tʂha mde <Xi> tʂo ɣa <A>
①čɑg -/sɑg -	①hɑr -	①söni(宵?)	ilči ~ nilči -
②sɑyu	qɑrɑ	šöni ~ süni ②düli	elč ~ jič
sɑʼɑrɑl čɑG ɑn/čɑh -	hɑr ②bɑrɑʼɑn	söni	natɕi <东乡>
sheyen/shaŋ -	shaliyan	dobon ~ dobori /yamzhi	
šayo čaIfan	kara/fara -		
aq/ürüŋ ɑq <U、Ka、kir、 Uz、Ta、Y> ɑk <Tu>、 ɑx <S>	qara aɑrɑ <U、Ka Uz、Ta> xɑr <Tu> Gɑr <S> qɑr <Y>	tün tun <U、Ka、 Kir、Uz、Ta> dyn <Tu、S> tur, tune <Y>	isïg ~ isïg isiq <U、Uz> steq ~ asaq <Ka、Kir> issa ~ assa <Ta> izix ~ issi <Tu、s> ahsəɣ <Y>

	99. 干(旱)dry	100. 天 day
zhōu(周)	gān/hàn	tiān
tjəu	kan/ɣan	t'en/thyen
* t's'iəu	* kan/ * gan	* t'en/ * dien
fikhor juq	skam po	gnam/nam mkjafi
ȵē tep <La>	kam po <La>	nam/nam kha
kho jy? <Ba>	kam mpo <Xi>	<La>
khor jəx <Xi>	rkam bo <A>	na <Ba>
		nnàm <Xi>
		Ynam <A>
dug -/tög -	gang -	teng - ri
dugui/tögör -	hag -	tenggir/deŋri
tögrög	anggax	tengger
zhcofi	hiya	①sunggari
tori -	olho -	②abaha
suru -		③enduri
dygylɛk <U>	quq	täŋri ~ tänsi
døŋge - <Ka、Kir>	qurʁaq	①tɛŋʃɛ <U、Uz、Ta>
dømɛ - <Uz>	<U、Kir、Uz、Ta>	deŋse <Ka、Kir>
tygɛr - ~ doqər -	ʁaŋ <Tu>	deedis <Tu>
<Ta、Tu、Y>	qurʁaq <Ka>	deŋər <Y>
	tamba <S>	②asman(统称)
	xan <Y>	③kok(天空)

关于本表的几点说明：

（一）对汉藏、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之间的历史联系问题，经多年探察，现已积累了数千个“谐音”词。我们怎样用它们来证明这两个语系在发生学上有历史联系的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如何把已考查到的“谐音”词，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对其语音对应规律作出系统的总结。然而，对数千个音近义同的词一一进行纵横比较考查，并从理论上予以阐明，对任何个人——尤其是年过古稀的我来说，任务过于繁重。于是，我想到先找个捷径提出自己的观点，便采用了斯瓦迪士的修正“百词表”，将五种语言的同义词读音作比较，观察其结果，以示该两个语系之间的关系如何，意在抛砖引玉。

（二）斯瓦迪士修定100词表所选的英语词，或许原本是一词只表示一物或一个概念。但汉译时，有的却与两个或两个以上汉语词（字）相对应。如第43号词 tooth，汉译为“牙齿”。“牙齿”是个复合词。“牙”与“齿”是各有所指的两个独立单词（字），故需分别处理。所以，斯氏的100个英语词，在汉、蒙等语的译文里却增加了30余词。

（三）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黄金城教授，在审读我的论文初稿后，曾来信建议：“事实上，在100个词条里，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能够找到有关研究成果。”“关于原始汉藏语的研究，国内外很多学者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是不是需要考虑他们的意见?”黄金城教授的意见非常中肯，我完全接受，并正在努力搜集相关资料。只因篇幅所限，本文未能反映前人的成果，待日后弥补。

（四）“天”（day）一词，原本是斯氏200个词表中所列第26条。因考虑到今后不打算再写此类文章，而“天”一词在汉藏、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中占有重要地位，故将原表中的第100个词“名”一词改换为“天”。

三

我们对《汉、藏、蒙、满、突厥五种语言百词读音比较表》，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语音对应规律，审视其语音面貌所显示的事实，发现它们之间可认定为同源词的比例是：

	汉	藏	蒙	满
突	59	32	57	47
满	87	51	84	
蒙	94	66		
藏	65			

罗美珍曾用斯氏的百词表，对汉藏语系内部某些语言之间的同义词作比较考查，所得出的对应词的数量如下：

汉语：侗—泰语　63 个

汉语：藏—缅语　54 个

汉语：苗—瑶语　32 个

汉语：侗—泰：藏—缅语 39 个

汉语：侗泰：藏—缅：苗—瑶语 19 个[2]

我们从所比较考查的表上可看到，汉—蒙、汉—满和蒙—满语之间的同源比例，均在 80% 以上。而汉蒙语之间的同源比例高达 94%，已远远超出其同语系的汉—藏和蒙—满语之间的同源比例，也超出了罗氏的汉藏语系内部的对应比例。对此现象，作何解释？事实告诉我们：汉藏、阿尔泰两个语系诸语言之间，可能存在更为古老的共同底层。

前面叙述的是我在 1997 年写出本文蒙文稿时的一些情况和收获。为进一步验证自己的初步认识，我又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索汉藏、阿尔泰两个语系之间的历史联系。先从汉蒙两种语言的对比考查入手，对它们的词汇、语音系统和语法结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比较研究。现把汉蒙两个语言比较研究所得主要收获提纲挈领式地阐述如下：

（一）词汇方面：除如上“百词表”展现的汉藏—阿尔泰语系五种语言同源比例外，又历经三年，反复核查两遍，现已考得汉蒙同源单词（字）达 5718 个，双音节独立词 200 余个。它们分别涵盖了汉蒙两种语言全部基本词汇和常用词汇。

（二）语音方面：以往人们研究诸语言之间亲属关系的经验表明，不同民族语言的同义词之间若存在严整的语音对应规律，则这些语言可能在发生学上有历史渊源关系。我们通过对斯氏“百词表”的五种语言同义词读音和 6000 余条汉蒙同源词读音作历史比较考查，发现汉藏—阿尔泰两个语系几个主要语言的同源词有着严整的语音对应规律，不仅如此，它们的语音对应又是建立在它们的语音演变规律基础上的。

1. 语音演变规律：

汉藏—阿尔泰语系诸语言（或以汉蒙语为代表）有其各自的语音演变规律。再对它们的语音演变规律进行比较观察，又显出基本一致的共性特征。它们的现代语音系统和语音对应规律，都是在这种语音演变规律所制约的基础上形成的。

（1）声母（辅音）的读音演变规律：

A. 舌根（或小舌）音前移为喉声至舌音，将其音变程式拟测为：＊q→＊x→＊k'→＊k→g→ɣ→h→s。

B. 喉声前移为舌音至颤音，将其演变程式拟测为：＊x→＊k→＊ɣ→h→s→d→t→t'→ts

→dʐ→r－。

C. 喉声前移为鼻音至舌尖及边音，将其演变程式拟测为：＊x→＊ɣ→＊g→ng（ȵ）→y→n→l。

D. 喉声前移至唇音，将其演变程式拟测为＊x→＊k→h→p'→p（f）→b→m－。

对词首辅音的演变模式（或称规律）大体拟测为如上四种。但它们并非如此绝然分组对立。只是为了陈述方便，我在这里分为四个系列表示而已。这些音变过程在不同民族语里实际情况不尽相同，各自均顺其自然发展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不同民族语言辅音系统。对此，王力在总结汉语语音演变进程时引例说："现在汉语的 tʂ、t'ʂ、ʂ有两个来源；大部分来自精清从心邪；少部分来自北初崇山。"[3]现代蒙古语的 c、s、ts、z、ǰ，是从＊S、＊d 两个辅音演变来的，等等。从以上汉藏—阿尔泰语系主要语言辅音演变规律，我们可初步归纳如下共性特征：声母（词首辅音）的发音部位由舌根音（或叫"小舌音"）转为喉声，由喉声转为舌音（舌后—舌中—舌前、舌尖），再转为舌齿、鼻音及双唇音等；现代汉语舌音或舌齿音，有由前位向后转移的态势，如舌面音和卷舌音即是。

（2）元音的读音演变规律：以汉蒙语的元音系统作为考查对象进行阐述。汉蒙语的元音系统有单元音、复合元音，蒙古语还有长元音。

单元音系统：汉语的单元音（或称"短元音"），据王力教授考，先秦时代的基本短元音系统有 a、ə、i、o、u 五个；蒙古语中世纪基本单元音系统有 a、e、i、o、u 五个，与汉语基本相同。然而蒙古语因元音和谐律的制约，又与 o、u 相对应地产生了 ö、ü 两个前位圆唇音。粗略观察，汉蒙语的基本单元音由远古时代的后元音＊a，有逐渐前移的迹象，其演变程式可能是 a→ɑ→ə→e→i→ɯ→o（蒙古语 ö－）u－（蒙古语 ü－）。蒙古语还有与其七个短元音相对应的七个长元音 aː、eː、iː、oː、uː、öː、ü 等。蒙古语的长元音不是短元音的发音时间自然延长所形成的，而另有来源，这是蒙古语与汉语的前身分化后产生的个性发展，此不赘述。

汉蒙语的复合元音各有十几种。但它们是汉蒙语从母语分化后各自发展的产物，因此，个性大于共性。目前，我还未能理清汉蒙语复合元音的产生、发展的全貌，故暂未将其作为比较考查的对象，这里也从略。

2. 语音对应规律：

语音对应规律是依据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原理，用来甄别不同民族语言之间是否有亲缘关系的基本方法，是西方语言学家确定印欧语系时所使用的成功实例。我们考查汉藏—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之间亲缘关系时必须注意的重要方法，就是看它们的同义词之间是否有严整的语音对应规律。如果有严整的语音对应规律，而且其同源词数量基本上涵盖其基本词汇，则其亲缘关系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情况相反，则其亲缘关系是否定的。

汉藏—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之间的语音对应规律，据我考查，显示出有一定层次的对应关系，可分为三个层次：(一)表层的语音对应，即现代语的音义相谐者；(二)中层的语音对应，即现代读音与汉唐时代的语音声转对应；(三)深层的语音对应，即此语现代语或中古读音与彼语古代(三代或史前时代)语音之间的声转对应，或彼语现代和中古读音与此语古代语音之间的声转对应。汉藏—阿尔泰语等诸语言语音对应规律特征基本如此。所以我们与西方语言学家们确立印欧语系时所取得的成功经验——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语音对应规律为准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然而在具体使用中，其方法不尽相同。我所考证出的 6000 余条汉蒙同源词，主要是依据其如上所述声转对应规律来确定的。

(1)表层语音对应：即两个语系诸语同义词之间的读音基本相同或相谐对应。

A. 喉音 q－ 、k－、g－、ɣ、h－等之间谐声对应：

	汉	藏	蒙	满	突厥
盖	gài < ɣap > * gap	kha bo（书面）	hab－ha	waha	kab－xag
		khap(拉萨)	gab－ala		
干(旱)	gān < kan < * kan	skam(书面)	gang ~ hang	niya	quq
	~ hān〈ɣ an〈 * gan	kamz(拉萨)			
黑	héi〈 * kak〈 * xmax	mag	har－	kar－	qar－

B. 舌音 s－、sh－、d－、t'－、č－等之间的谐声对应：

	汉	藏	蒙	满	突厥
多	duō < ta < * ta ~ * tar	du ma	bab－	daw－	täl－
少	sháo < ciu < * sjiav	tghu ŋ ŋu/deʔu	čö:n < čőn－	dsis－	az < * ɣad
血	xuē < xiuɛt < * xwet	khrəq(书面)	čis－ ~ čus	sengi	qän
	~ xié < xiwet < * hwit	tʂha(拉萨)			
天	tiān < t'－en < * t'en	kgnam	teng－ri	sung－gari	täŋri

如此谐声对应者还有：n－、m－、b－、j－、y－、r－等之间的谐声对应等等，引例暂略。

(2)中层语音对应，即两个语系诸语言之间的同源词的读音，现代、中古和上古之间相互声转交替对应。例如：* k－、* ɣ－、g－、h－、y－、ng－、n－、l－等声转对应。

	汉	藏	蒙	满	突厥
何	hē < ɤe ~ ha < * gar	gaŋ/ga(书)	her ~ yaɤ－	ai、ya	gani
羽	yǔ < jiuo < * ɣjwəɤ	sgro(书)	öd－ < * höd	ingge < hig－	jüng < * küg
		tso(拉萨)	~ yüd〈 * höd		
腹	fù < piuk〈 * piəwk	gok bàz(书)	hebel < hèl	hefe－	qaor－in
		ho(阿力)	ged－es－		

咬	jiào < kou < ＊krəu ~ yào < ʔau < ＊ʔkəw	so rgjag(书)	haɟ – < had – ɟag – u < ɟu：	sai – šof –	tisi – ki Ii –

(3)深层音转对应：即汉藏—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同源词，有的保持着上古音，有的保持着中古音，有的已变成现代读音，而有的则保持着远古（如三代）的原始读音。这样，它们之间的读音对应，现代、中古、上古和远古音显出声转交替对应的复杂情形。例如：＊x –、＊q、＊k' –、＊ɣ –、n –、s –、d –、ng –、j –、n –、1 – 等声转对应。

	汉	藏	蒙	满	突厥
今	jin < kjam < ＊kiam	jin	en – < ＊gen –	nä ~ än < ＊gän	an – < ＊qɑn、em – < ＊kem –
二	èr < nji < ＊njier	gnis/nis	hoyir < ＊ǰir – ~ hos ǰir – < ＊gir	ning、huwe	aki ~ iki < ＊kir – < ＊ngier
鱼	yú < ngio < ＊ngəɤ	na	ǰig –、dɔɑg –	nim –	bal –
叶	yè〈siæp/jiap 〈＊sejiap/＊rep	lo ma	nɑbč –〈nɑč –	ɑb –〈＊hɑv –	jap –

汉、藏、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同源词之间的语音对应，之所以呈现出如此纷繁、复杂的情形，主要是它们分化的时间早，大约在一万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分化了。故各民族语言独立发展进程中，其语音的演变如上所述，经过一变、三变、五变，甚至经历了十多次的变迁，而各民族语言中的具体词的读音演变进程又不尽相同，于是就呈现出如上"表层"、"中层"和"深层"三个不同层次的语音对应局面。这又是汉藏—阿尔泰语系之间之有亲缘关系的最基本的证据之一。

（三）语法方面：从现代汉藏—阿尔泰语言的语法结构上看，它们之间似乎没有共同之处。然而，详考其语法形态、结构方面，则有不少共性成分。

1. 语法形态上的构词规则共性成分——双音节独立词。通常人们把汉藏语系诸语言看作是单音节语言，即汉语里没有由前缀或后缀与词根相联结而构成的双音节派生词（称之为"孤立语"）。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则是词根联接后缀而构成新的派生词，称之为"粘着语"。汉藏、阿尔泰两个语系真的是如此绝然相异吗？王力说："构词法是语法的问题，同时也是词汇问题 。""汉语自始就不是单音节语；先秦时代已经有了大量的双音词"，"有许多双声叠韵的现象也就是语法、词汇方面的现象"[4]。汉语的所谓"双音节独立词"只指由两个音节构成的表示一个独立概念或特指一个事物的单词。从《尔雅》到《说文解字》，从《广韵》到《现代汉语词典》，它们都收有上百个"双音节独立词"。如"苳葵"、"颗冻"、"戡辥"、"峭嵘"、"驺虞"、"轱辘"、"萝蔔"（萝卜）等等。这种"双音词"，王力称之为"联绵字"或"骈词"。对"双音词"的特点，段玉裁在《说文》"鹖"字的注释里说："鸱鹖不可单言鹖。"我对段氏这句话的理解是，凡以两个字相连而构成的专名、独语，"不可"只用其中的一个单字省

“言”其物，必须将两个字合用而“言”其物。许慎在《说文》里虽然把这种“双音词”的两个字分别收为独立条目，但他在释文中从未把它们与其他具有独立概念的单字（词）等同对待。

汉语为何“自古”（因为包括汉语的前身夏商周时代的古金文和甲骨文里，也可见到“双音词”）有这种“双音词”呢？汉语的“双音词”的性质和构成来源如何？对这些疑问，汉语训诂学家们从未作解释。历代汉语言学家们尽管注意到了汉语存在这种事实，但他们谁也没有讲明其构词性质和词源。王国维曾写有专文，讲述“联绵字”，但也没有涉及其构词性质和词源。王力教授在其《汉语史稿》里用了四页的篇幅，讲述了“双音词”的问题，但他只解释为“双声叠韵”，却没有谈及其构成来源和性质。

我通过汉蒙同源词的比较考查，发现汉语的“双音词”和蒙古语的双音节派生词有着同源关系，从而对汉语的“双音词”的构成情况和词源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如“鹘鸼”，其上古音是“鹘”gǔ < ɣwət < * gwət 或 * grwət；“鸼”zhǒu < təu < * trəw，或书作“鸠”jíu < kiəu < * kjəw。= =《汉蒙》：“鹘鸼（鹘鸠）xödege”；《蒙汉》：“xödege，斑雀”。“xödege”一词分解则：xöd –（词根，= =鹘 * gwt）+ – e –（两个辅音间介入的元音）+ – ge（– ge 动词的持续体构词附加成分，= =鸠 kiəw）。又如“蟋蟀”，其上古音是：“蟋”xī < silt < * sjiwt；“蟀”shuài < siuet < * siw et 或 * kiwət。= =《汉蒙》：“蟋蟀”，gürgeljigen – e。”《蒙汉》：“gürgelji” = = gürgeljigen – e，蟋蟀。”“gürgelji”一词分解则：gür –（gür，名词 = =“蟋”，* sjiwet < * kiwət）+ gel –（– l < – n，– n：– d 交替对应，即阴阳对转）：故“gel –”~“ged –”，为构词后缀，即动词多次进行体 = =“蟀” * kiwət。参见满语“gurʤən”（蟋蟀）。再如“拮据”，其上古音为：“拮”jié < kilt < * kjiet：“据”jū < k’io < * k’jəɣ。= =《汉蒙》：“据 jù［拮据］gαčiɣ。”《蒙汉》：“ɣ αčiɣ①欠缺，灾荒”；“ɣ αčigadaxu，困窘，拮据。”“gαci ɣ”一词分析则，“ɣαč – < * gát –（名词 = =“拮” * kjieɣ）+ čig < * ki ɣ 由静词派生形容词后缀（蒙古语一个词里同一个辅音相继出现，一般缩合为一个辅音，故 gαč + čiɣ→gαčiɣ）= =“据” * kiet。从以上汉语“鹘鸠”、“蟋蟀”、“拮据”三个“双音词”与蒙古语同义的派生词相比较，它们是名词 + 后缀构成的同源词。从构词结构上看，这些“双音词”前边的“字”，相当于蒙古语词根，其后边的“字”则相当于蒙古语构词附加成分（后缀）。由此可知，汉语的“双音词”的构词结构，原本是由静词（名词、动词或形容词）词根加构词附加成分形成的派生词。即“双音词”是由“两个词素”构成的复合词。这样一来，汉语的“双音词”与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一样，又可以把它们分解成由词根加构词附加成分相联接，形成双音节派生词。从汉语“双音词”与蒙古语音义皆同的同源词关系中，我们看到，汉藏—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渊源关系的踪迹。只是由于汉藏语系诸语言自身的历史原因，那些由词根加后缀构成的“双音节

词”,已难以识别其构词原貌罢了。

2. 语法形态上的构词规则共性成分——复数后缀。汉藏—阿尔泰语系诸语言里普遍存在着一套辅音韵尾。例如,汉语有 -n、-ng、-p、-k(-ɣ)、-d(或 -r)等六个辅音韵尾,被称为“阴声”和“入声”。又如藏缅语族多数语言有 -n(-l)、ŋ、-m、-p(-b)、-k(-g)、-d、-r、-s、-h(-?)等辅音韵尾。蒙语也有 -n、-b、-m、-l、-n、-g、-d、-s、-r 等九个辅音韵尾,被称为“结尾辅音”或“字尾”。详考汉藏—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均有同类的辅音韵尾,只是有的语言里有些辅音韵尾因语音变异致其数量增多或减少,甚至消失了。如蒙古语的 -l < -n、-s、-r < -d。

汉藏—阿尔泰语系的这些辅音韵尾,在各族语言内部又相互交替运用;各民族的同源词里,也相互交替出现。以汉蒙语为例,在同源词里,这些辅音韵尾可交替使用。对此,汉语称之为“音转”或“阴阳对转 ”。以汉蒙语为例:

-n ⇌ -ng:汉语“囱”(窗)chuang < tsong < * tsɛewng:蒙语 togon - o < t'òn -(天窗),congxo(窗,可能是借词);汉语“天”tiān < tien < * t'en:蒙语 teng - ri(天)。

-n ⇌ -m:汉语“丸”wan < kuan < * gwan:蒙语 böm - bü - ge(丸、球);汉语“传”chuān < diuan < * djwan:蒙语 dam - ji - x(传、转);汉语“阴”(侌)yin < ʔiem < * ʔiəm 或 < kiem < * kiəm:蒙语①um - ar - a < * hum -(阴);②um - ai < * hum -(阴户)。

-n ⇌ -l:汉语“串”chuan < kaxn < * krwən:蒙语 hel - hi -(串):汉语“散”sán < san < san:蒙语 sal - hu(散)。

-ng ⇌ -m:汉语“中”zhōng < tiang < * tiəwng:蒙语 dum - da(中);汉语“经”jing < kieng < * keng:蒙语 jim(经);汉语“徵”zheng < * dieng < * dieng 或 < * kiang:蒙语 tem - deg(征,徵)。

-ng ⇌ -l:汉语“江”jiāng < kong < * krewng:蒙语 gòl(江);汉语“汪”wang < ʔwung < * ʔwəng:蒙语 nel - ui -(汪)。

-ng ⇌ -b:汉语“正”zhēng < t's'æng < * tjieng:蒙语 töb 或 zöb(正);汉语“肿”zhǒng < ts'iung < * tjewng < * kewng:蒙语 hab - ung ~ hab - ud -(肿)。

-k(ɣ) ⇌ -g(-h):汉语“伏”fù < bju < bjwɣ:蒙语 bög - hü(伏);汉语“初”chú < ts'io < * ts'iaɣ:蒙语 tug - tam(初)。

-k(ɣ) ⇌ -d(s:c > r):汉语“事”shi < ts'i < * tsjəɣ:蒙语 hereg < her -(事);汉语“佑”yòu < jiu < * ɣ jiw ɣ:蒙语 abur - < * haùr - < * qùd - 或 ör - ŭ - < * hör -(佑)。汉语“刺”ci < ts'iI < * tsjier:蒙语 hat - hu -;čič - i -,(刺)等等。

总之,所有这些韵尾辅音,无论在汉藏、阿尔泰语系内部还是在两个语系诸语族语言里

的同源词中，它们均整齐地交替对应（限于篇幅，引例暂略）。由此可知，各民族语言里的辅音韵尾的功能基本相同。那么，这些辅音韵尾的性质、功能到底如何？

对于阿尔泰语系韵尾辅音功能和性质，语言学家早已有了共识：它们是表示复数的构词后缀。至于汉藏语系诸语言的韵尾辅音的功能和性质，近来有不少学者作了比较研究，提出了种种解释。其中主要共识即韵尾辅音是表示复数的构词后缀。这样一来，两个语系共有的韵尾辅音的功能是表示复数的后缀，于是，它们和语法形态有了联系，即它们是属于表达语法和语义相联系的构词附加成分。我们从汉藏—阿尔泰语系共有的韵尾辅音的功能、性质完全相同这一点上，又得到了它们之间在语法上有共性，即两个语系间存在着亲缘关系的又一个有力证据。

3. 语法形态上的构词规则的共性成分——构词附加成分前缀和后缀。汉藏语系里，藏缅语族的某些语言，用构词附加成分表示一定的语法意义，例如藏语。而汉语则以虚词作为表示语法意义的重要手段。但通常人们不把虚词视为构词附加成分，而是看作独立词（字）。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则用大量的构词附加成分（或称“后缀”）表达其语法形态。这样，汉藏—阿尔泰语系诸语言表层标志——构词规则上似乎没有任何共性成分可言。其实，这是一种误会。以汉蒙语为例比较考查，我发现汉语的大部分虚词与蒙古语的许多构词附加成分相对应。例如，汉语的“于”（乌、於），其词中所表达的语义，与蒙古语名词的领属格的意义、作用完全相对应。

4. 语法结构——词序的共性成分。词序是表达语法意义的重要手段。以汉蒙语为例：汉语的主语在谓语前面，这一点汉蒙语基本相同。但谓语和宾语的次序，汉语和蒙古语一般是相反的。人们以此为由，否定汉蒙语之间在发生学方面有历史联系的可能。可是，汉藏语系主要成员——藏语却和阿尔泰语主要成员——蒙古语之“谓”—“宾”的次序完全相同。例如，汉语的“他煮饭”，藏语则谓之“他饭煮”，蒙古语也称“他饭煮”。但是汉蒙语之间词序的这种差异也不是绝对的，汉语本身也有“谓”—“宾”相颠倒的情形。比如现代汉语普通话一般说“不知道”，而汉语某些方言里说“知不道”。蒙古现代语言是“medehü ügei”（知——无），但达斡尔语里却说“ul mede”（不知）。这种“宾—动”、“动—宾”结构相颠倒的现象，在金文文献和商代甲骨文文献中亦可见到。详考汉藏—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中，构词法和句法方面，其词序的共性成分大于差异成分。下面对汉蒙语的词法和句子结构中的共性成分举例简介：

（1）简单词组：

A. 名词＋形容词形式：

蒙：usun－u（水的）gün（深）＝＝汉：水的深度

蒙:gal(火)ulaga－n(红)＝＝汉:火　红

B. 名词＋动词形式:

蒙:usa－bar(水—用)uxiyaxu(洗)＝　＝汉:用水　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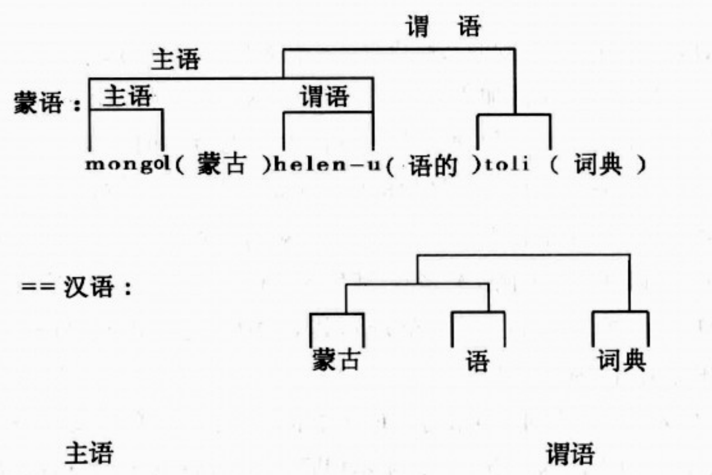
蒙:toloɣai(头)ergihü(转)＝　＝汉:头　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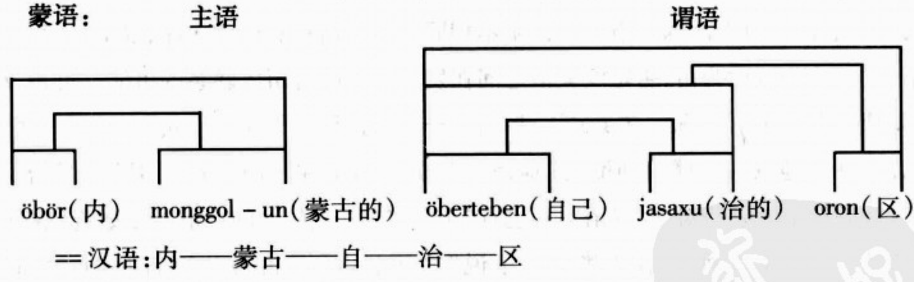
C. 形容词＋动词形式:

蒙:xurdun(快)yabuxu(走)＝　＝汉:快　走

蒙:xola－aca(远方—从)irejei(来了)＝汉:从远方来了

(2)复合词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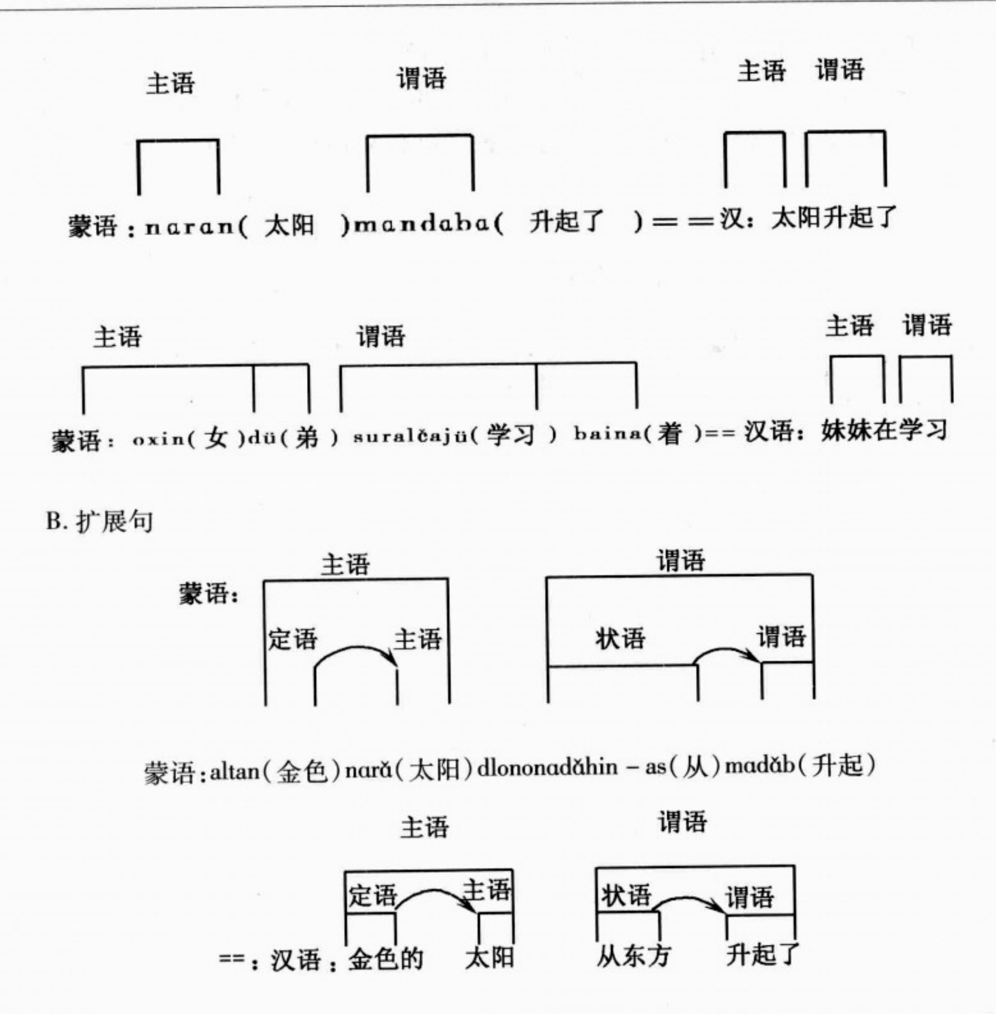


==汉语:内——蒙古——自——治——区

通常汉蒙语的复合词组的结构如此基本一致。

(3)句子结构:一般汉蒙语的句子结构基本一致。例如:

A. 非扩展句:



从上面两个例证，我们看到，汉蒙语的句子结构，无论在词序上还是在语法结构上，完全相应。

依据上述考查，我认为把汉、蒙、满等语言的关系完全分离开，视它们是各自独立形成的"汉藏"、"阿尔泰"两个语系，或许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们把近百年来在亚洲北部（西伯利亚和蒙古国等地区）及中国境内所发掘出的有关"蒙古利亚人"考古遗迹，以及近年我国科学家对汉、藏、蒙古等民族的人类遗传基因测试所得出的成果，加之学者们从文化渊源上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联系进行研究所得到的成果等，纵横联系起来，再加上对他们语言的历史联系的考查结果，统观汉、满、蒙、藏等民族的关系，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他们自古就是源于共同祖先、有着血缘关系的民族。换句话说，汉、藏、蒙、满等民族的先民们从氏族社会时代分化、四处迁徙以来，在他们历史沿革的长河中，形成了各自操持"彼此差异显明"的不同语

言的不同民族。寻根溯源,他们完全有可能是同根同源的兄弟民族。

在探索汉藏、阿尔泰语系亲缘关系过程中,对清格尔泰、陈乃雄、陈宗振、黄金城、宫玉海、刘志一、徐文堪诸位教授从各方面给予我的鼓励和支持,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 释:

〔1〕本文所用的斯瓦迪士的"修正一百个核心词"的英文和汉译文,选用自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1,第416—417页。

〔2〕罗美玲:《有关建立汉藏语系的几个认识问题》,《民族语文》1996年第4期。

〔3〕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第116页。

〔4〕同上,第35页。

永乐本《华夷译语》鞑靼馆“来文”校释

乌云高娃

永乐本《华夷译语》各抄本所收鞑靼馆“来文”的情况有所不同。东洋文库所藏明抄本《华夷译语》(以下简称“东洋文库本”)中,收有鞑靼馆“来文”30篇。柏林图书馆所藏明抄本《华夷译语》(以下简称“柏林本”)中,有鞑靼馆“来文”30篇。其中,有14篇与东洋文库本鞑靼馆“来文”内容相同。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收藏的明抄本《华夷译语》(以下简称“北图珍本”)收鞑靼馆“来文”40篇,其中5篇为“敕谕”。但鞑靼馆“来文”被编在“高昌馆课”[1]中。“北图珍本”与“东洋文库本”、“柏林本”所收鞑靼馆“来文”没有重复部分。

“东洋文库本”、“柏林本”、“北图珍本”《华夷译语》均属于永乐本《华夷译语》。这三本《华夷译语》所收鞑靼馆“来文”中有许多是属于女真馆的来文,而明洪武时期编纂的《华夷译语》鞑靼馆“来文”中,并没有属于女真馆“来文”的现象。这与明正统时期开始部分地区的女真部落与明朝进行交往时,往来文书以蒙古字书写、明四夷馆鞑靼馆的译官曾经代译过女真馆的“来文”这一事实有关[2]。因此,永乐本《华夷译语》中的鞑靼馆“来文”不仅成为探讨明朝与蒙古关系史的珍贵史料,对明朝与女真关系的研究也提供了新的资料。

永乐本《华夷译语》鞑靼馆“来文”由汉文和蒙古文原文两部分组成。其中蒙古文部分中有许多拼写、语序、语法方面的错误。因此,笔者对“东洋文库本”、“柏林本”、“北图珍本”《华夷译语》中的86篇[3]“来文” 做注解,并将蒙古文部分转写成拉丁文。

1. 皇帝洪福前, 斡阑卫[4]指挥同知[5]委列怯 怕奏:去年奴婢差 头目阿剌哈

qaγan nu suu tu , oran ui jiqui tuŋji uile emiyeged ayun öčimü, erči on boγul jaruju teümü alaqa

等 各 备骟马 等 物赴京进贡[6],蒙朝廷 给与 重 赏赐[7]。今 奴婢 又差

kiged öbere bi aqta kiged ed munŋ degedüs un tügejü ögčü kündü šaŋši . edüge boγul basa jaruju

头目 赏哈进贡驼马等物[8],叩头去了,望 朝廷 怜悯 照 例奏讨[9] 赏赐。怎生

teümü šaŋqa mörgü erčibe . egeren degedüs un eneriküi jerge yi qauli γuyun šaŋši yambar(yamar)

恩赐的 圣旨 知道。

yar soyurqaqu yi jrlq (jarliq) medemü yα.

2. 皇帝洪福前，忽儿海卫[10]都指挥失勒得等 怯 怕 奏：奴婢 每 在 边
qaγan nu suu tu, qurqai ui duu jiqui šilde kiged emiyeged ayun öčimü boγul nar balan qijaγar
外 效劳，出 力 年 远 了。 今 奴婢 庆贺 新 年 远 地
γadana ülümlen küčü ögčü on qola baraba . edüge boγul qulduqlan čini(sine) on qola γajar
方[11]进贡 马匹[12]，叩头来了，照 例奏讨彩缎表里、织金衣服等件[13]。 望[14]朝廷
dörbeljin aγuljarin yan üjegülün morina mörgü irebe ,jerge yi qauli bar öčimü γuyun. degedüs un
可怜见 准 与的。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örüšijen jobšiyan ög yin.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 (jarliq) medemü ya.

3. 皇帝洪福前 毛怜 卫[15]都 指挥使 猛可帖木儿 叩头 奏：正德 十
qaγan nu suu tu, maulen ui duu jiqui ši moŋketemür (müŋketemür) mörgü öčimü ,jiŋde arban
三 年(1518) 三月初 六 日 除授前 职。奴婢 时 常 在 边 杀
γurban on γurban sara türün jirγuγan naran tüšijü urida čola. boγul čaq nasuda balan qijaγar ala
贼 有 功。 未 蒙 朝廷 升赏。 今 奴婢 照 旧 例
qulaγai boi γuŋ . üdügüye muŋ degedüs un nere nemen. edüge boγul jerge yi qaučin(qaγučin)
奏 讨 升 赏。 怎生 恩赐 圣旨
qauli bar öčimü γuyun nere nemen soyurqa.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 (jarliq)
知道。
medemü ya.

4. 皇帝洪福前，建州 左卫[16] 都 指挥佥事 脱罗[17] 男 猛可 怯 怕 奏[18]：
qaγan nu suu tu, genjiu sou ui duu jiqui semši tolo köbegün muŋke emiyeged ayun öčimü,
奴婢 进 贡 马匹 叩头 来了，要 袭 父 前 职。望 朝廷
edüge boγul aγuljarin yan üjegülün morina mörgü irebe, ab jalγamji ečige urida čola. egeren degedüs
可怜见 准 袭 父 职。 在 边境 好 管束[19] 人 民 便益。
un örüšiyen jobšiyan jalγamji ečige čola. balan qijaγar sain qataγala irgen urγan joqistai.
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5. 皇帝洪福前，福馀 卫[20] 都指挥 佥事 脱忽赤 男 帖木儿 怯 怕 奏： 今
qaγan nu suu tu, wuyur ui duu jiqui semši toquči köbegün temür emiyeged ayun öčimü, edüge
遇[21] 万 寿 圣 节，进 贡 骟马 二匹。 今 差 头目
jolγalduba tümen nasutai sain üdür aγuljarin yan üjegülün aqta qoyara. edüge jaruju teümü
哈哈赤叩头 去了，奏 讨 表 里、衣 服 等 件。又 奏 袭

qaqači mörgü erčibe , öčimü γuyun γadar dotur degel qubčasun kiged jüil basa öčimü jalγamji
父 职。 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ečige čola.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6. 皇帝洪福前,朵颜卫[21]都督 花当[22] 怯 怕 奏 有: 本卫 都督 剌哈 蒙
qaγan nu suu tu, doyan ui dudu qodaŋ emiyeged ayun öčimü boi, büdün ui dudu laqa muŋ
朝廷 赏 与大帽 子、 金 带 有来。今 奴婢 花当 照 例
degedüs un soyurqa ög bürge köbegün altan büse boi ire . edüge boγul qodaŋ jerge yi qauli bar
奏 讨 大帽 子、 金 带,望 朝廷 可怜见 准 与的。
öčimü γuyun bürge köbegün altan büse egeren degedüs un örüšiγen jobšiyan ög yin .
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yambar(yamar)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7. 皇帝洪福前,童宽山 卫[23]都指挥佥事卜养古 怯 怕 叩头 奏:比先 成祖[24]
qaγan nu suu tu,tuŋquušan ui duu jiqui semši buyaŋγu emiyeged ayun mörgü öčimü,bi sen
皇帝 将我每人 民 着 做远 近、耳 目 这等有来,今 奴婢 进
daisuŋ qaγan abči bi nar irgen urγan mün kijü qola uira čiqin nidun ein boi ire, edüge boγul
贡 马匹 叩头来了。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aγuljarin yan üjegülün morina mörgü irebe .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8. 皇帝洪福前, 屯 河 卫[25]正 千户 冲山[26] 男 亦列格叩头怯 怕 奏 有:
qaγan nu suu tu, tun qowa ui jiŋ semγu čola köbegün ilege mörgü emiyeged ayun öčimü boi,
奴婢 父 在 边 出气力 有 功 行 间 故了。 今 奴婢 奏
boγul ecige balan qijaγar küčü öggün boi γuŋ yabu jaγura ügei baraba . edüge boγul öčimü
袭 父 前 职。 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jalγamji ečige urida čola.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9. 皇帝洪福前,建州 左卫都 指挥佥事 撒哈 怯 怕 奏: 成化 十 四
qaγan nu suu tu,genjiu sou ui duu jiqui semši saqa emiyeged ayun öčimü,čiŋquwa arban dörben
年(1478)十月初 三 日 除授 前 职 有,升 官 的 敕书 破
on arban sara türün γurban naran tüšijü urida čola boi, ner(nere) nemen noyan yin čišü qaγarba
了。 今 要 换 新 敕书,望 朝廷 可怜见 准 与的。怎生
baraba,edüge ab arilčin šine čišü, egeren degedüs un örüšiyen jobšiyan ög yin yambar(yamar)
恩赐 圣旨 知道。
yar soyurqaqu yi jrlg medemü ya.

10. 皇帝洪福前，渚冬[28]河卫[29]正千户[30]老察 弘治 十 五年(1502)间 进 贡
qaγan nu suu tu, jidüŋ qowa ui jiŋ semši lauča quŋji arban tabun on jaγura aγuljarin yan
来 时， 升 了 正 千户 职。正德 十 二年(1517) 二月 二十 五 日
üjegülün ire čaq, nere nemen baraba jiŋ semγu čola. jiŋde arban qoyar on qoyar sara qorin tabun
进 贡 来了，讨升指挥职事[31]。怎生恩赐 圣旨 知道。
naran aγuljarin yan üjegülün irebe.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11. 皇帝洪福前， 友帖[32]卫[33]都指挥佥事卯里孩 怯 怕 奏：今 遇 万
qaγan nu suu tu, yito ui duu jiqui semši maγuliqai emiyeged ayun öčimü, edüge jolγalduba tümen
寿 圣节 进贡 骟马二匹， 今 差 头目只儿挨叩头 去了，
nasutai sain üdür aγuljarin yan üjegülün aqta qoyara , edüge jaruju teümü jirγai mörgü erčibe
奏 讨 表 里 衣 服、 靴 袜[34] 等 件。怎生
öčimü γuyun γadar dotur degel qubčasun qutusun quyimusun kiged jüil. yambar(yamar) yar
恩赐 圣旨 知道。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12. 皇帝洪福前，毛怜卫 等 官 怯 怕 奏：比 先 奴婢 父 祖
qaγan nu suu tu, maulen ui dudu[35] kiged noyan emiyeged ayun öčimü, bi sen boγul ečige ebüge
以来 代 代 进贡，不敢怠慢[36]。今 遇 冬 令 节， 进贡
inaqšida üye üye aγuljarin yan üjegülün edüge jolγalduba übül tegri üdür aγuljarin yan üjegülün
骟马 二匹，差 头目 只儿挨叩头 去了。 怎生 恩赐 圣旨
aqta qoyara jaruju teümü jirγai mörgü erčibe.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知道。
medemü ya.

13. 皇帝洪福前，渚冬卫[37]已故[38] 指挥佥事阿的纳 孙 男 哈龙哈，又 有亦里卫已
qaγan nu suu tu, juduŋ ui ügei boluγan jiqui semši adina ači köbegün qaluŋqa, basa boi ili ui ügei
故 指挥佥事 完者秃孙男 伯孙 等 奏： 奴婢每 都 要 袭 祖
boluγan jiqui semši üljitü ači köbegün basun kiged öčimü, boγul nar bügüde ab jalγamji ebüge
前 职。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urida čola.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14. 皇帝洪福前， 哈密卫[39]已故 所 镇 抚 男 伯颜 奏：奴婢 父 敬
qaγan nu suu tu, qamil ui ügei boluγan sou jin wuu köbegün bayan öčimü, boγul ečige köndölen
顺 天 道， 尊事 朝廷。 比先 除授 奴婢 父 前职 故了。

daγan teŋri yin aγur yi, erkilen degedüs un. bi sen tüšijü boγul ečige urida čola ügei boluγan.
今 要袭 父 前 职。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edüge ab jalγamji ečige urida čola.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15. 皇帝洪福前，建州卫[40]都督完者秃奏：奴婢 做 都督 多 年 了， 在 奴婢 后
qaγan nu suu tu, genjiu ui dudu üljitü öčimü, boγul kijü dudu olan on baraba. balan. boγul qoina
做 都督的 剌哈 蒙 朝廷 赏 与 大帽、金 带。今 奴婢 照例
kijü dudu yin laqa muŋ degedüs un soyurqa ög bürge altan büse . edüge boγul jerge yi qauli bar
奏 讨 大帽、金 带。 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öčimü γuyun bürge altan büse .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ja.
16. 皇帝洪福前，建州左卫童失哈 等 四 人 呈 奏 有:海西 贼 人
qaγan nu suu tu, genjiu sou ui tuŋšiqa kiged dörben kümün čiŋ öčimü boi, qaiši qulaγai kömün
尚秃 前 来 边 上 做 贼，奴婢 每 处 人 去 报说 被[41]
šaŋtü urida ire qijaγar degere kijü qulaγar, boγul nar jug(jüg) kümün erči kele kelen mün qijaγar
上 官 人 拿 住杀了。奴婢 三年来进贡[42]，今讨升 赏。 怎生
degere noyan kömün bari jü alaba. boγul edüge γuyan nere nemen soyurqa. yambar(yamar) yar
恩赐 圣旨 知道。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17. 皇帝洪福前，福馀卫右都督 佥事 哈里哈 怯 怕 叩头 奏: 奴婢 在
qaγan nu suu tu, wuyur ui yiu dudu semši qariqa emiyeged ayun mörgü öčimü, boγul balan
边 外 出气力 多年了。 天顺三年(1459)十二月 二十三日
qijaγar γadana küčü öggün olan on baraba . ten šün γurban on arban qoyar sara qorin γurban naran
升 奴婢 做 都督佥事，今 讨 升 都督 职 事。怎生
nere nemen boγul kijü dudu semši, edüge γuyan nere nemen dudu čola ši. yambar(yamar) yar
恩赐 圣旨 知道。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18. 皇帝洪福前，建州左卫指挥使歹察 奏: 成 化 十 四年(1478)十月 初
qaγan nu suu tu, genjiu sou ui jiqui ši dayiča öčimü, čiŋ qowa arban dörben on arban sara türün
三 日 除授 前 职。今 讨 升 都 指挥佥事 职事。 怎生
γurban naran tüšijü urida čola. edüge γuyan nere nemen duu jiqui semši čola ši. yambar(yamar)
恩赐 圣旨 知道。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19. 皇帝洪福前，泰宁卫右都督可台 奏：今 奴婢 差 人 进 贡

qaγan nu suu tu, tainiŋ ui yiu dudu kötai öčimü, edüge boγul jaruju kömün aγuljarin yan üjegülün

马匹，奏 讨 青 段 子 二 匹[44]。怎生 恩赐 圣旨

morina, öčimü γuyun köke türge köbegün qoyar be.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知道。

medemü ya.

20. 皇帝洪福前，福馀卫正 千户 老察 叩头 奏： 正德 十一年(1516)七 月

qaγan nu suu tu, wuyur ui jiŋ semgu lauča mörgü öčimü, jiŋde arban nigen on doluγan sara

二十 三 日 除授前 职。今 讨 升 指挥使职事。 怎生

qorin γurban naran tüšijü urida čola. edüge γuyan nere nemen jiqui ši čola ši. yambar(yamar) yar

恩赐 圣旨 知道。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21. 皇帝洪福前，兀者前卫[45]都指挥同知影克 男 脱罗 叩头 怯 怕 奏 有：

qaγan nu suu tu, uje sen ui duu jiqui tuŋji yiŋke köbegün tolod mörgü emiyeged ayun öcimü boi,

奴婢 父 在 边 出气力 有 功 行 间 故 了。 今 奴婢 奏

boγul ečige balan qijaγar küčü öggün boi γuŋ yabu jaγura ügei baraba . edüge boγul öčimü

袭 父 职。 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jalγamji ečige čolan.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22. 皇帝洪福前，渚冬河 卫 掌 印[46] 都督撒哈 怯 怕 奏[47]： 成化 二十

qaγan nu suu tu, jütüŋ qowa ui alaγan tamaγa dudu saqa emiyeged ayun öčimü ire, čiŋqowa qorin

二年(1486) 五月十五日除授前职。 出气力多[48]年了，今讨升 赏。 怎生

qoyar on tabun sara arban tabun baraba. edüge γuyan nere nemen soyurqa. yambar(yamar) yar

恩赐 圣旨 知道。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23. 皇帝洪福前， 罕东 左卫[49]都 指挥佥事只儿挨，今 遇 冬至 令 节，进

qaγan nu suu tu, qanduŋ sou ui duu jiqui semši jirγai, edüge jolgalduba übül teŋri üdür ,aγuljarin

贡 骟马二匹，今 差 头目 脱罗叩头 来了， 奏 讨表里[50]、衣服、

yan üjegülün aqta qoyara edüge jaruju teümü tolod mörgü irebe. öčimü γuyun degel qubčasun

靴袜[51]等件。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kiged jüil yambar(yamar)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24. 皇帝洪福前， 朵颜卫都指挥使哈哈赤 怯 怕 奏：奴婢 在 边 出

qaγan nu suu tu, doyan ui duu jiqui ši qaqači emiyeged ayun öčimü, boγul balan qijaγar küčü
力 多 有 功 劳[52]。今 来 进 贡 马匹，奏 讨 赏赐[53]，望
öggün olan boi güŋlejü. edüge ire aγuljarin yan üjegülün morina ,öčimü γuyan šaŋši. egeren
朝廷 可怜见 准 与的。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degedüs un örüšijen jobšiyan ög yin .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25. 皇帝洪福前，塔山卫[54]都督亦剌哈怯 怕 奏：成 化 十 四年(1478)十月
qaγan nu suu tu, tašan ui dudu iraqa emiyeged ayun öčimü, čiŋ qowa arban dörben on arban sara
初 三 日 除授 前 职，有 升 官 的 敕书 破 坏[55] 了，
türün γurban naran tüšijü urida čola . boi nere nemen noyan yin čišuu qaγarba nebteren baraba,
今 奴婢奏[56]讨 都督[57] 敕书。怎生 怜悯 恩赐 圣旨
edüge boγul γuyan šini(šine)čišuu. yambar(yamar)yar enerikü i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知道。
medemü ya.

26. 皇帝洪福前，泰宁卫正千户 歹察 怯 怕 叩头 奏：奴婢做 正 千户
qaγan nu suu tu, tainiŋ ui jiŋ semgu dayiča emiyeged ayun mörgü öčimü, boγul kijü jiŋ semgu
多 年 了，今 讨 升 指挥佥事 职事。怎生 恩赐
olan on baraba . edüge γuyun nere nemen jiqui semši čila ši.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圣旨 知道。
jrlq(jarliq) medemü ya.

27. 皇帝洪福前，朵颜卫 都指挥 佥事 老佟 叩头 怯 怕 奏：成化二年(1466)
qaγan nu suu tu, doyan ui duu jiqui semši lautuŋ mörgü emiyeged ayun öčimü, čiŋ qowa qoyar on
三 月 二十 一 日 除授 前 职。今 讨 升 都督职事。
γurban sara qorin nigen naran tüšijü urida čola. edüge γuyun nere nemen dudu čola ši
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28. 皇帝洪福前，速平江卫[58] 都 指挥使 帖木儿怯 怕叩头奏： 奴婢做 都指挥
qaγan nu suu tu, subiŋγaŋ ui duu jiqui ši temür emiyeged ayun mörgü öčimü, boγul qijü duu jiqui
使多年了，今 讨 升 都督佥事，望 天 皇帝 可怜见
ši olan on baraba, edüge γuyun nere nemen dudu semši. egeren yin tŋri qaγan örušiyen
准 与 的。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jubšiyan(jübšiyeren) ög yin .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29. 皇帝洪福前，建州卫掌 印 都督卜里哈 怯 怕 奏：成 化 十
qaγan nu suu tu, genjiu ui alaγan tamaγa dudu buriqa emiyeged ayun öcimü, čiŋ qowa arban
五年(1479) 三月 十 五 日 除授 前 职,出气力 多年了。 今 讨
tabun on γurban sara arban tabun naran tüšijü urida čola. küčü öggün olan on baraba, edüge γuyun
升 赏。 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nere nemen soyurqa.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30. 皇帝洪福前，兀者前卫指挥同知撒哈塔怯 怕 奏:弘治 十
qaγan nu suu tu, üje ṣan ui jiqui tuŋji saqata emiyeged ayun öčimü, quŋji arban qoyar on arban
二年(1499)十二月二十五日除授前 职,在 边 上 进 送 人 口 有
qoyar sara qorin tabun naran tüšijü urida čola. balan qijaγai degere oruγulju üden kömün aman boi
功。今讨升都指挥佥事[59]。怎生恩赐 圣旨 知道。
γung.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31. 皇帝洪福前，兀者前卫都督完者秃 怯 怕 奏 有,比先 奴婢 父 祖
qaγan nu suu tu , üje san ui dudu üljitü emiyeged ayun öčimü boi, bi sen boγul ečige ebüge
以来 辈辈 在 边 效劳 出力 多年 了,今 奴婢 备办 驼
inaqšida üye üye balan qijaγar ülümlen küčü ögčü olan on baγaba edüge boγul beleduju temegen
马 等 物 赴 京 进贡 叩头 来了,望 朝廷 可怜见 照
morin kiged ed wuu ging aγuljarin yan üjegülün mörgü irebe. egeren degedüs un örüšijen. jerge yi
例 奏 讨 织 金 衣 服、靴 袜 等 件。
qauli bar öčimü γuyun nekemel altatu degel qubčasun qutusun quimusun kiged jüil
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32. 皇帝洪福前，考郎兀卫[60]指挥同知撒秃 怯 怕 奏，比先 奴婢 父 祖
qaγan nu suu tu , qaulaŋγu ui jiqui tuŋji satu emiyeged ayun öčimü, bi sen boγul ečige ebüge
以来 敬 顺 天 道，尊事 朝廷。 奴婢 辈辈 在 边 效劳
inaqšida köndölen daγan teŋri yin aγur yi, erkilen degedüs un. boγul üye üye balan qijaγar ülümlen
出力 不 敢 怠慢。今 奴婢 进 贡 骟马叩头来了， 望
küčü ögčü ölü büged osuldan. edüge boγul aγuljarin yan üjegülün aqta mörgü irebe. egeren
朝廷 怜悯 照 例 奏 讨 赏赐。怎生 恩赐
degedüs un enerikü̈i jerge yi qauli bar öčimü γuyun šaŋši.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圣旨 知道。

jrlq(jarliq) medemü ya.

33. 皇帝洪福前，建州右卫[61]都 指挥使哈剌哈等 六 人 来 奏，今 有
qaγan nu suu tu , genjiu yiu ui duu jiqui ši qalaqa kiged jirγuγan kömün ire öčimü, edüge boi
迤北 达 贼，在 奴婢 每 处 扰 害。奴婢 每 过活 艰难 无 食，受这等
ümetü muŋγul qulaγai balan boγul nar juq künüjü quur boγul nar nasan yadaŋki ögei ide jülen yin
苦楚，望朝廷 怜悯 奴婢每 常 在 边 上 效劳 出力 奏
küčü egeren degedüs un enerikäi boγul nar nasuta balan qijaγar degere ülümlen küčü ögčü öčimü
讨[62] 赏赐与 奴婢 回 去 边 上 用 度。 怎生 恩赐
γuyun dam daum šaŋši ög boγul qari erči qijaγar degere kereg duu.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圣旨 知道。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34. 皇帝洪福前，泰宁卫指挥同知 速纳哈 男 卜颜台 叩头 怯 怕 奏，
qaγan nu suu tu , tainiŋ ui jiqui tuŋji sunaqa köbegün boyantai mörgü emiyeged ayun öčimü,
奴婢 父 因此 时 常 在 边 外 出 力气，正德 四 年 八 月 内
boγul ečige tegüber čaq nasuta balan qijaγar γadana küčü ögčü jiŋde dörben on naiman sara dotura
得 病 故 了。 今 奴婢 进 贡 马 匹 叩头来了。要 袭
olan ebečin ügei baraba . edüge boγul aγuljarin yan üjegülün morin ba mörgü irebe. ab jalγamji
父 前 职。望 朝廷 可怜见 准 与 的。 怎生 恩赐
ečige urida čola. egeren degedüs un örüšijen jobšiyan ög yin .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圣旨 知道。
jrlq(jarliq) medemü ya.

35. 皇帝洪福前， 屯河卫 指挥同知亦列格叩头 奏， 比先年间 设立 卫，分
qaγan nu suu tu , tun quwa ui jiqui tuŋji ilege mörgü öčimü, bi san on jaγura bailγaqsan ui wun
赐 与 印 信，着 奴婢 掌管 部 下 人 民。奴婢 多 在
soyurqu ög tamaγa bisiregül mün boγul alaγan qadaγala medel un duura irgen urγan . boγul olan
边 上 出力 不 敢 怠慢。 今 远 地 方 进 贡马 匹
balan qijaγar degere küčü ögčü ölü büged osuldan. edüge qola γajar dörböljin aγuljarin yan
叩头 来了。朝 廷 怜悯 照 例 奏讨
üjegülün morin ba mörgü irebe. egeren degedüs un enerikäi jerge ji qaulu bar öčimü γuyun
赏赐。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šaŋši.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36. 皇帝洪福前，福余卫右都督可台 怯 怕 奏， 奴婢 在 边 诚 心
qaγan nu suu tu , wuyur ui yiu dudu ködei emiyeged ayun öčimü , boγul balan qijaγar čiŋ jurüken
出力， 今 进 贡 骟马 一 匹，专 差 指挥 帖木儿叩头 去了。
küčü ögčü, edüge aγuljarin yan üjegülün aqta nigen ba. jorin jaruju jiqui temür mörgü erčibe.
奴婢 每 这 几 年 被 歹人 抢 夺 艰难。 奏 讨 鞍 子、
boγul nar ene kedün on mün daišin talan büliyen yadaŋki. öčimü γuyun emegel ši,
嚼头、 鱼 网 等 件。望 朝廷 可怜见 准 与的。
qadaγar(qajaγar), jiγasun külmi kiged juil egeren degedüs un örüšiyen jobšiyan ög yin .
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37. 皇帝洪福前，毛邻卫都督佥事 只塔 怯 怕 奏，奴婢 比先 蒙 朝廷
qaγan nu suu tu ,maulan ui dudu samši jida emiyeged ayun öčimü , boγul bi san muŋ degedüs un
赐 与 印 信， 除授 前 职，管 束 人 民。 这 几 年 被
soyurqu ög tamaγa bisiregül, tüšijü urida čola. qadaγala un duura irgen urγan. ene kedün on mün
瓦剌 达 子 将 人 民 抢 去。又 将 升 官
oirad muŋγul köbegün abaju(abcu) irgen urγan talan erči. basa abaju(abču) nere nemen noyan yin
的敕书抢去了。今 进 贡 马 匹 叩头去了。奏 讨 都督佥事
čišü talan erčibe. edüge aγuljarin yan üjegülün morin ba mörgü irebe. öčimü γuyun dudu samši.
敕书。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čišü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38. 皇帝洪福前，哈密卫右都督 罕慎 怯 怕 奏，比先 太宗 皇帝 时
qaγan nu suu tu , qamil ui yiu dudu qanšim emiyeged ayun öčimü, bi san taisuŋ qaγan čaq
将 哈密 设立 卫 分 赐 与 印 信 管束 哈密 着，做
abaju(abču)qamil un bailγaqsan ui wun soyurqu ög tamaγa bisiregül qadaγal un qamil un mün kijü
远 近 耳 目 这等 设立 有 来。 今 奴婢 备办 驼 马 等 物，专
qola oira čikin nidün ein bailγaqsan boi ire. edüge boγul beledüjü temegen morin kiged ed jorin
差 指挥阿哈赴 京 进 贡 叩头 去了。 望 朝廷 可怜见 收了
jaruju jiqui aqa wuu giŋ aγuljarin yan üjegülün mörgü erčibe. egeren degedüs un örüšiyen qoriyaba
便益。 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joqistai .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39. 皇帝洪福前， 泰宁卫指挥使撒哈塔叩头 奏 有，正德 元年 (1506)七月 二十

qaγan nu suu tu , tainiŋ ui jiqui ši saqata mörgü öčimü boi, jiŋde terigün on doluγan sara qorin
二 日 除授前 职。在 边 进 送 人 口,出 力气 多 年 了。
qoyar naran tüšijü urida čola. balan qijaγar oruγulju üde kömün ama . küčü ögčü olan on balaba.
今 奴婢 进 贡 马 匹 叩头 来了。照 例 讨 升
edüge boγul aγuljarin yan üjegülün morin ba mörgü irebe. jerge yi qauli bar γuyun nere nemen
都 指挥使 职 事。望 朝廷 怜悯 远 夷 准 升 与
duu jiqui ši čola ši . egeren degedüs un eneriqüi qola γadaγadu jusiyen(jübsiyeren) . nere nemen ög
奴婢 的。 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boγul yin.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40. 皇帝洪福前, 弗提卫[63]右都督答吉禄、考郎兀卫都督同知斡罗台等 奏 有,纳剌
qaγan nu suu tu , wodi ui yiu dudu takilü, qaulaŋγu ui dudu tuŋji oludai kiged öčimü boi, nara
河 卫 指挥同知卜养古,比先 永乐 年 间 到 今 七 辈 出力 有 功,
quwa ui jiqui tuŋji boyaŋγu bi san yuŋlu on jaγura kürbe edüge tuluγan üye küčü ögčü boi γuŋ
除授 前 职。今 奴婢 保 这 卜养古 做 都督 佥事,好 管束 人 民。
tüšijü urida čola. edüge boγul baulan ene boyaŋγu kijü dudu samši , sain qadaγal un irgen urγan.
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yambar(yamar)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41. 皇帝洪福前, 建州卫都督完者秃怯 怕 奏, 奴婢每 与 朝鲜 国 地
qaγan nu suu tu , genjiu ui dudu üljitü emiyeged ayun öčimü, boγul nar ög čausan ulus γajar
方 近 住。我每二 处 人, 时 常 争 闹 有。朝鲜 人
dörböljin oira jü. bi nar qoyar jug (jüg) kömün, čaq nasuta temečekü keregürji boi. čausan kümün
说 你 自 往 大明 皇帝 前 进 贡 去,不 往 我每 处 来。
kele či öbesün üdün daimiŋ qaγan urida aγuljarin yan üjegülün erči, ölü üdün bi nar jug (jüg) ire.
因此, 今 奴婢 朝廷 前 奏, 望 怎生 怜悯 处置
tegüber, edüge boγul degedüs un urida öčimü, egeren yambar(yamar) yar enerikü nairalduγai
恩赐 圣旨 知道。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42. 毛邻卫都指挥老佟怯 怕 朝廷 前 奏, 奴婢 每 众 人 商量
maulan ui jiqui loduŋ emiyeged ayun degedüs un urida öčimü, boγul nar bürin kümün eyedüldü
远 地 方 来,回 去 时 无 有驮驮 脚力。今 要 奏 讨 辽东 衙门
qola γajar dörböljin ire, qari erči čaq ögei boi ačiqu olaγan. edüge ab öčimü γuyun lauduŋ yamun

里 买 牛只勘合文书。怎生 怜悯 圣旨
tur qudalduju ab üker ji qamγuwa bilig bičig . yambar(yamar) yar enerikü̈i yi jrlq(jarliq)
知道。
medemü ya.

43. 皇帝洪福前， 建州右卫指挥佥事 撒因孛罗 孙 男 昂克孛罗 奏 有，祖
qaγan nu suu tu , genjiu yiu ui jiqui semši sain bolud ači köbegün eŋke bolud öčimü boi, ebüge
成化 八(1472)年 二月 初 九 日，除授 前 职。出力 行 间 故
čiŋquwa naiman on qoyar sara türün yisun naran, tüšijü urida čola. küčü ögčü yabu jaγura ügei
了。 今 奴婢 要 袭 祖 原 职，望 朝廷 可怜见 准 与 的。
baraba. edüge boγul ab jalγamji ebüge urida čola . egeren degedüs un örüšiyen jobšiyan ög yin .
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44. 皇帝洪福前， 建州右卫里三格 等 怯 怕 奏 有，本 卫都督老察 弘治
qaγan nu suu tu , genjiu yiu ui li senge kiged emiyeged ayun öčimü boi, bütün ui dudu lauča quŋji
十五(1502)年来 进 贡 回 去，至 本 年五 月十 四 日
arban tabun on ire aγuljarin yan üjegülün qari erči kürdele bütün on tabun sara arban dörben naran
到 辽东 故 了。有 他 男 三 岁 年 小。 今 保 他
kürbe lauduŋ ügei baraba. boi tegün nu köbegün dörben nasun on öčüken. edüge baulan tegün nu
弟 扫察 袭 替 前 职。怎生 恩赐 圣旨
degü(degüü)sauča jalγamji yegüdgejü urida čola .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知道。
medemü ya.

45. 皇帝洪福前， 毛邻卫指挥 佥事阿哈 怯 怕 奏， 奴婢正德三(1508)年七
qaγan nu suu tu , maulan ui jiqui semši aqa emiyeged ayun öčimü, boγul jiŋde γurban on doluγan
月 二十 日 除授 前 职。在 边 出 力， 进 送 人 口 多 有[64]
sara qorin narana tüšijü urida čola. balan qijaγar küčü ögčü , oruγulju üde kömün ama olan boi
功。 今 奴婢 照 本 卫指挥 佥事 撒哈事 例 讨 升 都 指挥
yeke güŋ. edüge boγul jerge yi bütün ui jiqui semši saqa üile qauli bar γuyun nere nemen duu jiqui
佥事 职 事，望 朝廷 可怜见 准 与的。 怎生 恩赐
semši čola ši, egeren degedüs un örüšiyen jobšiyan ög yin .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圣旨 知道。

jrlq(jarliq) medemü ya.

46. 皇帝洪福前， 朵颜卫都 指挥佥事 马纳哈 怯 怕 奏，比先 有 奴婢 父

qaγan nu suu tu , duyan ui duu jiqui semši manaγa emiyeged ayun öčimü , bi sen boi boγul ečige

祖 以来 辈 辈 进 贡， 到 今 不 敢 怠慢。今 奴婢 专

ebüge inaqšida üye üye aγuljarin yan üjegülün, kürbe edüge ölü büged osuldan. edüge boγul jurin

差 头目 兀剌台 进贡 骟马 叩头 去了。奏 讨 青 红 布、

jaruju teümü üledei aγuljarin yan üjegülün aqta mörgü erčibe. öčimü γuyan küke ulaγan ülejin,

帐房、 剪子 等 件。望 朝廷 怜悯 都 准 与的。

čačir(čačar), qaiči kiged juil. egeren degedüs un enerikü bügüde jobšiyan ög yin .

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yambar(yamar)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47. 敕 谕 四 方[65] 海外[66] 诸 国 番王 及头目 人 等 朕 奉 天

jrlg (jarlig) dörben dörböljin dalai γadana bürin ulus wanoŋ qi teümü kömün kiged , jin wan teŋri

命[67]，一 体 上 帝 之 心， 施 恩 布[68]德。 凡 载 之 间， 日

miŋ ,nigen balder degere tai ji juruqen (jiruqen), si ači olajin aburi. won wöu tege ji jaγura ,naran

月 所照之处， 其人 民 老老 少少 皆 欲使 之

saran suu jerge yi jug (jüg), qi irgen urγan ödökö ödökö jalaγus jalaγus bügüde yu ilčin (elčin) ji

遂其 生 育 不致失所。 今 特 遣 使 赍 敕

üldej qi turuba (türübe) ju ölü ji si suu. edüge jorin jaruju ilčin(elčin) abuγad jrlg (jarlig)

普 谕 朕 意，循 理 安 分，勿 有 违 越，不 可 欺 寡，

büütuŋqaju jin jorqg ,daγaju yosun qan wun , quu boi abeged nügči, ölü böged basun qüü,

不 可 凌 弱。若 摅 诚 来 朝， 咸 赐 官 赏。 故兹 敕谕

ölü böged liŋ šau. qerbe delge čiŋ ire čau, bügüde soyurqu noyan soyurqa. tegüber jrlg (jarlig)

都 使 闻 知[69]。

bügüde ilčin (elčin) sonus medebe.

48. 敕 麓 川、平 缅[70] 军民宣慰使[71]思任发[72]等，尔以象马 方 物[73]

jrlg (jarlig)luu čüle tübsin maŋqa čerig orγan sön yui ši ššiwa kiged . či yi jaγan morin dörböljin ed

来 贡， 赐 与 尔及 妻 彩 缎 表 里，尔宜 恪 遵

ire üjegülün, soyurqu ög či qi gergei ardu törge γadar dotur, či yi qataγuju(qataγujiju) erqilen

朝廷 法度，以 副 朕[74]意， 故 谕。

degedüs un jasaq, yi wuu jin jorig tegüber tuγulaγabai (tuγulγabai).

49. 敕 大同 总兵 官 杨 信[75],原 迤北 抢 去 汉人, 今 不
jrlq (jarliq) daituŋ süŋbiŋ noyan yaŋ sin, ujaɣur ümetü(umaratu) dalan erči kitad(kitad) edüge ölü
时 走 回, 俱 从 彼 处 入 关 进 京,多 有 带 来 鞑
čaq küyi qari, bügüde suŋ bi jug(jüg) oru boɣum(boɣumta) ire giŋ, olan boi büse ire muŋɣul
马。 特 敕 尔 杨 信,今 后 如 有 似 前 带 来 马 匹 不可 人
morin. jorin jrlq (jarliq) či yaŋ sin ,edüge qoina šiu boi adali urida büse ire morin ba ölü kömün
马 同 来, 其 马 以致 瘦 损 无 力 须 喂 养 十 日 半 月,
morin sačaɣu ire, qi morin yi ji toruqan sün ügei li, si ui tejiyen(tejigen) arban naran jarim sara,
差 人 管 押 来 京。已 敕 沿 途 驿 站,好生 用 心 喂
jaruju kömün qadaɣal ya ire giŋ, yi jrlg (jarlig) yan tu yi jam saitur kereg jorugen(jirüken) oi
养。 特 敕 尔 杨信 知 之。
tejigen. jorin jrlq (jarliq) či yaŋ sin medemü yi.

50. 敕 总兵 官 文 书 说 与 各 边 卫 分 头目 每 知道:
jrlq (jarliq) süŋbiŋ noyan bilig bičig kele ög öbere kijaɣar(qijaɣar) ui wun teümü nar medemü ya,
朝廷 天 地 大 恩,与 边 外 开 卫门, 除授 你每 官 职
degedüs un teŋri ɣajar yeqe ači, üg qijaɣar(kijaɣar) ɣadana nege yamen, tüsijü či nar noyan čola,
着 管 束 部下 之 人,各 守 本 分。如 今 时 常 不守 法度,抢
mön qadaɣal un medel un ji kömün öbere siu bütün won. Šiu edüge čaq nasuta ölü siu jasaq. talan
掠 人 民 财 物,被 害 之 人 多 有 来 告。 今 先 行 文 书 与你每
lau irgen urɣan mal ed, mün qoor ji kömün olan boi ire jaɣa, edüge san yabu bilig bičig üg či nar
知道, 好生 管束 部下 之人,不 许 仍 前 再 犯。 有 再 犯 的 定
medemü ya. saidur qadaɣal un doura kömün, ölü usun šin urida basa wun, boi basa wun yin ögečin
行 奏 闻, 调兵 征剿。 故 谕。
yabu öčimü sonusču, čerig jiloqdun alaba. tegüber tuɣulɣabai.

51. 敕 亦里把里[76]地面[77]火者、王、头目马哈木 等,尔 能 敬 顺 天
jrlq (jarliq) ili bali ɣajar niɣur quja uŋ teümü maqamu kiged, či mergen köndölen daɣan teŋri yin
道, 尊事 朝廷, 遣 使 以阿鲁骨马 来 进, 诚 意 可 嘉。
aɣur yi,erkilen degedüs un jaruju ilčin(elčin) yi aruqu morin ire oruɣulju qiŋ önen joriq kü kiya,
特 赐 尔彩 缎 表 里,尔 宜益, 坚 臣 节
jorin soyrqu(soyurqu) či artu türge ɣadar dotur, či tüledta tüsimel un töröben(töröben) bekilejü,
永 效 勤 诚,以 副朕 望。 故 谕。

egüri orumlan kičijeŋkü(kičijeŋküi) čiŋ, yi wou jin egeren. egüber tuɣulɣabai.

52. 海西[78]都督等官 奏 有,我每 十 人 五 日[79]一次 送的 下

qaiši dudu kiged noyan öčimü boi, bi nar arban kömün tabun naran tede (ded)üde yin doura

程[80] 酒 肉,不足 五 日 吃用 有。会同 馆 把 门 的 馆

čiŋ darasun miqa ölü sau taban naran ide kereg boi, qui tuŋ gön sakiju(saqiju) egüden yin gön

夫的 牌 子每 商量,将 送 来[81]的 下程 酒 肉 等 物 都

wou bari si nar eyedüldü,abuju(abču) ide ire yin doura čiŋ darasun miqa kiged ed bügüde

夺 去了。今 望 朝廷 怜悯 着 一个[82] 官 人

böliyen(buliyan) erčibe. edüge egeren degedüs un eneriŋgüi mön nigen guua guua noyan kömün

送 来 分 与 便益。 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üde ire won ög jokistai(joqistai). yambar(yamar)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53. 朵颜卫指挥同知脱忽赤男 撒哈塔 奏 有,我的 父 十 二 月 十 六

duyan ui jiqui tuŋji tuquči köbegün saqada öčimü boi,bi yin ečige arban qoyar sara arban jirɣuɣan

日, 在 东 边 外, 将 原 授 职 的敕书

naran balan dürüne(doruna) qijaɣar ɣadana abuju(abču) ujaɣur(ijaɣur) jülen čola yin čišü

失落了,奴婢 今 要 求 讨 新 敕书,奏 得 圣旨 知道。

aldaraba. boɣul edüge ab jalbarin ɣuyun šini(šine) čišü, öčimü olun jrlq(jarliq) medemü ya.

54. 皇帝洪福前 ,建州 右卫都督察哈塔 并 毛怜卫大 小 人 等

qaɣan nu suu tu , genjiu yiu ui dudu čaqata basan(basa) maulen ui yeke öčüken kömün kiged

奏,今 我每 比照 今年 来 进贡, 海西的 人 赏赐,

öčimü,edüge bi nar jerge ji edüge on ire aɣuljarin yin(yan) üjügülün (üjegülün). qaiši yin kömün

都 赏 赐银 两,我每 照 例 奏 讨 银两

šaŋši bögüde soyurqa üg muŋgü(müŋgü) sijir. bi nar jerge ji qauli bar öčimü, ɣuyun

便益。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muŋgü(müŋgü) sijir juqistai,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55. 毛怜卫指挥使塔出奏, 比先 成化二十三年(1487)有, 我祖 撒鲁 正 直 好

maulen ui jiqui ši taču öčimü, bi san čiŋquwa qorin ɣurban on boi bi ebüge salu čiŋ šidurɣu sain

人, 同 兀黑纳被 辽东 韩[83] 总兵领 军 马 出 边

kömün, sačaɣu üqna mün lauduŋ qam suŋbiŋ üdüridčü(uduridču) čerig morin ɣar qijaɣar

外 时,将 我 祖 杀了。这等苦楚[84]今 奴婢 求 讨 升 职

ɣadana čaq abuju(abču) bi yin ebüge alaba. ein küčü edüge boɣul jalbarin ɣuyun nere nemen čola.

奏 得。圣旨 知道。

öčimü olan jrlq(jarliq) medemü ya.

56. 皇帝洪福前，考郎兀卫都督 同知撒哈塔孙 男 失勒得奏 有，我的 祖 故

qaγan nu suu tu , qaulaŋγu ui dudu tuŋji saqata ači köbegün šilda öčimü boi, bi yin ebüge ügei

了，弘治 四年(1491) 二月初 七日 除授 前 职。今 我 求 讨

baraba. quŋji dörben on qoyar sara türün doluγan naran tüšijü urida čola. edüge bi jalbarin γuyun

父 祖的职事。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ečige ebüge čola ši .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57. 皇帝洪福前，阿真河卫[85]指挥佥事 阿桑哈的男 歹孙奏 有，我的父亲

qaγan nu suu tu , ajin qowa ui jiqui semši asaŋqa köbegün daisun öčimü boi,bi yin ečige

成化十五年(1479) 二 月 初 九 日 除授 前 职。今 我 求 讨

čiŋquwa arban tabun on qoyar sara türün yisun naran tüšijü urida čola. edüge bi jalbarin γuyun

父 职。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ečige cola.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58. 纳剌河卫[86]指挥同知撒哈男 额赤格 奏 有，我的 父 成化 三年(1467)三月

nala qowa ui jiqui tuŋji saqa köbegün ečige öčimü boi, bi yin ečige čiŋquwa γurban on γurban sara

初 七 日 除授 前职。正德 十 四年(1478)十一月 十四日，

türün doluγan naran tüšijü urida čola. jiŋde arban dörben on arban nigen sara arban dörben naran ,

在 开 原 城[87] 将 原 授 职 的 敕书失落了，

balan nege ujaγur balaγasun(balγasun) abuju(abču) ujaγur jülen čola yin čišü aldarba (aldaraba).

今 我 求 讨 敕书。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edüge bi jalbarin γujun čišü,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59. 皇帝洪福前，兀者左卫[88]指挥佥事哈里哈男 撒鲁格奏有：[89]的 父在 成化

qaγan nu suu tu , üje suu ui jiqui semši qaliqa köbegün saluge öcimü boi, bi yin ečige čiŋquwa

十年(1474)二月十 七 日 除授 前 职。 今 奴婢 求 讨 父 职。

arban on qoyar sara arban doluγan naran tüšijü urida čola. edüge boγul jalbarin γuyun ečige čola.

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60. 朵伦卫[90]指挥同知脱忽赤男亦纳哈 奏 有，我的[91]父亲在 开 原 城

tulum ui jiqui tuŋji tuqači köbegün inaqa öčimü boi, bi ečige balan nege ujaγur balγasun

将 原授 职 的 敕书失落了。这失落了的 敕书 在 屯 河 卫的 人 手

abuju(abču) jülen čola yin čišü aldaraba. ene aldaraba yin čišü balan tun qowa ui yin kömüs γar
里,今 奴婢 求 讨 父的敕书 奏 得。圣旨 知道。
tur. edüge boγul jalbarin γuyun ečige čišü öčimü olan jrlq(jarliq) medemü ya.
61. 皇帝洪福前,兀者卫[92]都督也克怯 怕 奏: 今 奴婢 求 讨 金 带、
qaγan nu suu tu , üje ui dudu yeqe emiyeged ayun öčimü, edüge boγul jalbarin γuyun altan büse,
大帽 子[93]。 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bürge köbegün.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62. 皇帝洪福前,建州卫都督完者帖木儿 怯 怕 奏:奴婢 今 年
qaγan nu suu tu , genjiu ui dudu üljetemür(üljeitemür) emiyeged ayun öčimü, boγul edüge on
在 东 边 地 方[94] 射 猎,寻得 白 爪 海青
balan dürüne(doruna) qijaγar γajar dörbeljin qarbu abačin eri olan čaγan baγul šiŋqur(šoŋqur)
一 对,能 擒[95]天鹅。奴婢不 敢 自 用,专 差 指挥撒里赴 京 进
nigen dui mergen kim qun. boγul ülü büged öbesön qereg. jorin jaruju jiqui sali wou kiŋ aγuljarin
贡。 望 朝廷 怜悯 收了。 怎生 恩赐
yin(yan) üjegülün egeren degedüs un eneriŋgüi quriyaba.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圣旨 知道。
jrlq(jarliq) medemü ya.
63. 皇帝洪福前, 建州左卫 都督佥事 脱罗干 保 奏 有,本 卫都 指挥 佥事
qaγan nu suu tu , genjiu suu ui dudu semši tuluγan baulan öčimü boi, bütün ui duu jiqui semši
牙速 成化 四 年(1468)七月十 一 日 除授 前 职,今 故 了 有。
yasu čiŋquwa dörben on doluγan sara arban nigen naran tüšijü urida čola. edüge ügei baraba boi.
他 男 亦剌哈要袭 父 职。又 有指挥同知阿剌哈弘治 二年(1489)三月
tegün nu köbegün ilaqa jalγamji ečige čola. basa boi jiqui tuŋji ilaqa quŋji quyar on γurban sara
十 二 日 除授 前 职。出力气 多 年 了,今 讨 升迁 都指挥
arban quyar naran tüšijü urida čola. kücü öggün olan on baraba. edüge γuyun nere nemen duu jiqui
佥事 职事。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semši čola ši.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64. 皇帝洪福前,建州卫都督完者秃[96] 奏, 先 前 奴婢 本 卫一 百
qaγan nu suu tu , genjiu ui dudu üljetü(üljeitü) öčimü, san urida boγul bütün ui nigen jaγun
十 五 人 进 贡 来 时 有,都指挥使 苦鲁 名字 人
arbun(arban)tabun kömün aγuljarin yin(yan) üjegülün ire čaq boi, duu jiqui ši külü neretü kömün

有珠 子[97]二 个,卖 与 大市 倪佐 名字 人,说 定

boi sübüd(sobud) qöbegün qoyar güwe qudaldu ög yeqe bašar ni suu neretü kömün, kele nügčin

与 布 一百 匹,后 不曾与。今 望 朝廷 怎生 怜悯

ög büs nigen jaγun ba quina ese ög edüge egeren degedüs un yambar(yamar) yar eneriqüi

追 还 原 物 的 恩赐 圣旨 知道。

jüilejü tülüqü ojaγur ed yin (un)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65. 皇帝洪福前, 童宽山 卫指挥 同知帖鲁格 怯 怕 奏, 天 顺七年(1463) 十

qaγan nu suu tu , tuŋγunsan ui jiqui tuŋji telüge emiyeged ayun öčimü, ten šün doluγan on arban

二 月 初 三 日 除授 前 职。奴婢出力气 年 远 了, 今 照

qoyar sara türün γurban naran tüšijü urida čola. boγul küčü öggün on qola baraba. edüge jerge yi

例 讨 升 指挥使。 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qauli bar γuyun nere nemen jiqui ši.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66. 皇帝洪福前,建州右卫都督 赏哈[98]怯 怕 奏 有,本 卫都 指挥 佥事

qaγan nu suu tu , genjiu yiu ui dudu šaŋqa emiyeged ayun öčimü boi, bütün ui duu jiqui semši

刺哈 成化 十四年(1478)十 月 初 三 日 除授 前 职,弘治五年(1492)

laqa čiŋquwa arban dörben on arban sara türün γurban naran tüšijü urida čola. quŋji tabun on

十 二 月十 二 日 故 了。 今 保 他 男 老察 袭

arban quyar sara arban quyar naran ügei baraba . edüge baulan tegün nu köbegün lauča jalγamji

他 父 都督佥事 便益。 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tegün nu ečige dudu semši joqistai.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67. 皇帝洪福前, 建州左卫 都督 脱罗怯 怕奏, 天顺八年(1464)正 月

qaγan nu suu tu , genjiu suu ui dudu tulud emiyeged ayun öčimü, ten šün naiman on qobi sara

十 八 日 除授马 木敦 做 都 指挥。成化 元 年 抢 去 边

arban naiman naran tüšijü ma modun kijü duu jiqui. čiŋquwa terigün on talan erči qijaγar(kijaγar)

上 十 九 人, 马 十 四, 甲 八 副。 将 这 马 木敦 送

degere arban yisun kömün, morin arban be, quyaq naiman wuu. abuju(abču) ene ma modun üde

到 广 宁 城 收了。 这 马 木敦 多 出气力 有来。因此,

kürbe kün niŋg balaγasun (balγasun) quriyaba. ene ma modun olan küčü öggün boi ire. tegüber

今 保 他 男 马哈塔 袭 父 都 指挥职 事。怎生

edüge baulan tegün nu köbegün maqata jalγamji ečige duu jiqui čola ši yambar(yamar)yar

恩赐 圣旨 知道。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68. 皇帝洪福前，阿者迷河卫[99]都督只克 怯 怕 奏 有，都督答吉禄剌哈都
qaγan nu suu tu , ajimi qowa ui dudu jige emiyeged ayun öčimü boi, dudu taqilu laqa bügüde
蒙[100] 朝廷 赐 与大帽、金 带 有 来。今 奴婢 照 例 奏
moŋ degedüs un soyurqaqu ög bürge altan büse boi ire, edüge boγul jerge yi qauli bar öčimü
讨 大帽、金带。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γuyun bürge altan büse,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69. 皇帝洪福前，建州 右卫 都督 人 等 保 奏，成化 十五年(1479)三
qaγan nu suu tu , genjiu yiu ui dudu kömün kiged baulan öčimü, čiŋquwa arban tabun on γurban
月 十 六 日 除授阿剌哈做 都 指挥佥事 有,升 官的 敕书被
sara arban jirγuγan naran tüšijü alaqa kijü duu jiqui semši boi, nere nemen noyan yin(nu) čišü mün
大 军 马 抢 了。今 保 他 男 忽塔哈 袭 父 前 职。
yeke čerig morin talan baraba. edüge baulan tegün nu köbegün qudaqa jalγamji ečige urida čola.
成 化 十 五年(1479) 三月 十 六 日 除授阿塔忽做 都 指挥 佥事
čiŋ quwa arban tabun on γurban sara arban jirγuγan naran tüšijü ataqu kijü duu jiqui semši
有，升 官 的 敕书也 被 大 军 马 抢 了。今 有 他
boi,nere nemen noyan yin(nu) čišü taqai mün yeke čerig morin talan baraba. edüge boi tegün nu
男 马塔要 袭 父 前。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köbegün mata ab jalγamji ečige čola.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g(jarlig) medemü ya.
70. 皇帝洪福前，兀者前卫都督卜哈怯 怕 奏 有，本 卫都督脱里 景泰
qaγan nu suu tu , üje san ui dudu buqa emiyeged ayun öčimü boi, bütün ui dudu tüli geŋtei
元年(1450) 十月 十一 日 除授前职，诚心 出气力行
terigün on arban sara arban nigen naran tüšijü urida čola. juruken(jiruken) kücü üggün yabu
间，后 天 顺 二 年(1458) 被达北 达 子 做 贼 将 这
jaγura, qoina ten šün qoyar on ümetü(umaratu) muŋγul köbegün kijü qulaγai abuju(abču) ene
都督脱里抢 去了 有。他 男 兀哈秃天顺 三 年(1459)进 贡
dudu tüli talan ercibe boi. tegün nu köbegün ükatü ten šün γurban on aγuljarin yin(yan) üjegülün
时,袭 了 他 父 都督 佥事 职事,出 气力 行 间 故 了。今
čaq jalγamji baraba tegün nu ečige dudu semši čola ji. kücü öggün yabu yaγura ügei baraba. edüge
有 他 男 纳哈出 袭 父 都督佥事。怎生 恩赐

boi tegün nu köbegün naqaču jalɣamji ečige dudu semši.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圣旨 知道。
jrlq(jarliq) medemü ya.
71. 皇帝洪福前，兀列河卫[101]指挥使塔必纳怯 怕 奏，比先有奴婢 祖 阿哈塔
qaɣan nu suu tu , üle qowa ui jiqui ši tabina emiyeged ayun öčimü, bi san boi boɣul ebüge aqata
在 边 多出 气力， 升了 指挥使，出力 行 间 故了。
balan qijaɣar olan kücü öggün, nere nemen baraba jiqui ši kücü öggün yabu jaɣura ügei baraba.
后 奴婢父 袭 了 祖职事， 故了。天顺 五年(1461)四月 十
qoina boɣul ečige jalɣamji baraba ebüge čola ši. ügei baraba. ten šün tabun on dörben sara arban
二 日 奴婢 塔必纳 袭 父 职，出力气 多年 了。 今 讨 升
quyar naran boɣul tabina jalɣamji ečige čola, kücü öggün olan on baraba. edüge ɣuyun nere nemen
都 指挥佥事。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duu jiqui semši. yambar(yamar)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72. 皇帝洪福前，建州右卫都督赏哈 怯 怕 奏， 成 化 十 四年(1478)
qaɣan nu suu tu , genjiu yiu ui dudu šaŋqa emiyeged ayun öčimü, čiŋ quwa arban dörben on
除授 猛可 做 都 指挥 同知，后 被 抚顺所 官 人 杀 了
tüšijü muŋqe(müŋke) kijü duu jiqui tuŋji, qoina mün wuu šün suu noyan kömün alaba baraba
有，升 官的 敕书失落了，今 保 他 男 伯孙 袭 父
boi,nere nemen noyan yin(nu) čišü aldaraba. edüge baulan tegün nu köbegün baisun jalɣamji ečige
都 指挥同知。怎生 秝赐 圣旨 知道。
duu jiqui tuŋji. yambar(yal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73. 皇帝洪福前， 兀者卫都督指挥佥事马塔哈男 撒秃哈 奏，比先 奴婢 袭
qaɣan nu suu tu , üje ui dudu jiqui semši maqata köbegün satuqa öčimü, bi san boɣul jalɣamji
父职事 有， 敕书被 歹人 抢 去了。比先 有马侍郎 大人 去 招附
ečige čola ši boi, čišü mün taišin talan erčibe. bi san boi ma šilaŋ tašin erči ilsegülün(elsegülün)
时，奴婢 随他出气力 主 人 前 叩头 来了。众 人 都 升 了
čaq boɣul taɣa kücü ökgün. ejen kömün urida mörgü irebe. bürin kömün duu nere nemen baraba
职 事， 止 奴婢 不曾得 升。 今 照 例 讨 升 职事。
čola ši. türidge boɣul ese olun nere nemen. edüge jerge yi qauli bar ɣuyun nere nemen čola ši.
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74. 皇帝洪福前，建州卫指挥使童撒哈 怯 怕 奏： 天顺六 年除授前
qaγan nu suu tu , genjiu ui jiqui ši taŋsaqa emiyeged ayun öčimü, ten šün jirγuγan on tüšijü urida
职。 今 进贡 马 匹 叩头 来了，讨 升 都指挥佥事。
čola. edüge aγuljarin yin(yan) üjegülün morin ba mörgü irebe. γuyun nere nemen duu jiqui semši.
又 有指挥 佥事 撒哈塔天 顺 八年(1464)袭 了 父 职， 年 远 了， 今
basa boi jiqui semši saqata ten šün naiman on jalγamji baraba ečige čola, on qola baraba. edüge
讨 升 都指挥同知。又 有 指挥同知卜儿哈天 顺 二年(1458)袭了 父
γuyun nere nemen duu jiqui tuŋji. basa boi jiqui tuŋji burqa ten šün qoyar on jalγamji baraba ečige
职，年 远 了， 今 进贡 马 匹 叩头 来了，讨 升
čola, on qola baraba. edüge aγuljarin yin(yan) üjegülün morin ba mörgü irebe. γuyun nere nemen
指挥使。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jiqui ši.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75. 皇帝洪福前， 建州左卫都督脱罗[102]怯 怕 保 奏，成化 四年(1468)七
qaγan nu suu tu , genjiu ui dudu tulud emiyeged ayun baulan öčimü, čiŋquwa dörben on doluγan
月 十一日 除授牙速做都指挥佥事，今 故 了 有。他 男
sara arban nigen naran tüšijü yasu kijü duu jiqui semši. edüge ügei baraba boi. tegün nu köbegün
亦剌哈 要 袭 父 职。又 有 指挥同知马哈木 天 顺 二 年(1458)三月十 九
iraqa ab jalγamji ečige čola. basa boi jiqui tuŋji maqamu ten šün qoyar on γurban sara arban yisun
日 除授 前 职 多 年 了。 今 讨 升 都 指挥佥事。 怎生
naran tüšijü urida čola, olan on baraba. edüge γuyun nere nemen duu jiqui semši. yambar(yamar)
恩赐 圣旨 知道。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76. 皇帝洪福前，撒鲁河卫[103]指挥同知脱塔 奏：比先 招附 奴儿干人民 有
qaγan nu suu tu , salu quwa ui jiqui tuŋji tuta öčimü, bi san ilsegülün(elsegülün) nurγan urγan boi
功， 升 与指挥同知。又有弗提卫指挥同知亦塔哈奏： 奴婢 出力 多
güŋ, nere nemen ög jiqui tuŋji. basa boi wudi ui jiqui tuŋji idaqa öčimü, boγul kücü öggün olan
年 了， 都 讨 升 赏。 怎生 恩赐 圣旨
on baraba bügüde γuyun nere nemen soyurqa.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知道。
medemü ya.

77. 皇帝洪福前， 卜忽里卫[104]指挥佥事兀列格奏：天顺五年(1461)除授前职，今 远

qaɣan nu suu tu ,buquli ui jiqui semši ülege öčimü, ten šün tabun on tüšijü urida čola, edüge qola
地 方 进贡 貂鼠 皮 二十 张 叩头 来了,讨
ɣajar dörbeljin aɣuljarin yin(yan) üjegülün boluɣan(bolaɣan) arasun qorin jaŋ mörgü irebe. ɣuyun
升 职事。又 有乞塔 河 卫指挥佥事 里 三格天顺五年(1461)除授 前 职,
nere nemen čola ši, basa boi qita quwa ui jiqui semši li sange ten šün tabun on tüšijü urida čola,
出力气 多年了, 今 讨 升 赏。 又 有 弗提卫指挥同知牙速、
olan on baraba. kücü öggü. edüge ɣuyun nere nemen soyurqa. basa boi wudi ui jiqui tuŋji yasu,
童宽山 卫指挥佥事 影克、撒里卫副 千户 阿哈 等, 今 奴婢每,远 地
tuŋquusan ui jiqui semši yiŋke,sali ui wuu samqu aqa kiged, edüge boɣul nar qola ɣajar
方 进贡 来了,都 讨 升 赏。 怎生
dörbeljin aɣuljarin yin(yan)üjegülün irebe. bügüde ɣuyun nere nemen soyurqa. yambar(yamar) yar
恩赐 圣旨 知道。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78. 皇帝洪福前,泰宁 等 三卫[105] 达 子 忽里赤等 三 百 人
qaɣan nu suu tu , tainiŋ ui kiged ɣurban ui muŋɣul köbegün qoriči kiged ɣurban jaɣun kömün
进贡 到 京。今 遇 万 寿 圣 节,
aɣuljarin yin(yan) üjegülün kürbe giŋ. edüge jolaɣalduba (jolɣalduba)tümen nasutai sain üdür
都 进贡 骟 马[106] 一 匹。怎生 恩赐 圣旨
bügüde aɣuljarin yan üjegülün aqta morin nigen ba.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知道。
medemü ya.

79. 皇帝洪福前, 建州右卫 都督赏哈 怯 怕 奏 有:都 指挥阿剌哈家 下
qaɣan nu suu tu , genjiu yiu ui dudu šaŋqa emiyeged ayun öčimü boi, duu jiqui alaqa ger duura
妻 子[107] 九 口 人 被 陈 都 堂 杀了有。升 官的 敕
gergei köbegün yisun ama kömün mün čin duu taŋ alaba boi. nere nemen noyan yin(nu)
书被人 抢 去了。先 前[108] 失落了 敕书的 人, 后 都 给 与
了。
cišü mün kömün talan erčibe. san urida boi aldaraba čišü yin kömün qoina bügüde tügejü ögčü
baraba.
今 奴婢 保这阿剌哈 奏 讨 都 指挥敕书。 怎生 恩赐
edüge boɣul baulan ene alaqa öčimü ɣuyun duu jiqui čišü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圣旨　　知道。
jrlq(jarliq) medemü ya.
80. 皇帝洪福前，　建州左卫都督 脱罗　　怯　　怕　奏：天顺　　四 年(1460)十
qaγan nu suu tu , genjiu suu ui dudu tulud emiyeged ayun öčimü, ten šün dörben on arban
二　月　十　　二　日　　除授脱你赤做　都指挥 佥事。今　　保　　他　　做 都
quyar sara arban quyar naran tüšijü tuniči kijü duu jiqui semši. edüge baulan tegün nu qiju duu
指挥同知。成化　　元　　年 二月 十[109]　九　日　除授 歹罕 做　都 指挥使。成化
jiqui tuŋji. čiŋquwa terigün on qoyar sara yisun naran tüšijü taiqan kijü duu jiqui ši. čiŋquwa
十四年(1478)十　　月 初　三　　日　　除授扫察 做　都 指挥佥事，今　　故
arban dörben on arban sara türün γurban naran tüšijü sauča kijü duu jiqui semši. . edüge ügei
了，　保　　他　　　男　　昂克温 袭　　父　　前　职。怎生　　　　　　　恩赐
baraba, baulan tegün nu köbegün aŋkün jalγamji ečige urida čola.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圣旨　　知道。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81. 皇帝洪福前，　朵颜卫都　指挥猛可帖木儿　　　　　　　　　怯　　　怕　　奏：比先
qaγan nu suu tu , duyan ui duu jiqui muŋgetemür (müŋgetemür) emiyeged ayun öčimü, bi san
有 我 父　祖　　管　　　大 职 事 有 来，多　　出气力，辈　辈　　　　进
boi bi ečige ebüge qadaγala yeke čola ši boi ire. olan küčü öggün, üye üye aγuljarin yin (yan)
贡　　　到　京。　今　　　遇　　　　　　　万　　　寿　　　圣　　节　　　　进
üjegülün qürbe giŋ. edüge joluγalduba (jolγalduba) tümen nasutai sain üdür(edür) aγuljarin yan
贡　　　骟　马，专　　差　　指挥兀刺台叩头去了，　奏　　讨　　青　　红　　布、
üjegülün aqta morin. jorin jaruju jiqui ülatai mürgü erčibe. öčimü γuyan küke ulaγan ülejin
帐房、　　鱼　网、　剪子 等　件。　怎生　　　　　　　　恩赐　　　　圣旨
čačir(čačar), jiγasun külmi , qaiši kiged juil.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知道。
medemü ya.
82. 皇帝洪福前，　罕东左卫　都督 只克 奏：奴婢 每 在　　边　　　外　　地　　方
qaγan nu suu tu , qanduŋ suu ui dudu jige öčimü, boγul nar balan qijaγar γadana γajar dörbeljin
出　气力　有，千户 阿儿乞纳在 地　　方　　有　紧　　事，差　　他　　　领
küčü öggün boi, samqu arqina balan γajar dörbeljin boi törgen öile jaruju tegün nu üdüridču
人　　　　　　　马　　　提防　　他　　多 有　功劳，因此，今　奴婢　保　　升

(uduridču) kömün morin mančin tegün nu olan boi güŋlau. tegüber edüge boγul baulan nere
他 职事，望 朝廷 怎生 怜悯， 升 与 他
nemen tegün nu čola ši. egeren degedüs un yambar(yamar) yar eneriqüi, nere nemen ög tegün nu
职事，使 后 人 好 出气力。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čola ši. ši qoina kömün sain küčü öggün.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83. 皇帝洪福前，朵颜卫都督阿儿乞蛮怯 怕 奏：奴婢 敬 顺 天
qaγan nu suu tu , duyan ui dudu arqimal emiyeged ayun öčimü, boγul köndölen daγan teŋri
道， 尊事 朝廷， 诚 心 正直， 出气力行走， 蒙
yin aγur yi, erqilen degedüs un. čiŋ jurüqen (jirüqen) čiŋ šidurγu, küčü öggün yabu küi, muŋ
朝廷与了 大 赏赐 有来。今 遇 万 寿 圣
degedüs un ög baraba yeqe šaŋši boi ire. edüge joluγalduba (jolγalduba) tümen nasutai sain
节。 进贡 骟马 二 匹、骆驼 一 只、差 指挥那孩、帖木儿叩头
üdür(edür) aγuljarin yan üjegülün aqta qoyara ba temegen nigen ji, jaruju jiqui nuqai temur mörgü
去了。又 奏 奴婢 被 歹人 抢 夺 艰难， 奏 讨 帐房、
erčibe. basa öčimü boγul mün daišin talan büliyen(buliyan) yadaŋqi. öčimü γuyan čačir(čačar),
织 金 衣 服、 胡椒、青 红 布、剪子、鱼 网、鞍 子、
nekemel altatu dege(debel) qobčasun, qisaqu küke ulagan büs, qaiči jiγasun külmi ,emegel ši,
嚼头、 手帕、 胭脂、 粉、针。 怎生 恩赐
qadaγar(qajaγar), arčiγur, aŋgesge(eŋgesge), owa,jegün(jegüu).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圣旨 知道。
jrlq(jarliq) medemü ya.
84. 皇帝洪福前， 建州左卫 都 指挥使 花当 怯 怕 奏：成化五年(1469)有
qaγan nu suu tu , genjiu sou ui duu jiqui ši qaudaŋ emiyeged ayun öčimü, čiŋquwa tabun on boi
李三 名字 逃人 在 我每 地 方， 我 花当 将 这
lisan neretu kömün dutaba[110] balan bi nai γajar dörbeljin. bi qandaŋ (qaudaŋ) abuju(abču) ene
人 拿住，送 到 韩 总兵 处 收了。 成化九年(1473)有 朵颜 三 卫
kömün bari ju,üde kürbe qam suŋbiŋ jug(jüg) quriyaba. čiŋquwa yisun on boi duyan γurban ui
达 子 来 抚 顺 所 地 方 抢 夺 时，我每与 他
muŋγul köbegün ire wuu šün suu γajar dörbeljin talan büliyen(buliyan) čag, bi nar ög tegün nu
厮 杀了，他 一 人 送 与 边 上 王 大人 处。 成化
qadγuldun alaba. tegün nu nigen kömün üde ög qijaγar degere ög(oŋ) da šin jug(jüg) . čiŋquwa

十二年(1476 有 王 成 名字 人 逃 在 我每 地 方,我[111]拿住
arban qoyar on boi oŋ čiŋ neretü kömün dutaba(ditaγaba) balan bi nar γajar dörbeljin, bari ju
送 到 兵部 马 大人 处 有来。奴婢 有这等功劳, 今 叩头来了,讨
üda kürbe biŋbü ma dašin jug(jüg) boi ire. boγul boi ein güŋlau. edüge mürgü irebe, γuyan nere
升 都督佥事。 怎生 恩赐 圣旨 知道。
nemen dudu semši.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85. 皇帝洪福前, 福馀卫都督脱罗干 等 叩头 奏 有:迤北 达 子[112]
qaγan nu suu tu, wuyur ui dudu tölögen kiged mörgü öčimü boi , ümetü muŋγul köbegün
乜加思阑太师 将 我每 抢 杀。我 每 得 近 日 依靠 着 朝廷[113]
biγaslan taiši abuju(abču) bi nar talan ala. boi(bi) nar yin(un) oira naran šituju(tüšijü) mün degedüs
差 马大人来 着,我每 多 人 做
un qijaγar yuqurqa saγuqu. moŋ degedüs un jaruju ma dašin ire mün, bi nar olan kümün kijü
买 卖[114]。 我每三 卫头目 十分欢 喜。 今 有乜加思阑太师被
qudalduju ab qudaldu. bi nar γurban ui teümü maši qun bayasba. edüge boi bigeslen taiši mün
人杀了,我每 听 得 这等信, 差 人 朝廷 前 奏 报。
kümün alaba. bi nar sonus olun ein bisiregül , jaruju kömün degedüs un urida öčimü kele.
怎生 恩赐 圣旨知道。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medemü ya.

86. 皇帝洪福前,福馀卫 大 小 头目 人 等 叩头奏: 今 我 每 处
qaγan nu suu tu, wuyur ui yeke öčüken teümü kömün kiged mörgü öčimü , edüge bi nar jug[115]
有主剌把都儿 等 今 年 三 月 间,往 迤北 达 子 处 打 听
boi jula badur kiged, edüge on γurban sara jaγura üdün ümetü muŋγul köbegün jüg kübši sonus
声 息[116], 五 月 内 回 来了,言 说 迤北 达 子 移 营
üsüg juluji, tabun sara dotura hari[117] irebe. üge kele ümetü muŋγul köbegün nigübe[118]
往 西 行 了,因此 奏 报。 怎生 恩赐 圣旨
üdün ürüne yabu barba. tegüber öčimü kele. yambar(yamar) yar soyurqaqu yi jrlq(jarliq)
知道。
nüntüs [119] medemü ya.

注 释

〔1〕《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书》6,书目文献出版社,第325—368页。

〔2〕参看拙文《明四夷馆"韃靼馆"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第67—68页。

〔3〕此处86篇韃靼馆"来文"中第1—14篇是"东洋文库本"和"柏林本"中内容相同的部分;第15—30篇收于"东洋文库本";第31—46篇收于"柏林本";第47—86篇属于"北图珍本"。关于《华夷译语》韃靼馆"来文"的编号情况,详见拙文《明四夷馆"韃靼馆"来文初探》,《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7辑,2004年8月,第137—140页。

〔4〕斡阑卫属于韃靼卫所还是属于女真卫所,待考。建于明永乐五年(1407)。此处与"斡阑"对应的蒙文为"oran",柏林本为"olan"。

〔5〕蒙古文部分中,"指挥"、"同知"等词直接音译。

〔6〕蒙古文部分中,缺与"赴京进贡"对应的蒙古语。柏林本中有对应的蒙古文"wuu giŋ aγuljarin yan üjegülün"。

〔7〕蒙古文部分中,"赏赐"一词直接音译。

〔8〕蒙古文部分中,缺与"进贡驼马等物"对应的蒙古语。柏林本中有对应的蒙古文"aγuljarin yan üjegülün temege morin kiged ed"。

〔9〕缺与"奏"对应的蒙古文。柏林本中有"奏"对应的蒙古文"öčimü"。

〔10〕忽儿海卫,女真卫所之一,建于明永乐七年(1409)三月。

〔11〕与"地方"一词对应的蒙古文"地"意译为"γajar","方"直译为"dörbeljin"(方形之意)。

〔12〕"马匹"一词译为"morina",柏林本中译为"mori ba"。"匹"字音译为"ba"。

〔13〕蒙古文部分中,缺与"彩缎表里、织金衣服等件"对应的蒙古文。柏林本中有与"彩缎表里、织金衣服等件"对应的蒙文"ardu törge γadar dotur, nekemel altatu degel qubčasun kiged jüil"。

〔14〕缺与"望"对应的蒙古文"egeren"。

〔15〕毛怜卫,属建州女真,明永乐三年(1405)十二月设立。

〔16〕建州左卫,女真卫所之一,明永乐六年(1408)分设此卫。

〔17〕柏林本中"脱罗"译为"tolod"。

〔18〕汉文部分中,缺与蒙古文"edüge"对应的汉字。柏林本中有与"edüge"对应的"今"字。

〔19〕"管束"一词,柏林本译为"qataγal un"。

〔20〕福馀卫,蒙古兀良哈三卫之一。

〔21〕柏林本中"遇"字译为"joluγalduba"。东洋文库本的翻译是正确的。

〔22〕朵颜卫是蒙古兀良哈三卫之一,洪武二十二年(1389)置兀良哈三卫,即朵颜、福馀、泰宁三卫。

〔23〕柏林本中"花当"一词译为"qaudaŋ"。

〔24〕童宽山卫,女真卫所之一,建于明永乐六年(1408)二月。

〔25〕蒙文部分中,与汉文"成祖"相对应的词为"daisuŋ"(太宗),翻译有出入。柏林本中蒙汉文部分中的记载是相符的,为"太宗"对应"daisuŋ"。

〔26〕屯河卫,女真卫所之一,建于明永乐三年(1405)八月。

〔27〕"冲山"译为"čola"(职)是错误的。在柏林本中没有出现汉字"职",也没有蒙古文"čola","冲山"一词音译为"čuŋšan"。

〔28〕柏林本中为"jüdüŋ"。

〔29〕渚冬河卫,女真卫所之一,建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十月。

〔30〕柏林本中"千户"一词音译为"semgu"。东洋文库本译为"semši"(佥事的音译)。

〔31〕蒙古文部分中,缺与"讨升指挥职事"相对应的蒙古文。柏林本中有"γuyan nere nemen jiqui čola ši",译成"semgu"是正确的。

〔32〕柏林本中音译为"yiute"。
〔33〕友帖卫,女真卫所之一,建于明永乐六年(1408)三月。
〔34〕柏林本中缺汉文"靴袜"一词。
〔35〕汉文部分中,缺与"dudu"相对应的"都督"一词,柏林本中有"都督"一词。
〔36〕蒙古文部分中,缺与"不敢怠慢"相对应的蒙古文。柏林本中有"ölü büged osuldan"。
〔37〕渚冬卫,应是渚冬河卫,女真卫所之一,建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十月。
〔38〕柏林本中"已故"一词译为"ügei boluqsan"是正确的,东洋文库本的翻译错误。
〔39〕哈密卫,西域卫所之一,建于明永乐四年(1406)。
〔40〕建州卫,女真卫所之一,建于明永乐元年(1403)十一月。
〔41〕汉文部分中,缺与蒙文"qijaγar"对应的"边"字。
〔42〕蒙古文部分中,缺与"三年来进贡"对应的蒙古语。
〔43〕蒙古文部分中,"青缎子"一词,"子"字被直译为"köbegün"(儿子之意)。山崎忠在《乙种本〈华夷译语〉鞑靼馆"来文"的研究》一文中,根据蒙古文部分日译时,将"青缎子",误译为"青缎子、男子"。
〔44〕蒙古文部分中,"匹"字直接音译。
〔45〕兀者前卫,女真卫所之一,设于明永乐五年(1407)。
〔46〕"掌印"一词,被直译为"alaγan tamaγa"(手掌之印)。
〔47〕汉文部分中,缺与"ire"相对应的"来"字。
〔48〕蒙古文部分中,缺与"日除授前职,出力气多"相对应的"naran tüšijü urida čola. küčü öggün olan"。
〔49〕罕东左卫,西域卫所之一,建于明成化十五年(1479)始设。
〔50〕蒙古文部分中,缺与"表里"相对应的蒙语"γadar dotur"。
〔51〕蒙古文部分中,缺与"靴袜"相对应的蒙语"qutusun quyimusun"。
〔52〕"功劳"译为"güŋlejü",音译"功"字,加蒙古语动词时态。
〔53〕蒙古文部分中,"赏赐"一词,直接音译。
〔54〕塔山卫,女真卫所之一,建于明永乐四年(1406)二月。
〔55〕山崎忠在《乙种本〈华夷译语〉鞑靼馆"来文"的研究》一文中,认为汉文部分中,缺与蒙文"nebteren"对应的汉字。此处汉字"坏"字是蒙文"nebteren"的对应词。"qaγaraju nebterekü"是"破坏"、"破损"、不成样子的意思。
〔56〕蒙古文部分中,缺与"奏"对应的蒙文。
〔57〕与"都督"对应的蒙文是"šini(šine)",是汉字"新"的意思。从此"来文"内容分析,"都督"是错误的,应该是"新"字。
〔58〕速平江卫,女真卫所之一,建于明永乐四年(1406)二月。
〔59〕汉文部分中,缺与"今讨升都指挥佥事"相对应的蒙古文"edüge γuyun nere nemen duu jiqui semši čola ši"。
〔60〕考郎兀卫,女真卫所之一,建卫于明永乐五年(1407)三月。
〔61〕建州右卫,女真卫所之一,正统年间置。
〔62〕汉文部分中缺与蒙古文"dam daum"相对应的汉字,此处"dam daum"的意思不详,其相对应的汉字待考。
〔63〕弗提卫,女真卫之一,明永乐十年(1412)置。
〔64〕缺与"yeke"对应的汉字"大"。
〔65〕注:"来文"蒙古文部分中,将"四方"一词直译为"dörben dörböljin "(四个方形)。
〔66〕注:"来文"蒙古文部分中,将"海外"一词直译为"dalai γadana"。
〔67〕注:"来文"蒙古文部分中,"天命"一词,"天"字意译,"命"字音译。"番王"、"及""头目"等词,

也是音译。

〔68〕注:《华夷译语》"衣服门"中"布"字译为"olajin"(斡列真),名词,指一种织物。"来文"蒙古文部分中,将"布"这一动词直译为"olajin"。

〔69〕蒙古文部分中,对"帝"、"之"、"施"、"凡"、"覆"、"所"、"其"、"欲"、"致"、"失"、"普"、"安分"、"勿"、"违"、"寡"、"凌"、"弱"、"诚"、"朝"等字、词,直接音译。

〔70〕麓川、平缅是地名,今云南省西南边境地区。"来文"蒙古文部分中,直译为"luu čüle tübsin maŋqa"。

〔71〕蒙古文部分中,"宣慰使"音译为" sön yui ši"。

〔72〕"思任发"音译为"sšiwa",汉字"人"被译为"ši"音。《明史》卷三一四,云南土司二条记载为"思伦发",任平缅宣慰使司的宣慰使。

〔73〕"来文"蒙古文部分中,将"方物"一词直译为"dörböljin ed"(四方形物),《华夷译语》"鞑靼馆译语"未载"方物"一词,通用门有"方"字,译为"dörböljin"(朵儿边勒真),此"来文"中的蒙文翻译可能根据这一"方"字直译的。

〔74〕注:"来文"蒙古文部分中,对"以"、"宜"、"以副朕"等字、词进行了音译。

〔75〕注:"来文"蒙古文部分中,杨信之前,多出"都督"一词,"大同"、"总兵"、"都督"、"杨信"等词,直接音译。

〔76〕注:亦里把里指地名,"ili barq"的汉字音译。突厥语"barq"指城市,应是今新疆伊犁城。

〔77〕蒙古文部分中,"地面"一词,"地"意译,"面"直译为"niɣur"(脸面的意思)。

〔78〕注:海西是女真部卫所之一。

〔79〕蒙古文部分中,"日"被直译为"naran"(太阳)。

〔80〕注:蒙文部分里,"下程"一词被直译为"duura cing","下"字为意译,音译"程"字。在续增《华夷译语》中的"鞑靼译语"饮食门中"下程"一词译为"šigüsün"(失兀孙),是指馔、膳的敬语。元代文书中与"šigüsün"对应的汉文为"祗应"一词,见《薛禅皇帝牛年(1277—1289)圣旨碑》。

〔81〕汉文部分中缺与蒙古文"ide"相对应的汉字"吃"。

〔82〕汉文部分中缺与蒙古文"guua guua"(汉语"个个"的音译词)相对应的汉字"个个"。

〔83〕"韩"被音译为"qam"。汉文中的"n"音在蒙文中被译为"m"音。

〔84〕"苦楚"直接音译为"küčü"。

〔85〕阿真河卫,是女真卫所之一,建卫于明永乐六年(1408)二月。

〔86〕纳剌河卫,就是答剌河卫,是女真卫所之一,建卫于明永乐五年(1407)。

〔87〕将"开原城"的"开原"(地名)直译为"nege(打开)ujaɣur(原来)","城"译为"balɣasun"(镇)。

〔88〕兀者左卫,是女真卫所之一,建卫于明永乐二年(1404)二月。

〔89〕汉文部分中,缺少与"bi"相对应的"我"字。

〔90〕朵伦卫属于鞑靼卫所还是属于女真卫所及始设年代等,待考。

〔91〕蒙文部分中缺少与"的"相对应的蒙文"yin"。

〔92〕兀者卫,女真卫所之一,建于明永乐元年(1403)十二月。

〔93〕"大帽子"直译为"bürge köbegün"。"来文"第22中"大帽"译为"bürge"。鞑靼馆"来文"中将"大帽子"、"珠子"、"青缎子"等词中的"子"字直译为"köbegün"(儿子之意)。多处出现这种错误。

〔94〕"地方"被直译为"ɣajar(地) dörbeljin(方形)"。

〔95〕"擒"字被音译为"čim",这里汉语中的"n"音,在蒙文中被译为"m"音。

〔96〕完者秃成化五年七月任都指挥佥事。此"来文"虽无年代记载,根据完者秃的在任年代,可断定是成化年间的来文。

〔97〕"珠子"被直译为"sobud (真珠)köbegün(儿子)"。《华夷译语》珍宝门"珠"译为"sobud (速不

惕)"。这里将"珠子"的"子"字译为"köbegün"是错误的。

〔98〕赏哈是在正德三年二月袭职,此"来文"应是正德年间来文。

〔99〕阿者迷河卫,女真卫所之一,建于明永乐六年(1408)二月。

〔100〕"蒙"被音译为"meŋ",有时被译为"egeren"。

〔101〕兀列河卫,女真卫所之一,设于明永乐五年(1407)。

〔102〕脱罗成化五年七月任都指挥同知,正德元年故。

〔103〕撒鲁河卫属于鞑靼卫所还是属于女真卫所及始设年代等,待考。

〔104〕卜忽里卫属于鞑靼卫所还是属于女真卫所及始设年代等,待考。

〔105〕蒙古兀良哈三卫,即朵颜、泰宁、福馀三个卫所。

〔106〕"骟马"译为"aqta morin","骟马"即译为"aqta"就可以了,加"morin"多余。

〔107〕"妻子"译为"gergei(妻子) köbegün(儿子)"。

〔108〕这里缺少与蒙文"boi"相对应的汉文"有"字。

〔109〕蒙文部分中,缺少与"十"对应的" arban"。

〔110〕"逃"应译为"dutaɣaba"。这里译为"dutaba",与蒙古语口语接近,将其当作书面语来翻译是错误的。

〔111〕蒙古文部分中缺少与"我"字相对应的蒙文"bi"。

〔112〕"达子"指"蒙古",应译为"muŋɣul"。这里直译为"muŋɣul qöbegün"(蒙古男子)。

〔113〕汉文部分中,缺少与蒙文"degedüs un qijagar yuqurqa saɣuqu. moŋ"相对应的汉字。蒙文的意思是"朝廷边墙居住,蒙朝廷"。《蒙古秘史》和《华夷译语》中"yuqurqa"被译为"墙"字。

〔114〕"做买卖"被直译为"kijü qudalduju ab qudaldu"。应译为"qudaldaɣu kij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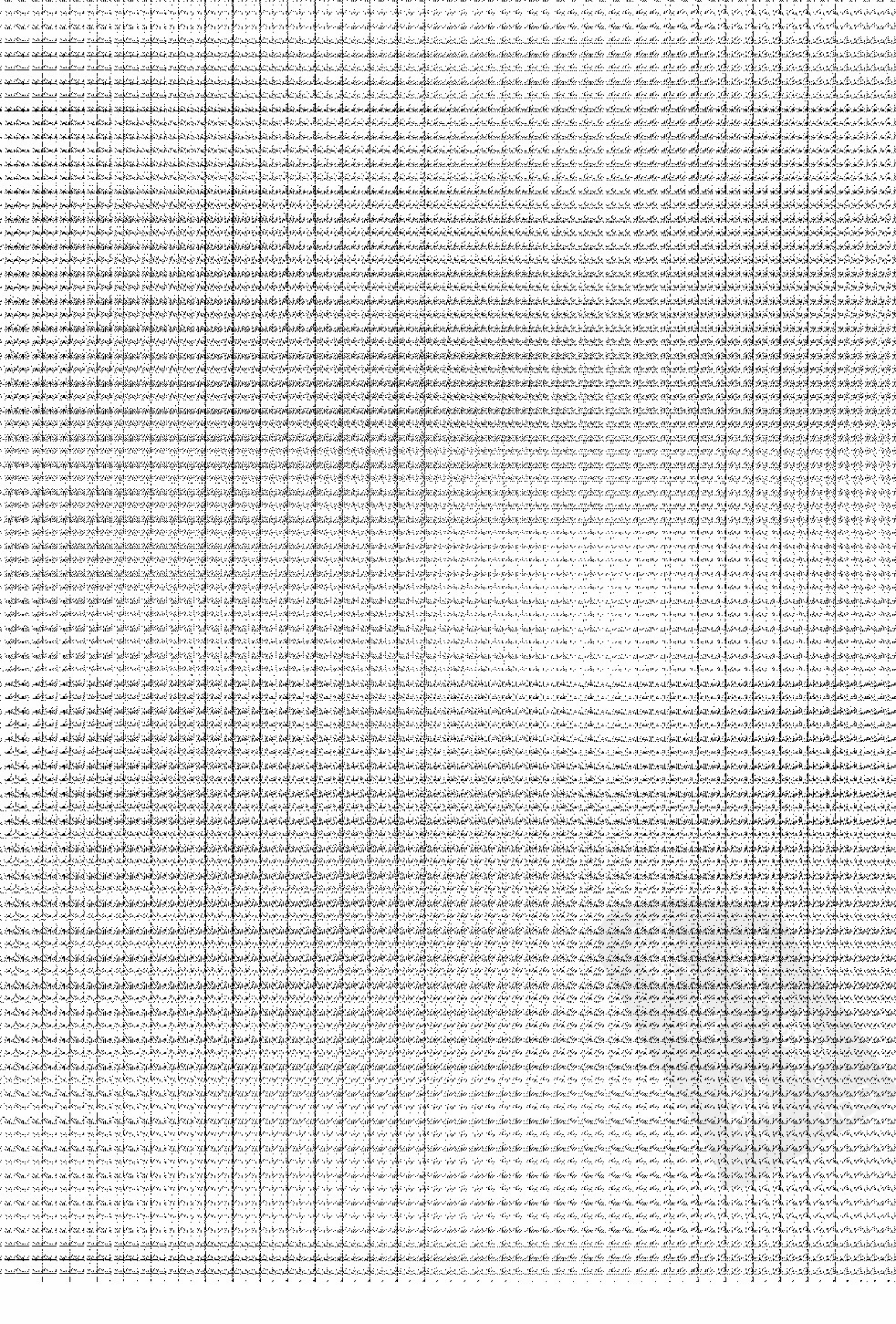
〔115〕"jüg"的误写。

〔116〕这里"声息"译为"üsüg juluji",续增《华夷译语》"人事门"中"声息"一词被译为"üsüg sabaɣan"(兀 租克撒巴安)。

〔117〕"qariju"的误写。

〔118〕"negübe"的误写。

〔119〕"nutuq"的误写。



对“农作—语言扩散假说”的审视

徐 文 堪

众所周知，自19世纪的拉斯克(R. C. Rask ,1787—1832)、格林(Jacob Grimm, 1785—1863)和其他学者发现所有印欧语都有共同起源以来，近两个世纪对原始印欧语的构拟和对其故乡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过。在原始印欧语的研究方面，我们可以举出如梅耶(Meillet)、库里洛维奇(Kurylowicz)、加姆克列利则(Gamkrelidze)和伊凡诺夫(Ivanov)等著名语言学家。在印欧语的发源地和其迁徙过程的研究方面，当代最有影响的学者是吉布塔斯(Marija Gimbutas)和剑桥大学的伦福儒(Colin Renfrew)，他们把考古学材料和语言学证据相结合，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除印欧语系之外，南岛语系的分布和扩散也日益引起全世界学术界的关注，在这方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是较有代表性的。

伦福儒认为，原始印欧语得以传播和分化，实际上是农业扩散的结果。印欧语系起源于小亚细亚的中部和东部，从公元前7000年开始，操印欧语的原始农夫从小亚逐渐向欧洲和亚洲迁徙，呈波浪式前进，把农业引入原先过采集和狩猎生活的居民居住的地区，这些居民在学会农业的同时，语言上也逐渐被同化，从而使印欧语得以不断扩散。至于南岛语系，分布地区极其广泛，东到太平洋的复活节岛，西到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北到夏威夷，南到新西兰。贝尔伍德认为，南岛语系的分布是与稻作农业联系在一起的[2]，正是由于稻作农业由我国长江流域向东南沿海的传播，造成了东南沿海地区人口的膨胀，并最终促使操南岛语系语言的居民在距今6000年左右从大陆向太平洋岛屿的迁徙。夏威夷大学的语言学家白乐思(Robert Blust)则认为南岛语系与南亚语系的关系非常密切，二者构成Austric大语系，其发源地就在长江流域中游[3]。

对于上述“农作—语言扩散假说”(The farming-language dispersal hypothesis)，近年来已经引起热烈的争辩和讨论。2001年8月，贝尔伍德和伦福儒在剑桥的麦克唐纳考古学研究所(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组织了一次专题国际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英、美、德、法、俄、意大利、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爱沙尼亚、克罗地亚、菲律宾、

荷兰、丹麦、科威特等各个国家的学者,议题涵盖了历史语言学、史前考古学、分子遗传学和人类生态学等领域。会后由两位考古学家合编的论文集已于 2003 年出版(*Examining the Farming/Language Dispersal Hypothesis*, **Peter Bellwood and Colin Renfrew, Eds.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Cambridge**, 2003,519**pp**)。这部内容丰富的文集共收入 57 位作者的 36 篇论文,最后是两位学者的跋语,对会议讨论的问题作了结论性的评述。

全书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共 2 章,分别由伦福儒和贝尔伍德撰写,强调了语言学、考古学和遗传学三者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第二部分从各个角度对"农作—语言扩散假说"作了总体论述,共 7 章。第三部分是地区研究,分为"西亚和北非"(6 章)、"亚洲和太平洋地区"(9 章)、"中美洲和美国西南部"(4 章)、"欧洲"(8 章)四大地区。

本书各章的观点并不一致。有的作者对"农作—语言扩散假说"表示赞同,对这一假说进行了多方面的阐释;也有作者质疑该假说的某些论点,或者提出一系列值得继续探索的问题。这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和研究"假说"都是非常有益的。

对欧亚学研究者来说,占本书很大篇幅的探讨亚洲、太平洋地区和欧洲的论文特别有用。

例如,关于前面提到的印欧语和印欧人的起源和迁徙问题,现在还远远没有解决。伦福儒认为印欧人起源于中东,安纳托里亚是其故乡,早期农耕者在不断的扩张中把古印欧语带到了欧洲,所以欧洲语言的洪流中应该有基因变化引起的波浪。但是,近年的 DNA 研究却表明这种"农业先导"对欧洲的基因库影响很小,似乎只限于临近中东的地区,比如希腊人的 DNA 中有新石器时代的成分,而爱尔兰人则完全没有新石器时代 Y 染色体的标记。另一方面,从捷克到阿尔泰地区,一直向南贯穿中亚,M17 这个标记出现的频率都很高,出现的时间则为 1 万年到 1 万 5 千年之间,"微卫星定位"多样性显示,它最早起源于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M17 标记是 M173 的后代,而 M173 起源于欧洲。M17 产生的地区、分布情况和产生的年代,都表明它是在吉布塔斯所主张的库尔干(Kurgan)文化的代表者骑马穿越欧亚草原的迁徙过程中扩散开来的。在印度说印欧语的人群中,M17 出现的频率也较高,而在南部说达罗毗荼语的人群中则相对较低。这个标记在中东出现的频率并不高,在伊朗西部出现的频率也低。所有这些基因数据和种种考古发现,都证实印欧语最早起源于俄罗斯南部的假说可能是成立的[4]。当然,对中东起源说也不能轻易否定,虽然目前找到的证据很少,但遗传学家卡瓦利—斯福扎(Luca Cavalli - Sforza)和他的同事已经证明,有一些基因证据表明有移民从中东进入欧洲,并将最早的"前古印欧语"带进了欧洲,包括库尔干地区,但由于时代久远,印欧语农耕者所携带的基因信号已经消失。总之,不管哪种假说,都还有待未来

的语言学、考古学和遗传学研究的检验。对我国古代操印欧语族群(吐火罗人和伊朗语族群)的起源的探索,也应作如是观。

操汉藏语的族群的起源问题,自然也是我们十分关注的。最近宿兵、金力等教授的工作,已经取得了进展[5]。本文集中收入了荷兰学者 George van Driem 的论文,他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就主张把汉语归入藏缅语[6],而不是像传统观点那样,在汉藏语系之下分出藏缅语族和汉语族。可惜这一新观点至今没有引起我国语言学家的重视和讨论。而汉藏语言的比较研究,自 John Leyden 在 1808 年指出汉藏语若干语言具有同源关系以来,也已有将近两百年的历史,但正如龚煌城先生所指出[7],至今还远远落在印欧比较语言学之后,相对而言还属初级阶段,两组语言的语音对应规律,由于缺乏足够数量的确实可靠的同源词,还不能加以总的、全面的叙述。因此,我们必须从可靠的同源词中去发现正确的对应关系,再从正确的对应关系中去发现更多的同源词;而同源词的研究也应以发现汉藏语言演变发展的规律为其目标。龚先生所论,应是今后汉藏语言学家努力的方向。

关于南岛语系的起源问题和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共同构成的 Austric 大语系的发源地问题[8],自然也是中国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和遗传学家应该时刻放在心头的大课题。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展开叙述。

与这本论文集出版几乎同时,贝尔伍德与另一位著名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合写的论文 Farmers and Their Languages: The First Expansions 在 *Science* 刊出(Vol 300:597—603,2003)。戴氏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系教授,以生理学开始其科学生涯,进而研究演化生物学和生物地理学,曾在新几内亚进行考察,收获甚丰,被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和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其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9]和《第三种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10]都已译成中文出版。他们在这篇论文中认为[11],世界上有多个农业起源中心,如西南亚,亦称近东或新月沃地;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墨西哥中部和南部以及中美洲的毗连地区;南美安第斯山脉地区,可能还有亚马孙河流域的毗连地区;美国东部;非洲的萨赫勒地带;热带西非;埃塞俄比亚和新几内亚等。农业人口由这些地区向外扩散,随之造成语言和生活方式的传播,这是全新世人类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农作者与狩猎—采集者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可以生产出足以养活更多人口的食物,从而造成农业地区人口的较快增长,而且大多数农业生活是定居的,这就为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复杂化和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当农业人口的数量和集中达到一定程度时,因为与驯养的动物长期生活在一起,极易传染上动物所得的传染病,但也逐渐产生了抵抗这些疾病的能力。而在他们向居住着狩猎—采集者的地区推进时,又把各种传染病带到这些地区,由于狩猎—采集者缺乏抵御疾病的能力,结果人口锐减。欧亚大陆的病菌在大量消灭世界

上其他许多土著民族如太平洋诸岛居民、澳大利亚原住民、非洲南部的科伊桑民族（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造成了农业社会在几千年内基本取代了狩猎—采集社会。在全球的不同地区里，这个取代过程相当复杂，但农业人口的不断扩张，是绝大多数取代过程中都存在的普遍现象。

作者进而论证了世界上各大语系形成的过程，列举了班图（尼日尔—刚果）语系，Arawak (Taino)，南亚、壮侗和汉藏，Uto—Aztercan，Oto—Manguean、Mixe—Zoquean 和马雅，新几内亚高地，日本，南岛语系，达罗毗荼语，亚非语系和印欧语系的情况，指出农业人口的扩张和迁徙是造成当今世界上各大语系分布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

戴蒙德还在 2003 年 9 月 10 日的《洛杉矶时报》上发表了题为《当年的全球化》的文章，这篇文章提出的论点也很引人注目。

作者认为：我们往往把全球化看成一种典型的现代产物，是随着 20 世纪交通、科技、农业和通讯等领域取得巨大进步而出现的。但是实际上，文化、语言、政治思想和经济制度甚至转基因作物，从若干中心地区向其他地区广泛传播，却是古已有之的现象。

古代的农民不仅学会了如何种植粮食作物和饲养家畜，而且还懂得如何选择有价值的品种，从而创造出转基因作物。随着转基因作物传播到世界各地，创造了这些作物的文化也随之传播。

第一波全球化浪潮大约在公元前 8500 年开始，主要是因为中东地区和中国创造出转基因作物。除这两个地区外，墨西哥、安第斯山地区和尼日利亚与此也有一定的关系。这些地区的农耕者占有很大的优势，因为只有某些种类的野生动植物才适宜家养，而其中大多数刚好出自上述中心地区。

生活在这些农业中心的古人彻底改变了社会的面貌。狩猎和采集者放弃了原来的生活方式，转而在花园、果园和草场附近的村落里过一种更安全、更稳定的生活。剩余农产品可以贮存到冬天，这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供养那些不直接参与粮食生产的人。由于有了剩余食物而且生活稳定，农耕社会的人口密度比周边由狩猎和采集者构成的社会要高一千倍。

最后，这些农业中心有能力发展军事和经济，结果就出现了全球化。古代的农耕者从农业中心出发，带着他们的基因、食物、技术、文化、典籍和语言，走向世界。未来的考古学、语言学和遗传学将进一步证实这一点。

第一波全球化进程主要是沿东西方向进行的，在欧亚大陆速度最快，这是由于其东西向的主轴线和相对而言不太大的生态与地理障碍所致。对于作物、牲畜和技术的传播来说，气候和纬度的适应性是极其重要的因素，所以欧亚大陆在古代可以视为一个整体。传播的速

度在非洲就比较缓慢了，而在美洲尤其缓慢，这是由于这两个大陆的南北向的主轴线和地理与生态的障碍。在传统的新几内亚，这种传播也很困难，因为崎岖的地形和高山漫长的主脉妨碍语言和政治方面统一的任何重大进展。

总之，“农作—语言扩散假说”是西方学者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得出的关于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的一种重要理论，涉及全球考古学、历史语言学、分子生物学和生态学的重大进展[12]，中国学者必须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且及时作出自己的回应。

注 释

〔1〕C. Renfrew, Models of change in language and archaeology, *Th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87 (2), 1989, 103—55.

〔2〕彼得·贝尔伍德《史前东南亚》，载尼古拉斯·塔林主编、贺圣达等译《剑桥东南亚史》（第一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2—112页。

〔3〕R. Blust, Beyond the Austronesian homeland: the Austric hypothesi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archaeology, in Prehistoric settlement of the Pacific, ed, W. H. Goodenough.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86(5), 1996, 117—40.

〔4〕斯宾塞·韦尔斯(Spencer Wells)著、杜红译《出非洲记——人类祖先的迁徙史诗》，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42页。

〔5〕B. Su, C. Xiao, R. Deka, M. T. Seielstad, D. Kangwanpong, J. Xiao, D. Lu, P. Underhill, L. Cavalli—Sforza, R. Chakraborty and L. Jin, Y—chromosome haplotypes reveal prehistorical migrations to the Himalayas, *Human Genetics*, 107(6), 2000, 582—90.

〔6〕G. van Driem, Tibeto—Burman replaces Indo—Chinese in the 1990s: review of a decade of scholarship, *Lingua*110, 2002, 79—102.

〔7〕龚煌城《汉藏语研究论文集·自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ii—iii页。

〔8〕《问题与讨论：DNA的研究与南岛民族的起源》，《语言暨语言学》第2卷第1期，2001年，第229—78页。

〔9〕贾雷德·戴蒙德著、谢延光译《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

〔10〕杰拉德·戴蒙德著、王道还译《第三种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

〔11〕焦天龙《“农作/语言扩散假说”与中国考古学》，《中国文物报》2004年4月9日第7版。

〔12〕贝尔伍德的最新著作 *First Farmers, The Origin of Agricultural Societies*(2004)已在最近出版。又：本文写成后，得知文中提及的戴蒙德教授最近出版了新著《崩溃》(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ll or Succeed.* XVI + 579 pp. Viking, 2005)，对一些曾在历史上辉煌一时的人类社会文明的衰落乃至“崩溃”的普遍共性作了分析。

《欧亚学刊》章程

一、本学刊所谓"欧亚"主要指内陆欧亚(Eurasia),大致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瑙河、伏尔加河流域,具体而言除中欧和东欧外,主要包括我国东三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以及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斯坦、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其核心地带即所谓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

二、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是世界历史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份,东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美洲历史文化上有许多疑难问题都必须通过加强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将内陆欧亚历史文化视作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才能获得确解。我国作为内陆欧亚的大国,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更是责无旁贷;有关研究不仅饶有学术兴趣,而且足以加深睦邻关系,为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有利的周边环境,因而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

三、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上活动于欧亚草原及其周邻地区(特别是我国甘肃、宁夏、青海、西藏和小亚、伊朗、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鲜乃至西欧、北非等地)诸民族本身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和交涉。由于内陆欧亚(尤其是其核心地带)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其历史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

四、"欧亚学刊"是不定期、连续性学术刊物。凡属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范畴的专题(或资料)研究论文,内容充实,有一定广度、深度,均在收辑之列,只要文字洗炼,篇幅可以较长(一般不超过5万字)。尤其欢迎系统研究成果。每辑约30万字左右。一年左右出版一辑。

五、本刊主要登载中国学者的有关论文,也适量刊用外籍学者同类论文。后者主要以汉译文的形式发表,若为英、日、德、法、俄文,亦可以原文发表。

六、本刊主要刊登论文,也适量刊登有关的书评。书评提倡实事求是,反对一味捧场。

七、汉文稿件具体要求如下:

(一)使用大小相同的有格稿纸,每格一字,标点占一格,稿面要整洁。

(二)字迹要清楚,字体要端正,不要草书或行书。

（三）主要使用简化字（以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布者为准）；如引用古籍必须用繁体者，须予注明。某些文章由于内容需要，亦可按作者要求全文用繁体编排。

（四）章节层次清楚，序号一致，其规格举例如下：

第一档：一、二、三

第二档：（一）、（二）、（三）

第三档：1、2、3

第四档：（1）、（2）、（3）

（五）书名加书名号"《》"书名中嵌套的书名用"〈〉"号；篇名、报刊名加引号。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历代（包括民国）纪年，在文中首次出现时，一律标出公元纪年。

（七）引文应仔细核对，做到准确无误。引用古籍，须注明书名、篇名（或卷数），若非常见古籍，还应注明版本；篇名置于书名号内，其间用"·"隔开，如：《汉书·西域传》。

（八）注释全部放在文章末尾，不用脚注或边注，除非确实必要，亦不用夹注。注号[1]、[2]、[3]，置于字、句右上角。再次征引，用"注[1]所引文或书第几页"或"同注[1]"等形式，不合并注号。

（九）文献资料的出处必须注明著译者、书或论文名、出版地点和出版者、出版年月。如系外文论著，英、日、德、法、俄用原文，不必汉译；其余用拉丁字母转写，并附汉译。书、刊引用次数较多者一律使用略语。略语表应置于注释最前面。如：JRAS：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其格式举例如下：

1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页78—104。

2　季羡林"浮屠与佛"，《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页323—336。

3　荣新江"龙家考"，《中亚学刊》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页144—160。

4　北村高"コタン出身译经僧と华严经について"，"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17（1978），页88—93。

5　A. Stein,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Oxfort, Clarendon Press, 1928, pp. 67—90.

6 E. G. Pulleyblank,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 in *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66), pp. 9—39.

（请注意外文斜体的运用）。

（十）标点符号的书写要注意：逗号、顿号、句号、分号、冒号、问号、感叹号不要放在每行顶端；引号、书名号、括号的前半边不要放在每行末尾，后半边不要放在每行顶端；删节号、破

折号可放在每行顶端,但不能分作两行书写;行文中删掉一句或数句,用六个点,删掉一个自然段,用十二个点,并另起一行。完整的引文,句号写在引号内;不完整、夹引夹议或转述类引文,句号和逗号要写在引号和注号外。引文后的注号应紧接引号,必要时亦可放在引号外的标点之后。

(十一)专名的汉译: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暂时只能提出以下要求:

1. 儘量采用约定俗成者。

2. 译名在做到全文一致的基础上,尽可能与本刊前出各辑已采用者统一。

3. 不习见的专名,在文中首次出现时,请附上原文,除俄文外,一律使用拉丁字母转写形式。

(十二)插图:如文中需要插图,请作者提供清晰的照片(或底片、翻转片),绘制精确的图、表等,并在稿中相应位置留出空白(或用文字注明);图、表编号以全文为序。

(十三)来稿请附汉英文提要,同时提供大作英文名称。

(十四)欢迎电脑打字稿(A4 型纸隔行打印)。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欧亚学刊　　（第五辑）
作者=余太山，李锦绣主编
页数=295
SS号=12163868
出版日期=2005.6
出版社=中华书局
主题词=东方学（学科：　丛刊）东方学
参考文献格式=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学刊　　第5辑.北京市：中华书局，2005.
内容提要=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经费资助：本书是关于欧洲、亚洲历史研究的文集，收录的理论文章有：《匈奴的崛起》、《民众信仰与国家建构：关于黑秃阿喇的七大庙》、《斯文赫定收集品的新刊楼兰文书》等。